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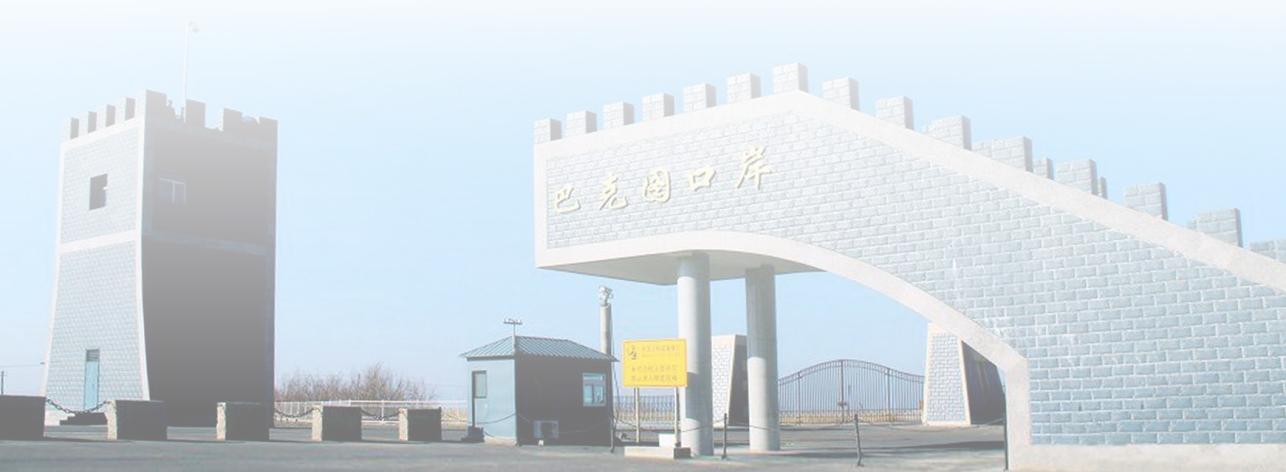
塔城地区特色文化系列丛书

塔城地委宣传部 主编
塔城地区文联

新疆塔城

口岸文化

刘向晖著



《塔城地区特色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尔肯江·吐拉洪

副主任 张 博

总策划 陈建国 朱 钢

编 委 潘玉芝 张东明 薛茂奎 刘向晖 郭天成

编 务 杨 军 杜继高 黄祥林

序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制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特指精神财富。塔城是一个富有的地方，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在精神层面的。宝物如此之多，不胜枚举，只能精挑细选。2012年1月，地委一号文件明确，戍边文化、口岸文化、包容文化、生态文化是塔城特色的“四大文化”，这里应成为特色，成为精品。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特，人特我精！

汉唐康居，元朝封地，清代卡伦，东归驻防，火烧沙俄贸易圈，巴尔鲁克山我不租给你了！巴什拜献物资保家抗日、捐飞机卫国抗美，孙龙珍巾帼单枪战群敌，小白杨挺拔在这里戍边！我们自豪地——爱国。

刺刀划开的口子，西出远游的岸滩，有过被迫，更是抉择。从现在追溯250年，掠夺者从这里冲进来掘金，逃荒者从这里走出去求生；探险者从这里闯进来猎奇，着魔者从这里走出去梦游；合作者从这里进来谋求发展，进取者从这里出发勇敢开拓；身后有强盛的国家，这里是口更是岸！我们自信地——开放。

“北京精神”有八个字，其中就有“包容”，新疆在祖国的西北角，塔城在新疆的西北角。首都要包容整个地球，西北角的西北角，没有包容就难以生存，就会被世界遗忘。全地区有27万个家庭，两个以上民族构成的家庭占7.5%……

“我们都是塔城人，我们都是新疆人，我们都是中国人”，说这句话的玛丽亚老人已经走了，但这句话的哲理已融入塔城人的血脉之中。我们都要做合格的中国人、称职的新疆人、优秀的塔城人！不用奖励，何需优待，对方已经是家庭的一员、生命的组成，还有去问族别的必要？一家人有相互嵌入的包容！我们自然地——和谐。

这里曾是准噶尔古海，骆驼石的发现把人类在新疆的活动提前了43000年。游牧民族敬畏山河草原，农耕民族珍惜水源土地。这里要发展，但更要可持续地发展；这里也要进步，但不要牺牲生态地“进步”。五弦之都，不能弹出干渴的苦涩，而要美如油画；绿色额敏信手拈来都是有机；老风口层林尽染让天蓝得过分；遍地山花在巴尔鲁克开得放肆；赛尔群山就是吉祥的哈达；乌苏自

古有西湖；翠山碧玉鹿角湾。“农业用水减下来，毁草开荒禁下来，种植面积调下来”，没有下来哪有起来，年年用力，久久为功，舍得舍得，先舍后得！庄子说：“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生生不息，天人合一，为蓝天无处觅白云的生态！我们自如地——发展。

郭天成、管述军合著的《戍边文化》，刘向晖著的《口岸文化》，蔺茂奎著的《包容文化》《生态文化》四本书即将与大家见面。陈建国同志让我写序，写了几段，不知是否算序。因为“四大文化”中爱国、开放、和谐、发展的精髓日渐丰富，西出兴边的大业方兴未艾，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的铁路正在挺进……伟人山下，一群义无反顾的走西口人信心百倍地追梦——我们是塔城人民的儿子娃娃！

张博
二〇一九年
一月二十七日

作者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塔城地委书记

引 子

塔城市是中国西北边陲离边境最近的一座小城，距西部边境口岸巴克图 12 千米，直线距离只有 9 千米。这样近的距离，无论是贸易还是旅游，都非常便捷，因此凡是到塔城来的人，大都要到巴克图浏览一下，欣赏一番。除了到口岸去观赏对面的异域情调，还有一处景观让游人赞叹称慕，那就是横卧在边境上的一段山峦，与伟人毛泽东安睡的体型神态非常相似，远远望去，就像伟人安卧在天边云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伟人山”。毛泽东生前为国操劳，逝世后还在这里守护人民。但凡来此游览过的人，都会啧啧称奇，连连赞叹：像，真像！

来到巴克图口岸，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它天然优越的地理环境：地势开阔、平坦，数辆卡车可以并排往来通行；视线也非常好，对面的巴克特小镇清晰可见，确实是辟为陆路口岸的天择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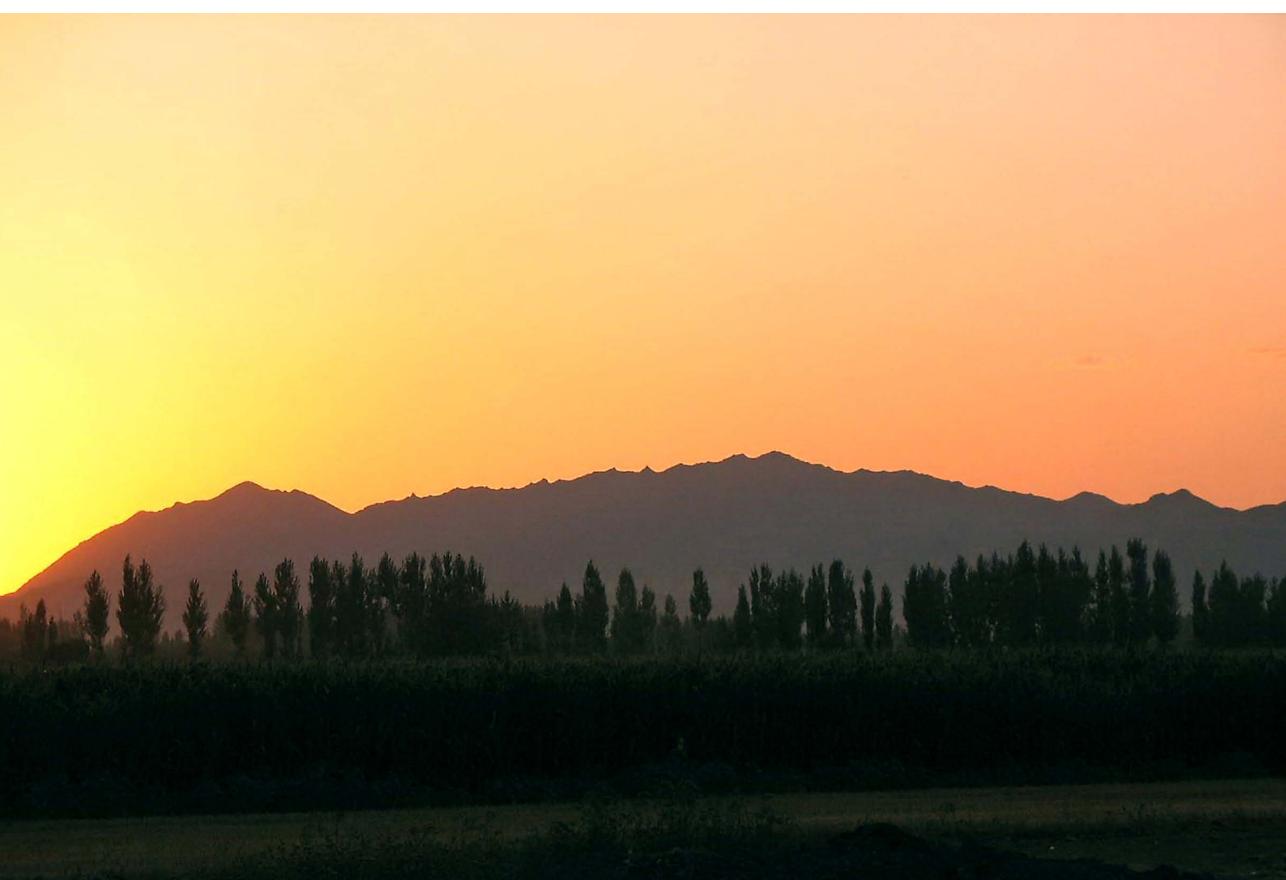
巴克图口岸是新疆向西开放的一个重要通道，作为塔城地区的唯一口岸，与中国许多著名口岸一样，它有着痛苦的诞生经历——由不平等条约催生的一枚苦果。历史告诉我们，巴克图口岸并不是主动开放，塔城人也不是气定神闲地开门揖客，而是在强邻的刺刀逼迫之下，在一种苦涩无奈中，极不情愿地敞开了瘦骨嶙峋的胸膛……

回顾过往，巴克图曾给塔城带来过困惑，带来过屈辱，但也带来了商业、文化的繁荣。巴克图口岸让塔城经历了沧桑，增加了知名度。塔城，作为与口岸近在咫尺的城市，它也支撑了巴克图口岸的快速发展，推进了巴克图口岸的开放规模与发展速度。可以说，近距离和便捷的交通，使得巴克图口岸和塔城城市乃至整个行政区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塔城的口岸和城市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口岸的人与物过往频繁时，城市则繁荣发展，蒸蒸日上；当口岸冷清闭塞时，城市也冷落停滞，一派萧索。

不仅如此，巴克图口岸的冷落与繁华还影响着整个塔城地区甚至向全疆辐射。口岸的出现使塔城在无奈中打开了门户，不得不直面来来往往的人群和形形色色的宾客，不得不面对面对与客人们一同涌进的千奇百怪的物品和应接不

暇的信息。在口岸开放的互通有无中，塔城人逐渐拓宽了视野，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懂得了接纳、包容与借鉴，并在相互交往、互相影响中树立起了自信，一步步形成了容纳异己、取长补短的开放心态，同时把这种心态融入生活，积淀为一种习俗，为塔城本土文化的形成涂上一层耀眼的亮色。这就是巴克图口岸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给塔城带来的回馈——开放的文化。

现在，塔城地区各民族团结和谐、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这种良好的局面是与塔城各族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共荣共存的包容传统分不开的，也与口岸形成的开放文化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塔城地区强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充分发挥独特文化传统，全地区上下一心，共谋发展。如今的塔城地区已由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环境沉寂、生产落后、发



塔城的伟人山

展迟缓、经济凋敝的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产业基础、较强经济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在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环境优势明显，后发优势突出。尤其是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战略构想提出之后，塔城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一个重要区段，这种优势进一步凸显。

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进程中，与丝绸之路上的相关国家友好相处，互通有无，大气魄、大手笔做好开放工作，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天机巧合，我们躬逢其盛，当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以巴克图为依托，做好塔城地区对内、对外的开放工作，发挥塔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应有的作用，争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我们清楚地知道，巴克图作为地区唯一的口岸，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为本地的经济发展，为本地人民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面对历史，我们曾经有过犹豫、彷徨。但是，历史已翻到了崭新的一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磨炼，塔城人民开始用更宽广的胸襟、更开阔的视野去对待口岸的开放。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日子里，口岸开放的作用必将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期，在当前紧锣密鼓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里，口岸的开放，口岸的发展与繁荣，也必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巴克图口岸诞生的背景
1	一、塔城的由来
6	二、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
15	三、众多民族的聚居和融合
23	四、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逼下的划界
30	五、众多的卡伦和台站
37	第二章 口岸建立的辛酸和欢歌
37	一、初期的商贸往来及口岸的正式建立
46	二、口岸的开通与塔城的经济开发
51	三、由金矿开采权引发的捍卫国家领土的斗争
54	四、1865 年前后塔城经济社会状况
59	第三章 巴克图口岸影响下的塔城文化
59	一、战乱后塔城的重建与恢复
67	二、建省后塔城居民的定居倾向和趋势
74	三、口岸重开后塔城贸易的畸形发展
81	四、为俄商提供支持的领事馆和道胜银行
86	五、慕名前来塔城的探险者
93	六、农耕、游牧与欧化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
102	七、塔城地域特质孕育的文明之花

107	第四章 民国时期——口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107	一、民初塔城经济社会状况及欧化倾向
119	二、白俄败兵串扰塔城及苏俄新领事遇刺事件
126	三、东北义勇军由巴克图进新疆及归国华侨的安置
132	四、苏联影响下的文化教育与政治氛围
144	五、民国末期塔城社会的动荡与萧条
155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巴克图口岸
155	一、塔城党政机构的建立完善与口岸的运行及辐射
160	二、伊塔事件的发生与处置
166	三、冰冻时期的巴克图
172	第六章 改革开放后的巴克图口岸
172	一、改革开放初期——冰雪初融
176	二、20世纪90年代巴克图口岸的边贸——如火如荼
181	三、巴克图口岸建设的演进
189	四、依托巴克图口岸的旅游业
195	五、新时期巴克图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199	六、新时期巴克图口岸的地位和影响
205	尾 声
205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大门——巴克图展望
211	参考书目



第一章 巴克图口岸诞生的背景

一、塔城的由来

塔城，源于塔尔巴哈台和绥靖城的简称。塔尔巴哈台，是蒙古语和汉语的结合体，“塔尔巴哈”蒙语意为“旱獭”，“台”是“军台”的缩语，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塔尔巴哈台”这个地名。据记载，忽必烈执政时期的1278年，元朝丞相伯颜奉命率军追击叛臣昔里吉来到塔尔巴哈台一带，因军粮不能及时运来，士兵饥饿难耐，就命令各部就地取食。军士们发现此地多“塔尔巴哈”即旱獭，纷纷捕捉为食。士兵们还发现，塔尔巴哈不仅肉可食用，其毛皮也质地坚韧柔软，于是纷纷将毛皮收集起来。任务结束后，他们把毛皮带回京师，鞣制成革，大受贵妇人们的欢迎，许多士兵用其换取绸缎，发了一笔小财。为此，“塔尔巴哈”就成了塔城最早的代名词。1282年，元政府在此设置驿站，称“塔尔巴哈驿”，这是塔城最早的称谓。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在此地设置军台，塔城从此有了定称“塔尔巴哈台”。塔尔巴哈台还译为塔尔巴哈你、塔拉巴哈台和塔尔巴噶台等，都是音译的结果。后来，清政府先后在雅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和楚呼楚（现塔城原称）筑肇丰城和



塔城一角



唐太宗李世民

绥靖城，塔尔巴哈台与城相连，就有了“塔城”之名。

先秦时期，远在祁连山敦煌一带的月氏人和乌孙人，被匈奴所迫，先后迁入伊犁河流域和塔城等地，他们曾长期在此驻牧生活。汉代初期，今塔城地区南部为乌孙游牧地。汉文帝时期，匈奴征服楼兰、乌孙、呼揭诸国，塔城成为匈奴属地。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塔城区境隶属都护府，但北部地区仍由匈奴控制。东汉至魏晋时期，区境为西域长史管辖，其后为突厥汗国辖地。唐显庆二年

（公元 657 年），唐统一西域，在塔城区境设阴山、匐延、玄池诸都督府，统辖于安西大都护府，后隶于北庭大都护府。唐末，塔城一带成为葛逻禄、回鹘诸部游牧地，后隶属喀拉汗王朝政权。

宋代，今塔城境域属西辽统辖。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 年），成吉思汗派兵击灭乃蛮王子屈出律夺取的西辽政权，塔城区境归蒙古汗国所有。成吉思汗分封诸国时，塔城一带成为窝阔台汗国领地，汗府设在也迷里（今额敏县境）。蒙哥汗继位后（1251 年），设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塔城为其辖区。1309 年后归属察合台汗国。明代，塔城区境为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游牧地。1628 年，土尔扈特部落西迁，塔城成为准噶尔部牧地。1635 年，巴图尔洪台吉建立准噶尔汗国，其统治中心移至和布克赛尔，塔城地区成为该汗国的核心地带。

1755 年，清王朝派兵攻灭准噶尔汗国，两年后又平定了蒙古贵族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统一新疆，塔城开始由清朝政府直接统辖。清政府对塔尔巴哈台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视，认为新疆为中国西北屏障，而塔尔巴哈台地区“西控哈萨克，北扼俄罗斯”，“至俄罗斯部落约八百余里，环山带河，广袤数千里，为伊犁、乌鲁木齐之屏藩，实新疆西北之雄镇也”（《塔尔巴哈台事宜》），特设参赞大臣一人并携领队大臣以镇守之。清政府为加强塔尔巴哈台地区军民和边防事务的

管理，巩固西北边防，于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1764年1月），议于“雅尔地方，筑城驻兵，应派大臣镇守”（《清高宗实录》卷701）。廷议中主张筑城的朝臣们认为，为了和伊犁成为掎角之势，必须建筑雅尔城。“若不筑城驻兵，设卡巡查游牧，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联署”（《西域水道记》卷5）。伊犁将军明瑞为此还询问厄鲁特熟悉雅尔地方情况的人，进行一番调查后，“立木为筑城记”。经乾隆皇帝准允，清政府遂在雅尔地方设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理辖区的军政事宜。清政府随即饬令乌鲁木齐大臣绰勒多（又称绰克托），率领600名绿营兵丁，会同伊犁参赞大臣爱丰阿，始于雅尔筑城，作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驻地。授绰勒多为塔尔巴哈台第一任参赞大臣。又从伊犁调派两位领队大臣同驻。参赞大臣“总理驻防、屯田、农官事务等”，领队大臣管理游牧和卡伦。从此，塔城有了正式的官府机构。

雅尔城建成后曾经历了一个东迁的过程。对此，《清史稿》概括说：“乾隆二十九（1765年），筑雅尔城，名曰肇丰。三十一年，改筑城于楚呼楚……名曰绥靖。”关于迁城的原因，综合众多史料，其过程大体如下：雅尔城筑建仅年余，继任参赞大臣阿桂等借口“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进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请将雅尔城迁移至塔尔巴哈台山阳之楚呼楚。因为阿桂等人先斩后奏，待迁城已成事实后方奏报朝廷，结果引起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大发雷霆，虽然没有治罪，却斥责阿桂等：“伊等于心何安，理宜请罪据奏，何得隐忍不以为事”（《清高宗实录》卷767，转引自《魏长洪新疆历史论文选》）。虽然皇上发了脾气，但考虑到（不少大臣为阿桂等人求情）雅尔地方确实有“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的实际问题，还是做了让步，同意雅尔城东迁。遂于1766年在东部的楚呼楚地方重建新城（雅尔城称为旧城）。新城竣工后乾隆皇帝亲自命名为绥靖城。现在国外有些史书游记中，仍称塔城为楚呼楚，而塔城本地人中仍有人将雅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称为“老塔城”。

塔尔巴哈台军政机构设置后，参赞大臣是当时塔城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直接



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塔城绥靖城遗址

听从朝廷调遣，归伊犁将军节制。大臣府下设领队大臣、协办大臣、管粮通判等官员和相应的衙署。在行政级别上是与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并足鼎立的重要区域。从形式

上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统辖管理的塔城地区是伊犁将军辖属的一个单位，但实际上，它是独立性相当大的一个行政单元。因为伊犁将军统辖地域过于辽阔，牧区、农区，环境迥异，将“西域新疆”一分为四，实际上相当于四个省份。正如时人评价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之间的关系为“犹内地督抚分省而治”（《西域见闻录》）。

事实上确实如此，如塔城参赞大臣行使的职责是：对统辖区域实行军府统治，即军事、兵事、商务直接由参赞大臣掌握，如驻防巡守、稽查卡伦、屯垦戍边、对外通商等。对辖区人民则实行扎萨克和千户长制，即辖区民众的生产、赋税、诉讼等民事则由朝廷册封的王公贵族、部落头目管理。境内的蒙古实行扎萨克制，和布克赛尔境内设亲王盟长，统辖三旗、十四个苏木；乌苏境内设郡王盟长、统辖二旗八个苏木。境内哈萨克以部落为单位实行千户长制。当时塔城境内的哈萨克有四个部落，即柯勒依、曼毕特、赛尔拉特、吐尔吐勒四部，共设台吉一员，千户长四员，统领上述部落。亲王盟长及台吉、千户长均受参赞大臣节制。这与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职责及行政方式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1884年，新疆建省，下设道府厅县以便管理。1888年，塔城裁掉了管粮通判官衙，增设了抚民直隶厅，直隶厅隶属于新疆省辖下的伊塔道，同时又节制于塔城参赞大臣。当时各衙署的分工是参赞大臣主管旗营军事及蒙哈部落，直隶厅主管屯垦事宜。建省时的设想是，裁撤将军、大臣各官，由道厅县直接管理各项事务。但由于将军、大臣的坚持，伊犁、塔城的参赞大臣保留下来，这样以来塔城便有了三套统治系统，可谓政出多头。

1762年，清廷在地处塔城南部一带地区设库尔喀喇乌苏办事大臣加以统辖。1772年设领队大臣、县丞各一员，管理该境土尔扈特部落和屯田事宜。1886年

设抚民直隶厅，隶属镇迪道。统治方式与塔城相同。

在塔城军府机构设立时期，塔城辖境地域非常辽阔，西部边界由铿格尔图喇（今哈萨克斯坦之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过额尔齐斯河，经喀尔满岭、爱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北部边界由铿格尔图喇顺额尔齐斯河向东，经斋桑泊到科布多边界；西南部顺勒布什河与伊犁接壤；南部沿阿拉山口、艾拉克淖尔与乌苏相连；东南部与乌鲁木齐、古城相接。总面积 21 万多平方千米。

1840 年后，沙俄乘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势衰微之机，采用修据点、筑堡垒，强行移民等手段，不断蚕食塔城所属土地，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其所蚕食的土地合法化。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沙俄强行划走塔城所属土地计有 11.71 万平方千米。致使中外驰名的巴尔喀什湖、斋桑湖、阿拉湖及爱古斯河、勒布什河等塔城山河尽被俄国侵占。1905 年，塔城、阿尔泰分治，原属塔城参赞管辖的吉木乃、布尔津、福海、青河等地划归阿尔泰办事大臣管辖，塔城辖属地域仅剩下今塔城、额敏、裕民、托里、和布克赛尔一带地方。

民国初期，塔城地区的建置沿袭清制，仍保留参赞大臣。1913 年，塔城抚民直隶厅改为县，隶属伊塔道；库尔喀喇乌苏抚民直隶厅改为乌苏县，隶属迪化道。1915 年，从玛纳斯分设沙湾县，隶属迪化道，随后设和什托洛盖县佐，由沙湾县管辖。这时，虽有伊塔道的机构设置，但距离遥远，诸事均由近在咫尺的塔城参赞定夺。而塔城参赞的任命和塔城经费来源全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因此，事实上当时塔城和新疆是分治的。

由于政出多头，不便管理，新疆督军杨增新几次要求裁撤将军参赞，统一新疆事权。1916 年，中央政府决定裁撤塔城参赞，改设塔城道，同时将乌苏、沙湾两县划归塔城管辖。至此，塔城才归并新疆省统辖，结束了多套统治系统并行的局面。

1918 年，在塔城县境分设额敏县。塔城道辖县四个。1929 年，道改称行政区，道尹公署改为行政长公署，辖塔城、额敏、乌苏、沙湾四县和和什托洛盖设治局。1939 年，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县区保甲（县以下设区，区下设保、甲）为主的“新县制”。

哈萨克族多以游牧为业，习惯以部落为单位分部聚居，部落首领行使一切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农牧区仍实行千、百户长制。千、百户长名义上由民众选举，县长委任，

实际上都由牧主或地主担任，集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并可以世袭。三区革命政权建立后仍实行这种制度。1940年，在察汗托海（老裕民）设图尔班宗设治局，隶属塔城县。次年撤设治局，成立裕民县。同年，和什托洛盖设治局改称和丰设治局。1942年，设托里设治局，隶属额敏县。1943年，塔城行政长公署改称新疆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4年，和丰设治局升格为和丰县，塔城辖县达六个。1945年8月，三区革命军攻占塔城，成立了塔城专员公署，1946年8月，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塔城专员公署称新疆省塔城专员公署。1949年，划出额敏县第八、九、十三个区组建克烈半县，县城设在托里。

1950年1月，隶属新疆省人民政府的塔城专员公署成立。原克烈半县改为托里中心区。1952年5月，设置托里县。至此，塔城辖属七县级行政区域建置的格局形成。

以上勾勒出的历史线索，就是塔城行政区划的来历和演变过程，也可以说是塔城地区的“前世今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以前虽有先民们在这里从事生产的活动，但对这片土地正式的设置管理，却是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之后的事，具体说来就是从1764年清政府设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起，塔城才有了正式的行政机构。

二、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

塔城和中原政权直接建立联系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根据历史记载，唐代初年，西突厥曾称雄西域一带，对西域各部族人民极尽经济盘剥和政治压榨之能事。今阿勒泰、塔城一带的葛逻禄人不堪忍受，奋起反抗，造成西突厥统治集团的内讧，遂分裂为两个小国。由于两国之间攻伐不断，造成人民流离失所，长期不得安宁。为维护自己的部族和人民，西突厥的咄陆可汗向唐朝政府遣使称臣，要求归附，请求唐朝的保护，受到唐中央政府的正式册封。这是唐对西域实施管理的正式开始，公元640年，唐在今吉木萨尔县北设庭州府治，随后又设伊州，直至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的设置，唐对西域的管理机构日趋完善、系统。

唐对西域的管理期间，受到唐朝中央政府册封的瑶池都督、突厥旧贵族阿史那贺鲁曾两度聚众反唐，发动叛乱。最终在656年至658年，被唐朝大将程知节，也就是程咬金等将领率军彻底击败，整个西域包括中亚，都纳入唐朝版图。据说，

程咬金在追击叛将阿史那贺鲁时，曾于公元 656 年 8 月来到今天的塔城一带，在今塔城附近发动攻击咽缅州战役，斩敌 3 万余人；同年 12 月又在今塔城的南部额敏河一带重创叛军，杀敌数万，给叛军以毁灭性打击。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指出这次塔城追剿的征战路线，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行军路线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已经把地处西域的塔城与中央对西域的管辖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塔城真正成为通往中亚的重要通道，是在 12 世纪中前期耶律大石建都也迷里和西征中亚，建立幅员辽阔的西辽帝国和 13 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发动西征之际开始的。

辽国衰败后，辽国贵族耶律大石不甘命运摆布，率领精干忠诚部属 200 人逃往辽国尚未陷落的北疆重镇——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可敦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



耶律大石

在那里招抚旧部，号召重建辽朝，受到当地各部族支持，从而使辽国旧有西北兵马全部归于耶律大石麾下。耶律大石就从那些拥戴他的部落中征集精兵 1 万人，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便捷有效的管理机构，一个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西辽雏形基本完备。此后，经过五年的积累和成长，耶律大石政权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他决定向外发展。

重建辽国，固然是耶律大石和臣属们最向往的，但是距离最近也是最主要的对手金国正处于全面上升时期，实力很强，大宋也一时找不出破绽。于是耶律大石就改变思路，决定先向西发展，扩大疆域，建立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然后再谋光复大辽帝国的良策。

目标既定，1130 年春，耶律大石按照契丹族传统，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祖宗后，随即率领部众和军队向西开始了气势磅礴的西征。他原计划向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斯地区进攻，但由于受到当地吉利吉斯部族有计划的抵抗，只好转而向西，一路披荆斩棘，越过阿尔泰山进入翼只水（额尔齐斯河）和也迷里河地区。耶律大石率军进抵叶米里后，先在这里筑城屯兵，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并于 1132 年在这里建都称帝，正式打出了西辽帝国的旗号。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耶律大石的帝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随即开始了继续西扩的步伐，并于 1134 年经过高昌回鹘之地，占据了东喀喇汗王朝的首府巴拉沙衮（今托克马克）。为



額敏河畔的初春

了巩固国土，他将国都从也迷里河迁到新占领的巴拉沙衮，称“虎思斡耳朵”。此后，耶律大石率领他的军队马不停蹄地一路向西，一次次进取攻伐，先后吞并了西部喀喇汗王朝和花剌子模王国，并把伊斯兰塞尔柱王朝势力逐出河中地区，控制了其原有属国，建立了一个疆域东起土拉河，西尽咸海，几乎囊括整个中亚，面积超过 400 万平方千米的庞大帝国。在西辽统治的 80 多年时间里，因为也迷里的缘故，塔城一带成了通往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通道。

在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灭亡之后，成吉思汗连续发动了西征乃蛮和花剌子模的战争。从 1218 年西征花剌子模开始，蒙古大军的铁蹄也沿着耶律大石路线走进中亚。战争期间，往来的使者、后续人员，曾多次往返于蒙古和中亚之间，成吉思汗的行军路线与耶律大石或不尽重合，但大体保持了一致。期间，塔城作为中转站，成了必经之地。从此，塔尔巴哈台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史料之中，同时，也让塔尔巴哈台成了西域各游牧部落所熟知的地方。

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结束后，成吉思汗将包括西域在内的辽阔的中亚、东欧山河分封给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诸子。其后，诸子及其后王们继续发动



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

战争，拓展封地，并在西亚再建伊利儿汗国，几乎将整个欧亚大陆囊括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内。征战期间，塔城地区事实上已经成了蒙古军及其后续人员过往频仍的通道。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归来，他的两个孙子忽必烈和旭烈兀，即未来蒙元帝国的皇帝和西方伊利儿汗国的创建者，从蒙古本土前来迎接，恰在也迷里一带（即现在的塔额盆地）相遇。为庆祝这次胜利相逢，成吉思汗特地命令在该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围猎庆典。在这次庆典中，11岁的忽必烈射得一兔，旭烈兀猎获一鹿。按照蒙古习俗，要用猎物的肉和脂肪擦涂中指，表示已经成为可以参加战斗的战士。成吉思汗亲自为他的两个爱孙操持了这项郑重其事的礼仪，成了这片土地上极具象征性的事件。

其后，由于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受封于此，并将都城建在额敏河畔，东去西来的使者、宾客、商旅各色人员频繁地往来于此，不绝于道。其中，最著名的是几位欧洲使者。

第一位是普兰·迦儿宾，他是意大利人，曾在罗马教会担任要职，博学精明、擅于辞令。当时，第二次西征的蒙古军队在蹂躏了俄罗斯大地之后，又挥师西进，快速攻克布达佩斯，横扫波兰、匈牙利，并打败了波兰、日耳曼和条顿骑士团的东欧君主联军，他们所到之处樯倾楫摧，横尸遍野，一片血腥。蒙古人的强横、冷血、残忍，震动了整个欧洲，他们惊呼：“上帝之鞭”的惩戒来了！据逃往意大利的教士报告，蒙古军队中有许多基督徒，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据此作出决定，委派普兰·迦儿宾出使蒙古，劝说他们停止杀戮。普兰·迦儿宾领命后于1245年4月从法国出发，于次年4月抵达伏尔加河畔并拜会了钦察汗国的拔都汗，递交教皇的信函，但拔都却要他去蒙古本土朝见大汗。普兰·迦儿宾又走了3个多月，才抵达哈拉和林，见到了正准备登基的贵由汗，并参加了登基大典。



第二任蒙古大汗 窝阔台

在去哈拉和林途中，普兰·迦儿宾曾在也迷里古城经停，他在报告《普兰·迦儿宾行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接着，我们进入了黑契丹的地面，鞑靼人（指蒙古人）在那里只重新修建了一座斡密立城。皇帝在这里建了宫殿，我们曾被邀请进宫喝



也迷里古城遗址

了点东西，一个从皇帝那边来的人命市长与他的两个兄弟在我们面前跳了舞。”该《行记》注释对也迷里一词解释说：“这个城市是哈拉契丹人于1125年左右建立的，哈刺契丹被蒙古人占领后，也迷里显然由窝阔台进行了重建。”

普兰·迦儿宾在记述中还谈到了距此不远处有“一个不很大的海”和海边上的一座山：“据说山上有一个洞，冬天从洞里发出强烈的风暴，人们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才能勉强地从那一带通过。”根据描述，这个所谓的海就是今位于中哈边境的阿拉湖；所谓风洞，应该就是塔城地区托里与额敏县之间的老风口。该风口的偏西大风通过狭长通道吹过国境，直抵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现在哈萨克斯坦当地人称之为“阿拉风”。

第二位在塔城经停的欧洲人是法国人鲁布鲁克。他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于1253年出使蒙古，于往返法途中都路过也迷里，并短暂停留。此事在其《东方行记》做过准确记述。

此外，窝阔台之子贵由在继承蒙古大汗位后，曾准备到他的封地休养，结果于1248年死在前往也迷里河的途中。之后，他的遗体便由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护送到也迷里河一带安葬。在葬礼上，皇后斡兀立海迷失还与宿敌托雷的寡妻在也迷里见了面。据《多桑蒙古史》记述，贵由汗去世后，斡兀立海迷失依照蒙古习俗摄政监国，办完贵由汗的丧事之后，她驻跸于夫君的安息处，并还在也迷里古城的宫殿里接见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者安德烈等人。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



冬季穿越风口区的牧人

九世正统兵进攻埃及，久战无功，驻扎在塞浦路斯岛。恰有蒙古使者奉蒙古统帅野里知吉带（贵由亲信，当时正驻波斯）之命前来，宣称贵由大汗保护所有的基督徒，并愿意帮助法国进攻埃及。路易九世闻言大喜，便派出以安德烈教士为首的庞大使团出使蒙古，拟与贵由结盟，共同对付埃及和穆斯林，为此还准备了一份厚礼。没想到使团刚抵达蒙古本土，就得到贵由已死的消息，只好从和林折向也迷里，把路易九世的信件和礼物送给了开始摄政的皇后。但斡兀立海迷失并没搞清这些外国使节前来的目的，以为他们是纯为进贡而来的贡使。她接受了法王的礼物，并按蒙古和中国的礼仪接待了使者，明确提出要法国臣服蒙古，对结盟一事不置一词。使节们无功而返，这让路易九世非常懊悔。

这些故事说明，在蒙古帝国中前期塔城已经成为蒙古大军、使者们频繁往来路线，是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进入蒙元之后，中央政府为强化对各汗国



乌什水土墩墓，传说中的贵由汗墓

的统治与联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起了中央政府与各汗国之间的交通路线，线路之间，建立若干“站赤”（蒙语，意为站务管理者，相当于驿站）。其中最重要的路线是被称为“塔勒奇山道”的漠北路的西段。这条道路的基本行径是：穿越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从科布多或乌伦古河经霍博（今和布克赛尔）转向也迷里河地区，之后南下阿力麻里（今伊犁）去往中亚钦察草原及两河流域。这条道路的开通为丝绸北道开辟了新道，与以往相比，走新道大大减少了行程。以往从科布多到阿力麻里往往需要快马数月历程，而新道则只需十余天即可到达。1274年元朝建立之后，为加强对新疆地方的管理，管理更加规范，站赤设置也更为广泛，1282年3月在今塔城设置了塔儿八合你（即塔尔巴哈台）驿，常年供给马匹、车辆等物资以备使用。

进入清朝时期，伊犁成为新疆的统治中心，塔城作为伊犁将军治下辖区，统辖面积辽阔，向东向北直抵乌伦古湖和斋桑湖，向北向西则与巴尔喀什湖相接。此时，通往伊犁的这条路线达到强化，沿线增加了军台、驿站。其中，设在塔城区段的有乌兰乌苏、安集海、奎屯、乌苏、布尔噶齐、墩木达、古尔图7个驿站。中俄通商后，内地的物资及外国货物在此道上往返运输。1864年中俄勘界后，中国新疆失去大片领土，塔城的巴克图也由一个过往通道变成了边境口岸。新疆建省后，此道仍是来往商旅们的驻地和运送货物的必经之路。但由于国土面积的减少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从塔城过境去省府迪化的道路成为主要线路。

1884年新疆建省后，塔城至迪化道得以开辟。省府在这条新辟道路上也设立了军台、驿站，全长830千米。其北段从乌苏到塔城设有乌苏、沙喇乌苏、库尔河、庙尔沟、昆都、雅码、托里、平安（老风口）、二道桥、定远、塔尔巴哈台11个驿站，同迪化至伊犁道相接。此道除一般驮队通行外，多用来传递军书、官文，以后逐渐用作商旅们贩运货物的转运道路。当时还有一条较为便捷的岔道，就是从庙尔沟向东，经小拐，走老沙湾同迪化至伊犁道相接。由塔城进入的人员和货物可由此路进入迪化或伊犁。

清末民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塔城的通道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清朝末年，国力日渐衰微，但相邻的俄罗斯却日益强大。随着其国势的发展，其临近塔城一带地区的经济交通也得到迅速发展。清末时期俄罗斯先已经把铁路修到了谢米巴拉金斯克，进入民国时期，则把铁路修到了距塔城仅250千米的阿亚古斯城。

清朝末年，新疆的许多军政要员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往来于内地和新疆的。他们的具体路线是：从中国的东北进入俄境，乘坐其通往西伯利亚的火车抵达谢米巴拉金斯克或阿亚古斯，然后再从那里乘坐汽车或四轮马车从巴克图入境，再从塔城去迪化。离开新疆则由这条路反向而行。这比过哈密经星星峡越戈壁走河西走廊的长途车马劳顿要方便快捷得多。当时鼎鼎大名的樊耀南、包尔汉、谢彬等人就是从这条路线来到新疆的。

进入民国时期，经过杨增新十余年的经营与和平建设，新疆经济社会都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新疆政府的倡导下，于1928年开通了迪化至塔城的公路。这是新疆最早的营运公路，东南至迪化经吐鲁番、哈密与内地相连，向西则经塔城与苏联的中亚公路、铁路网络相接。由于迪化至塔城公路的开通，通过这条路进出新疆的人员更加频繁，其中在新疆历史上留下鼎鼎大名杨增新、盛世才、金树仁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矿业委员吴蔼辰等人都曾与这条路线结下了缘分。如杨增新被刺后，其遗体就是经巴克图运往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城市谢米巴拉金斯克，再从那里转火车去内地的。杨增新的接任者金树仁在“四·一二”政变中下台后，在塔城通电下野，并由巴克图出境抵阿亚古斯，在那里转乘西伯利亚火车前往内地；盛世才的“新疆王之梦”则是乘坐这趟火车从塔城进入新疆开始的。

20世纪30年代初，一批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奉苏联有关部门的派遣来新疆工作，有不少人是经塔城巴克图入境的，如最早来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张义吾及稍后的熊效远、竺清旦（刘晓平）等人就是从苏联经塔城到达迪化的。当年奉命接应西路军的高层领导陈云、滕代远等人是否从塔城入境，现在尚无确凿资料证明，但根据《共产国际苏联在新疆的活动》一书记述：盛世才上台后，请求苏联派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以俞秀松为首，先后有20多名共产党人来新疆工作，他们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从塔城入境的。因



民国矿务顾问吴蔼宸乘雪橇游塔城

为当时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仅修到谢米巴拉金斯克，而谢米巴拉金斯克不仅与塔城距离最近且有公路相通；在新疆境内，塔城至迪化的公路也是修建最早的，在迪化至伊犁国际通道于1937年7月修通之前，从苏联到新疆途经塔城这条路是最便捷的，因此在1937年7月前，在新苏间往来，一般都会选择这条路线。据此分析，陈云、滕代远从塔城巴克图入境到迪化与盛世才会谈，建立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可能的。1932年，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西土铁路）延至阿亚古斯。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后，因人力及武器装备悬殊导致失败，4万余名义勇军将士不得不退入苏联，后来假道西伯利亚铁路来到距塔城200千米的阿亚古斯，然后从塔城的巴克图口岸进入新疆，为推动新疆历史进程作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期盛世才实行亲苏亲共的六大政策后，这条道路更加繁忙。当时苏联为新疆每年培养100名留学生，学生们往返都是从塔城巴克图出入境的，这条通路堪称是教育发展之路，素质提高之路。其后，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重要物资以及一部分抗战物资也由这条路线源源不断送往中国的抗战前线。直到迪化到伊犁的公路开通之后，苏联的物资可从霍尔果斯口岸直接运输迪化后，塔城巴克图口岸所承担的通道压力才有所减缓。同时，在此前后，随着新苏关系的一步步加深，还开通了新疆迪化经伊宁至苏联阿拉木图的航线，国家重要人员开始乘飞机往返于苏联和新疆，由苏联经巴克图进入新疆的重量级人员也开始减少。但是，在此前后，作为新疆与苏联（包括此前的俄罗斯）贸易物流大通道，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大通道，所起作用是位居新疆当时所有通道的前列的。俄国时期及苏联时期的的各种日常工业产品，曾源源不断地由塔城入境，运往省城迪化，运往全疆各地。同时，新疆的一些农牧土特产品，也从全疆各地会聚于此，输往中亚各地直至欧洲。无疑，这种重要通道的作用，对口岸的形成和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蔼宸一行乘车前往迪化

三、众多民族的聚居和融合

塔城属于寒冷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是众多游牧民族的游牧地。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葛逻禄、契丹、乃蛮、蒙古等古代民族，都曾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居住，繁衍发展。他们你来我往，迁进迁出，许多民族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早在 17 世纪中叶之后，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开始倡导农业，他将南疆乌什、喀什、叶尔羌等地的维吾尔农民强行迁来，让他们开垦土地，为准噶尔人提供粮食。同时加入到这个群体的还有少量从内地前来的汉人、被俘的俄罗斯人、布哈拉人和哈萨克人，他们被安置在和布克赛尔、额敏河谷等地，从事谷物生产。但是，真正把塔城作为居留地，停下游移的脚步，让各部落民族人民成为塔城的定居人群，却始于清代。也就是说，从清政府统一新疆，在塔尔巴哈台设置参赞大臣后，塔城才真正有了定居的人民。

自清代以来，在塔城地区长期居住的民族主要有：西蒙古卫拉特中的土尔扈特人与东迁的察哈尔人，哈萨克的一些部落，还有汉、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锡伯、维吾尔、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清史稿》卷 7、《钦定新疆识略》卷 5）。这些民族成员经历了千辛万苦，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定居了下来。此后，塔城地区逐渐成为我国多民族友好聚居的典型，这是各民族互相学习、相互包容、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延续。

专制的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长期性，在统一新疆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采取民族歧视政策，严禁内地人民到新疆来，企图阻止自汉唐以来汉族人民与西域人民的历史友谊与融合发展，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兵的进驻新疆就是他们严令下的无奈之举。绿营兵自清朝乾隆中期奉调进驻塔城，人数达到 600 余人，他们（包



准噶尔汗国的奠基者巴图尔珲台吉



和布克赛尔县境的准噶尔古城遗址

括其中的中下层官员及与绿营兵戍边和生活相关的辅助人员）就成了塔城汉族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时起，内地汉族劳动人民，冲破清政府设置的重重隔离政策，到塔城种地或开矿，这是塔城汉族的主要来源。期间，还有为数不少的携眷西来的内地汉族商人，在塔城寻找商机，就地经商。以后，又有一些“屯户”和犯屯被遣发到塔城，他们都渐次融入塔城。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许多内地汉、回等族民众前来塔城开采金矿。其中哈图金矿规模最大，据《塔尔巴哈台事宜》记述，在开采高峰阶段：“厂列十区，人数高峰时达数千人，内地商民聚此开挖者几数万人。”回民起义时，他们参与塔城保卫战，失败后，有的被杀，有的逃匿，也有一部分留在这里，成了塔城居民。此后，陆续有陕甘等内地平民为谋生或逃避战乱、灾难等来到塔城。他们都为屯垦戍边，为开发建设塔城作出了贡献。

乾隆中期稍后，清政府镇压了大小金川的藏民起义，于1777年遣发100多名起义失败的藏民群众到塔城，从事种地、挖煤或杂役（《塔尔巴哈台事宜》卷4），后来这些人逐渐融入了当地各个族群之中。

塔城地区的蒙古族来源比较庞杂，有厄鲁特人，这是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战乱中离散的准噶尔人被编成“厄鲁特营”，安置在巴尔鲁克山和额敏一带；有1764年由张家口地区西迁的察哈尔蒙古营。上述蒙古诸部作为八旗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驻守卡伦、台站和巡查边界，也有一部分为塔城官营牧厂从事放牧工作。



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兵

他们驻守的 8 个卡伦都位于边境，6 个台站都处于科布多通往塔尔巴哈台的重要交通要道上。

与厄鲁特蒙古密切相关，塔城还有一批在此游牧较早的柯尔克孜人。柯尔克孜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而在塔城生活的柯尔克孜人却大都信藏传佛教。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一度强大的柯尔克孜人逐渐沦为准噶尔帝国的臣民。后来其中的一部分因长期与准噶尔蒙古人一起生活，耳濡目染，完全接受了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成了虔诚的喇嘛教徒。1755 年，清朝派兵平定准噶尔叛乱，一部分柯尔克孜人也随避战的蒙古人逃往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社会平稳后，一部分逃亡的人陆续返回伊犁，向新疆的新主人清朝皇帝投诚，其中包括一部分柯尔克孜人。1765 年，乾隆皇帝为加强边防，将陆续返回的准噶尔人改称厄鲁特，组建厄鲁特营，安置在今额敏县到托里县的广大地域。与准噶尔蒙古无异的 90 余户 700 多人的柯尔克孜人也作为厄鲁特营八苏木之一被安置于额敏县骆驼脖子至木乎尔泰一带驻牧。从此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长达 200 多年。在他们与蒙古族相互融合的 200 多年历程中，曾经一起驻守边境线上 8 个卡伦和 10 个驿站，谱写了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而战斗的光辉历史。

1962 年伊塔事件发生，根据政府要求，长期游牧于额敏东北的柯尔克孜人迁居塔城，逐渐与塔城各族人民融为一体。现今居住在塔城市部分乡场的柯尔克孜

人就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居留地变了，但信奉喇嘛教的习惯信仰依然保持着。塔城柯尔克孜人的宗教经历告诉人们，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环境相关，有很大的偶然性，绝非不可选择。

此外还有一大批属于西蒙古卫拉特的土尔扈特人。明朝末年，因受准噶尔蒙古排挤西迁到伏尔加河游牧的土尔扈特部，因不堪沙俄苛政暴虐，于1771年举部东归，返回祖国。隶属策伯克多尔济的三旗九千之众，被安置在塔城所属的和布克赛尔草原放牧。包括塔城人民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对归来的土尔扈特部大众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帮助。境内的厄鲁特蒙古人自愿捐助马2000匹，牛1万头，羊2万只，帮助那些历经磨难的土尔扈特人安家置业，在故乡开始新的生活。还有一些属于阿尔泰乌梁海的蒙古人，他们操蒙古语，同时也会讲哈萨克语。他们回到祖国后怀着感恩之心，与塔城各族人民一道守卫着这片土地。1865年回民暴动期间，他们中的不少人主动追随棍噶扎拉参参与保卫、收复塔城的武装斗争，持久耐战，付出巨大牺牲。正因为他们的付出，直到1867年，在全疆许多地区、城市纷纷陷



穿着清朝服饰的土尔扈特蒙古人



土尔扈特人东归途中

落之后，和布克赛尔、库尔卡拉乌苏、精河、塔尔巴哈台一带还控制在土尔扈特郡王和棍噶扎拉参手中，与清军连成一气，这为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索还伊犁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民国学者秦翰才在其《左宗棠在西北》一书中所说：“新疆变局发生，

经过了六七年，清政府没有办法，所差强人意的是巴里坤总兵保住了巴里坤一城，伊犁将军收复了塔尔巴哈台。”如前所述，塔城并非伊犁将军收复，而是一直控制在忠于清王朝的土尔扈特郡王和棍噶扎拉参手中，这才为伊犁将军提供了立足之地，并通过伊犁将军对新疆全局产生了影响。这是塔城蒙古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团结御侮，为保卫塔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的重要贡献。

俗称“劲旅”的索伦营，原是从东北西迁来的戍边勇士。1763年初，清政府决定从东北地区选派一批官兵携带家眷，永戍新疆。这年秋天，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官兵各500人，携带家口，迁往伊犁屯守边疆，最初他们以换防的方式从伊犁来到塔城驻防巡边。作为清朝政府平叛戍边的军事力量，他们为守卫祖国的西北边疆和镇压分裂势力统一新疆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是起义不久，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等相互勾结，纷纷混入起义队伍，窃取权力，瞬间由清朝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变成起义的领导者。他们接着改变起义方向，开始推行民族仇杀和宗教异端政策。同治五年（1866年）下半年，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开始进攻集中在伊犁拱宸城的索伦营军民，到11月，索伦营军民因寡不敌众弃城溃退。部分索伦营军民在失去牧耕之地而又遭内乱打击的情况下，分数批向西退进俄境，出走者3000余人。他们在俄国被视作奴仆，沙俄官兵强迫他们为其耕种、放牧、开垦荒地，收获物被勒索净尽，生活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他们返回祖国的要求日益强烈，他们多次向沙俄当局要求“情愿速回我处”，但遭到

拒绝。索伦营军民出走后，清政府在试图派人携资前去救济的同时，一直通过外交手段，要求沙俄当局归还我边民。起初，沙俄当局用种种手法故意刁难清朝交涉人员，并且对索伦营等营军民加紧威胁利诱，使其臣服。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清政府的多次交涉下，沙俄当局被迫同意归还这部分军民。在外颠沛流离两年多的索伦营军民，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并根据当时的需要，听从塔城参赞大臣的安排，参加了塔城屯垦。与他们一起进入塔城的还有同样是从东北地区西迁来的戍守西北边疆的一部分锡伯营官兵和眷属。

形势好转后，集中到塔城的索伦营、锡伯营官兵及家属被安排到塔城老城内（绥靖城），追随先期抵达塔城的伊犁将军在此建立了伊犁将军府办事机构。从此，达斡尔族、锡伯族群众开始在塔城安居。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为加强边防，伊犁将军遵旨建造塔尔巴哈台新城。留居当地的300余户达斡尔族人民和100余名伊犁地区派来的达斡尔族、锡伯族工匠，与当地各族劳动人民一起参加了筑城劳动。光绪十七年（1891年），新城竣工，原索伦营的人全部迁入新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奏请组建塔尔巴哈台新满营。达斡尔族人被编为新满营的正白、正黄、镶白、镶黄、正蓝、镶红六旗。从伊犁地区调来的锡伯族人和原流落到塔城的锡伯人被编为正红和镶蓝二旗。新满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军台、防守卡伦和驿站驻守。他们也同其他达斡尔人一样留在了塔城。现居塔城的达斡尔人和锡伯人，大都是他们的后裔。

与上述各民族共同开发塔城的还有人数众多且为塔城现今主体民族的哈萨克人。

哈萨克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由古代西北许多部落或民族，如塞种、月氏、乌孙、柔然、阿兰、突厥咄陆、突骑施、葛逻禄、钦察、乃蛮、克烈、阿尔根、弘吉刺、阿里钦等长期交流融合，逐渐形成的。但近代哈萨克的得名及正式形成，则是以15世纪哈萨克汗国建立为标志的。此后，哈萨克人又不断融合中亚草原上的乌孜别克人的一些蒙古部落，将牧地扩展到巴尔喀什湖西北直到中亚塔什干等地。到17世纪，哈萨克人按部落系谱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中国史籍称为大帐、中帐、小帐）。大玉兹各部驻牧于巴尔喀什湖南部及伊犁河到锡尔河之间；中玉兹驻牧于锡尔河北部；小玉兹则驻牧于今哈萨克斯坦的西部。

清统一新疆之前，游牧于钦察草原的哈萨克各部大都臣属于准噶尔。18世纪中叶之后，清朝政府击灭游牧的准噶尔汗国统一新疆，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及

大玉兹等部投归清朝。当时，原准噶尔人聚居地，即新疆北部地区，因清军在平叛中准噶尔人大量战死、病死或逃亡，致使这一地区地广人稀。此时的哈萨克人看到了这一现状，加上受到沙俄向哈萨克草原不断扩张诸因素的压力驱使，境外哈萨克部落仍不断越界内迁。清政府不胜其扰，不得不改变以往拒绝收纳、驱出境外的政策，准许哈萨克人在界内卡外，纳租游牧，收取一定数额的租金（每百畜抽一）。稍后，又对迁到塔尔巴哈台的部分哈萨克部落编设佐领，收取税赋，并对其实施管理。

事实上，当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期间，1757年哈萨克左部就开始协助清军追剿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并遣使向清政府纳贡称臣，阿布赉被清廷被封为哈萨克左部汗。同年秋天，哈萨克右部阿布勒比斯也遣使致书清廷：“请陪左部自效”，受封王爵（《新疆图志》卷16、《西陲要略》卷4、《塔尔巴哈台事宜》卷4）。哈萨克左部的鄂莫尔、色楞伯特尔出使北京时，还“乞留宿卫”，敬请政府批准，被任为乾清门侍卫。1763年，西部哈萨克努喇丽、巴图尔汗、乌尔根齐部的哈雅汗同时“遣使奉表贡”（《西陲要略》卷4、《塔尔巴哈台事宜》卷4）。哈萨克三部连年朝贡不绝，汗王去世要向清政府报丧，新汗王承袭，要奏请清廷册封认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与哈萨克三部的隶属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自1765年开始，哈萨克陆续东迁到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游牧（《钦定新疆识略》卷2）。阿拉湖是东迁的哈萨克放牧地区之一。他们还协助清朝驻塔尔巴哈台的官兵维护社会治安，因功受封赏的人很多（《塔尔巴哈台事宜》卷4）。1770年，斋桑湖西北岸、布昆河沿岸及阿尔泰山西部的阿巴克—克列部约1000户长期居留在和布克赛尔、吉木乃一带。在斋桑湖沿岸游牧的有：右部哈萨克汗阿布勒比斯第六子库库岱的乃蛮部，还有西部哈萨克台吉萨尼阿斯第四子罕巴尔的部落（《西域水道记》卷5）。1790年，乃蛮部首领库库岱曾到北京朝见乾隆皇帝，被封为“公爵”。嘉庆之后，江霍卓管辖的色密斯奈曼和斯班奈曼诸鄂克，皆在塔城北境游牧（《西域水道记》卷4）。后来，沙俄东侵愈烈，对在当地游牧的哈萨克进行残酷抢掠，哈萨克人不堪其苦，东迁的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清政府对东迁的哈萨克游牧地区，曾郑重声明：“哈萨克自臣服我朝以来，向只准在爱古斯河以外游牧，嗣蒙恩赏，借卡外千里之地令其驻牧，仍在我鄂博之内”（《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这就清楚地表明，东迁的哈萨克牧地，仍是中国的领土。随后还批驳把这些土地“赏给”哈萨克之说是谬误，指出“是哈萨克

游牧之地，皆我朝疆土，舆图所载甚明”（《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这些资料说明，东迁哈萨克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其游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当时属于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

为加强对这里各游牧部落的管理，清政府还设立官员在这里征收赋税。其税率是：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清政府为了调动哈萨克头人的积极性，将一些赋税征收的具体工作交给他们，收到很好的效果。为表彰这种行为，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奏请，赏给花翎或蓝翎顶戴。在乾隆时期，因协助征收牲畜税，“据实心行走”或“拿赋奋勉”，被封赏的有七次之多。嘉庆之后，这类的封赏就更多了（《塔尔巴哈台事宜》卷4）。这些事实都说明，清代的塔城已经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从斋桑湖流出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那里的辽阔的牧地，包括那里的人民都属于中国，归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衙署管辖。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在沙俄的武力胁迫下被一块块肢解侵占，沦为异域。

1864年，中俄按《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界，条约规定哈萨克族“人随地归”，即“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随地归何国管辖”。据此，塔城有哈萨克公哈苏木罕统领的克烈部落的6个苏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南北；三品台吉玛木尔别克（封为镇国公）率克烈5个苏木，游牧于塔城南玛依勒山（今托里县）一带。五品总管1人（柯林拜）、六品章盖5人、七品昆都5人率众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山阳东至锡伯图，西至哈巴尔苏一带。五品总管1人（卓尔塔尔）、六品章盖3人、七品昆都3人率众游牧于塔城南额敏河北岸一带。五品总管各1人（革萨、棍札）率众游牧于锡伯图以东至赛里山（又名萨里山）及额依宾山西北等地。陆续从俄属回归的哈萨克头目有：图尔图里、满持、赛布拉特、住木河、霍什霍尔拜却台、迈梅太克、哈札克拜、萨塔等。其后，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哈萨克人作为一个跨国民族，时有迁徙。而在塔城境内的哈萨克各部落人员，因清朝乃至民国政府都没有对其制定一个有效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大部分哈萨克部落并无建制（只有清朝对少数部落编有佐领），只是封授其首领名义上的爵位、官职，任其自由迁徙游牧。因此，对其人口的统计和管理也变得粗放，并且由于时常迁徙，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人口变化差异很大。

1878年（光绪四年）1月，据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李云麟查，塔城所属哈萨克有三部分：其一是阿吉所都哈萨克；其二是黑宰哈萨克；其三是拜吉格特哈萨克。1884年（光绪十年），塔尔巴哈台哈萨克有克烈、曼毕特、赛布拉特、吐尔图吾力（即

图尔图里）四部。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收回巴尔鲁克山时，收回曼罕特部4个苏木，驻牧于塔城西南。1912年（民国一年），塔城哈萨克又增加了乌瓦克部落，有克烈、曼毕特、赛布拉特、乌瓦克、吐尔图吾力五大部落，共有哈萨克人3862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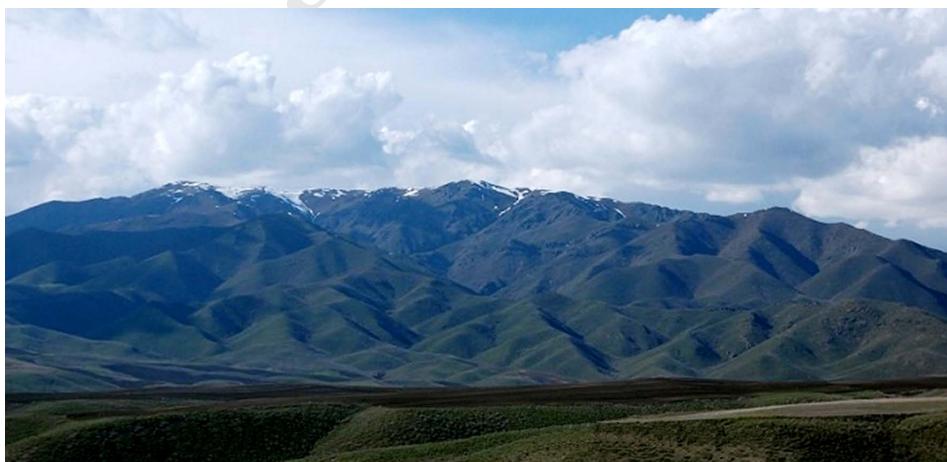
此后，哈萨克人与先后到达这里的汉、蒙古、满族、达斡尔、回、藏、维吾尔等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共同开放创造，成为塔城这片土地上共同的世居民族。

四、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逼下的划界

进入17世纪，哈萨克人按部落谱系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大玉兹各部落驻牧于巴尔喀什湖南部及伊犁河到锡尔河之间；中玉兹驻牧于锡尔河北部；小玉兹则驻牧在今哈萨克斯坦的西部。18世纪前半叶，哈萨克各部不断受到东边的准噶尔政权的侵扰，有的被迫西迁，清朝击灭准噶尔汗国统一新疆后，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及大玉兹等部投归清朝，清朝虽然没有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也没有“张官置吏”，却定期接受其朝贡以藩臣之礼待之。从此，由伊犁往西、巴尔喀什湖以北广大草原为哈萨克各部落游牧地，喀什噶尔附近及天山西部山区为柯尔克孜各部落游牧区。清朝政府以哈萨克、柯尔克孜为新疆西境边塞卫士。正如魏源所言：“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唯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两部落而已”（《圣武记》卷4）。尽管英国殖民主义者、沙俄不断对哈萨克进行扩张，直到18世纪末，英帝国主义还在苦心经营恒河中下游及附近地区，沙俄的实际控制线仍在奥伦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谢米巴拉金斯克一带，离中国还很遥远。在英、俄殖民者之间的新疆以西的亚洲腹地，则是大大小小各行其是的汗国、邦国和部落，如巴达克尚、浩罕、瓦罕、吉尔吉特等，它们大都以依附、朝贡等方式与清朝建立并保持着友好、密切的政治关系。

此后，由于新疆北部地区地广人稀，加之沙俄向哈萨克草原扩张等原因，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前拒绝收纳、驱出境外的政策，准许哈萨克于界内卡外，纳租游牧，“每牲百只抽一”（《清高宗实录》卷777）。甚至对迁至塔尔巴哈台的部分哈萨克部编设佐领，收取赋税（《塔尔巴哈台事宜》卷1）。在事实上，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一带游牧的哈萨克人均已成为清政府所属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辖地的属民。据此，按照清政府当初授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管辖地域，基本上是被清朝击灭的准噶尔所辖的西北疆域。这部分疆土由于沙俄的东侵，到18世纪中后期事实上已经缩小了。但塔城管辖的疆界，在清代历史文献记载中依然是十分明确的：东北方向沿额尔齐斯河与乌里雅苏台定边副将军所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地相毗连，东南紧邻乌鲁木齐辖地；西南以勒布什河（今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与伊犁为界（《西域水道记》卷4）；西至爱古斯（河）哈萨克部四百余里，接连巴尔喀什湖，与哈萨克部以次为界（《西域水道记》卷4）；北至科布多交界之额尔齐斯河六百里（《钦定新疆识略》卷2），至俄罗斯部落约八百里（《塔尔巴哈台事宜》卷4）；额尔齐斯河西北流至铿格尔图喇（今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河北是科布多地区，河南也属中国（《朔方备乘》卷23）。喀尔满岭（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是中国与俄罗斯交界诸山之一，越过喀尔满，自此往西南，沿爱古斯河与哈萨克左部为界（《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根据这诸多历史记载可知，东起沙滨达巴哈，向西跨过额尔齐斯河，翻越喀尔满岭，走向西南，沿爱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这里有一条明确的国界线。查看地图我们可以看出，碧波万顷的巴尔喀什湖曾经是边界湖泊，富饶多产的斋桑湖、阿拉湖、额彬格逊淖尔（今哈萨克斯坦之萨塞科利湖）都是中国的内湖，绵延150千米的额敏河、湍急弯曲的布昆河（今哈萨克境内之布康河）、雅尔河（今乌尔扎尔河）、哈尔巴哈河（在今哈萨克斯坦）、布吉什河（今哈萨克境内布噶孜河）、阿尔达莫多河等河流，都是中国内河，每年秋季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



塔尔巴哈台山

都要率兵巡视境内的哈萨克，巡查卡伦，都会在这些湖泊河流间穿行逗留。作为塔城最高军政长官的参赞大臣，也会不定期到这些地方进行走访和视察活动。按照清朝定制，由官方主持的山川祭祀仪式，也在这些著名的山川举行。起初，这些祭祀仅是临时性的祭告，后来逐步演进为制度化的岁祭。塔尔巴哈台山、巴克图山、巴尔鲁克山、额密尔河、裕勒雅尔河、阿拉克图吉勒淖尔、额彬格逊淖尔，均是塔城官员每年代表朝廷最高统治者举行祭祀大典之所。这些都无不说明当时这些山川所属。对此，就连长期在这一带活动过的俄国军官巴布科夫，也在其晚年出版的《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确认：巴尔喀什湖北岸标明是中国与哈萨克的边界线，西北边界是卡尔宾斯克山岭。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力日益衰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争相蚕食侵吞的对象。19世纪50年代末，沙俄趁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进一步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本来，新疆的西部疆界是十分明确的，大量的史籍文献都清楚地记载着新疆西部疆界是巴尔喀什湖的北岸。但沙俄为了达到侵吞中国领土的目的，竟然不顾事实，提出“中国西部疆界未定”的谬论。清政府非常明白沙俄的扩张野心，一再据理力争，但



清朝政府驻沙皇俄国的外交官

由于自身的软弱，加上西方及沙俄的军事压力，被迫于 1860 年 10 月签署了屈辱的《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依据这个条约及后来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科布多界志》、《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塔尔巴哈台界约》等四个边界子约，俄国从新疆割占了 40 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其中，属塔城辖区的就达 11 万多平方千米。沙俄对我国西部领土欲壑难填的贪婪和无休止的侵占，激起了我国西部各族人民的愤怒反抗，发生在 1855 年的塔城各族人民火烧沙俄贸易圈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妥协，最终也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之后就开启了屈辱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从 1862 年起，中国与沙俄进行了漫长而又艰难的西北勘界谈判，谈判的过程，也是领土被一片片被剥离分割的过程。由于勘界涉及塔城地段较多，当时在塔城任职的官员，有很多人参与了谈判和具体的划界斗争。如曾任塔城参赞大臣的明谊、明绪、锡霖，领队大臣博勒果素、荣全、图瓦强阿及一些中下级官员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项斗争。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地处边远的塔城，情况更为复杂。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塔城的大多数地方官员还是认真履行了对边境事务的管理职责，坚守岗位，维护着国家领土的完整。在沙俄大规模侵吞新疆土地之前，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员一直尽职地行使其对边界哈萨克的行政管理，查边巡视，发现情况迅速报告朝廷。在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过程中，也是义正词严，寸土必争。如 1862 年，曾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明谊和时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及领队大臣博勒果素，同俄国代表就确定西段边界在塔城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俄国代表巴布科夫以武力为后盾，强迫中国承认常设卡伦为边界。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清政府在边境地区设立的卡伦有常设、移设、添设三种。这三种卡伦，在沙俄尚未占领西部哈萨克草原，即未曾与我国直接发生边界界务之前已设立，目的是防止该地游牧人员私自出入或进行抢劫行为，并没有什么边界界址的意义，因为那些地方都属我国领地。常设卡伦，设在固定地点，永久不移，一般离城市较近。移设卡伦，有时在此，有时在彼，卡设兵在，兵去则卡空，多在春秋、春冬等牧民转场时节移动。添设卡伦，是在某一时期，因为临时的需要设置卡伦，到时效过去卡伦随即撤销。两个卡伦之间的巡查递筹的路线，叫开齐。有的卡伦还另设瞭望地点，叫布申克，即小卡伦。

卡伦线和国界线完全是两个概念，上述三种卡伦都不是国界线，因为“驻兵

安卡，卡外之地尚多”（《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在塔尔巴哈台西北一线，卡伦绵亘千里，可见三种卡伦都在中国境内。之所以要设立三种卡伦，是因为这些地区居住的大都是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春夏秋冬气候差异很大，牧民之牧地也变化不定。卡伦就是为维护这些游牧部落的秩序安全而设，所以它的设立也随游牧部落的移动而移动。“三者之中，惟常设卡伦为永远驻守之地，余皆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皆在常设卡伦之外。”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的卡伦，以塔城为中心设置，东北与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卡伦相接，称塔尔巴哈台东路卡伦，距塔城以千里计；向西南至阿拉套山，称塔城西南路卡伦。可见，常设卡伦之外，还广有数百里乃至上千里的辽阔土地。卡伦的作用是管理游牧，稽查偷盗、逃人，传递文书，征收赋税，维护边境治安等，很清楚，卡伦位于中国领土之内，是边防的第二线，根本不是边境线。如果一定要将其视为边界，那也应该是以最外部的移设和添设卡伦为边界。正因为如此，卡伦距边界都有一定距离，特别是常设卡伦，离边界更远。有的常设卡伦就设在城市附近，如塔尔巴哈台所属的巴克图卡伦，距塔城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千米。俄国人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硬是把中国设在境内的卡伦说成边界标志，就是借词侵吞中国领土。为达到目的，俄国人出动军队，越过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不断向中国常设卡伦推进，占据了伊犁、塔尔巴哈台常设卡伦附近的许多战略要地，甚至距塔城仅十几千米的巴克图也受到俄军的威胁。所谓以常驻卡伦为界，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境内划国界，这是赤裸裸的武装侵占。

面对不可一世的俄国代表，明谊等人据理反驳，他们指出：《北京条约》第2条内提到的边界长达万里，其中仅指出地名三处，而且并未明确提到以常设卡伦为界的词语；随后又指出，自乾隆时期以来，清政府即对卡外哈萨克等民族实行管辖，收取租马；勒布什等地为巡边部队会哨之地，乾隆年间在那里立有石碣，现在尚存，常设卡伦并非国界，彼此疆界各有定制，应依旧址地图详加讨论。

谈判进行了两个多月，双方会晤了十多次，明谊、明绪、博勒果素等人严正驳斥了俄国人的荒谬论调，坚持不肯退让，谈判几度陷入僵局。俄国人理屈词穷，决计再度给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遂单方面中止会谈，启程回国。谈判停止期间，塔尔巴哈台官兵照例巡查边卡，防范入侵者。1863年，此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已经调离，改由锡霖继任。锡霖此时体弱多病，曾多次向朝廷提出回内地治病的要求，无奈这个时候清政府正忙于对付中国东南洪秀全的凌厉攻势，事务纷

繁，迟迟不作答复，他也只能强打精神支撑，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他时常督饬官兵在边卡严密侦查，认真防御。6月至7月，领队大臣博勒果素率领塔城官兵数次在塔尔巴哈台的塔勒奇沟、巴克图等地与俄国军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坚决堵御俄国侵略者闯卡。

正当此时，陕西、甘肃地区爆发了回民反清大起义，受其影响，新疆的局势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沙俄利用清政府内顾不暇之机，陆续采取军事行动，向中国的常设卡伦逼近。1864年春，俄军全线出动，分头侵入科布多、塔尔巴哈台、斋桑淖尔及伊犁地区，他们占据卡伦道路，垒建鄂博，阻拦、驱赶卡伦官兵，抢夺中国官兵的武器和毡房。同时还在占领区强迫当地哈萨克出具手印字据，要他们声明归属俄国。在俄国的恐吓武力威逼下，清政府屈服于俄国的强横，担心“若不早为完结，诚恐酿成不可收拾之势”，便照会俄国驻华代办，同意按照俄国代表提出的“分界议单”划界。当年9月，俄国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第二次来到塔城，与清政府代表会谈。由于明谊、锡霖没接到上谕，巴布科夫不肯等待，离塔城回国，谈判再次中断。这时，天山南北的反清起义已相继爆发，伊犁将军的府治也处在起义军的包围之中。清政府内忧外患，相逼甚急，万般无奈，只得指示塔城谈判代表“勉图收束”。明谊、锡霖等人也感到形势的严峻，尽管从心里不满意，也只能按清政府的指示照会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同意按俄国的议单换约。9月，俄国代表扎哈罗夫、巴布科夫第三次来到塔城，将俄国绘制的划界地图交给中国代表，并声称：如不照此办理，我们就派兵强占。11月，明谊、锡霖、博勒果素等人被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只得在屈辱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

按照《界约》规定，换约后240天后两国大臣就要在指定地点会齐，建立界碑鄂博，划分界址。1865年，塔城爆发回民起义，乘大势攻城，锡霖率军民拒守城内，回军久攻不下。1月27日，回军以谈判为名，将锡霖诱到城外杀害。新授参赞大臣武隆阿继续闭城坚守。后因援军发生恶性瘟疫退走，回军乘机攻破塔城。武隆阿率军巷战，负伤后被乱刀砍死。千总甘涌力竭被俘，被回军残暴地将手脚钉在城门上，受尽折磨，数日之后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由于塔城的失守，中俄双方原定建立界碑鄂博工作受到影响。1869年春，双方才开始在清政府控制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之地边界勘界立碑。由于清对塔城的统治还没有恢复，所以塔城以南的中俄国界仍然没有勘界立碑。

直到1883年秋，中俄双方签订了《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才在塔城的西南设立了界碑。从塔城失守的1865年到1870年间，塔城虽然控制在清政府手中，但因战乱，两任参赞大臣被杀，新委任的参赞官员因局势混乱，有的根本没到任，有的属兼职，塔城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已经侵吞塔城许多土地的沙俄仍不满足，继续用武力威胁和骚扰中俄边界塔城所属一带地方。

1871年，荣全奉命去伊犁同俄军谈判收回伊犁。他一路率军清剿匪患，打通了科布多到塔城的道路。又在徐学功所率汉族民团配合下，率队进攻俄国人在塔城北面设立的驻有200余人的哨卡，杀死俄国士兵90多人，冲破俄国阻挡，进入塔城，在塔城设立了行营，恢复了清政府对塔城的统治。由于俄国人阻挠，荣全无法去伊犁，便立足塔城，会同塔城参赞大臣英廉，一同招募逃散的军民在塔城垦荒种粮，为驻军提供军粮，以保卫疆土不被俄国人侵占。1876年，他派军官依楞额率领驻塔城清军千余人，协助左宗棠的西征军攻克了顽固堡垒玛纳斯，全歼了阿古柏在北疆的守军。1877年任参赞大臣的锡纶，领队大臣图瓦强阿多次带队征讨受沙俄指使前来塔城边界骚扰抢劫的白彦虎匪帮，荡平了匪患。为有效防止沙俄渗透，他们还将所属十营兵力分为十屯，分派到塔城北山边卡和巴尔鲁克山地区以屯代防，一边垦种，一边防守，有效地阻止了沙俄的入侵。在边界谈判中，他们还因熟悉边界情况，参与谈判事务，为维护国家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二十余年的划界历程中，塔城多数官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尽忠职守，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斗争中，他们尽心竭力，全力捍卫国家利益。但是由于地位所限，他们并不能决定谈判的结果。因此，这时期的大部分塔城官员们虽然尽职尽责，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们治下的地方还是丧失了大片的土地。划界之前，塔城巴尔鲁克山以西有一条直通伊犁的被称为“喀帕尔走廊”的地带，是塔城通往伊犁的捷径。但在中国内外交困的境况下，也被俄国割去，从此去伊犁，无论公差还是个人商务，都不得不绕道而行，陡增了许多行程。这是当时官员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剧。

近代地理学家白眉初在《近代二十四藩建撤考略》一文中指出：“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咸丰四年（1854年）正值中国鸦片战争后，大乱迭起，不暇西顾之时，亦即吾哈萨克藩地被其包围入其管领之时期，此即撤藩最初时期；而沙俄对于中国之攘夺西域藩属而侵占疆域，则自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始，后同治三年（1864）同沙俄缔结《塔城界约》，光绪七年（1881年）缔结《伊犁条约》，

光绪八年（1882年）、十年（1884年）两次缔结了《喀什噶尔界约》。至此，西北国界显出，西疆失去甚巨。”

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初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管辖境域非常辽阔，西部由就铿格尔图喇（在阿尔泰山西段，今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过额尔齐斯河，经喀尔满岭（今哈萨克斯坦卡尔宾山）、爱古斯河（阿亚古斯）到巴尔喀什湖北岸东端；北部由铿格尔图喇顺额尔齐斯河向东，经斋桑湖到科布多界；西南顺勒布什河与伊犁接壤；南部沿阿拉山口、艾拉克卓尔与库尔喀喇乌苏相连；东南部与乌鲁木齐、古城接壤，总面积达21.8万平方千米。经不平等划界后，原自铿格尔图喇过额尔齐斯河，经喀尔满岭、爱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的辖属塔城的中国边界，北向东南推移至赛哩山、塔尔巴哈台山、库木尔齐、巴克图、莫多巴尔鲁克等卡伦一线。原属塔城的爱古斯河、布昆河、勒布什河、雅尔河流域及巴尔喀什湖、斋桑湖、阿拉湖、萨瑟克湖等中国内河、内湖都被划入俄境，使得离塔城最近的一个驻守哨所（常设卡伦）变成了与城市直接相连的口岸。

五、众多的卡伦和台站

清朝在统一新疆过程中及设立伊犁将军之后，根据军事和边防需要，设立了很多卡伦和军台、驿站。当时卡伦和台站具有双重性质，在国界上时，它是边防哨所，在内陆时则是管理内部的一种手段和形式。综合其功能计有如下几项：防守边界，管理游牧，保护耕种，稽查逃犯，防守要隘、道口、森林、水源、桥渡，监督贸易，保卫城镇，传递函件，协助运输军需物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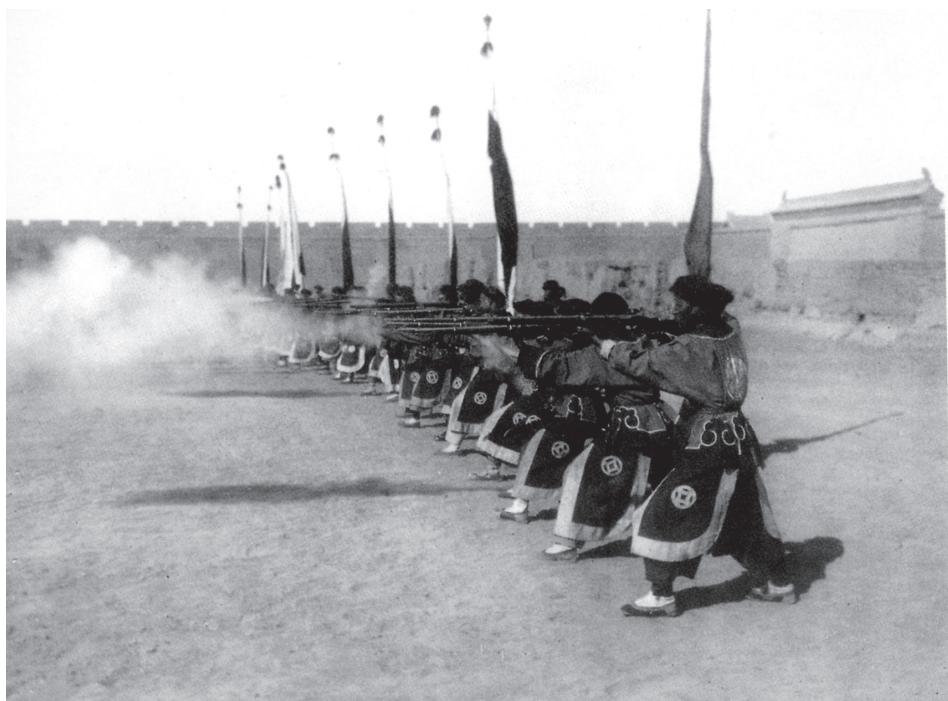
在边疆地区设置卡伦，是清代前期在北部边疆建立的一项重要政策。雍正初期，因“黑龙江檄外境壤牙错地，无边墙，各处俱设卡伦，以防御俄罗斯”（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0）。后来，又在中俄中段边境的喀尔喀游牧地设置了47座卡伦。“准噶尔平后，塔尔巴哈台、伊犁增设卡伦一如前制”（《朔方备乘》卷10）。

清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理非常重视，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加强对这一地区边境的有效管理，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设置之前，早在乾隆前叶的1758年，就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北地区设立了许多卡伦。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的卡伦就有29座。在属于塔尔巴哈台辖区范围内就设置了以下卡伦：从斋桑湖流

出的一段额尔齐斯河西岸，设有迈拉虎卡伦，与科布多所属和尼迈拉扈卡伦隔河相望；斋桑湖正北地区设有札哈苏淖尔卡伦和策克德克郭勒卡伦；在斋桑湖东南岸，额尔齐斯河与塔尔巴哈台河合流处，设有玛尼图噶勒干卡伦；斋桑湖西北地区、阿布达尔摩多河滨，设阿布达尔摩多卡伦；临哈尔哈巴河设哈尔哈巴河卡伦；布吉什河岸设布吉什卡伦。随后，伊犁将军明瑞向清廷建议，要在雅尔周围设卡伦 21 座，每座卡伦派驻军士 25 名。后来因为这些卡伦“去伊犁、雅尔河二处，近者二三百里，远者千里”，所以又请停设。以后设置的卡伦，无论添、撤、挪移，或是常驻卡伦，都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可见，卡伦设置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成不变，完全是根据当时的需要。

清政府对于卡伦，有严格的巡查制度。西北边境地区的巡查制度更为严格，每年春秋二季，各巡查所属卡伦一次，由主管边防的官员负责执行巡查任务。从 1764 年到 1840 年，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巡查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北路，由塔城向北至斋桑淖尔西北的辉迈拉呼卡伦，与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军队会合后返回塔城；另一条是南路，由塔城向西，经雅尔、招莫多、爱呼斯到勒布什，在这里与从伊犁方向前来巡查军队回来后，由巴尔鲁克、巴克图等卡伦返回塔城。1840 年后，沙俄对我边境地区不断扩张蚕食，竟深入我边境地区 600 余千米，加上 1865 年后的动乱，塔尔巴哈台两任参赞大臣相继殉难，塔城无人理政，施行多年的卡伦巡查制度就此停止。后来，虽有所恢复，但其规模、力度已经大减，性质上由功能众多的巡查变成了单纯的边境巡视。

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清政府设置最早的的正式机构是军台。所谓军台就是兵站，“以备递送折报公文，并转运各项官物”（《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上册），也就是专门传递军事文书和转运军用物资的机构。清制，除全国腹地设有相当数量的驿所外，通向沿边地区专司军报的是站、塘、台。每站设笔帖式或蒙古章京，统于将军或理藩院；甘肃嘉峪关口外设“塘”，每塘派千总、把总管理，而由特设的都司或守备督率之；西北设“军台”，每台派章京或笔帖式管理，统辖于当地的都统或将军、大臣。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清政府在新疆设置了很多军台，用以传递折报公文、军事情报，并运送各项官物。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后，根据新疆驻兵、屯田的需要，对原有军台的布局进行了一些调整。整个新疆共设军台 165 座，营塘 63 座，驿站 39 座，联络贯通 7850 余千米，形成了一个贯通新疆与内地、联络天山南北、“四通八辟、棋布星罗”的交通网络。随着清政府对新疆



晚清时的新疆士兵在训练射击

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台站的数量逐渐增多，联络更为密切和便捷。

1763年，清廷诏命在雅尔河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设军台，并派兵驻守管理。塔尔巴哈台军台设置早于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是在平定新疆过程中，根据军事需要设置的。新疆平定后，从伊犁将军所在地向东北至塔尔巴哈台975千米，共设置军台9个。每个军台都设有兵丁或当地民户进行管理，并备有马匹、牛只、骆驼、车等交通和运输工具。北疆各台站一般是每个军台有5名士兵守卫，大都是就近从当地各兵营抽调，令他们携眷前往。重要的台站，适当增加兵额并派有满兵，后来基本上都由绿营兵携眷与当地民户共同管理，发给一定的费用，并允许就近开垦土地，自行耕种。这就是塔城最初屯田方式的一种。次年派兵筑城，乾隆皇帝亲自赐名“肇丰”，委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驻守管理，设各级官员65人，士兵600人。这是塔城军政管理机构的肇始。由于该地冬季雪大封路且极其寒冷，夏季又多蚊蝇叮咬，将士不堪其苦，遂于1776年向南移至楚呼楚地方（今塔城市）再筑新城，乾隆帝再次赐名“绥靖”。城中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各衙署、府第，满旗兵营及相应相关办公场所一应俱全，并逐步完善。随着人民聚居，人员辐辏，



巴尔鲁克山

渐成街市，从此，塔尔巴哈台山下有了一座新城。

绥靖原本只是一处军台，但随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设置，遂成为整个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军政管理机构，成了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行政中心。据《清朝续文献通考·邮传考》记载，其所属军台共计 10 处，有马 110 匹，牛 20 头。军台的设置不是一次到位的，随着时间的具体情况的需要而变化。据载：“嘉庆八年，上谕要求：塔尔巴哈台自色特莫尔多至乌尔图、布拉克军台止，计设大台四处，每台置铁瓦车二辆。”可见，不仅军台有大小之分，有数量的变化，还有设施的更新。嘉庆八年军台添置了铁瓦车，其传递营运等综合能力也加强了。

参赞大臣是本地最高军政长官，军事、兵事、民事、通商均有其决策定夺。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衙署设置初期，由于面积广大，其统辖的军台、驿站很多，东至科布多，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西南到伊犁，巡防、驻守的哨所、卡伦路线很长，因此所属军士、官员也日趋增多。但西北勘界后，由于失地颇多，不仅边境线急剧向内收缩，边卡、军台、驿站的数量和走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865 年，由于波及全疆的农民起义的爆发，清政府在塔城的统治也受巨大冲击，两任参赞大臣战死，加之伊犁随后又被沙俄出兵占领，几年之中，整个塔城基本处于无人统辖的无政府状态。1871 年，乌里雅苏台将军荣全被清廷委任为

伊犁将军，同时，还命他火速前往伊犁，与俄国人会商收复伊犁事宜。为了安全起见，荣全从乌里雅苏台抽调了一百多名官兵护卫。队伍走到海西（今福海县）时突遭匪徒抢劫，清军领队官受了重伤，幸亏驻在西湖（今乌苏县北）的徐学功率领民团前来救援，才赶走了匪徒。一路上在民团的保护下，冲破重重险阻，终于打通了科布多到塔城的驿道，于1872年1月来到塔城。由于这时的伊犁已被俄国人占领，荣全几次准备前往，俄国人百般阻挠，迟迟不派代表。荣全在阿亚古斯空等两个月，既不能会谈，又无法赴任，只好停留在塔城，并在这里设立了伊犁将军行营（今额敏县一带），办理全疆公务。随后，清政府新委任的塔城参赞大臣等各级官员也陆续到任，清朝政府在塔城的统治方始得到恢复。

由于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在军民的共同开垦和建设下，因遭战乱受到严重破坏而荒凉冷落的塔城，人烟房屋逐渐稠密，一天天繁荣起来。一时之间，偏僻的塔城竟成了全疆的政治中心，成了团结和领导全疆各族人民抵抗外侮、收复失地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本来，沙俄在占领伊犁之后，还计划侵占塔城。1872年四五月间，他们出动三个连的兵力，并准备了大炮等重型武器，侵入了塔城所属的额敏河谷地，想通过这里去攻取玛纳斯和迪化，就像当时侵占伊犁一样，再演一次“代收代守”的丑剧，公然提出：塔城是伊犁的管辖地，也是俄国暂管的地方。但由于此时荣全已在这里设立行营，布防了军队，而从各地投奔而来、参与塔城屯垦的军民又加强了塔城的防御力量，如果俄军这时再率军深入，不仅会受到当地各族民众的反击，还会与荣全部署的清军全面发生冲突，这样一来，“代收代守”的伪装就要被揭穿了。所以沙俄只好放弃了计划，从塔城撤走了军队。在后来的数年内，塔城军民一边生产，一边训练军队，积极备战，在保卫国家领土不被侵犯的同时，积极为收复失地作准备。1876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斗打响，荣全率军从塔城出发前往参战，为攻取北疆最后堡垒玛纳斯发挥了积极作用。

按照《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国已经失去了塔城西南塔斯提河以西的大片领土，昔日内湖阿拉湖也被俄国划走。1881年2月，清政府委派的全权代表在圣彼得堡与俄方就交还伊犁进行谈判，在左宗棠西北大军之支撑下，曾纪泽全力力争，虽然索回了伊犁及所属部分领土，但由于政府软弱，仍然失去了不少国土和权益。在双方签署的《中俄伊犁条约》的附件《中俄改定陆离通商章程》和《俄商前往中国贸易卡伦单》中确定：在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准中俄两国人民任便贸易，

均不抽税。在塔尔巴哈台设巴克图、察汗鄂博为过界贸易卡伦。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塔城所属巴尔苏山口至喀拉达坂之间这段边界，也即巴尔鲁克山一带及其南段以西的一些地方，已经写明归属中国，明确规定了走向，只是没有设立界碑。按照《中俄伊犁条约》第九条规定：从前未立界碑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安设界碑。但是，在1883年9月中俄双方代表商谈界碑时，俄方代表竟提出“重议边界”的无理要求。经中方代表据约批驳后，俄国代表又以游牧于巴尔鲁克的地区的俄属哈萨克一时全部迁移困难为由，要求租借巴尔鲁克山10年，如不答应，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中方虽据理反对，无奈俄方代表一味胡搅蛮缠。中方代表升泰恐俄方借端生事，引起更大麻烦，经请示后答应了俄国租借巴尔鲁克山的要求，于1883年10月订立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租借地方包括今天的裕民县全境和额敏、托里两县的一部分。

俄国人租占该地后，东出可断塔尔巴哈台驿路，南下可入乌苏、精河，断伊塔通往迪化之饷道，隔断伊塔的边防，失地利，危疆域，使中国西部边疆的防御“如鲠在喉”，隐患极大。不仅如此，由于俄国租占面积大，塔城辖区所剩面积更加狭小，当地的牧民不敷驻牧，人口牲畜糊口无资，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有离乡背井，四处逃难谋生。塔城人民就这样狭窄拮据的环境中生活了10年。

为了讨还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地各族人民多次向地方官员要求收回巴尔鲁克山，当地驻军和官员也多次提出索还巴尔鲁克山的要求。在当地官员和军民的强烈呼吁下，清政府曾经照会俄国，要求迁民还地，履行条约。但俄国政府迟迟不作答复。时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尔庆额，在塔城时间较长，任职期间，他亲身体验过百姓失地的痛苦和沙俄日益膨胀的野心。他担心如不能按期收回失地，就无法安顿百姓，于是在借约期满前一年就给朝廷递了奏折。他在奏章中说：“借予俄人巴尔鲁克山地方，至明年九月将界期满，请饬总理衙门预先照知俄使，将俄属哈萨克陆续迁移。……如到期照知，必以哈萨克迁徙困难藉辞推诿，以呈其觊觎之计。”

根据塔城军民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开始与俄国政府进行索还巴尔鲁克山的交涉。这时，俄国人好像已经忘了前面许下的诺言，竟然提出继续租借的无理要求，实质上是妄图以无赖手段将巴尔鲁克山据为己有。清政府一面据约行文驳斥，一面令塔城派人与俄国领事馆交涉。塔城地方政府依靠当地人民的支持，据理进行论争，竭力索还。沙俄代表“初犹狡执，既而再三争辩”，但在有他们自己亲笔

签字的条约面前，终于理屈词穷，才答应按照条约将他们的属民迁走。但在办理迁移山中俄属民众时，又以有数千户人家无处安置，要把巴尔鲁克的南段卡住不还。当地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交涉官员也坚持不让，俄国代表见隙可乘，这才同意将借地一次交清。巴尔鲁克山失而复得，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版图，但是，那些此前失去的土地，包括塔城官兵长期巡逻稽查的卡伦鄂博、边防哨所，那些军台驿站，我们再也无从觅踪。

此后，塔城地区所属地方与俄国的边界基本确定，沿边通往俄境的通道（塔城当地人俗称“口子”）很多，其中较平坦易于通行之地就不下 10 处。在塔城西部边境，除巴克图之外，还有乌苏布拉克、沙尔布拉克、额敏河出境处，靠近巴尔鲁克山一线的卡伦鄂博有巴尔嘎克、色敦巴尔鲁克、塔斯特、海瓦奇满、红盐池等；塔城北端沿塔尔巴哈台山、萨吾尔山即两山山口间的卡伦则有察汗鄂博、乌里雅苏图、博罗胡吉尔、博尔噶苏台等，人畜均可通行。民国初年，俄国哈萨克人起义遭到镇压，不少哈萨克人就是通过这些通道涌入中国塔城境内的。稍后的 1920 年左右，被苏俄红军击败的大批白卫军败兵及其眷属，也是通过这些自然通道被解除武装后进入塔城安置的。其后，由于白卫军败兵不服从管理，屡屡生事，欲以塔城为基地反攻苏联。经新疆政府同意，苏联红军入境追剿被卫军败兵，则是从苇塘子、巴克图一线进入塔城辖境的。

在上述通道中，由于大部分均在山中，道路崎岖坎坷，不易通行，只有巴克图通道地势平坦，向内可经他乘直通迪化；向外则经过马坎赤经乌尔扎尔与阿亚古斯四通八达的铁路相连，所经之地大都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人口密集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对苏贸易的需要，额敏河出境河口与察罕鄂博还被启用为对苏贸易的临时交货点，随着时空的推移演变，包括额敏河出境河口、察汗鄂博等通道均为人们所废弃遗忘。最终，距塔城最近的巴克图得天独厚，成了唯一的通道。这就是现在的巴克图口岸。

第二章 口岸建立的辛酸和欢歌

一、初期的商贸往来及口岸的正式建立

塔城最初的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塔城设治初期。不过那时的贸易对象并不是俄国，而是周边的哈萨克、柯尔克孜诸游牧部落中的各部族成员。因为那时中国与俄国领土并不接壤，与他们的距离还远着呢！

1760年清朝统一新疆后，逐渐在新疆建立政治、军事制度，并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生产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北疆开展大规模的屯田和举牧。于是清政府从这年开始，把伊犁作为与哈萨克贸易的中心加以建设和经营，以获得大批的马、牛、羊、驼等使用和食用的牲畜。塔城是紧随伊犁作为贸易点的另一个贸易中心，并且起点很高。起初，总统天山南北事务的伊犁将军只希望把与哈萨克等部族的贸易中心集中在伊犁，并没打算在塔城再设贸易点。因为这样便于管理和统计，并可以减少商品货物转运的麻烦。但塔尔巴哈台一带的游牧部族因为交通和习惯等原因，就是盯住塔城不放，千方百计把他们的牛、马、羊和畜产品带到塔城进行交易，伊犁将军方面也无可奈何。当时塔城官员们，为了自身需要，也为展示塔城官府的威信和恩义，也屡向清政府和伊犁将军上表进言。最终，伊犁将军只能因势表态，同意在塔城再辟集市，开展贸易。塔城官员特在塔尔巴哈台绥靖城（今塔城军分区驻地）东侧设置了固定的哈萨克贸易厅，每逢秋季，周边各游牧部落的人员就会络绎不绝地前来交易，他们大都是利用转场迁徙过程中临近塔城的机会，用自己的牲畜、毛皮、兽皮等畜牧产品来交换生活必需的茶、糖、布、盐等各类商品。同时也有专门的商队驱赶着马匹、牛羊和少量骆驼等牲畜，驮载着牛羊皮张、毡片等货物前来“交易绸缎”而去。其所需绸缎、布匹，俱自伊犁或迪化转输。为与各游牧部落进行交换，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取绸缎数百和数千匹不等，从伊犁或南路调取回布数千或数万匹不等。在交易兴起和繁荣时期，商队用马、牛、羊等牲畜换取的主要是

内地生产的各种丝织品，这是草原游牧民族最喜欢的商品。1769年，塔尔巴哈台用于交易的绸缎达4000余匹。1780年，塔尔巴哈台所需棉布5000余匹，陕西省不能织办，朝廷令湖北如式织办。当贸易被消减或削弱之后，游牧者所换取的商品则主要是由南疆生产“回布”。嘉庆《大清会典》记载：“凡哈萨克之牲畜设官市，伊犁、塔尔巴哈台与哈萨克互市牲畜，每马十，给回布三十至五十匹；牛十，给回布二十至四十匹；羊百，给回布七十五至八十五匹。回布每十匹，合银四两。如哈萨克愿得缎匹者，计值给予，官为经理。”《伊江集载》记载：“每年调解内地各色绸缎七百四十匹，内江宁解二百四十七匹，杭州解二百四十六匹，苏州解二百四十七匹，以备赏犒外夷及官兵买用，并换易哈萨克牲畜。每年由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等处征运回布九万九千余匹，内应转运塔尔巴哈台三五千匹，其余备赏犒外夷并易牲畜。”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管窥塔城设治初期的贸易情况。这种贸易一方面给当地政府带来可观收益，另一方面又给辖区（包括辖区之外）的游牧部落带来便利，因此官民每年对这项活动都乐此不疲。

由于塔城是西北边防的军事重镇，是消费型城市，几乎没有自己的手工业，绝大部分商品都是由其他地方调运而来。直到道光末年，塔城的手工业才有了酿酒和榨油等少数物品的生产。因此，商品进出的物流量很大，发展也很快。随着时间的流逝，历久成习，塔城的贸易就成了当地人及周边远近人民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塔城设治初期的贸易中，除由官方承办外，也有内地商贩参与其间。据《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记述，从乾隆年间起，内地商贾经常贩运各种日用百货来塔尔巴哈台销售，交换牲畜、毛皮和药材等物。但前来贸易的大都是行商。1836年起，因为清政府从这时开始，允许在当地经营的内地商民自备资金，搬迁眷口移住，商民聚居于此者不断增加。史载自绥靖城建立后，“举牧兴屯，生聚教诲，民夷向化，蔚为西北重镇”。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之前，塔城也是贸易中心，是与哈萨克等外藩部落进行交易的中心，主要是内贸，主导者是以官方为主，掌控着贸易大权，内地商人也参与其间。交换对象主要是内附之哈萨克、布鲁特等游牧部落成员，互换的货物是各游牧部落的畜牧产品和中国内地商品。虽然也有少量的俄罗斯商人加入其间的交易，但只是辅助性的，无法改变内贸这个大局。

在参与贸易活动的成员中，大都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辖之地的游牧者，

即藩属于大清帝国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部落的商队及附近游牧者，土尔扈特人被安置在塔城后，应该也是贸易成员之一。据《清代新疆经济社会史纲》一书介绍，最初清政府鉴于这里驻兵及人口有限，只同意接受小股商队前来贸易。从各游牧部落前来塔尔巴哈台贸易的商队，人数大都是只有数十人左右，超过百人的商队则比较少。商队所带的作为商品交易的除羊只外，马、牛一般均在数十或数百匹头之间。据史料记载，1765年进入塔尔巴哈台贸易的商队前后共有5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特尔滚（哈萨克部落首领）属下的阿克萨尔克商队，共有成员50余人，成交贸易额为：马316匹，牛79头，羊3615只。1767年奉派前来塔城贸易的商队也是5队，但有两次商队人数超过百人。一是当年8、9月间以哈尔巴斯为首的商队，共有成员198人，该次交易共计易换骟马783匹，牛130头，羊3175只。当年10月间由瓦克、克列鄂托克两部落派出的商队有成员142人，该次共完成交易马1432匹，羊248只。这是成规模的交易情况，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交易。同时还有一些来自布鲁特（柯尔克孜）的商队以及一些来自俄罗斯的商人前来交易。但由于清政府控制严密，这种交易不受官方保护，因此数额很小。

这些由清政府掌控的初期贸易，为清朝经营新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从乾隆时期在新疆北部大兴屯田（军屯、民屯、回屯、犯屯），设“四牧营”，安置从伏尔加河东归的土尔扈特诸部等，都需要大量的牲畜，以安置新到的人口和发展生产。这些物资如从内地调运，路程太远，途中会有很高的死亡率；而从与哈萨克诸部贸易中获得，则事半功倍。事实证明，正是贸易中获得的各种牲畜，安置了移住北疆的各类型人口，使之能尽快地融入本地，发展本地的农牧业生产；再如设于当地的滋生厂，滋生牲畜，发展牧业，每年从贸易中换取的马、牛、羊、骆驼等，均可交由滋生厂放牧，促进了本地畜牧业的发展。

清朝与哈萨克的贸易以内地生产的绸缎、布匹和南疆各地生产的“回布”为主要品种之一，需求量很大，这无疑刺激和推动了该地的手工业发展。尤其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南疆各地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回布，开始大批量投放到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市场，并逐步取代了内地的各种布匹。有学者统计，乾隆至嘉庆、道光时期，每年由南疆采办并运往北疆的回布，除供各族驻防携眷屯田绿营官兵的各项需求外，占总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回布，是用于与哈萨克诸部贸易的。这不仅节约了国家运费，也解决了南疆回布销售困难的问题，并

极大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生产发展，同时对推动整个新疆的社会发展和进步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由于贸易获利颇丰，引起了俄方关注。渐渐地，不仅参与贸易的人员在增多，官方也开始插手。1791年，俄国布赫塔尔马要塞的官方就出台了“通商办法”，鼓励俄国商人赴塔尔巴哈台进行贸易。进入19世纪，随着他们对中亚哈萨克草原的扩张，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西北的领土暴露出贪婪野心。为获得领土和商业上的双重利益，他们在对我新疆地区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蚕食侵吞的同时，还通过外交手段屡次要求与伊犁、塔城等地正式通商。1805年，俄国政府特任命葛洛甫金为全权代表出使中国，其中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说服中国政府，同意俄国中国的新疆正式通商。这一时期，俄国政府和工商界对与新疆通商非常关注，其外交部与财政部还专门研究了伊犁、塔城为商埠的问题。根据此后新疆大片领土被割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的通商诉求中，其实还包藏着对土地占有的强烈欲望。通商，只是他们的掩人耳目的旗号及利益副产品。

19世纪以后，沙皇俄国开始向哈萨克诸部步步紧逼，最终吞并了辽阔的哈萨克草原，并逐步侵入中国西北边疆。19世纪上半叶，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扩张已推进到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25年，沙俄在卡拉塔尔河上建筑房屋并且派驻军队。这一侵略活动受到清朝的抗议，次年俄军退出。最初沙俄对我国西部边区的军事活动还遭到了长期游牧于此的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勇猛抗击。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无暇西顾沙俄的蚕食行径。结果，哈萨克族等牧民自发反击沙俄的斗争很快失败，沙俄大举移民到新侵占地，在草原地区推行总督制管理方式。这样一来，清朝早在统一新疆过程中建立起与哈萨克的藩属关系开始解体。

1840年和1848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不得不在东南沿海陆续开放一些港口作为通商口岸。西北的沙俄帝国也不甘居后，他们沿着哈萨克草原继续东进。为了刺探中国西部市场和军事情况，沙俄政府于1845年派遣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冒充中亚商人混进伊犁、塔城等地进行活动，了解俄国在塔城等地的贸易受阻碍的原因的详细情报和中国沿边哈萨克和布鲁特居住地区的情况，为其武装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作准备。通过刺探，柳比莫夫向俄政府报告说：以中国之大，“对

俄国产品来说，那里不存在市场不足的问题”，“只要运去的多，走这条路或是另一条路对俄国来说都是一样”（《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清代卷下册）。为此他建议沙皇，为打开中国西部市场，政府要采取积极的侵略步骤，包括强迫中国政府签订通商条约。他还与其他大臣一起向沙皇提议：一面采取军事措施，从西伯利亚派出武装部队，占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乌尔扎尔（即中国雅尔河流域）、卡拉塔尔（中国科克乌苏河流域）等通往塔城和伊犁的交通要道；一面通过俄国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向清政府提出开辟商埠的要求。这表明，沙俄在伊塔通商问题上，是把“贸易措施与军事的和政治的措施结合在一起了”（《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结果，基本与沙俄预计的一样，至 1846 年、1847 年沙俄势力最终占领了所谓的谢米列契斯克边区（七河地区）。其后，沙俄乘中国内外交困的时机，强行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及其在具体化过程中的武力威逼，进一步割占我国西部领土。最终，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国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部众赖以生存的牧地尽被沙俄吞并。伊犁将军不得不沉痛地向朝廷奏报：“哈萨克全部遂归俄有，我新疆由是即与俄国接壤。”

此时，沙俄认为他们扩张的新占领区已完全与中国的伊犁、塔城相接，其枢密院通过驻北京外交使团两次呈文清政府理藩院，以与中国西部正式通商条件已经成熟为由，要求开辟伊犁、塔城、喀什三地为通商贸易区，但遭到清廷军机处的拒绝。

1850 年 1 月，俄国政府第三次提出开辟伊、塔、喀三地为通商口岸的要求。当时清政府面临的状况是：从 1841 年到 1849 年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和骚乱事件就有 110 多次，各地此伏彼起的小规模革命斗争正在会聚成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国际方面，由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取得的侵略成果，关系日趋紧张，而俄国则在中国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陈兵边境，不断发出武力威胁。此时的清政府，一方面面对西方列强的强悍和威逼，妥协退让已成积习惯例，唯恐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会“致激事端”；另一方面俄国商队进入伊犁、塔城两地贸易已成既定事实，拒绝并无实际效果。迫不得已，遂于同年 5 月同意在伊犁、塔城两地开埠通商，但“必须两国共同另议章程”。至于喀什，则以商务不旺为由，拒绝开放。

1851 年 7 月 19 日，俄国商务谈判代表科瓦列夫斯基携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噶

里、扎哈洛夫和塔塔林诺夫等一同来到伊犁。这几个人都有相当深的中国背景，如谈判首席代表科瓦列夫斯基曾任俄国驻华东正教布道团的监护官，扎哈洛夫和塔塔林诺夫都是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布道团的成员，居留北京多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熟悉，堪称是俄国的“中国通”，这对中国谈判代表无疑是一种压力。

中方的谈判代表是时任伊犁将军的奕山和参赞大臣布彦泰。奕山是皇室宗亲，曾以反对林则徐抗英和对外怯懦畏敌而闻名。由这样的人主持谈判，其结果可想而知。1851年8月6日，清政府被迫与俄国政府签定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是一个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约之年恰逢道光皇帝驾崩和咸丰皇帝继位，加上奕山畏敌如虎，这些因素更加重了条约因缺少努力坚守而造成的不平等结果。

整个条约共有七个条款，归纳其全部内容，沙俄据此获得了如下特殊权益：

一是设立领事权。条约第二条规定，两边商人互相交易，虽系自定价值，不能不为之设官照管。中国由伊犁商务处派员；俄罗斯国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官照管。“匡苏勒”是俄语领事馆的音译，条约的规定等于中国丧失了对等在俄罗斯派驻领事的权利。从领事设立后的具体情况考察，沙俄领事的职权事实上绝不止是专管贸易，而主要是在商务名义的掩盖下，大量窃取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关键时刻还对塔城地区的内政事务进行干预。

二是通商免税。条约第三条规定，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新疆原来对俄国商品征收“三十抽一”的税率，在此条约中也被取消了。所谓“两不抽税”，表面上看似平等，而实际上因为中国人并不去俄国经商，所以这个条款只对俄国商人有利，中国方面却丧失了关税主权。它破坏了清政府在新疆利用关税保护本国经济的权力，为俄国的经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塔城（乃至新疆）沦为了俄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供应地。

三是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第九条还规定，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亭居住，自由俄罗斯管贸易官管束。第十一条规定，俄罗斯商人前来，必有骑驮牲畜，即在指定伊犁河沿一带自行放牧；其塔尔巴哈台，亦指定有牧草地方放牧，不得践踏田亩、坟墓。尚有违反者，即交由俄国管贸易官究办。将这几条综合起来，就是俄国商人在中国平白无故增添了牧场，而且其商民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官员管理和中国法律制裁，而由俄罗斯领事

单方面处置。

四是建立贸易圈。《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俄国商人可以在伊犁、塔城两地买地盖房，以便住人、存货。这即是俄国在伊、塔两地建立贸易圈的最初的“条约”依据。贸易圈开始不过是俄商盖房居住和存货的场所，但随着沙俄对新疆侵略的深入，它的占地逐渐增多，并排斥中国主权在圈内行事，实际上成了沙俄建在新疆土地上的侵略据点。

五是藉保护商队之名，行武装侵略之实。条约第六条规定，俄罗斯商人在对中国伊犁博罗霍吉尔卡伦外、塔尔巴哈台乌占卡伦外行走，倘有夷匪抢夺等事，中国概不经营。所谓“夷匪”，是清政府和俄国政府对哈萨克草原各游牧部族的蔑称。所谓“抢夺等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同胞对沙俄不断入侵和掠夺的反抗和斗争。条约中的这项条款，实际上为其后沙俄侵略博罗霍吉尔卡伦和乌占卡伦以外的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对此，时任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明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准俄国人来塔城贸易后，俄人沿途强征哈萨克骆驼马匹，勒索粮草供应，渐又驱使牧民为其役使，还强掳各部游牧民子女……此实为侵占塔尔巴哈台边界之大阴谋也。”事实也正是如此，从此之后，俄国人



塔城俄国贸易圈一角（王金凯 油画）

以此为据，以保护商队为名，随意奴役属于中国的各游牧部族的人民，并瞒天过海地侵吞了中国大片土地。事后，沙俄的谈判代表巴布科夫也在其回忆录中得意地说：“从这个观点看（指俄国可通过“保商”之名侵吞中国西部领土），《伊犁条约》（指《伊塔通商章程》）不仅在商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有重大意义，它成为向中亚细亚内部继续进攻的动机”（《1859—1875年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这一条约的签订过程充分表明，它根本不是在双方自愿平等的谈判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沙俄利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形势，强迫清政府对沙俄的侵略要求作出让步的结果。由于沙俄的侵略野心和行径，原距塔城很远的许多卡伦在沙俄渐进式的扩张和清政府一再软弱的退让中，一个个被侵占而消弭于无形，近在咫尺的巴克图卡伦（原在巴克图山西部），设立时仅为塔城保卫的一个哨所，最终竟成了国门。

1851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塔城的贸易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前，塔城的贸易基本由塔城地方当局控制，进行贸易的交易双方均为清政府辖属的商民及其藩属国属民。俄国商民只是参与了其中少量的交易，影响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1851年后，俄国人根据签订的通商条约，将有权在塔城建立了贸易场地、货栈、居住房屋以及放牧牧场、墓地等。无疑，这给俄商们的到来及俄国商品的流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塔城的交易控制权易手。

1852年春，塔城与俄国正式通商。由于俄国商民在中国经商可以不纳进口货物税，利润丰厚，极具吸引力，致使大批俄国商人在利益驱动下涌入塔城。他们圈地盖房，开设洋行，进口日用俄货，倾销塔城市场，收购本地活畜及土特产品等原料出口。1852年夏，俄国政府为方便其商民的经商活动，在塔城汉城西北隅划占土地，盖房51间，其中8间为匡苏勒（领事官）居住，其余用来经商、居住或存放货物。当地人把它叫买卖圈子或贸易圈。圈内的俄国商人不仅享受不缴纳税赋的优待，还不遵守中国法律，遇有两国民事纠纷，均由驻贸易圈的俄国领事裁决，其性质极类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沿海城市的租界地，成为“国中之国”。贸易圈内除俄国商人外，还有德国、美国商人代理人开办的洋行。到年底，居住在塔城贸易圈的俄国商人有92人。这样一来，塔城的贸易控制权就由塔城地方当局转移到俄国驻塔城领事馆，交易的物品也由运自中国内地的商品和南疆的商品如绸缎、茶、布、糖、回布及日用商品变成了俄国商

品。中国的地方当局不仅失去了贸易的主管权，也失去了贸易中的不菲的利润，加上不收税，塔城地方几乎一无所得。由于塔城与内地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商品从内地运来，运输费用非常高昂，而俄国商品进入塔城相对便捷，中国商品无法与其竞争，因此塔城商埠开通后，中国商品还失去了竞争力和市场，堪称是损失巨大，有害无利。

上述条约执行后，俄商们以塔城贸易圈为基地，通过巴克图、塔斯特、额敏河口、察汗鄂博等边卡，从俄罗斯运进布匹、棉线、煤油、红茶、食糖、五金、火柴、纸烟及铁器原材料等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高价卖给农牧民或批发给中国商人。收购本地牲畜、皮毛、肠衣、棉花、珍稀兽皮、干货等当地土特产品，从塔城运往俄国，远销欧洲。在经营中，虽然也有少量中国商人参与期间，但由于俄商有政府支持，有领事馆的保护，诸事皆可获得方便，从此，从塔城进入中国的俄国商人越来越多，俄国商品更是铺天盖地，塔城的外贸和商业基本上被俄国商人垄断。从 1851 年到 1854 年，沙俄向中国西北输出的商品额短短三年就增加了将近 5 倍。

事物均有两面的意义：上述情况虽然使中国的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但也给新兴的开埠城市向外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过去只有少量商品输往中亚和俄国，大部分商品（主要是毛、生皮、毛皮等畜牧产品）要通过运输昂贵的畜力运往中国遥远的内地各城市，而现在塔城地区已与俄国毗邻，而且，中亚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也对如水果、牲畜、肉类和油脂这样一些过去只在新疆市场拥有销路的新疆货物提出了要求，本地人则通过出售这些货物来换取棉织品和毛织品等俄国工业品。苏联的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其《十九世纪下半叶（中日甲午战争前）俄种经济关系》一书中说：正是由于毗邻新疆的迅速发展的俄国中亚市场，有力地将新疆纳入其运营轨道，使新疆出现了被俄国商品占领的趋势，特别是棉织品。俄国工业迅速适应了新疆市场的特点，因而，各种棉织品成了俄国向这一带市场出口的主要项目。此后，由于距离上的便利，新疆市场（包括塔城）与内地市场渐行渐远，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 20 世纪的中叶。

塔城从开埠之日起，它在商品交易的同时，还兼而具有了转口贸易的功能。新疆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特点更加剧了这一功能。实际上，19 世纪中叶起，塔城就成了新疆对外开放的一个门户，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门户

远远大于新疆其他城市。因为伊犁作为开埠城市，伊犁通往内地的道路崎岖难行，而喀什开埠则是 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之后。在那个特定时期，塔城成了转口贸易的最佳捷径。曾担任过沙俄政府驻塔城领事的鲍戈亚夫连斯基说过：对中国人来说，塔城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靠近俄国的一个边防点。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塔城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贸易中心，是我们向中国出口商品的货栈。同游牧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蒙古人、吉尔吉斯人所进行的大量草原上的贸易就是以此为基地开展的。其次，从俄国运往迪化以及中国内地的商品主要也是通过塔城，而从中国境内运往俄国的商品同样也要经过塔城（尼·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曾任中亚总领事的广禄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塔城初期的贸易情况时也说：塔城是《中俄伊塔通商章程》所产的老商埠地，是与俄国贸易往来的一处重要吞吐口岸，迪化、哈密、焉耆一带的出入口货物皆集中此地，尤其在国防上价值至为重大。由此可以看出塔城在当时对俄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地位。

二、口岸的开通与塔城的经济开发

塔城商埠正式开通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塔城的名气随着商队的脚步和商品的流通而向四处播撒扩散，这无疑给塔城带来了商机和人气。从而引来了许多怀着发财梦的人，从四面八方前来塔城冒险。在这络绎不绝的人群中，不仅有俄国、西亚等外国商人，也有陕、甘一带甚至中原地区的汉族人。他们云集于塔城官衙的四围，分群而居，或经商，或种地，或打工，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谋生存，求钱财。这些人的到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为塔城的开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塔城是当时新疆北部的重要商埠，聚集在这里的居民除军人、军政官员及其眷属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经商人员，其中不少是追随军队携眷西来的汉族商人，在塔城坐地经商。对这些人来说，经商自然是最根本的，但他们首先需要生活。戍守边防的将士、塔城的官员及商人们的生活需求催生了塔城的屯垦，即塔城农业的进步和发展。

早在清朝在塔城设官管理，就开始了塔城的屯垦事业。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府设在雅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时，就有绿营兵 600 人驻扎在那里，

一边保卫边防，一边种地生产粮食。大臣府治迁往楚呼楚后，屯垦的士兵也随迁到今塔城附近，垦种的土地达到 18000 亩。1768 年，塔城屯兵所种庄稼获大丰收，人均收获粮食 18 石（1 石 =100 升），受到清政府的嘉奖。此后，因为屯兵数量变化，屯田数量略有减少，1775 年时降为 17000 亩。到道光年间，即 19 世纪 20 年代，塔城屯种的数量一直维持在 14000 亩的水平。军屯是塔城地区边防赖以维持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后来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被用来作为守卫边防、捍卫国土的重要方式而保持下来。

最初在塔城屯田的主要是绿营兵，也就是汉族士兵。后来，内地的汉族劳动人民因生活所迫，冲破清政府的隔离，不远万里来到塔城开荒种地。在军屯过程中，塔城也出现了犯屯和民屯。1775 年，有 100 名厄鲁特人被派到塔城挖煤，其中有 31 名种地，为挖煤的犯人提供口粮，每人拨地 12 亩，共种田 372 亩。另在锡伯图等地也分布着一些屯田的疑犯。以后，大批的“屯户”和“犯屯”被遣发到塔城从事耕种。在绥靖城外及今额敏、托里等处，还有 100 多户屯田农户，耕种着 3000 多亩土地。1851 年，塔城开埠，商人大量增加，对粮食、蔬菜的需求大为增加。塔城地广人稀，水源丰富，于是来此以耕种为谋生手段的人也大为增加，聚集在塔城绥靖城周边及额敏河流域从事种植，不仅保证了塔城城区人口粮食需要，对家畜养殖也有较大促进。

商埠的开通还推动了塔城畜牧业的成长和发展。为解决军队保卫边防、物资运输及生活必需，马、牛、羊、驼的养殖和繁育是与塔城设治及派兵戍守同时进行的。但牲畜大规模繁育养殖，是随着与哈萨克诸部的牲畜交易和军需的增多而开始的。塔城的官办牧场主要养殖马、驼、牛、羊等畜力和食用家畜，分滋生和备用二厂。滋生厂设置于 1774 年，是向附近的哈萨克部落购买公母马 600 匹、公母牛 200 头、公母羊 3000 只而建立的，由察哈尔一佐领、厄鲁特两佐领分别放牧。1777 年，迪化四佐领移驻斋尔，当局将其所经管的滋生公母马 6760 匹、公母牛 1140 头、公母羊 66800 只交给塔城牧厂，仍令各佐领放牧。至 19 世纪末年，塔城滋生厂计有大马 9679 匹，马驹 371 匹；大牛 4154 头，牛犊 1120 头；大羊 70800 只，羊羔 8830 只。

塔城“备用厂”是 1771 年以追罚各项牛马设置。嗣后又以陆续滋生足 2 岁马驹及哈萨克每年缴纳赋马拨入。1778 年开始陆续将滋生厂 4 岁成年牛拨入备用厂放牧。备用厂每年拨补军台马 33 匹，内地各营马 600 ~ 1000 匹，羊



辽阔的塔城原野

1500～20000只不等，除拨补外，至1792年仍留有马匹4300多匹、牛1600多头、羊34000只。这是塔城官方管理的牧场的牲畜数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塔城地区畜牧业的规模。

由于商贸交通发展而导致的塔城另一项大规模发展的是塔城的金矿开采事业。塔城黄金蕴藏丰富，在新疆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不仅品位高，储量也多，而且菁华早露。哈图金矿就著名的金矿之一。哈图，即蒙语金山之意，可见塔城富金由来已久。

早在乾隆年间，曾任塔城参赞大臣的乌尔伍逊等人就奏请朝廷，开发达尔达木图（今哈图）金矿。因朝廷认为这里与哈萨克、厄鲁特接壤，恐开挖金矿会妨碍当地牧人放牧，所以坚决不答应。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伊犁将军保宁、塔城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扎筠等又向朝廷报告，请求开采达尔达木图金矿。当时，中国康乾盛世尚未完全衰退，处处是一片太平祥和的景象，国家的财力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嘉庆皇帝看了奏折之后，唯恐挖金会挖乱了边境的平静安宁，便生气地斥责这几位边关大臣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小利，他给

保宁等人下了命令，把产金地都封禁起来，严禁采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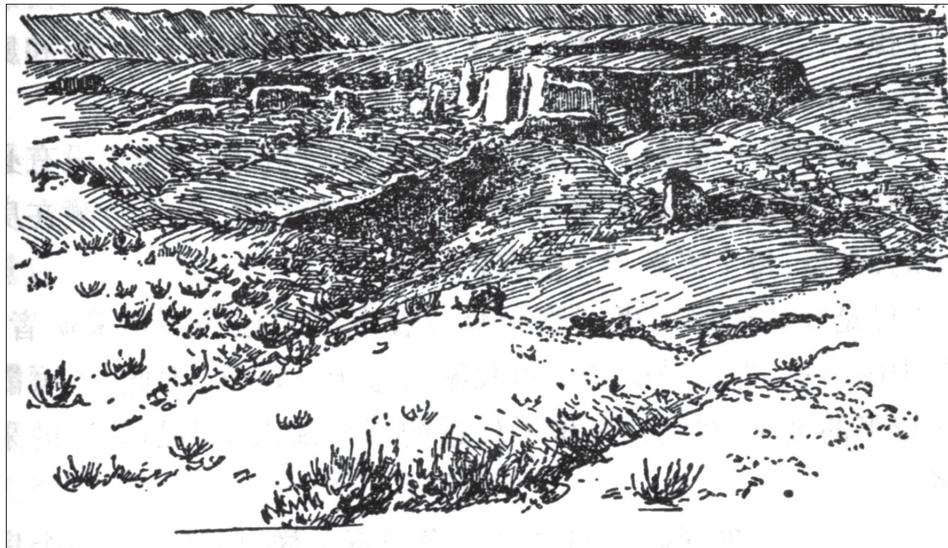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支付能力日绌。尤其是新疆，财政开支全靠协饷。协饷主要靠外省筹集解送，新疆驻兵较多，筹饷成为各省的一项沉重负担。如果能自己解决，那将节省多大一笔费用呀！筹集经费遇到麻烦的时候，有人就想到了新疆的黄金。嘉庆十九年（1814年），吏部尚书英和给皇上写了个报告，他说，新疆每年军饷开支需白银数百万两，给内地各省造成拖累。那里的金矿银矿很多，如果办理得好，军费支出绰绰有余，也给内地减轻了负担。这次皇上没再发怒，毕竟让别人老掏钱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就在报告上画了圈，表示同意。英和见皇上采纳了自己的主意非常兴奋，立即给伊犁将军传达了朝廷的指示，命他们照章办理。

时任塔城参赞大臣的松福接到朝廷的指示后，立即着手办理，他先派官兵开辟了道路，清理了矿区，并按照原来的构想，制定了采金章程，设立哨卡和管理机构，贴出告示，试办开采。凡有愿采金者，只要照章纳税，均可以自愿前往达尔达木图金矿采金。告示规定，每个采金者每年须向官府缴纳采金税六钱六分。据统计，当年就有领票采金的民众1062人，当年共收入税金380多两。到1818年，金矿共有采金者900多人，年采黄金1630～1900两，每年的课税收入320多两。这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小的规模，比此前迪化地区全部金矿的税收还要多。

达尔达木图金矿矿区大，含金量高，在这里挖金的人不少都发了财，使塔城金矿名头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听到消息的人，不分远近，成群结队，纷纷到这里来淘金。从嘉庆年到道光年间，这里的黄金业发展十分迅速，规模也非常庞大，人数最多的时候达万人，先后开凿了10个厂区。这10个厂区在山的南面并且都有自己的名字，分别为兰州湾、新兰州湾、东新兴工、西新兴工、老南工、老东工、察汗阿腾、马拉水、车轱辘沟、扎工。淘金者在这里搭盖的工棚住所纵横林立，挖金者和由此招徕的各色人员穿梭其间，那气派、景象，俨然是一个大市镇。

这样的盛况维持了一个时期，丰厚的采金税收，确实让塔城官府的银库富足了数十年，不仅官员们的钱袋鼓起来了，士兵和一般百姓生活也有了改善。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道光中期，金矿又被官府封禁，淘金者被全部遣散，昔日喧闹嘈杂的矿区又变得一片死寂。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地处



清末哈图金矿区破败的房舍

边境的塔城，巡边守土之责虽然重要，但却时常为军费不能按时拨付而劳神。清政府国库空虚，实在也没好办法。为解决财政危机，又下令“招商开采热河及新疆各城并直省所属金银矿”。塔城参赞大臣接到朝廷通知后，立即发出通告，招徕各地民众到塔城开挖金矿。由于塔城金矿名声远播，加上参赞大臣的宣传告示，内地各省及本省商民都纷纷应召前来，准备在塔城一圆自己多年以来的黄金梦。

当时来塔城淘金的人主要分布在塔城的两处金矿，一处是塔城西南的雅尔噶图金矿，一处是达尔达木图金矿。这两处都是富矿。传说雅尔噶图金矿盛产草皮金，有“日产斗金”之说。但蜂拥而来的庞大挖金队伍竟招来了俄国人的忌恨，他们硬说金矿属于俄国，并用武力驱赶中国采金民众，酿成惨案。引发了著名的“火烧贸易圈”事件，金矿因此遭到破坏，荒废湮没，至今不知所终。达尔达木图金矿主要由内地商人刘光和、卞极明采挖。他们率众数千，分成五大帮，在金矿安营扎寨，一心一意在这里淘金。众人公推刘光和为“金头”，在他带领下，淘金者在扎工矿区开凿新洞，跟苗追凿，经过五年的艰苦劳动，他们终于收回了成本，并且有了盈余。希望鼓舞着这些不远万里而来的淘金人，又经数年努力，他们终于挖到了品质极高的矿石，豆大的金粒就嵌在矿石里，经过开凿、粉碎、淘洗就得到了亮灿灿的碎金。这些黄金经过冶炼，被加工成

一块块金砖，源源不断运到山外。不断地挖，不断地运，刘光和大获丰收，竟被同伴们送了个“金驼子”的外号。当然，其他淘金者也都程度不同地受了益。挖金的势头很旺，前景一片光明。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部名为《淘金王》的影片，讲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说了这样一句话：“等卖了金子赚了钱，就在塔城买个小院，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这的确是那些背井离乡的挖金人的最大愿望。

三、由金矿开采权引发的捍卫国家领土的斗争

由于口岸的开通，带来了商机，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危机。因为塔城贸易圈的建立以及领事馆的设置，加上借口保卫商人的军队的入驻，使得塔城的许多军政部署情况都为沙俄政府所掌握，沙俄据此制定对付塔城地方当局的对策，往往得逞。同时，由于《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签订，规定俄国商人在塔城贸易不缴纳赋税，导致俄国商人大增，俄货倾销，反而冲击了中国市场，并大大减少了原有的贸易税收，这也是伊犁将军、塔城参赞大臣制定宽松措施，招徕商民来塔城开矿挖金的最直接原因。

随着塔城当局对开采金矿政策的放松，远近来此冒险淘金的人不断增多，他们把目光投向一切可以获利的地方。

在塔城西南端的中俄边境附近，有个名叫“雅尔噶图”的地方，在图古勒池（今阿拉湖）南边，距巴尔鲁克山不远，完全在中国的塔城辖区境内，而且“是塔尔巴哈台每年春秋应祭之所”（《塔城地区志》）。该地出产黄金，是当地开采历史较长的金矿，中国百姓早就有人在这里采金。1853年9月，塔城地方政府奉清廷之命，允许民工前往开采金矿，但要缴纳适量税赋，用来补贴当地驻军的粮饷。由于有利可图，闻讯前来采金的民众人数急剧增加，采金量也日渐增多。塔城贸易圈内的俄国商人听说后十分眼红，怂恿俄驻塔城领事向中国当局提出照会，诈称金矿在俄国境内，要求中国将采金民众撤回，并威胁说如果不照办，难保日后不发生事端。对俄国人企图霸占我国金矿的无理要求，伊犁将军当即回文驳斥，声明金矿在我国境内，是否开采俄国人无权干涉。但为避免冲突，又屈服于俄国政府的压力，伊犁将军下令撤回采金民众，暂停开采。采金民工们一致认为，雅尔噶图金矿历来属于中国，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挖



火烧塔城贸易圈

金与俄人无关，所以他们不睬禁令，继续在雅尔噶图矿区挖金。

俄国人见恫吓阻止不了中国民众，便准备使用武力解决。1855年春，俄国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无视中国主权，率士兵及武装起来的商人200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到雅尔噶图，用皮鞭和刺刀强行驱赶中国采金民众，并将分散的民工堵入洞中，放火烧洞，熏烧致死6人。即使这样，俄国人要霸占中国金矿的阴谋仍然无法实现。在后来的日子里，中国民众不畏强暴，与俄国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俄国人恼羞成怒，又枪杀5人，并用捆绑、投河、鞭打等野蛮手段，先后残害中国民工200余人。惨案发生后，塔城各族人民异常愤怒，抬尸聚集在塔城官衙门前，选徐天尧、安玉贤等9人为代表，向塔城原负责商务的官员萨碧屯请愿，要求塔城当局出面向俄国交涉，保卫国家主权，严惩杀人凶手。塔城官府惧怕俄国人的势力，不敢答应，派兵驱散了群众，还给徐天尧等代表带上枷锁，重刑责打。

惨痛的现实告诉人们，官府是不会给人民撑腰的，要捍卫领土主权，惩办

凶手还得靠自己。因此，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手惩罚侵略者，为死难兄弟报仇。1855年6月，数百名义愤填膺的塔城各族民众，在徐天尧、安玉贤等人的带领下，集合到塔城的俄国人贸易圈前示威，勒令交出凶手，否则就放火烧毁贸易圈。塔城人民旺盛的斗志吓倒了俄国人，他们都龟缩在贸易圈内，不敢露面。塔城参赞大臣英秀为避事端，派兵驱散了群众。

8月26日夜，徐天尧、安玉贤率塔城各族群众600余人，冲进贸易圈，用苇子点燃了圈内的草堆，顿时，草垛连同货栈一同燃烧起来，火光冲天。在滚滚烈焰中，塔塔林诺夫等狼狈地从圈内窜出，抱头逃离了塔城，顷刻之间圈内的住房、货栈连同所有货物全部化为灰烬。

火烧贸易圈后，塔城民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继续要求惩办凶手，查处案件。徐天尧等9名民工还写了《控章京萨碧屯勾结俄人残害民工禀文》，揭露塔城管理商务的官员萨碧屯对俄屈膝退让，帮助俄人残害中国民众，侵吞国课，目无法纪的行径。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国统治者既害怕民众造反，难以收拾；又怕俄国人借机生事，扩大事态，结果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奏明朝廷，用所谓“安抚之计”，将塔城参赞大臣英秀和章京萨碧屯革职；同时又将徐天尧、安玉贤以“挟仇故烧场园”罪名分别处以充军和流放的重刑。

从1856年至1858年，中俄就火烧贸易圈一事进行了数次谈判，沙俄代表乘机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声称要效仿英国在广东索赔烟土之例，向中国发动战争。在俄国施加的种种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按条约规定，由中国重新修建被烧毁的俄国贸易圈，并以“贴补”名义向俄赔偿白银135682两，抵武夷茶5500箱，分3年付清。

事情的结局虽然以徐天尧、安玉贤等人被充军流放，中国赔偿俄国人白银13万两而告终，但俄国人图谋霸占中国领土的阴谋却因此受阻。中俄两国在就贸易圈被焚事件的谈判中，中国代表理直气壮地指出：事情的起因是俄国武装人员武力驱逐挖金民工、毙伤人命所致，罪魁是俄国领事，雅尔噶图是中国的地方，离俄国甚远，俄国人有什么权力干涉？尽管最后还是赔了钱，但用的是“贴补”的名义，也算是在外交上争得了一点面子。更重要的是，塔城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遏制了俄国人的侵略野心，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壮举，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四、1865年前后塔城经济社会状况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新疆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统一新疆的战争刚刚结束，清廷立即决定，对新疆地区“薄取其赋，除去准噶尔一切苛政”，以恢复民力。为解决驻军粮饷，大力推广屯田。1772年，清政府批准了陕甘总督文绶提出的屯田措施：招新疆商贾、佣工之人，就近认垦，以省资送；指明新疆地名、道里情形，晓谕民户，以期乐从；嘉峪关请每日辰开酉闭，以便商民（《清高宗御制诗》四集）。此外还创办牧场，养殖牲畜，为边防提供军马、畜力和肉食。有力的措施使农牧业、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得到迅速发展。以此为基础，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往来，与国外的贸易业逐渐频繁起来，由此带来了新疆经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一时之间，“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如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纷至”（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二）。这里记述虽称泛泛，见微知著，可见当时新疆整个社会的昌盛。

塔尔巴哈台是天山北麓西北边陲的重要城市，随着屯垦的开展、人口的增加，塔城的商业就逐步发展兴盛起来。内地商贩贩运各种货物来城销售，城中居民和周边草原各游牧部落，包括中亚的各人种商人，纷纷前来交易，形成盛况。1836年，清朝政府允许在塔城经商或靠杂役营生的内地汉人自备费用，搬迁眷口。商人们搬来家庭之后由行商变成坐商，一时效仿者增加，对塔城商业发展和人气提升促进极大。据载，仅从湖北、山西运来的茶叶一项，每年就达十四五万块。塔城还有官铺，从乾隆时开始，每年从内地调运绸缎数千或上万匹，从伊犁或迪化运回布1.5万匹，用来与哈萨克交换牲畜及供应驻防官兵购买。塔尔巴哈台每年由肃州转运茶叶3000封（每封约5斤，即2.5千克），还有大批药材，以供应官兵和贸易之用。这些商品都是由官方的店铺经营的。应该说，在此时期，塔城的整体情况与新疆各地一样，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稳定进步，特别是商业一项，给塔城带来较大利益，让这个边陲小镇凸显出巨大的潜力和人气。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沙俄大概正是看到了这样显著的商业利益，加上其背后的政治目的，才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软硬兼施地要与伊塔地区经商。《章程》签订后，沙俄的目的是达到了，

一是通过经商，垄断了哈萨克草原的贸易，并打开了新疆庞大的市场，通过塔城将其商品倾销中亚、新疆，甚至内地，严重打击了新疆本地的手工业。二是廉价收购包括塔城在内的新疆的牲畜、毛皮等土特产品和原材料，致使新疆人民遭受其经济盘剥。三是通过经商、设立领事馆，将其侵占中国土地的黑手伸进中国边疆地区，进一步扩大了信息源，为后来不断侵吞中国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有了固定的经商场所，加上有利于俄国商人条约保护，俄对新疆的贸易输出额迅速增长，1851年为21.15万卢布，1854年增加到65.21万卢布（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要》）。贸易圈内的设施也得到了发展，塔城贸易区安置经过一年多，圈内的房屋就由最初的51间增加到70多间。

反观中国方面，虽然开通了商埠，但由于国货运输线长，运费高，商品生产方式原始落后，又失去关税保护，无法与俄货竞争。对新疆和塔城地方当局来说，一方面造成了内地或南疆输入塔城商品的大幅减少，造成税收和贸易利差的损失；另一方面还失去了先前控制中亚的贸易权，加上商埠的贸易管理权限也不完全掌管在中国手中，地方官员的积极性也受到挫伤。所以，塔城开埠初期，由于当地官员的消极，贸易的规模并没有扩大，反而较此前有所萎缩，数额远不及乾隆时期的贸易额。

1855年，贸易圈因“雅尔噶图惨案”被塔城民众焚毁。据事后塔城参赞大臣英秀报告，“是夜风大火爆，无人扑救，夷房延烧几近。所存者不过十数间”。事件发生后，俄国领事当夜即率领圈内的俄国商人逃回俄国境内的阿亚古斯地方，贸易圈的贸易活动由此停顿下来。1856年，中俄两次就贸易圈焚毁事件举行谈判，均被沙俄代表野蛮破坏。为了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压，1857年8月，俄国驻伊犁领事也率领在伊犁贸易圈的俄商携带货物，撤回本国。

此时中国国内，各地反抗清王朝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令清朝统治者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如清朝中期影响巨大的农民起义就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都发生在这段时间。加上帝国主义列强此时对清朝也是穷追不舍，千方百计要在中国攫取利益。俄国更是与英、法、美沆瀣一气，要在中国争夺利益。1858年6月，清政府迫于压力与俄国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共12条。主要内容有：一向俄国增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通商口岸，俄国兵船可在各口岸停泊。二扩大陆路通商，

嗣后对俄国陆路通商人数、所带货物与资本，不加限制。三俄国得在各通商口岸设领，俄人若与中国人发生纠葛或其他事故，由两国官员“会同办理”。俄人在华犯罪，按俄国法律受审。四俄国人在内地传教，中国方面不得禁止。五中国今后给予别国的一切政治、贸易及其他特权，“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六由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

列强对中国南部的争抢，使得疲惫不堪的清政府更无力顾及西陲边地的各种事务的细节。在此背景之下，沙俄再次把趁火打劫的伎俩用到中国西北。1858年7月，俄政府通知清廷，要求恢复关于贸易圈事件的谈判。谈判期间，俄方代表扎哈洛夫即率武装部队驻守在塔城边境。在俄国压力下，中俄于同年8月又签订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贴补条款》，条款不仅保留了俄商在塔经商不纳税的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

根据条约，塔城被焚毁的贸易圈由清朝地方当局按照旧制重新修建。工程从签订之日起动工，到1859年5月已经盖好了大半。7月，俄国驻塔城领事斯卡契夫到任，他利用条约中的验收权利，对已经建成的贸易圈房屋设施吹毛求疵，反复挑剔更改，继续扩大利益。塔城当局迫于压力，只有屈从，几经添加，直到1859年8月，贸易圈才按照俄领事的要求全部竣工。至此，贸易圈的房屋设施已从原来的52减增加到98间，增加了近一倍。其中，仅匡苏勒（领事）住房就达21间。不久，他们又在圈内修建了一座附设于领事馆的教堂。无论数量、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贸易圈。

最重要的是，沙俄还通过贸易圈事件的谈判，以保护其商民为借口，强行在贸易圈内驻兵50名，开了外国在新疆驻兵的恶劣先例。早在1855年11月贸易圈被烧毁不久，沙俄有关当局在致伊犁将军的咨文中就已经流露出要在贸易圈内驻扎军事武装的企图，表示：“本国居住买卖圈子之人不能自卫，易被匪徒骚扰”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边》第三编上册）。赔偿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即令俄方代表带兵迅速离境，以安民心。俄方代表此时完全暴露出无赖的本来面貌，一再拖延不走，并以保护贸易圈为名，提出“于伊、塔两处夷圈，添设夷兵50名，籍资保护”（《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清政府以严守成约加以拒绝，无奈俄方代表依仗武力，一再强求。塔城参赞明谊表示：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必须奏明伊犁将军后方可答复办理。但此时的伊犁将军扎拉芬泰，极端昏聩无知，不但对沙俄侵夺我国主权的阴谋愚昧无查，反而认为“所请夷圈设

卫，其情量属无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说什么：就算他们心怀叵测，区区五十个人又能做什么呢？还不如顺势答应他们的要求，还显得我们大度。就这样，沙俄在获得了贸易方面的许多便宜之外，又轻易地攫取了在贸易圈中驻扎武装卫队的特权。这样一来，俄国人不仅收益好，还有军队保护，又安稳又有钱赚，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呢？于是乎，许多俄国商人再次闻风而动，纷纷涌入塔城逐利。

此后中俄勘划西北疆界。为配合桌面上的划界谈判，沙俄开始有计划地在中俄交界地段以武力向中方领土推进蚕食，多次与清政府巡边守卡部队和边疆居民发生冲突。两国之间的争端，也引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不睦。尤其是沙俄以武力相威逼的蛮横引起了塔城边疆军民强烈的愤慨。伊犁地区临近边境的人民通过多种方式向俄方人员进行斗争和反抗。这种抗争严重影响了贸易环境，伊犁境内的中国商人拒绝向俄国人出售各种商品，致使其生活来源断绝，不得不将全体商民撤离国内。塔城的贸易圈内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人气大减，生意冷淡，最后贸易圈完全成了中俄划界谈判的会址。由于无生意可做，加上受到城里城外中国人民的敌视，贸易圈内的商人陆续返回国内。俄国商人虽然满怀希望而来，却并未发生他们所希望的那种交易火爆局面。加上此时伊犁将军和塔城参赞大臣等官员对俄人占领新疆市场不满，极力进行遏制，塔城的贸易一直徘徊不前。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1865年南疆农民大起义的前夕。

到1863年，圈内已无俄国商人居留，贸易完全停止，新起的偌大一个贸易圈遂成一座空城。1865年2月，塔城也爆发反清起义，贸易圈剩余的俄国人也都撤离回国，贸易圈遭到废弃。其后，新疆陷入长期战乱。塔城以绥靖城为核心的街区经过清军与起义者反复争夺，几次易手，屡遭破坏，后来虽然重新控制在清军手中，但该城已成残垣断壁，不能居住。贸易圈也与满目疮痍的绥靖城一样变成荒芜废墟。

与塔城此时贸易情况略有不同的是屯垦和黄金的开采。塔城的屯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由过去的以兵屯为主变成了以民屯为主。从全国各地为谋生而来的民众，他们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以供驻军官兵消费，同时还为在这里经商、采金的人们提供了商品粮。正因有了充足的粮食，才给那些前来采金的人提供了必需的生活条件。据史料记载，嘉、道年间，内地商民聚此（指塔城地区）挖金者几数万人，先后立厂十区。其间虽经沙俄侵略者的侵扰破坏，都未能阻

止商民们的采挖。其中，仅在达尔达木图金矿采金工人就达数千人。

1865年，绥靖城守城官兵受到塔城回、哈起义者的进攻，刘光和奉命增援，随他前来塔城援救官兵的精壮矿工就有2000多人，由此可见当时在塔城采金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

正是这些勤劳的生意人、经营农耕的屯垦者、挖金工人，他们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当时塔城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繁荣。照此情况及趋势，塔城的各项事业的开拓建设理应得到更广泛的推进，经济社会当有更快的发展和进步。但是，1865年，一场源于南疆的农民起义迅速蔓延，不仅摧毁了清朝在南疆的统治，也波及塔城。

在南疆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塔城回民也发动了起义。后来，起义领导权被封建头目和混进起义队伍中的清军军官所篡夺，起义性质由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演变成对平民的血腥屠戮。不仅清朝在塔城的统治遭到沉重打击，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严重损失。矿工逃散，矿井废弃，经营农商的民众也四散逃避，致使农田荒芜，市场沉寂。历经艰辛所发展起来的屯垦、商业、采金等各业都遭到严重破坏，塔城社会陷入无序和混乱，整个塔城地区一片萧飒。尤其是塔城的金矿开采，其盛况再未得到恢复。

第三章 巴克图口岸影响下的塔城文化

一、战乱后塔城的重建与恢复

塔城参赞大臣府治最早设在雅尔。第二任参赞大臣阿桂强调那里的自然环境恶劣，未经奏请朝廷，擅自将大臣府治东移到 100 千米外塔尔巴哈台山南面的楚呼楚（即塔城市）重建新城驻守。

楚呼楚是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草木繁盛，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居住。参赞大臣阿桂命人在这里选址筑城。筑城工作始于 1766 年。次年，一座新城在这片绿草如茵的处女地上拔地而起，这就是塔尔巴哈台城。新城设东、西、南三个大门，大臣们还给这些大门起了名字，东门叫翔和，西门叫布悦，南门叫遂亭，城内建有大臣衙署、府宅，此外还有满营兵房 200 间、回营兵房 60 间、绿营兵房 60 间及火药仓库、武装仓库 30 余间。开始因阿桂未经请示就自作主张，乾隆皇帝



战后重建的绥靖城

还发了一顿脾气。后来了解了情况也就谅解了阿桂，得到新城竣工的消息后，他不仅为这座遥远的草原新城赐名“绥靖”，还亲笔题写了“绥靖城”的匾额。

绥靖城建成后，后任大臣们又陆续在城内建造了一些设施。1770年参赞大臣安泰在城中修了一座绥靖寺，寺内请匠人塑了佛像；在正面建万寿宫，城北楼上建关帝庙；南门外建先农坛，每年举行祭祀仪式。1804年绥靖寺的部分房舍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参赞大臣肇兴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加上寺内喇嘛分头募化，将绥靖寺修葺一新，寺内佛像经过重新描绘，金光闪闪，大殿生辉。次年，肇兴又在南门外修建了一座牌坊，取名“迎恩桥”。这时的绥靖城里里外祥和安宁，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无论从驻军规模、城市人口还是地理位置，都堪称新疆重镇。

1865年，塔城回、哈民众在南疆农民起义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武装起义。在起义酝酿阶段，暴动起事曾一再被掌教阿訇石金斗所阻。1864年8月，苏玉德率200余名回民准备举事，又被驻军的游击副将米庆所追捕驱散。为此，参赞大臣锡霖对石金斗并无怀疑，对米庆更是信任有加，认为此人虽为回民，但心存皇恩，值得信赖。加上此时锡霖和领队大臣博勒果素正忙于协同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与俄罗斯就西北边境问题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沙俄代表“动辄以用兵为词，肆意强横”，锡霖等人面对沙俄的贪婪无赖，绞尽脑汁，疲于应对，无暇顾及塔城之事，于是就把许多事务交米庆处理。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米庆朝三暮四竟然倒向苏玉德等人，还帮助他们出谋划策。锡霖等人发现了端倪，多次对他们进行劝导，晓以大义，但没有结果。

1865年1月，经过苏玉德等人串联鼓动，起义正式爆发，他们率众占据城外的清真寺，攻打塔城，城中官兵拼死抵抗，损失不小。后来，“回众久攻不下，遂杀城外二道桥汉民二千余命”。此后又数次率众攻城，清军外无援军，内无持久抵抗的力量和粮草，形势非常危急。石金斗、米庆等人见清军大势已去，摇身一变，钻进起义队伍，很快篡夺了起义队伍的领导权，遂使反清起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起义军事实上成了打着宗教旗号的封建割据势力。

为打破僵局攻下塔城，已经站到清军对立面的米庆等人利诱勾结俄属哈萨克一起参与攻城行动，但还是无功而返。此时的参赞大臣锡霖深知城小人少，无法持久，加上仍对米庆还抱有幻想，向暴动者提出谈判建议，希望通过谈判来说服对手。米庆等人同意谈判，但提出谈判须在城外清真寺举行，并请锡霖和

博勒果素亲自参加。锡霖为说服米庆，解除围困，同意了米庆的要求。在谈判的争执中，暴动者有人突然从窗外用长矛刺向锡霖。博勒果素见状大怒，认为米庆等人全无诚意，实为设局杀人，遂顺手夺过长矛刺死米庆，自己和锡霖也被杀死。这就是起义军诱杀参赞大臣事件。

锡霖和博勒果素被杀后，塔尔巴哈台城内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恰在这时，赴任途经塔城的新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武隆额挺身而出。他当机立断，召集满营官兵和绿营兵一同守城。加上此时蒙古喇嘛棍噶扎拉参正在塔城讲经，他召集喇嘛僧众、厄鲁特和土尔扈特部蒙民数千人协助清军守城。在哈图金矿挖金的金头刘光和闻讯后也率 2000 多名民众赶来助战。塔城军民连为一气，保卫塔城，打退了暴动者的围攻。清廷闻讯，当即任命武隆额为塔城参赞大臣，统筹负责保卫塔城事宜。但此时军中粮饷极为匮乏，援军也遥遥无期，武隆额只能日坐愁城，苦苦据守。次年 4 月，棍噶扎拉参军中发生严重瘟疫，死病人员甚多，迫不得已只好退居塔城南湖一带。苏玉德再次率众来攻塔城，城中军民苦苦据守，闻讯赶来援助的刘光等遭到伏击，死伤甚重。塔城独力难支，终被攻破，武隆额战死，千总甘勇被俘被钉死在城门上，城中军民惨遭屠戮，死者甚众。

后来，苏玉德的暴动军在棍噶扎拉参所率喇嘛兵和蒙古民众的一再袭扰围攻下，力量渐渐不支，于同年 5 月退出塔城，南下库尔喀喇乌苏，与妥得麟部（迪化一带起义领导者）会合，临行前还不忘在塔城放一场大火。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攻防塔城的拉锯战中，或毁墙进攻，或加固坚守，都免不了对城内城外建筑物的破坏。在一年多的硝烟炮火和浴血厮杀中，不仅生灵涂炭，衙署、兵营、民房等各类建筑也损毁残破，加上回民暴动军撤离前的纵火，历经百年沧桑的绥靖城，终于被毁。此后的塔城虽然一直被清军及忠于清政府的蒙古喇嘛兵和民众所控制，却已面目全非。待 1872 年伊犁将军荣全前往伊犁受阻而不得不驻扎塔城时，被毁十余年且被弃置一旁的塔城，满城颓壁残垣，几乎变成废墟，早已经不能居住，荣全只好把将军行营设在绥靖城东 80 千米的额敏河畔。参赞大臣英廉也驻扎在这里。

光绪四年（1878 年），锡纶接任塔城参赞大臣，当时伊犁还没收复，白彦虎残匪在沙俄的唆使下时常越界到塔城境内抢掠骚扰，沙俄也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以实现蚕食的野心。锡纶及其驻军忙于边界防备和境内剿匪，顾不上修复城池。过了两年，边界稍微安定了一些，锡纶就给朝廷写信，要求拨款修建城堡及衙

署。当时正值国库空虚，朝廷拿不出钱来，事情就被搁置下来。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战乱耽误多年的中俄塔城西北疆界划分完毕，边界也平静下来。于是锡纶便在额敏河北岸的多尔博勒津（今额敏县城）选择一块地方，修建了一座土堡，内建文武衙署十余处，作为参赞大臣及其僚属的办公场所。多尔博勒津北通斋桑，南接老风口，东达布伦托海。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加上建伊犁将军行营时已有了一些基础，这时因大臣府衙和大批驻军的生活需要，吸引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买卖人到这里做生意，还有许多自愿搬迁来的各族百姓。随着人口增多，以大臣府衙为中心，各色民房店铺依次铺开，渐渐成了街市，一天天繁华起来。只是没有城郭，防守不便。

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塔城参赞大臣的额尔庆额认为额敏河一带地方虽然土地肥沃，但无险要可守，加上离旧城较远不好控制，只有旧城地势险要而且紧靠边境，用来屯兵御敌和巡查边界非常有利，因此请求在旧城之东择地重建新城。

清政府批准了建城报告，并拨出专款。于是额尔庆额便开始着手准备。他组织了建城班子工总局，特地请来能工巧匠，命厄鲁特游牧领队大臣图瓦强阿为城建总监工，筹划分城工作。建城工作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开始，光绪十七年（1891年）竣工，共花费白银19万多两。在建城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由于塔城地处边远，各类商品缺乏，建筑材料全靠自己，砖瓦要自己动手烧制，木材要自己上山砍伐，连建筑工具也是自己动手制作，而建城繁重劳动大部分都落在各营的士兵身上。他们冒着酷暑，肩挑手提，筑墙垒屋，经三年苦干，终于大功告成。新城呈长方形，城上建有大城楼、月城楼、角楼10余座，大小炮台7座。全城辟有3个门，东门名绥靖，南门叫雍熙，西门为怀德。城中的衙署、兵营、府第、庙宇、亭台楼阁及民房建筑兴建于1891年，到1901年方告全面完成。重新建造的绥靖城屋宇整齐，道路宽阔，从远处望去，“丽谯屹立，雉堞云连”，景象规模颇为壮观。城内主要居住者都是各级官员和军人，还有他们的家属，由于这些居民多是满人、锡伯人、达斡尔人及察哈尔人，故被称为满城。

在满城修建过程中，1899年时任参赞大臣又将废弃的旧城重新修葺，并把屯防副将和管粮通判的官衙迁移到这里。由于城中居民多是绿营兵和后来迁来的内地汉人，所以被称作汉城，也称老城。随着人口的增加，老城也逐渐恢复



绥靖城（满城）遗址

了昔日的繁荣。城区已形成五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是错落有致的民宅建筑和各种庙宇、清真寺及官办学堂等。1903年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就在这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开发建设，饱经忧患的绥靖城老城城墙早已荡然无存，大部分遗迹也面目全非，现仅存城北楼关帝庙座基，遗址在今军分区后院。新城留存时间较久，20世纪50年代初期，城上楼台虽然都在雨侵风蚀中萎缩毁废，但城墙城门基本完好。后来，城墙大都在城区改造扩建中被推倒拆挖，现仅留下个别残段，被作为遗迹保存下来。

战乱时期，由于塔城城池被毁于战火，军民或死伤或逃难，致使塔城变成一座空城。以伊犁将军荣全为首的清军规复塔城后，才逐渐恢复生气，人口逐渐增加。人口成分包括驻塔城的清军官兵及其家眷、塔城官府各衙署人员、留在此地坚守的土尔扈特部落人员、前来投奔的流散的满蒙官兵、索伦营、锡伯营官兵及家眷。据有关历史资料分析，这时仅驻塔城清军官兵当不下数千人，如果算上家眷，数字会更大。还有此前在塔城务农、采矿、杂役、经商的汉、回民众以及从南疆逃难来的维吾尔人。据《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一书介绍，伊塔道设立时，该道约有人口10500户，43500余人，在整个新疆属人口最少的道署。因当时伊犁战乱时间长，加上沙俄占领造成的损失，主要人口当集中在

塔尔巴哈台地区。至 1909 年，塔城计有人口 14200 多人（《新疆图志》）。根据当时的人口分布情况，这个数字中大概不包括在塔尔巴哈台草原及和布克赛尔草原游牧的哈萨克人和土尔扈特人，而主要是塔城官署周边的城中居民、商人、屯垦务农、手工业等与城市联系密切的定居人口，而不是全部。根据日野强在塔城旅行的途中所见，他进入塔城后，仅汉城就有人口 600 余户，加上各级官员及驻防官兵、满城人数、俄商人数，数量会更大。日野强发现进入塔城沿途的托里、额敏河、二道桥，断断续续，都有一些村落和游牧者。这些人口或因远离城市，或因游移不定，很难完全统计。因此，14000 多人口应该不是当时塔尔巴哈台地区人口的全部，而是政区行政中心城镇（塔城的满城和汉城）和主要居民点的人口。据《塔城市志·人口篇》记载，乾隆年间的 1771 年，塔尔巴哈台共有驻防官兵、居民和游牧人口总计 3371 户，22850 余人；到光绪末年的 1907 年，塔尔巴哈台政区计有厄鲁特、察哈尔、旧土尔扈特等蒙古部落，哈萨克四部落及汉、满、达斡尔、锡伯、维吾尔、俄罗斯和新满营八旗总人口 7942 户，42950 余人；1909 年，塔城直隶厅人口为 1292 户，5758 人，这是由直隶厅管辖的农业人口数。这些数据应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据此考察，塔城地区的人口是增长的。如果考虑到距离战乱很久及交通不便等因素，其人口恢复和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北疆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高轮车

正是得益于人口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塔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非常显著的。

战乱之后，塔城成为伊犁将军行营所在地。伊犁将军在传统上又重视军屯，因此，1872年伊犁将军荣全进驻塔城后，又开始大力发展屯田。由于受到当时席卷全疆的农民起义的打击，在新疆的满营旗兵、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以及绿营兵大都战死或溃散逃往他地。荣全在塔城的消息传出后，伊塔地区、包括全疆各地的散失兵勇及各类亲政府人员纷纷前来依附。荣全在整顿兵事时，遵循“弱不胜战者，散之为民”的原则，将不宜再加入军队作战的一些年老体弱者遣之为民，按户拨给土地，由地方当局发给籽种、农具从事耕种，收获除交还本金外，余粮按时价收购，每年能获得粮食七八千石，解决了驻军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当时一批在战乱中从伊犁退入俄境，又辗转从巴克图进入塔城的索伦营、锡伯营官兵及家属就被荣全安排在塔城附近，从事屯垦。

1884年新疆建省后，由于塔城军事政务仍归塔城参赞大臣统辖，伊犁将军节制，因此，军屯这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仍是塔城主要粮食生产渠道。当时的塔城参赞大臣令塔城驻军马步十营分为十屯，分赴塔城北山和巴尔鲁克山等边境地区，以屯代防，每屯发给农具、耕畜、籽种，一面耕种生产，一面守卫边防。新疆建省，伊塔地区设伊塔道，道府设在伊犁，隶属新疆巡抚。1886年，塔城设立隶属于伊塔道的直隶厅，主管屯垦及相关事务。由于巡抚和将军权限划分模糊，加之将军权力系统主要集中于伊塔地区，使塔城直隶厅的权限受到限制和削弱。尽管如此，塔城的民屯事业仍然得到了促进和发展。

为加快恢复新疆战乱后的经济，新疆巡抚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加以推动。如令原先散失的民众返归旧地，开挖渠道，兴修水利；实施计户授田，增加补贴，让农民扩耕；裁撤兵屯促使其向民屯转化；改遣屯为民屯，以调动其积极性，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丈清土地，按亩征税，减轻农民负担；同时招抚外来流民进一步扩大耕种。以上种种措施，虽受到将军权力系统的部分消解，但还是得到了部分落实。据不完全统计，1888年塔城附近有汉民屯户140余户，此外还有很多回、维吾尔农民在周边地区垦种。当年军民年总计收获粮食达1.1万石。

稍后，额尔庆额继任塔城参赞大臣，他对屯垦更加重视。他认为，汉人大都是种地能手，而塔城本土汉人太少，致使塔城肥沃的良田大半荒废。而军垦士兵远离家乡，不能尽心尽力。因此，他主张从甘肃抽调兵士，携家眷一同来塔

城驻防，守边、屯垦两不误，又免了思乡之苦。清政府认为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由此开始征调甘肃士兵携眷来塔城屯垦戍边，并形成制度，塔城的屯垦事业因此得到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稳定和人口的发展，如额敏一带新垦区不断出现，农业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到1911年，塔额一带有生科土地（已计征田赋的土地）40900多亩，新垦土地2580亩，总计43500多亩，比清朝前期增加了一倍多，并且修有干渠15条，支渠10条，保证了垦区的灌溉。这个数字比当时重要垦区库尔卡喇乌苏垦区的18000多亩的耕种面积要多出数倍。在牧业上，让战乱中逃亡的察哈尔、土尔扈特和厄鲁特蒙古部众各自返回旧地，极力助其归牧，通过官方购买再办滋生牧厂，让他们生活有靠，同时恢复和发展畜牧业。1910年，塔城参赞大臣还仿照伊犁招商集股的办法，创办皮毛公司，为地方财政开源。

在战乱中，采矿和冶炼业是受到破坏最严重的部门。如塔城的金矿，道光、咸丰年间开采最盛时期，矿工多至数万人，无论塔城官方还是挖金个人都获得了不错的收益。“经回乱，矿工四散”，矿厂也惨遭破坏。新疆建省后，塔城当局在恢复发展农牧业的同时，矿业开采再次被提上议程。1897年，俄商莫斯科温垂涎哈图金矿曾经的厚利，请求租借该金矿，设厂开采。新疆巡抚饶应祺恐利权外溢，与俄国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商议中俄合办。后因所请工程师技术不精，获利不丰，于1902年拆伙停办。1903年，巡抚潘晓苏申请公款专项，成立宝新公司，采取官督民办的方式继续开采，后因经费不继，于1906年停办。与金矿开采有关的还有煤矿的开采，矿厂位于板厂沟及斋尔山阴煤厂沟一带，起初，主要是供哈图金矿工程之用，后来也渐用于民间的取暖和冶铁之用。开采方式采取小立井、小斜井、小平洞等，全靠人工挖掘，靠人力辘轳或马拉绞盘提升，每年可生产几百吨。

塔城自新疆建省至清朝完结，社会基本平稳，再未发生大的动荡。社会的稳定和睦为塔城各行各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环境。在这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各民族相互学习，互相交流，虽然地处偏远，与内地万里相隔，使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经济社会，包括人口，各项事业还是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巴克图口岸近在咫尺，极大促进了与俄国及所属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的了解接触，经济上互相影响，文化上互相学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塔城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时期，塔城甚至出现了一些记

述新疆乃至中亚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作家和史著，如长期居住塔城的库尔班艾里·哈力德和他的《东方五史》等。

二、建省后塔城居民的定居倾向和趋势

公元前 60 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从此，新疆正式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及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一直到 1884 年（清光绪十年），在近 2000 年的漫长岁月里，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的统治，除了个别地区，对大部分地区实行的都是军府制统治。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多为武职，不直接过问当地的民事，与内地长期实行的以文职官员为主，直接管理民事的郡县制统治制度不同。

清朝统治新疆后，设伊犁将军“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伊犁将军以下，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统兵驻防各地。除在汉、回族农民群众为主的迪化地区实行郡县制外，在南疆和伊犁的维吾尔族中实行伯克制，对天山南北的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则实行扎萨克制。在伯克制和扎萨克制统治下，中央政府派驻当地的大臣，除重大案件及治下百姓直接向中央派驻的官员控告，一般不主动或不直接过问民事，维吾尔、蒙古等族的民事则由本民族中的王公、伯克等首领管理。清朝政府在新疆实行的统治办法，在其初期，对于笼络、利用当地民族上层首领为自己统治服务，稳定社会局势和尽快恢复生产，都起过一定作用。

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新疆生产的发展，清政府实行军府制的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对外，军事力量逐渐衰弱，无力抵御外来侵略，在沙俄、浩罕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中无所作为。对内，造成各地王公、伯克势力的膨胀，合法、更多是非法地占有着大批的土地和农奴，既阻碍着中央政令的推



左宗棠



新疆省第一任巡抚刘锦棠

行，又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道光朝以后，新疆内忧外患不断，政局多次出现动荡。早在嘉庆年间，具有远见卓识的龚自珍就建议朝廷在新疆设省，并提出了具体设省方案：将塔尔巴哈台设为塔州，州治为塔县（即现在的塔城市），雅尔改为肇丰县（《魏长洪新疆历史论文集》）。可惜当时的伊犁将军、塔城参赞大臣害怕分权，奏章没能通过。其后，塔城参赞大臣虽在，雅尔却沦为异域。

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爆发了各族农民群众的起义，清朝派

驻各地的驻军大臣被杀，在新疆实行的军府制统治也基本瓦解。光绪初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但这时的新疆的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外部，俄国已完成对中亚诸汗国的吞并。由于《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中俄边界早已越过巴尔喀什湖，向东推进到霍尔果斯河一线，昔日新疆的军政中心、伊犁将军驻所惠远城，此时离中俄边界只有几十千米，已经失去了新疆中心的地位。从帕米尔高原到阿尔泰山麓，与新疆毗连的已不再是比较落后、弱小的各汗国，而是实力较强、侵略野心极大的沙皇俄国。在内部，1864年各族农民起义后，清朝政府在新疆的原统治机构基本瓦解，重设的伊犁将军长期偏居塔城一隅，无力“总统”全疆。维吾尔、蒙古中的王公、伯克，许多人在战乱中被杀身亡，倾家荡产，昔日的权威和威风早已不见。以左宗棠、刘锦棠为首的湘军（另有少数豫军、蜀军等）在驱逐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过程中，派出大批官员，以善后局的名义统治着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在左宗棠等人的力主和坚持下，清政府决定在新疆建省设县，在伊、塔设伊塔道，与全疆各地实行统一的行政体制。但是在伊犁、塔城地区推行郡县制工作遇到很大阻力。

伊、塔是我国西北边疆的重镇，驻有大批八旗、绿营官兵，1882年（光绪八年），伊犁将军进驻伊犁后，旧的一套机构很快恢复。刘锦棠设置伊塔道的计



《皇清职贡图》中的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人

划早已提出，由于遭到金顺等人的抵制，迟迟无法实施。1885年（光绪十一年），金顺因队伍哗变去职，刘锦棠赴伊犁处理此案，对伊犁情况更为了解。返回迪化后，刘锦棠再次向清朝政府提出设置伊塔道的问题。但是，刘锦棠的这一计划，又遭到新疆伊犁将军色楞额的反对。1889年（光绪十五年），色楞额以“伊塔远居边地，巡抚碍难遥控”为理由，向清朝政府提出将伊、塔两地“文武仍归将军、副都统就近专辖”，刘锦棠、魏光焘便联合上奏，驳斥色楞额的上述观点。

刘、魏在奏折一开头就明确地说：“伊犁、塔尔巴哈台，本皆新疆境地，昔年屯兵置守，则南北各有不同。今既建省设官，则伊、塔无容独异。盖同此边境，必须联为一气，而巡抚统辖全境，尤应并计兼筹。”接着，他们驳斥色楞额关于“伊犁距省太远，巡抚碍难遥控”时说：阿克苏距省城较伊犁远得多，喀什噶尔更远于伊犁，巡抚皆可治理，伊犁如何不能治理？塔城距伊犁与伊犁距迪化路程差不多，伊犁将军能管理塔城，巡抚为何不能管理塔城？他们还针对色楞额提出的即便在伊、塔推行郡县制，伊塔道官员也只能管“偷盗案件”，而一切重大事件由副都统办理的意见，驳斥说：这种做法“于体制亦多不合”，无法实施。他们之后对清朝政府说：新疆建省大局已定，伊、塔地区郡县制统治的推行已势所必然，不可随意更改。

双方争执的结果，伊塔道按计划获得设立，但与其他道仍有不同。方案是：道员驻宁远（今伊宁市），下辖伊犁府、绥定县、宁远县、精河直隶厅、塔城直隶厅和博尔塔拉巡检。伊犁将军除兵事外，丝毫不得干预他事。但是，由于历任伊犁将军的反对和将军一职在清朝政府中的特殊地位，对这两地旧军府制的改革并不彻底。伊犁将军不但保留，权限也并没有缩小，而且还有“节制镇道

专权”，甚至有上奏全疆事务的权力，较内地专管驻防，其权力不可同日而语。此后的实际情况是：将军仍管辖伊、塔地区各项事务，在有关新疆的事务的各项谕旨中，一般将军列名在前。

1888年，在新疆建省数年后，塔城裁撤了隶属于参赞大臣之下的管粮通判这一衙署及其官员，设立了塔城抚民直隶厅，直隶厅长官称抚民同知。直隶厅上隶于新疆省下设的伊塔道，同时受塔尔巴合台参赞大臣节制。关于抚民同知的职责，许多史书及文章大都语焉不详，《塔城地区志》将抚民同知职权只归纳为“办理屯垦事宜”数字，有些资料则具体为“负责地方户籍、田赋、刑案以及土尔扈特游牧事宜，参赞大臣主管旗营及蒙哈部落”。

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伊塔道及其下属的塔城直隶厅虽然设置，由于伊犁将军往往干预，道员并不能正常行使权力，与塔城参赞大臣近在咫尺的直隶厅抚民同知更是束手束脚，政令难行。政出多门，互为掣肘，扯皮推诿，凡此种种，给当地综合治理造成障碍。这种现象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长庚第二次出任伊犁将军后表现更为明显和突出。他通过游说，竟让朝廷发出：“所有新疆地方文武及兵饷一切事务，均归该将军节制”（《清德宗实录》第546卷）。这样一来，新疆新设巡抚及各道府厅州县都该归隶于伊犁将军麾下了。后来，因为有人奏请要设新疆总督，统一新疆巡抚和将军事权，朝廷没有同意。新疆



塔城达斡尔戍边纪念碑

才没有退回到将军统辖一切的军府制老路上去。因此，伊犁将军虽然权限缩小，但紧紧抓住塔城不松手，新疆巡抚也无法完全管理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军政事务。对此，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说：“（本想）整理垦牧各政，因蒙哈地方多属将军统辖，不免先自怀越俎之嫌，也实有滞碍难行之处。可知畛域之见起于习惯而中于人心，牢不可破，迨施之事实隔阂尤多。”民国初登上新疆都督高位的杨增新也认为：“伊犁将军于新疆巡抚之外另树一独立机关，其职权与内地各将军之附丽于省者不同。故历年以来，两大不容，办事每多窒碍。”一直到1890年（光绪十六年）年底，又发生了塔城领有副都统衔的参赞大臣额尔庆额以“塔城僻处一隅，巡抚万难专辖”为由，要求“仿照科布多例，仍归参赞大臣镇守”，倒退到建省前的状态的言论。清政府虽要求其限时将有关事务向巡抚移交，不准再借词延长，但并未见效。可以说，抚军事权混淆、权力掣肘的现象是贯穿于晚晴新疆政治生活始终的。

新疆省的建立，结束了新疆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长期与内地不统一的历史，对于提高新疆的政治地位，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新疆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加强各民族间的往来和团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将军干预问题，直至进入民国，将军裁撤，新疆军政事权才归于统一。与此相适应，新疆建省后，塔城设直隶厅，名义上应归新疆巡抚，但实际上主要由塔城参赞大臣节制，加上边务、兵事、蒙哈归参赞大臣管理，实际上直隶厅权限十分狭小。直到进入民国杨增新上台之后，该伊犁将军改为镇边使（不久又改为镇守使），1916年撤销塔城参赞，设塔城道，塔城才真正归属新疆省管辖。

塔城建制初期，其地人口主要形式都是流动的。不仅久居于此的土尔扈特、厄鲁特人各部及稍后进入该地的哈萨克人各部均以游牧方式生活，无固定居所或居民点，包括塔城的驻兵也是不固定的。当时，塔城官方除参赞大臣衙署各机构官员和绿营兵为驻守外，其余如满营、察哈尔、锡伯、索伦、厄鲁特等八旗各营官兵均为换防制。1870年前，每次从伊犁派往塔城的八旗旗营官兵为1300人，每两年换防一次，所需费用颇为不少。1771年，东归的土尔扈特中的一部分（即策伯克多尔济亲王所率北路两旗）被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境内驻牧。由于境内人口增多，边防管理也须加强，故从1771年起，派往塔城的八旗营勇增加到1500人，换防期限由两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至1864年前，换防兵数又有几次调整，但大体保持在1500人左右，加上绿营兵，驻防官兵人数约为2000人。

1865年新疆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给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以沉重打击。战乱之中，清朝在新疆各地的统治阶层和清军官兵首当其冲，遭受攻击最多，死伤甚多，逃亡者众。动荡期过后，因为清政府派出的伊犁将军从科布多由东向西行进，塔城因此最先归复。此后一段时期，由于伊犁将军行营设置于此地，驻军、官员大为增加，同时，受到迫害的各地农、工、商人员也不断向塔城会聚，人口增加非常迅速。因此在人口方面，塔城也是最先得到恢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从沙俄收回伊犁的1882年。在这期间，塔城定居人员增加很快，有农民（包括为逃避南疆阿古柏残暴统治而前来谋生的维吾尔人）、手工业者、经商人员，这是定居群体当中的主体，这些人口的增加在塔城、额敏一带形成了不少新的街市、村庄等居民点。如，现在的额敏城镇就是在这个时期自然形成的城镇。在上述经商人员中，有不少是来自内地陕、甘、晋、津等地，其中以天津杨柳青人为数最多。他们最初是随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大军“赶大营”挑担进入新疆的小本生意人，塔城的环境吸引了他们，于是把货郎担挑到了塔城。后来他们接来家眷，长期定居，慢慢发展成坐商，也有一些弃商归农或经营家庭作坊，成为富裕农户和小手工业者。在后来的生活里，他们招来亲朋，聚集前来投靠的乡亲友好，逐渐成为塔城定居人口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在塔城军屯一直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份额。但随着社会发展，民屯势不可挡地成为主流。塔城官方为顺应潮流，从建省前后就开始了对军屯的改造。清廷从1875年就开始执行裁勇归农的政策，通过这一改革，使一部分士兵成为农户，以增加农业劳动力。1875年后，塔城参赞大臣也乘机进行整顿，一些驻军中的老弱伤残人员及不适宜继续从军者，在这样的改革中就此离开部队，加入了垦种群体，在多处地方择地垦荒，自耕自食，融入当地，连同他们的眷属成了塔城永久住民。新疆建省



塔城新满营协领额孟和阿

后，这项措施得到更有力的推动，不仅迅速扩大了塔城的民屯和农业生产，也促使更多的人口在塔城定居下来，成为塔城发展进步的动力。此外，由于长期接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塔城周边的一些游牧人群也转向了定居和农耕。这部分人的主要参与者是那些一边守卫边防、一边从事放牧的察哈尔人、厄鲁特人、土尔扈特人和少量的布鲁特人（柯尔克孜）等。如土尔扈特人为了解决其部民的粮食问题，在清廷的一再开导下，也开始了农耕，但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

此外还有少部分哈萨克人也加入了定居的行列。长期以来，哈萨克人一直是传统游牧经济的坚守者和捍卫者，只是到了新疆建省以后，塔城境内邻近城市和农业文明的一部分哈萨克人，因长期接受从事农业、商业民族的影响及因天灾人祸和其他社会因素，放弃游牧生活转而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伴随着他们走向定居的还有他们的制作酥油、制乳品、制革、擀毡、皮衣制作等家庭手工业的逐渐发展。这些无疑都给城市发展及定居从农经商增加了新的元素。

从塔城建治开始，就有一批为官兵服务的从业人员，如磨面、制衣等服务方面的人员，他们与当地的衙署官员与驻军官兵一样，是塔城的早期住民。随着塔城人口的增加，这些服务行业分工愈细，从业人口也不断增加。到 1889 年，先后从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迁居塔城从事皮革和制鞋业的哈萨克、维吾尔、俄罗斯工匠就有 15 户。此外，当时还有专门从事烧制砖瓦和石灰的行业；有铁器加工、木器加工、缝纫、榨油、简单食品加工等从业者，他们是塔城早期定居者中的城市劳动者。

1895 年，塔城参赞大臣富勒铭额向清廷奏报说，要将此前所遴选出的尖锐营官兵，改编为驻防满营，并根据伊犁新满营的模式，设为左、右两翼，分编为八旗。从此，驻军完全演变为携眷驻守，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停轮换。经过清政府允准，塔城当年就组建了新满营，称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八旗分左、右两翼，设协领 2 员，佐领、防御、骁骑校 8 名并设催总、前锋校、领催等大小指挥人员。左翼计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 223 户，男女计 1263 人；右翼有正黄、正红、镶蓝、镶红 209 户，男女计 746 人。总计人口 2000 余人。在这支新满营中，六旗为达斡尔族，另二旗为锡伯族。1912 年，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塔城的驻防八旗制也寿终正寝。新满营的官兵或解甲归田，或做其他营生，基本留在当地，成了塔城永久居民。

应该说，新疆建省推动了塔城城市化的进度，形成了塔城居民的定居趋势，

特别是伊塔道和塔城抚民直隶厅的设立，虽然不时受到来自伊犁将军系统的一些制约和抵触，但是对塔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塔城人口的定居趋势，还是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巴克图口岸的通道作用，俄罗斯人和俄属中亚人群的大量涌入则加速了这一进度，并使定居人口的人种和民族成分更加丰富多彩，为多元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至清末的 1909 年，塔尔巴哈台行政区划内约有 43000 人口，其中塔城直隶厅管辖人口为 1292 户，5758 人（《塔城市志》）。按照塔城当时情况，直隶厅主管屯垦，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大体囊括了清朝末年塔城（主要包括现在的塔城额敏、裕民、托里、和布克赛尔等地）地区基本的的定居农业人口，加上各级官员、驻军及家属，再加上经商人员、手工业者及其他行业的人员，定居数字会增加很多。这充分体现了建省、道、厅这一措施对塔城人口定居倾向和趋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三、口岸重开后塔城贸易的畸形发展

1865 年塔城发生反清回民起义，商业停运，人去楼空，塔城的俄商贸易圈被弃用荒芜。1872 年，新任伊犁将军荣全率兵从科布多路线进入塔城，并建立行辕。于是，很多因逃避战乱散失在各地的索伦营、锡伯营官兵、眷属及部分满营官兵先后来塔城聚集，一些在兵荒马乱中避居他地的汉、回族农商，包括部分为逃避阿古柏残酷统治的南疆维吾尔人也纷纷来到塔城，塔城逐渐按恢复



准备前往塔尔巴哈台的哈萨克人

了生气。由于塔城与俄罗斯阡陌相连、口岸相同，不少俄商闻风而动，前来塔城经商。他们在原来的贸易圈东侧擅自修建了约 20 栋房屋、铺面建筑。到光绪初年（1874 年），塔城北面已经形成以俄商为主的贸易市场，“长半里许，矮屋错落，华夷杂处，然华商不过十中之二”。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从俄境经巴克图来塔的俄商仍络绎不绝，致使市场周围，俄民环居。1878 年春，锡纶出任塔城参赞大臣，对俄商在塔城的情景“一见惊愕”，很快在贸易市场东面街口“设立木栅栏，以免夷商散漫”，也免得生出别的意想不到的事端。

此时，恰逢俄国国内爆发了第一次特别显著的生产过剩危机，其主要特征是物价下跌，工厂倒闭，其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轻工业和冶金业。俄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其国内的市场大大萎缩，于是便把搜寻市场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通过开辟中国西北部、东北部的庞大市场以减缓自身危机。同时，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沙俄帝国的扩张重点正集中在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并正在与欧洲谈判恢复“三皇同盟”（1873 年 6 月 6 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奥皇签订《兴勃隆协定》，约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同年 10 月 22 日德皇也加入这一协定，协定至 1875 年有效，史称第一次“三皇同盟”）问题。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促使沙俄在 1879 年 3 月的御前特别会议上作出决定：获得中国在通商、赔偿损失和调整天山以北的边界等方面作出让步后，可以交还伊犁（《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清代卷下册）。1879 年 8 月，俄国财政部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同中国人谈判重点在商业利益，其他都应该服从这个重点（《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清代卷下册）。沙俄以交还伊犁为要挟，力求扩大他们在新疆的通商利益及与清政府在谈判中的被动，使俄国在《伊犁条约》中获得了在新疆全境免税通商的特权，并重新攫取了在伊犁、塔城重建贸易圈的权益，同时还把建贸易圈的地点扩大到喀什噶尔和吐鲁番等城市。在这一背景下，塔城参赞大臣虽欲对俄商在塔规模、场所有所规范，但很难产生实质性效果。

1882 年 5 月，俄国驻京使节照会清政府，委派俄外交部职员巴尔卡申为驻塔城领事官。同年 10 月，巴尔卡申到任，与参赞大臣锡纶讨论划拨贸易圈地址及方位事宜。在谈判中，塔城方面提出即将现有俄商聚居地作贸易圈的新址，并将散居于周边的俄商民迁居于参赞大臣设立的栅栏以西。但俄国领事坚持不肯将散居的俄商迁到圈内，反而要以商民现已占据的市场及周边地区通通划为

新建贸易圈的范围。在反复争执下，事情终以塔城当局作出让步，于 1883 年 4 月签署了《议定俄属商人贸易地址条约》落幕。条约规定的贸易圈具体范围是：塔尔巴哈台旧城东北，俄属商人铺房东北角后围墙起，自缠回街市东栅门渠边，到中国现设总办稽查保甲局。由俄商铺房向西，中国汉民菜园子北边，向西往南绕至城北离城 20 丈（1 丈 =3.33 米）大路，过一巷口，由第二路口至俄属商民围墙，往西北至楚呼楚小河沿。向北自水渠往东由土坡俄商民墙围，自缠回街市东北拐角止。此一段内，为新议定贸易圈。计东面 194 丈，南面 123 丈，西面 241 丈，北面 288 丈（《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根据条约，重建后的塔城贸易圈位于汉城北梁坡上，其四至界限为：北至塔城街；南抵建筑街一道巷（原名领事街）；西至乌拉斯台小河；东至塔尔巴哈台街南段。周长约 2800 米，面积约 380 多亩，远远超过了原来旧贸易圈的面积。即便如此，俄国领事仍不满足。在其一再强求下，这次签署的条约，竟将十年后贸易圈需要增加的占地也一并划出：“倘十年后塔尔巴合台地方俄国所属之人来者较多，须再议添给地址，由西面围墙往西到河边之地，以便添给”（《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划入贸易圈的所谓“缠回街市”，原为塔城中俄商民共同使用的贸易市场，条约第三条规定：“中国、俄国之人在此街市杂居，仍准其照旧贸易，所给俄人新地，此后中国民人不可盖房”（《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但条约签订后，圈地内中俄共有的贸易市场，渐为俄商所独霸。按照 1851 年签订的伊塔通商章程规定，贸易圈本应建在城外空旷的官荒地上。但由于 1881 年伊犁条约签订之前，沙俄利用新疆战乱之机，实际上控制了新疆的通商贸易，俄商则把持了贸易市场。这次重划贸易圈新址，用条约条文正式把公用的贸易市场划入贸易圈内，开创了恶劣的先例，等于强占中国土地并强行夺取了中国人在塔城土地上的贸易权，为进一步进行经济掠夺提供了便利。不久，俄国在贸易圈南端建立了俄国驻塔城领事馆，领馆东侧又建造了教堂。圈内俄民熙来攘往，语言须通过翻译才能交流，服饰也与中华迥异。

为鼓励俄商向中国倾销商品，有一个时期，“俄国商人凡运送一马驮俄货入新疆，俄政府还付给业主十六卢布的奖金”（包尔汉《新疆五十年》）。这样的环境特点，便捷的通道，加上众多的优惠和保护，使俄国人对在塔城进行贸易更是趋之若鹜。从此之后，塔城的俄国商人人数越来越多，19 世纪末塔城

已有俄商 108 户。1903 年，沙俄在塔城设立了银行，有了银行支持，加上塔城当局放任的管理方式提供的宽松、自由的环境，塔城简直成了俄国商人的天堂，促使俄商发展更快，进入塔城参与经营的人员更多，完全垄断了塔城市场，掌握了塔城经济的命脉。为对进入塔的俄国边民有所限制，1905 年塔城不得不设立巡警清源局，控制并管理俄国边民越境、迁居塔城事宜。1906 年 3、4 月间，日本人日野强辗转来到塔城，在塔城逗留半个多月。他对塔城环境街市作了真实记述，他说，塔城由满、汉两城组成，满汉两城就近相接，满城周长 20 町（1 町 =109.9 米），城内设参赞大臣、索伦营领队大臣衙门，满人居民仅数十户，其他多是空房坏房。汉城周长数十町，城内设有塔尔巴哈台直隶厅、协台衙门等，人家约六百户，其北门有俄国领事馆、俄国电信局、俄清银行支行（指华俄道胜银行）等。侨居的俄商有约四百五十户。输入迪化和吐鲁番的俄国货大部分经由这里，加之附近山野里游牧的哈萨克人常用家畜交换日用品，故市场比较繁荣。

据《塔城地区志》、《塔城口岸志》等史料记载，到 1907 年，“塔城的俄国商户达 291 户，3840 多人”，致使街面上俄国人的“洋楼棋布，洋行林立”成了塔城一大景观。日野强去塔城是 1906 年，与《塔城地区志》等史料的记载仅相隔一年。日野强的著作是根据他每天的日记梳理加工而成，是亲眼所见的第一手资料，可信程度很强。因此他记述塔城当时有俄商 450 户是可信的，大的商户可能会雇佣一些店员和杂工，每户平均人数自然会多一些，这就与《塔城地区志》等书籍记载的俄商 3840 多人的数字比较吻合了。

由于免交海关税和贸易税，利润异常丰厚，加上沙俄政府背后撑腰，华俄道胜银行资金支持，塔城不仅俄商云集，俄国商品更是堆积如山。他们把塔城当作当成向整个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倾销商品的集散地，巴克图口岸则成了商品进出的大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商们已不满足于仅把生意范围局限在塔城，而是瞄上了塔城以外更广阔的新疆市场。这种状况越往后越严重，到清朝晚期，俄国商品的销售特别是工业品和棉纺织品的销售，“逐渐从边境沿线各点，深入到省内，从而控制了一切主要的城市”（《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清代卷下册）。从整个新疆看，1893 年俄国对新疆的贸易总额为 582.85 万卢布，到 1903 年猛增到 1500 万卢布，如果加上中国商人从新疆输往内地和输出俄国的 500 万卢布，贸易总额就超过 2000 万卢布。从塔城地区看，1881 年到 1901 年的 20 年间，俄

国对塔城的贸易额由不到 50 万卢布增加到 500 万卢布（《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无疑，在俄国商品倾销新疆过程中，塔城成为跳板，巴克图变成了天山南北麓各地的俄国商品转运站。

塔城俄商最初的主要经营方式是从俄国运来各种生活必需的工业产品，如布匹、棉线、石油、器皿、铁器、茶砖、糖、纸烟、火柴及其他生活日用品，换取本地农牧民的农、畜土特产品，如牲畜、羊毛、肠衣、棉花、各类畜皮、兽皮等。在交易过程中，俄商高价出售他们运自本国的棉毛纺织品及其他生活日用商品，低价收买本地农畜土特产品。在一些偏远牧区，他们用一尺布换一张羊皮，半块茶叶换一只羊，甚至一个手电筒换 15 只羊。有些生活富足的牧主或地主，愿意享受洋货，又无法到外地购买，明知上当，也只有接受摆布。不少俄国商人就是靠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发了横财。他们除一般坐店经营现金买卖外，还在生产者需要资金的时候，以预付款的方式把一部分经营商品和一小部分现金付给生产者，与他们签定到期以土特产品还账的合同。预付款要交利息，而且利率很高。一般都在 1 倍以上，高的达到 5 倍。如果到期不能交纳，还要根据滞还期的长短，加几成甚至几倍的罚款。据记载，晚清时期每年从塔城运往俄国的牛羊皮百余万张，羊、驼毛 50 余万千克，马 2000 多匹，牛 2000 多头，羊 7 万只；从俄国运往本地销售全疆各地的货物值白银 45 万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不小的规模，完全垄断了塔城的进出口贸易。

1881 年《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后，在塔城、额敏、裕民一带形成“百里贸易区”，俄国商人手持俄领事馆发给的免税通商执照（新疆人将其称为通商条），不仅可以自由出入边境，在百里贸易区开洋行、设店铺，低价收购伊塔地区的牛羊活畜、毛皮、肠衣及棉花等农牧产品，高价出售布匹、铁器、瓷器等工业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大赚其钱，还可以把他们的商品行销中国腹地的广大地区。当时，北疆重镇乌苏也是俄商贸易货物的集散地之一，共有俄商 80 多家，贸易额达 200 万卢布。俄国商人就通过这样的一买一卖，掠走了塔城各族人民钱财，塞满了自己的腰包。即便如此，他们还不满足，又把目光盯在茶叶的经营上。新疆的茶叶一向由中国人从内地运来，然后再经塔城等地输往俄国，这样中国商人可以获得利润，政府也可获得税收。1906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条约》，取得特权，免税运输，沿途倾销，中国茶商受到打击，政府也损失了税收（《历史上的伊犁》）。

对新疆历史非常熟悉并在塔城的贸易圈内工作过的包尔汉，在其《新疆五十年》一书中这样评说塔城的进出口贸易：这些洋行（指贸易圈内的俄商）当年几乎掌握了北疆商业经济命脉。每当春秋两季，货物大量出入时，驼铃响彻迪化—塔城—谢米巴拉金斯克的路上。新疆的土产由此往下新城运发，在当年欧亚商人云集的下新城临时交易市场上，新疆土产是惹人重视的商品之一。经营这项商品的商人以及购买原料的工厂主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榨取了新疆劳动人民的血汗从而发财致富。当时沙俄对新疆的进出口贸易北路以谢米巴拉金斯克为总汇，南路以费尔干纳为总汇。经塔城运往俄国的不只是新疆土特产品，俄商还从内地贩运一部分土产经塔城入俄。

当时在塔城的俄国商人，个个都很神气，他们仗势恃强，凭着手里的通商条，不仅不纳税，往往还拒绝中国税卡的检查。此外，他们还常把通商条借给中国商人，借机捞钱。一些不法中国商人拿着用钱买来的通商条冒充俄商借以逃避各项税金并欺压本国商人，给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塔城税收造成重大损失。俄商们从心里瞧不起中国的官员，但在中国经商多年，也摸透了中国官场的风气，遇到机会总是不惜金钱进行拉拢，以便将来获得更多好处。像当年假道俄国来新疆的中国官员，大都接受过塔城俄商的宴请。宴请时，他们总是把俄国领事也请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事实上，这些商人们也确实有能量，如果需要他们在俄领事馆办事，他们总能办到。当年谢彬假道俄国漫游新疆后准备返京，有关手续就是请俄国商人给办理的。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内战爆发，工业生产停滞，俄国货物进口中断，塔城洋行纷纷倒闭，没倒闭的也实力衰竭，大部分歇了业，有一部分转向内贸。后来，新疆与苏联恢复了通商关系，少数资金雄厚的俄商又兼营起外贸来。当然，在帝俄时所享受的一切特权都被取消了。他们看到形势一时不会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转变，便申请加入了中国籍。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俄商在塔城经营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家：

俄商天兴洋行：由俄国谢米巴拉金斯克的塔塔尔族商人阿热甫经营，1851年在塔城设店。这个洋行以木轮车作为运输工具，往来于谢米巴拉金斯克、塔城之间拉运货物，从俄国运来火柴、石油、布料、金属器具及各色杂货，换来牛、马、羊的皮张及棉花等运往俄国，每年运出的皮张、棉花约1.6万吨，进出口货物为数相当。民国初期，这家洋行的经理是阿里夫和依布拉音弟兄二人。十月革

命后其规模缩小，经营主体转移到省城迪化。包尔汗先生曾在这家洋行工作过。

俄商仁忠信洋行：由俄国乌孜别克族商人台吉鄂斯满创办。1852年开始在塔城设店，起初买卖兴隆，资金额曾达到50万卢布。不久开始亏损，终于1880年倒闭破产。中俄商人和塔城农牧民受骗后纷纷与他打官司讨债，最后因台吉鄂斯满一死了事。

俄商德和洋行：由乌孜别克族商人热依木江和木尔沙里巴依经营。1881年在塔城设行，主要经营输入俄国各类生活日常用品，输出皮毛、肠衣、棉花等土特产品，同时还收购满口大羯羊，喂养后运往俄国出售。这家洋行在塔城还有很多田地、草场、房屋和牲畜，总资产达100多万卢布。1917年俄国革命后，洋行关闭。

俄商德盛洋行：由驻塔城代表伊敏江巴依经营。主要是收购本地土特产品，销售俄国洋货。这人很善于经营，遇到人们手头紧张时可以赊账，商品积压时便减价销售，所以生意一向都比较好。他收购的皮毛因加工细致、包装整齐而获得了好名声，在莫斯科也小有名气。盛世才主政新疆时倒闭。

俄商吉祥涌洋行：创办人叫热玛赞·坎尼雪夫（也称热玛赞阿吉），塔塔尔族。他最早是俄国喀山的车夫，来新疆后靠代人推销米心茶起家，后来随舅舅开办了吉祥涌洋行。进入民国时期热玛赞去世，洋行由其侄子胡赛音和哈桑两兄弟经营，塔城分店经理为哈桑。吉祥涌规模很大，全疆各大城镇都设有分店，主要推销俄国的棉纺织品和日用商品，收购羊绒、驼毛、皮张、棉花等。这家洋行与沙俄官方贸易机构“羊毛公司”有密切联系，因此生意做得很火，在塔城置办了很多房产，门面很大，曾为塔城行署、塔城报社办公地点的红楼，也就是现今的红楼博物馆，就是吉祥涌出钱兴建的，它现在已成了塔城的著名老建筑。1917年后，吉祥涌的主人加入了中国籍，因为实力雄厚，后来还被当时的的新疆政府所倚重，哥哥胡赛音还当上了盛世才时期的政府委员，成了名闻一时的风云人物。后因得罪了盛世才，哈桑兄弟均被逮捕入狱，财产也被没收，吉祥涌设在塔城的分店停业。

从19世纪30年代到民国初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塔城几乎成了俄商的一统天下，表面上似乎很繁荣，但实际上却是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对中国地方税收的掠夺，对塔城各族人民的掠夺。据当时新疆地方政府的一份报告说：“查俄货运售新疆，以前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改定条约有暂不纳税一条，未经

征收俄货之税，新疆通行已三十余年。按历年回报俄货进口价值，岁在三四千万不等。以每岁减作三千万计算，照章值百抽五，岁应抽税一百五十万两。碍于成约，免征至三十余年，约损失国税四五千万，而英国之援照俄约免税者，尚不在内。”这是杨增新在其当政后的粗略算法。实际上，新疆的税务损失远不止这些，按照上述俄旧约规定，允许俄商免纳的仅是进出口贸易商税，而事实上俄商不仅任意把免税特权扩大到新疆境内的地区间的贸易，而且拒纳牲畜、草场等多种税款，有的还与中国本地奸商勾结，向中国商人出售“通商条”，串通一气偷税，到民国时期，甚至已严重地威胁到了新疆的整体税务收入。此种情形，尤以塔城为甚，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只能加剧塔城的贫穷、停滞和落后。

四、为俄商提供支持的领事馆和道胜银行

1851年，俄国乘不平等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之机，取得了在塔城开设领事馆的特权。其实，俄国在伊塔设领事馆一事在签约过程中就带有不平等的欺诈性质。按照章程第二条规定：两边商人互相交易，虽系自定价值，不能不为之设官照管。中国由伊犁商务处派员；俄罗斯国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官照管。“匡苏勒”是俄语领事馆的音译，沙俄代表利用中国谈判者对“匡苏勒”一词语义不甚了解这一情况，签订成约，这成了沙俄在中国设立领事馆的最早“法定”根据，条约的规定等于中国丧失了对等在俄罗斯派驻领事的权利。此后，沙俄得以通过派驻领事，以“合法”外衣为保护，在塔城等中国西北地区扩张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进行各种侵略活动。

1852年8月，俄国派人到塔城筹建领事馆，馆址选在城东门外，与塔尔巴哈台城的哈萨克贸易厅相邻。1853年11月，工程告竣，交付使用。其中有领事住房8间，哥萨克



沙俄领事馆旧址

兵住房 5 间，塔塔林诺夫被沙俄任命为驻塔城第一任匡苏勒官，也就是领事。此后，沙俄便开始了以领事馆为中心的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活动。塔塔林诺夫等人以领事身份为掩护，大搞间谍活动，刺探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拉拢收买塔城官吏，侵占中国土地，欺压、残害塔城人民，干涉中国内政，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雅尔噶图金矿惨案发生后，领事馆被愤怒的群众烧毁。1858 年 10 月，中俄就此签订《塔尔巴哈台议定赔补条约》。条约规定，由清政府出钱重建俄驻塔领事馆。1859 年 8 月，重新修建的领事馆完工，地址在城西北的一角。乘此重建之机，沙俄将馆舍扩充为 34 间，其中领事住房 21 间，工作人员住房 13 间。1865 年，回民起义席卷全疆，沙俄驻塔城领事馆毁于战火。1883 年春，中俄又签订了《塔城巴哈台俄属商人贸易地址条约》，条约规定重建领事馆，地址选在塔城城东北角。新开设的领事馆规模比前两次更大，并允许 10 年之后扩建。此次扩建，规模更大，凸显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畸形的特殊地位。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明确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 年 9 月 23 日，中国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宣布取消原沙俄政府驻华公使及其驻华领事人员的资格，并停止待遇。同年 11 月 7 日，塔城道尹张健奉命照会俄驻塔城领事哆勒布哲夫。这位领事按照要求，将领事馆的案卷、房屋、公物逐件列表移交塔城当局后离塔。沙俄驻塔城领事馆关闭。可以说，从沙俄驻塔城领事馆的设立，直至沙俄覆灭为止，领事馆始终是沙俄在中国西北地区布下的眼线和进行侵略的巢穴。

从沙俄在塔城设立领事馆到关闭，共计 68 年，先后有 7 人出任领事。

第一任领事塔塔林诺夫，汉名明常，1852 年 8 月出任领事。此前，曾随俄国东正教布道团来中国，留居北京布道多年，学会了汉语和满语。回国后又任职外交部，专门研究中国问题，成了俄国有名的“中国通”。1851 年 7 月，作为俄国外交官员参加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谈判和签订。任驻塔城领事期间，蛮横无理，多次损害中国利益，是雅尔噶图金矿惨案的主谋。从塔城逃离后又任职外交部，是《中俄北京条约》谈判的俄方翻译。

第二任领事为康斯坦丁·安德里昂诺维奇·斯卡奇科夫，汉名孔会。1858 年 7 月赴塔任职，1865 年因战乱离塔。此前为俄国外交官，曾留居北京多年，从塔城回国后任俄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在塔城期间，参与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谈判。

第三任领事鲍戈亚夫连斯基，1882年5月到任。原为俄国外交部职员。在塔城任职期间曾参与《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俄议定塔城俄属商人贸易地址条约》的谈判和租借中国巴尔鲁克山的谈判。1891年离任，后著有《长城外的中国西部》一书。

第四任领事宝德林，原为俄国外交部二等翻译，1891年到塔城任职，在任期间参与了归还租借期满的中国塔城巴尔鲁克山的谈判。1893年6月任期未满即病死。

第五任领事伯勒满，他参加了归还中国巴尔鲁克山的谈判及《中俄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的签订。1896年离任。

第六任领事索科夫，任职14年。

最后一任领事哆勒布哲福1911年3月任职，1920年11月领事馆被关闭，哆勒布哲夫率领他的随员们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这块沙俄颐指气使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地。

沙俄驻塔城领事馆设立初期，人员设置主要有领事、副领事等，后来增加了武官、医官、翻译等官员。按照《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沙俄驻塔城领事主要管理俄国通过塔城与中国进行商务贸易活动和定期来塔城进行贸易的俄国商人。但实际上他们权限要大得多，往往借俄国政府之名向塔城当局施加压力，干涉塔城政务。此外还通过不正当手段刺探当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非法设立商约，在塔城居民中发展俄侨组织。1859年8月，俄政府以驻塔城领事馆被焚毁为借口，强迫清政府同意在领事馆驻兵50名，开俄军驻扎新疆的先例。清末，沙俄领事馆的武装卫队增至百余人，最多时达千人以上。随着各类人员的增加，领事馆还附设有了邮政所、学校等机构。《中俄北京续增条约》签订后，俄驻塔领事馆拥有了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定居塔城的俄商的行政、司法均归领事馆管辖，中国法律对他们无效。随着沙俄领事馆的关闭，他们的一切特权也被取消了。

塔城另一个与众多俄国人在塔经商有关的机构是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塔城是边陲小城，人口又不多，怎么会与外国银行有缘呢？这是有原因的。

清代中后期，沙俄为从中国攫取利益，强行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城通商条约》，由于塔城离俄界较近，聚集的俄商很多。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圈地盖房，销售商品，收购中国的土特产品，却不缴纳税赋，因此，交易量很大。

为支持其商人的经营与发展，设立银行就成了客观需要。1895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总行在圣彼得堡成立，1903年在塔城设立分行，由设在西伯利亚的巴尔瑙尔中心分行管辖。

华俄道胜银行在

塔城的经营范围主要有存款、贷款、汇兑、金银及信用证券买卖，发行金券及其他货币兑换券，推行卢布等。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俄国商人。在银行的支持下，俄国人在塔城经营的商业发展很快。到1907年，俄国在塔城的商号发展到290家，从事商业的人员达3800人，资产最多的达100多卢布。据1911年的统计，塔城俄商每年销往新疆南北两路的各种商品达二三十万卢布，在本地可销售数百万卢布，因为俄国商人不纳税，中国本地生意人没办法与他们竞争，再加上银行对中国商人贷款条件苛刻，利率高达5分（月息50%），并要以财产抵押，逾期就要以抵押财产抵债，所以中国人在塔城的生意受到极大压制，无法扩大规模。道胜银行还凭借其分支机构遍布京、津、沪、武汉、东北各大城市的优势，挤垮了本地先前经营汇兑的票号，垄断了塔城的汇兑业务，迫使附近的商民都得到他们的银行汇兑，他们又乘机抬高汇费，使用在途资金。在短短的数年内，道胜银行不但垄断了塔城的金融，也控制了塔城的商业。

华俄道胜银行除大力支持本国商人扩大经营外，极力推行沙俄卢布和自行印制的金本位纸币金券。卢布最初是作为中俄边境贸易的媒体流入塔城的，1852年沙俄在塔城建立贸易圈后流入量猛增。待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成立后。卢布竟成了市场上的主要流通货币，控制了塔城市场，连塔城地方的国家收入也要以俄币计算。1913年，银行又发行金券。当年发行100万两，1913年至1917年，又在伊犁、塔城、喀什三地发行500万两，造成卢布和金券泛滥成灾的局面。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卢布与金券大幅度贬值。此前，每1卢布值银1两，1914年，1卢布能兑换银圆0.55圆，1917年后贬为仅值银1钱或银圆0.1圆，造成塔



清末俄罗斯驻塔城领事馆门前的乞讨者

城官府 13000 两的收入亏损了 8000 两的局面。这时，华俄道胜银行已被苏联收归国有，虽有部分董事逃往法国，在巴黎另设总行管辖俄国境外的分支机构，但却因此实力日衰，所发行的金券也大大贬值。金券发行之初，原定每两可兑换 50 卢布，后来由于滥发纸币已完全不能兑现。从而造成一种现象，民众手中卢布或金券不少，却不能换成面额较小的零票，买不成东西，致使有不少人“怀俄帖千元而面形菜色者”。到 1919 年，1 卢布只能兑换银圆 0.015 圆，短短数年，币值狂贬至近百分之一，给塔城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民国初年，塔城的其他金融机构如票号和官钱局都先后停办，华俄道胜银行独霸塔城，滥发纸币，塔城商民不仅受其压制，经济上也蒙受惨重损失。为此，塔城民众曾几次酝酿组织自己的金融机构，并向塔城参赞毕桂芳（1912 年至 1914 年任参赞）递交了报告。但毕参赞以“创设银行不特财力不足且商业久滞之区，金融恐亦未易流通”为由，没有批准。1917 年，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谢彬来塔城考察，也曾劝塔城商民集资筹建金融机构。谢彬分析说，塔城市场上赖以流通的全是俄国的卢布和道胜银行的金券，把权力让给外国，这在金融上绝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应该乘俄国纸币贬值、信用丧尽的机会，集资向新疆省库领取省票（当时新疆省政府自行印制发行的钞票），办一个官钱局，同迪化、奇台、吐鲁番等地联络汇兑，使官票流通市场，取代俄国货币，这无论对国家对商人或民众，都有好处。人们都认为谢彬说得有道理，并准备着手筹备，但终因官府不支持，又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牵头，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原先塔城一带俄国商品充斥市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俄国货物无法运来，而中国商品却日益增多。原因是俄国战争支出浩繁，国库空虚如洗，只好靠滥发纸币支撑，又不能将纸币兑换为现银，因此，在这里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和民众，得到的全是纸币，而且大部分发的都是伍佰元、千元大钞，一元、三元、五元、拾元的零票像凤毛麟角似的珍贵。人们持大钞去道胜银行兑换，银行竟然毫无道理地一概拒绝，惹得塔城百姓成百上千地聚集在银行周围，把银行团团围住，要求兑换，否则就不离开。两相对峙，冲突一触即发。幸亏塔城官府派兵维持秩序，极力劝阻，软硬兼施，才算平息了风潮。

后来，银行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卢布及金券币值一路暴跌，塔城分行的业务已无法正常维持，拖到 1920 年初，银行终于宣布停业。同年 2 月，俄道胜银行的行员闵德林从塔城押运货币和账册去迪化，被新疆省督军杨增新截获，计有

卢布 328.2 万元，新疆省票 678.76 万两，金币折合 66.7 万卢布，各种西方货币折合 593.6 万卢布。至此，华俄道胜银行设在塔城的分行彻底垮台。

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先后在塔城经营 17 年，由于资金雄厚，网点密布，又有政治背景，因此新疆地方刚刚萌芽的稚嫩金融机构，无论是塔城参赞大臣经办的官钱局，还是总台在北京的汇兑处，都不是它的竞争对手。最后终于形成了华俄道胜银行在塔城一头独大、垄断塔城金融的局面。它打压弱小，大力支持俄商，从另一个角度遏制了塔城本地工商业的发展，塔城的中国商人辛勤经营，却难有起色，更难以与俄商比肩，这不能不说有华俄道胜银行发挥的作用。同时，它还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方式，从塔城百姓手中掠夺走了大量的钱财，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使地处边远的塔城各族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五、慕名前来塔城的探险者

塔城地处中亚腹地，历来是东西文明的荟萃之地和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13 世纪 20 年代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率领其无敌的蒙古铁骑发动西征，往返于蒙古高原、中西亚及欧洲之间，曾多次途径塔城，他们应该是最早的塔城探险者，不仅开辟了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无数神秘传说，让人们吟诵至今。

到了近代，塔城的地位更为显要，不仅是通道，还成为重要口岸。但是，在开埠之初，口岸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而往往是和屈辱与无奈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口岸的多重作用和影响逐渐被统治者所发现，政府在看到它带来麻烦和不安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带来的文明、繁华和利益。因此，也愈来愈受到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塔城本地当政者的重视。巴克图口岸开通后，受观念和认识的影响，很长时间里，巴克图口岸之地只有口岸之名，却无口岸之实，相应设施一无所有。直到 1909 年，清政府拨出专款 1900 多两，建起了巴克图口岸及相应设施。至此，塔城巴克图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口岸。

巴克图口岸开通后，塔城成为北疆重要商埠，各地商人，尤其是俄国商人纷纷前来，趋之若鹜，无形之中扩大了塔城地区的影响和知名度，吸引了很多前来经商、传教、居住和探险的人。说起外国探险，人们总是联想起楼兰古城、尼雅遗址以及敦煌的佛窟，很少将它们与地处新疆北部边陲的塔城联系起来。

而事实上，探险家们也曾多次光顾塔城，在这片辽阔的地域留下处处履痕。

早在蒙古统治西域时代的13世纪中叶，西方教士普兰·迦儿宾、本纳迪克特和法国人鲁布鲁克，为去朝见蒙古大汗，曾先后取道新疆，经塔尔巴哈台去蒙古帝国首都和林（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360千米处）。后来两人都写下了很有价值的旅行记。据《多桑蒙古史》记述，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汗去世后，其妻斡兀立海迷失依照蒙古习俗摄政监国，办完贵由汗的丧事之后，她还在也迷里古城的宫殿里接见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出的准备与蒙古结盟的庞大使团安德烈一行，并接受了法王赠送的奢华礼物。

如果说当年的西方旅行家们只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探路者，那么到了19世纪，有计划而来的外国人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探险性质。当然，由于他们自身立场的不同，又直接或间接地受各国政府的干预，因此，来塔目的往往是学术考察和搜集情报交织在一起的。有的确有积极意义，有的则损害中国主权。

1856年，俄国人僧克曾到塔尔巴哈台地区一带进行探察，并收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这一时期，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国势衰微之际，不少俄国人打着考察的旗号，实际上是测绘地形，搜集情报，为沙俄蚕食我国西北疆土作准备。如1858年俄国上尉哥鲁别克率一支由俄皇家地理学会组成的探险队在塔城境内的探察，1872年俄国人马图索夫斯基从斋桑湖出发，自北而南越过额敏河谷行抵玛纳斯，再沿驿站经塔尔巴哈台到达沙拉的沿途考察就有这种性质。到过塔城的外国探险家很多，但大都不为人知，或留下的资料很少。对塔城留下记述文字较多的有以下几人：

一是俄国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谢苗诺夫。1857年，他们从俄国的维尔诺出发，前往天山地区进行探察。他们登上了天山的汗腾格里峰，对天山山脉进行了天文测量和矿藏研究。当年9月他们来到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最初的府治，即人们通常说的“老塔城”雅尔（俄称乌尔扎尔）。这时的雅尔已被俄国人吞并，并建立了居民点，全村有900多人，耕种着大片的土地。谢苗诺夫写道：“乌尔扎尔村的庄稼播种面积很大，黑麦的产量是种子的5倍。春播作物的产量更好，小麦产量是种子的8倍，春麦和燕麦是种子的13倍多，亚麻的产量也很好。”谢苗诺夫等人把营寨扎在村里，然后登上了塔尔巴哈台山的一座高峰。他描述说：“我登上塔尔巴哈台山峰时，眼前出现了非常宽阔的景象。一边（南边）像是在地图上一样，有着弯弯曲曲向南流去的乌尔扎尔河的广阔草原，然后就是

说明阿拉湖景色的千百个闪耀着的光点和黑色的斑点。再往后，就是和彩云相连的谢米列契阿拉套雪峰。”这是较早的远眺塔城盆地的景色描写。谢苗诺夫考察回国后写成《天山游记》一书，名声大振，并因此被沙皇授予“天山斯基”的称号。

二是日本人日野强。他是最早来新疆探险的日本人。日野强当时的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少佐，1906年受参谋本部特殊使命，到新疆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回到日本后，将其行程详加整理，纂成《伊犁纪行》一书出版。书中按照他的行程，一路记述了他所经之地的地理风貌、物产资源、城池分布、行政设施以及人口、民族、社会、军事、交通、通讯等情况。他于1907年1月进入新疆，同年9月离开，先后在新疆盘桓达9个月。期间，他是3月24日离开迪化乘坐俄式四轮马车前往塔城的，途经西湖（乌苏）、庙尔沟、雅玛图、托里、老风口、额敏河，于4月15日抵达，21日离开，然后前往伊犁。

日野强对塔城地区的记载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额敏河：“附近沿道一带属湿地，芨芨草繁茂，小河甚多，到处是沼泽。二道桥以北数町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宽仅7米，深可没膝。随后又遇一河，宽约20米。额敏河是这条大道上最大的河流，两岸为绝壁，河宽达千米内有数条水流，流速都很急，其中最宽的一股水流约30米，水深到马腹，涨水时节会造成数日交通中断。”另一个是塔城的城建设施：“塔城满汉两城就近相接，满城周长约20町，城内设参赞大臣、索伦领队大臣衙门，满人居民仅数十户，其他多是空屋坏房；汉城周长数十町，内设塔城直隶厅、协台衙门等，人家约600户，其北门有俄国领事馆、俄国电信局、俄清银行支行等，侨居的俄商有约450户。输入迪化和吐鲁番的俄国货大部分经由这里，加之附近山野里游牧的哈萨克人常用家畜交换日常生活用品，故市场比较繁荣。”

三是日本人橘瑞超。1902年至1910年间，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组织中亚探险队（又称大谷探险队），曾三次来新疆考察探险，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橘瑞超作为后续年轻主要成员，1908年第一次进入新疆，在罗布泊、楼兰、吐鲁番等地考察发掘，曾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1910年秋橘瑞超第三次来新疆探险。他们假道俄罗斯铁路经塔城口岸进入新疆。

橘瑞超等人是9月底进入塔城的，因为等待托运的行李，在塔城的一个富户人家借住半月之久。这里并不是他们的重点考察区，因此，闲住期间除了购

买车辆、马匹、牧民用的帐篷等备用之外，就是花精力对付本地的特产奶茶、馕和抓饭等，可惜他们对这些本地人认为是美味的东西并不持赞美态度。闲暇无事，便去塔城不大的街面游览观光。十多天的观察体验，使这位年轻的日本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一、塔城是迪化到圣彼得堡通道上的一个著名的边境城市，受俄罗斯影响很重；其二、官员们庸庸碌碌，为保官帽而奔忙。橘瑞超在游记中是这样介绍塔城的：塔城地处边境，商业发达，俄国势力在这里影响很大，通行俄语、俄文。除土著居民外，有汉人、蒙古人，还有纯粹的俄罗斯人。在街上散步游览，到处显示出中国风格，各方面感觉又像是走在俄罗斯偏僻的乡村。街上有路灯，房里也烧煤，也有的点煤油灯，也有欧洲风格的装饰品。这就是 20 世纪初一个日本人眼里的塔城，民族杂居，文化多元，蒙昧中又点缀着一丝现代文明的光点。在文章的结尾橘瑞超又说了一段这样意味深长的话：“世界上到处都有中国人。古代中国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居住在这里的人，有中国政府派遣来的，也有俄国方面派遣来的。塔城近年逐渐发展起来，这里有俄国领事馆，电信局，最近又新修了邮电局，俄国的势力在这里一天天增大起来。”日本国土狭小，总是虎视眈眈地盯着别国的土地，特别是中国，这已积淀成为一种国民的心态。因此，在中国贫弱之时，他们每到一地，就尽力搜罗记载该地风物人情的志书，明着是为研究，其实别有用心。成书于 20 世纪初的《塔城直隶厅乡土志》手抄本就是与橘瑞超一同来塔城的日本人林出次郎带回日本的，中国国内无藏本，1987 年该书才由日本中国文献研究会发行后送还新疆。当时日本、英国争相染指新疆，橘瑞超的上述感叹是否也藏有这种心态呢？

橘瑞超回国后，完成了《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蒙古语研究》等著作，还与人合著了《新西域记》、《西域考古图谱》等书，使他跻身于斯文·赫定、斯坦因、勒柯克等大探险家的行列，名噪一时。

四是俄国人费·阿·奥勃鲁切夫。奥勃鲁切夫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



日本探险家橘瑞超

苏联科学院院士。在金属矿藏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貌学、地理学方面都有重大成就。

奥勃鲁切夫曾先后两次到新疆探险考察，第一次是1894年，他组建了一支探险队从新疆东部天山，前往新疆、甘肃、青海交界处进行考察探险。这个时间比瑞典的斯文·赫定首次新疆探险还早了一年。他的这次中国西部探险取得巨大成功，足迹踏遍新疆东部和北部的高山大漠，到过塔城、吐鲁番、哈密、迪化、伊犁，路过甘肃、陕西、青海直至西藏的边缘地带，搜集了大量的地质资料，收获之巨让他是以受用终生，并奠定了他一生学术成就的基础。为此他获得了年度“普尔热瓦热斯基奖”。1905年，42岁的奥勃鲁切夫带领他的两个儿子和两名学生再次来到新疆，在新疆北部实地考察。这次考察，塔城是他的大本营和支撑点。他从塔城准备行囊出发，骑马率领驼队，足迹遍及塔城的山山水水及北疆的许多地方，考察了当时塔城的人民生存状态和风土人情，考察过哈图金矿遗址、阿尔泰山的金矿情况和克拉玛依一带的魔鬼城，留下许多真实而准确的记述。据史料记载，正是奥勃鲁切夫率领的考察队发现了克拉玛依的沥青矿，并分析了它的成因；他还介绍了由乌尔嘎萨尔山与巴尔鲁克山相夹形成的老风口的情况。他的这次探险同样获得了巨大荣誉。由于他在探险和科学考察及地质、地理学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他先后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五次获得列宁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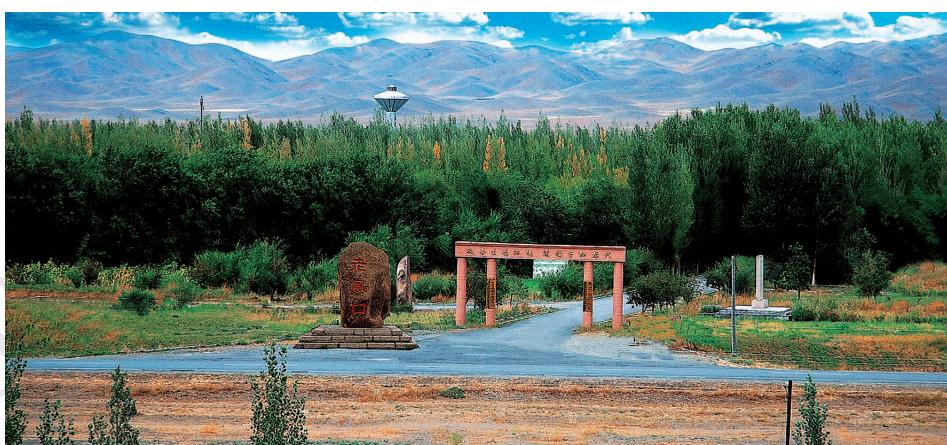
晚年，奥勃鲁切夫以探险游记的方式将他的两次中国探险经历写成《荒漠寻宝》（书名直译为《中亚细亚荒漠寻宝人札记》）。该书利用在新疆考察时搜集到的丰富资料以及其他探险家的所见所闻，通过寻宝人的口吻讲述了在新疆



奥勃鲁切夫绘制的清末塔城民居小院

等地寻宝探险的经历和传奇。因为塔城是他第二次考察行动的大本营，他曾多次为购置考察仪器设备及生活必需品往返于塔城与谢米巴拉金斯克、塔城与莫斯科之间，在塔城多次、长时间逗留，甚至以商人的身份在此买进和出售物资，因此对塔城情况非常熟悉，书中对塔城种种地情，也多有涉猎。如奥勃鲁切夫在书中以在塔城寻访向导和翻译的方式，详细记述了塔城的城市建设、民居风格和人民生活场景，介绍了俄国驻塔城领事馆的情况等。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述，展示出了20世纪初年塔城社会风俗民生的图景，记述了俄国商人如何在新疆塔城等地区的商贸活动以及清朝末年中国大西北的边塞小城的风土人情。书中还通过寻宝人的视角，记述了塔城哈图金矿曾经的辉煌和衰败，藉寻找哈图金矿埋藏黄金的故事，显示了哈图金矿衰落的原因，并暗示了那场灾难的真实存在；记述了当时塔城等新疆边塞地区交通闭塞，城镇破败，农耕方式极其原始，牧人逐水草而居，他们辛苦一年用皮毛之类原始资料换取几尺洋布和少许日用品的贫困生活场景。由于作者的足迹是从塔城展开，塔城内容又占了相当的篇幅，因此塔城地区的山水地名随处可见，如额敏河、塔尔巴哈台山、扎伊尔山（加依尔山）、乌尔卡沙尔山（乌尔嘎萨尔山）、库鲁斯台草原等，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同时，书中还有不少不经意的细节，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许多信息。比如，谈到托里与额敏县之间的老风口，该书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吃过早餐跨上马，在植被稀疏的荒原上继续南行，在乌尔嘎萨尔群山和巴尔鲁克山余脉之间调转了方向。在这通道沿途散布着一些小山丘，它们被称作杰



老风口生态区



库鲁斯台

利德卡喇，意思是黑色多风的山丘。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冬天时常刮可怕的伊比风，（现称艾比风或阿拉风）寒风凛冽，这些山上的积雪全被风吹化了，荒山秃顶现出一片

黑色。不仅这里刮伊比风，在巴尔鲁克山背后刮得还要厉害，这一带是老风口。不管是柯尔克孜人（哈萨克人）还是卡尔梅克人（蒙古人）都不在那里居住，因为夏天很热，草长不好，饲料少；冬天时常刮伊比风，狂风大作，吹得人站不住，重载的骆驼就像干枯的风滚草一样被卷走，人被冻僵。”书中还记述了一个传说：“阿拉湖上有一个岛，岛上有一个石头山，山上有一个大洞穴，伊比风就是带着一种可怕的力量从这个洞穴中冲出来。有一次，在一个无风的日子，柯尔克孜人全村出动用牛皮封住洞口，再用石头堵死，不让风再从洞里刮出来，伊比风使他们厌烦透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伊比风又发怒了，它咆哮着冲出洞来，撕破牛皮，又像从前一样刮起来了。”该书随后给出了大风的缘由：伊比风根本不缘起于小岛，它从艾比湖刮过整个广阔的山谷。这是从准噶尔盆地大沙漠来的冷空气通过一侧的麦里山和巴尔鲁克山以及另一侧的阿拉套山之间的峡谷向北流动而形成的。这里的风叫库鲁苏台（库鲁斯台）伊比风，由于刮这种风，牧民们也不在杰利德山里居住。只是紧挨乌尔卡沙尔山脚下隐藏有几座汉人小村庄。从塔城有一条路通过那些村子，遭遇伊比风的路人可以在那里暂时躲避狂风的袭击。

该书在记述书中人物来到哈图山时描述说：卡图山脉到了尽头，山势变得低矮而平缓，扎伊尔的末端成了小山岗。在前面，接近穆库尔泰小树林的地方，出现了宽阔平坦的缓坡。该书记述说，汉人在这里挖地下的煤炭，运到塔城去供给人们烧炕取暖。还说，从前用这煤炭炼铁，铁锻造剑和矛。地名铁米尔塔姆就由此得来，是铁厂的意思。这里应该是指现托里县的铁厂沟。

上述两段文字透出了非常丰富的信息：第一，长期以来老风口的风灾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惧，因此才有了关于阿拉湖小岛山中洞穴吹风及人们用牛皮堵住风洞的传说。第二，当时汉族劳动人民在塔城境内谋生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连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也分布着汉族人居住的村庄，从中可以看出，在塔城各地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一定不少。第三，在那样偏僻的山沟中（铁厂沟）有人从事挖煤和运输，说明当时塔城境内汉族人民从业的广泛性。

以上是晚清之前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外国探险家在塔城的情形。他们的考察让后人了解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内幕；他们的记述则为我们研究塔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状，包括口岸建设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真实资料。同时，他们的到来，也让外界加深了对塔城的了解，让塔城人对外界产生认知，这对塔城的发展、塔城地域文化的形成，无疑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六、农耕、游牧与欧化交融形成独特文化

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塔城在准噶尔蒙古统治之下，整个塔尔巴哈台地区均是他们的游牧地。期间，也有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的一些部落在这里间或往来游牧，但准噶尔人在这片土地上占绝对统治地位。准噶尔人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佛教文化是当时塔尔巴哈台的主流文化，包括与准噶尔人联系密切的部分柯尔克孜人也信奉喇嘛教。好在无论是准噶尔人还是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根性是逐水草而居，不尚定居，不事建设，就好像一阵风，来到时气势恢宏，离去后便无影无踪。他们虽在这里有交集有碰撞，但除了争夺草场地盘会发生冲突外，习性上并没有过于显著的差异。即使冲突，也主要发生在部落集团之间，个体之间则不会因文明的不同而冲突。当然，由于文化表现出来的不筑城、不定居的特点，因此他们都没给这片土地留下太多的记忆和明显的痕迹。

清朝入主中原后，作为同为游牧民族且受通古斯文化影响的西蒙古卫拉特主体的准噶尔部，在清王朝统一新疆后自诩藩属，本可以作为清朝统治者的同盟而和平共处。但由于其首领自康熙至乾隆三朝对清政府的反复进犯袭扰，终于让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乾隆帝彻底失去耐心，最终乘准噶尔内乱之机一举解决了西部边疆的动乱之源，一劳永逸地稳定了西域新疆，从而使新疆先置军府，后

建省设州县，最终与内地一样，走向正轨。

清朝统一新疆后，根据文化、宗教、社会分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居民可分为以下几个文化群团：

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定居方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群团。塔尔巴哈台设置参赞大臣后，大批满清官员和兵勇来到塔尔巴哈台，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其后，为加强新疆国防和巩固新疆统治，清政府先后从张家口一带和东北地区征调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数千人携眷来新疆。这些作为满营八旗官兵的将士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曾以换防形式长年驻扎在塔城沿边地区的军台、卡伦和驿站，或巡边守卡，或屯田驻守，为塔城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他们又和自己家庭一起常驻塔城，成为塔城常住居民的一个群团。

满族，是清朝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满营八旗的察哈尔蒙古、锡伯、索伦各部，包括后来被纳入旗营管理的厄鲁特（准噶尔被平定后的遗民），则是满清王朝的同盟军，是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基础阶层。当满清王朝统治者从东北进入北京，开始接受并主动吸纳汉文化开始，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就逐渐成为清朝统治文化的核心内容。1757年，清王朝统一新疆，该王朝入主中原已经数朝，其汉化业已完成。时间愈久，他们的汉化程度愈深，因此，到了晚清，包括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身，已经没有了满文的读写能力。清政府派驻塔尔巴哈台的将领和官员，同样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汉文化熏陶，他们用来实施军事统治行政管理的文化载体，虽然还不失满人的强悍和游牧民族的粗豪，但其文化形态已明显地表现出了汉文化的价值判断及诸多理念。其中有两任塔城参赞大臣本身就是汉族人。一位是李云麟，另一位是毕桂芳。按清朝惯例，参赞大臣这样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一般应由满族人担任，但塔城却是例外，这无疑使塔城的汉文化影响程度相应加大、加深。再加上，参赞大臣辖属的各衙门具体办



建于晚清的乌苏承化寺

事人员，特别是文职人员，有许多汉族成员；此外，与满营八旗军同时抵达塔城的，还有大批由汉族官兵组成的绿营兵，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施政管理，同样对塔城施加着重大影响。因此，塔城自设置以来，占主流和统治地位的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汉文化的影响还随着塔城汉族移民的增加，汉族官员比重的加大而不断增加，尤其是新疆建省后，伊塔道的设立和塔城抚民直隶厅的设立，使塔城地区的汉族人口增加更快，汉文化的主流地位和文化影响进一步加强。阅读中俄签订的有关塔城贸易圈重新修建的有关文献及一些外国探险家的相关撰述，我们发现，19世纪末塔城城区附近已有汉族同胞专营的菜园，塔城盆地及山中还分布着许多由屯田或做工的人组成的汉族人村庄。

根据塔城各个时期人口情况分析，塔尔巴哈台地区直接承载汉文化的群体人口是逐渐增多的，虽然还不是人口最多的群团，但由于属于主流文化，因此它的影响力也是最强大的。从宗教信仰考察，汉族多信佛教、道教，满族、蒙古、锡伯、索伦诸族多信藏传佛教，也有一些信仰萨满教。总体讲，在宗教信仰方面有相通之处，因此以上诸民族均可划为直接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群体。

从生活方式看，上述群团中的察哈尔、锡伯、索伦诸族，此前他们或游牧，或狩猎，或兼营农业，并不属于农业群团。但自从进入新疆后，就与统治阶级的满族一样，戍边、屯垦就成了他们终生的事业，他们成了农业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无论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都深深打上了儒家和农耕文化的烙印，融入了这一文化群团。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边疆，并通过行政管理及其他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加以践行，成

为中国主流文化、也是塔尔巴哈台最具代表意义文化的载体。

此外，塔尔巴哈台绥靖城曾经过多次修缮和一次重建。无论是初建和重建，其建筑方式风格、建筑格局名称、城门的方位和命名、城中修建



新建绥靖城的角楼

的祠堂庙宇功能，也完全是汉化的，如城中奉命修建的寺庙称“绥靖寺”，与道教有关的则成“万寿宫”、“关帝宫”，城中祭祀的设施称“先农坛”，后来兴建了一座官家商铺，名为“恩永号”，南门城外



四轮马车

还有一座称作“迎恩桥”的牌坊等等，传承的完全是正统的汉文化。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塔尔巴哈台事宜》一书从撰稿到印行，先后经过了三任参赞大臣。最初由永保（1786～1793年在任）主持撰写，贡楚克札布（1796～1802年在任）继任后坚持续写，增加了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六年10年间的屯工、卡伦、官厂等内容；最后由兴肇（1802～1804年在任）在前两任编纂的《塔尔巴哈台事宜》书稿基础上，补充了4年变化，增记了境内的山水，“详所刍详，而不厌其繁；略所刍略，而不嫌其简。逐案逐款，务归明晰”，还重新划分了门类，分类汇编，装帧成套，并写了详细的序言，最终完成了《塔尔巴哈台事宜》一书的编纂刊行，堪称是塔城的第一部地方志书。资料由编纂者亲自收集整理，真实可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说明，这几位大臣不仅接受了汉文化的观念，并且身体力行文化的传播和教化。所有这些，都通过这个群团中每个人的言行，通过施政过程，时时刻刻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二是以游牧为生存方式的草原文化。清统一新疆以前，塔尔巴哈台是卫拉特蒙古准噶尔人的一统天下。哈萨克人的一些部落虽然也不时游牧于此，但由于塔城并非其核心牧地，只是偶然一用，加上居无定所，因此也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的印迹。清政府在塔尔巴哈台设官后，依照沿袭惯例，开始对入境哈萨克人采取堵截、驱赶的政策。待哈萨克大、中玉兹中的部落首领如阿赛汗等归附清朝并被清廷封爵加官，准其纳贡称藩，清朝始将哈萨克作为藩属国。

此后，受到俄国扩张压迫的哈萨克人再迁入中国境内游牧时，清朝依照藩国

之理，改变了以前的“驱逐出境”的政策，特恩准其租地放牧，收取一定费用，一般是“百牲抽一”的税率。自此，才有了哈萨克人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辖境放牧的情况。后来，因为沙俄在东侵过程中，对哈萨克人进行残暴的掠夺，使东迁的哈萨克越来越多。19世纪后半叶，沙俄以不平等条约为借口，采取武力威逼等方式与中国勘分西北疆界，强行划走中国西北部领土40多万平方米，其中属于塔城辖境的土地计10多万平方米。根据中俄两国达成的“人随地迁”原则，不少属于中国塔尔巴哈台居民的哈萨克人被划入俄国。但有许多哈萨克人不甘心受俄国人统治，他们冲破外国人设置的关卡障碍，纷纷逃入塔城境内。这些逃亡者，加上原来塔城境内的哈萨克人，成了地地道道的塔城人，他们是现居塔城哈萨克人的先祖。

哈萨克人剽悍勇敢，崇尚自由，有城郭而不居，一年四季过着庐帐为室，肉酪为粮，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辽阔的草原上，为塔城这片土地由蛮荒走向有序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塔城土地上另外一个崇尚自由的游牧群体是1771年从伏尔加河畔东归的土尔扈特人。

1775年（乾隆四十年），清政府在土尔扈特内建立盟旗制度，旧土尔扈特即渥巴锡所领东归之众，被划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各立盟长，共设10个旗，总称为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归伊犁将军节制。其中东路、北路就安置在今塔城地区境内。南路和西路分别被安置在裕勒都斯草原和博尔塔拉。北路由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下设3个旗共有人口2151户，9560余人。东路则由多罗郡王巴木巴尔率二旗7个苏木游牧于乌苏的西南山区，北路王旗，由和硕布颜图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亲辖，领有6个苏木；右旗，归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之子、扎萨克一等台吉所属，领有4个苏木；左旗，归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之弟扎萨克一等台吉所属，领有4个苏木。他们的游牧区域分布在今和布克赛尔一带，隶属于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清末，北路3个旗14个苏木共有人口11709人。在塔城建制初期，这是一个堪称庞大的人口数字。土尔扈特人原居住地就在塔尔巴合台草原，虽一度远迁伏尔加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东归。自从回归祖国并被安置在祖先曾经繁衍生息的这片土地，就与这片厚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再也没有离开。

土尔扈特人，包括同为西蒙古曾经的同盟者厄鲁特人，他们和与自己同样具

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哈萨克人一样，同属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习俗上有很多的相似处，但他们却属于宗教信仰上的两大阵营：哈萨克人信奉伊斯兰教，而土尔扈特人与厄鲁特人一样，信奉藏传佛教，按照亨廷顿当代文明圈的划分方式，他们属于两个族群，同样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范畴。然而，这是两个具有宽广心胸和伟大爱国情怀的民族，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生活在塔尔巴哈台草原上，却并没因为不同的信仰而产生纠葛或冲突。相反，在关键时刻，他们能摒弃前嫌，真诚相助。比如 1864 年中俄划界后，原属塔城的大片土地沦为异域，原在这些地方放牧的部分哈萨克部落，即克列部落的分支江铁开部落因不堪沙俄税赋重压，也不愿按“人随地归”方式接受俄国人的统治，选择了南迁中国，也就是塔尔巴哈台辖属的境域。这是一支人口数千、牛马羊数十万头的庞大队伍，他们的到来必然会挤占土尔扈特人的草场，加之此前土尔扈特人曾为草场资源与哈萨克人起过争执，不少土尔扈特首领表示拒绝。但当他们得知迁徙的哈萨克人后面有俄国追兵，而这些哈萨克人又表示了不愿受俄国人的奴役的强烈愿望，有过同样经历的土尔扈特人被感动了，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在和布克赛尔的冬牧场度过了漫长难耐的冬天，度过难关，第二年草原又绿的时候，才把他们护送到塔城西南的加伊尔和玛依勒山区。两个不同信仰的族群，在爱国主义的情怀感召下，以宽广的胸怀、包容的心态，化解了恩怨，度过了难关，为塔城民族和解和团结爱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由于塔城辖境的蒙古诸部与哈萨克诸部均为“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其生活习俗与生产方式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相近，因此对他们的管理方式也采取了与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相类似的札萨克制。札萨克在蒙古语中是“执政官”的意思，清政府在实施这一制度时，将其作为一旗之长的称号，每旗设札萨克一人，由清廷任命该部落的首领担任，并以其势力的大小和对清朝的效忠程度而封为汗王（亲王、郡王）、贝勒、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世袭爵位。他们对自己所属之札萨克内的土地、人民拥有完全的管辖权，而与清廷派驻的参赞大臣只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主要事务都由被政府任命为札萨克的部落首领管理。这样，一方面赋予部落首领以高度的自治权，保证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符合其民族习惯，提升了他们对清政府的向心力；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他们居无定所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节省行政成本。当然，为体现清政府对他们的有效政治控制，蒙哈各部须“分旗游牧，分地划界”，各王公、台吉、



蒙古式摔跤

札萨克无故不准越界，有事或联姻须呈报当地大臣核准，方可执行。此外，世袭的爵位，必须经过清廷的批准和任命，并需按例进京朝贡。

在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下，塔城境内的蒙古、哈萨克各部在后来的不同历史阶段都保持了和睦相处，即保持了各自的文化传承，同时也为塔城的社会发展进步和本土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三是以城市为依托的商业文化。塔城地处西北边陲，与中亚哈萨克诸部相连，与俄国相距甚远。后因沙俄实施武力扩张，遂使中国的塔尔巴哈台地区与其边界相连。塔尔巴哈台绥靖城建成之后，塔城官府即与周边哈萨克人开始了贸易往来，其中，也有属于俄罗斯的商人参与其间，前来交易。但因为受塔城地方官府的限制，人数和交易数量都不多。此后，随着沙俄对塔城辖境土地的蚕食侵吞，其边境距塔城越来越近，终至相连。在侵吞塔城领土的同时，还以塔城为通道，把攫取塔城乃至整个新疆的丰厚商业利润作为其核心利益的计划紧锣密鼓的加以实施。1852年逼迫中国开通塔城商埠后，由于塔城口岸通商免税，等于不设海关，巴克图仅仅就是一条顺畅的通道（当时全国的海关全都由外国人掌握，但毕竟还有海关，而塔城根本不设海关可见国家主权损失的程度）。因此近在咫尺的俄国商人蜂拥而入，至当年年底，到塔城经商的俄国人就达近百人。其后，尽管围绕口岸的事件不断发生，来自俄国属地的各色商人及其他人员还是越来越多，一直呈上升趋势。到清朝末年的1907年，在塔城贸易圈居住的俄商有450户，近4000人。与俄商一同前来的应该还有一些从中亚各地乃至俄罗斯本土迁来的其他从业人员，如宗教、文化人士、手工业的工匠、医者等等。如果加上俄驻塔城领事馆人员及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数字将更大。

由俄国商人带到塔城的，除了商品，还有这些商人所在国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建筑风格等一系列文化元素。此外他们还带来了

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和近代金融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压榨新疆人民的工具，但也强化了塔城作为开埠城市的经济功能，通过“外力”把双边贸易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事物强行“楔入”塔城社会和民众心里。

从商人们的种群看，他们有的来自俄国本土、西伯利亚等地的俄罗斯人，有的来自中亚各地的乌兹别克人、塔塔尔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等；从宗教信仰划分，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乌兹别克、塔塔尔等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分别将这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带到塔城，为塔城这片多种族文化荟萃之地增添了新的元素，注入了生命活力。如俄罗斯人的东正教文化给人带来的乐观、笃信和坚韧向上的品质和注重建筑风格、美化环境的生活习俗，给塔城民风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乌兹别克、塔塔尔人带来的中亚人的好清洁、求真知，为了理想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不仅渗透在他们的经营里，也深深影响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上述在塔城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各种文化，初看风格迥异，大为不同，但若仔细考察，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差别中有着许多一致，如作为中华儒家农耕文明承载者的满、汉、察哈尔、锡伯、索伦等族，他们承担着屯垦戍边的重任，除了巡查卡伦、戍守边疆的军事任务外，农耕逐渐成了他们的主业，定居成了他们生存状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农业经济比重的加大、大批汉族成员的不断加入，则强化了这一倾向和趋势。清朝终结后，他们大都归向



塔城东正教教堂

农耕或融入城市。但是，由于传统的根性和耳濡目染，他们对游牧生活和草原文化也非常熟悉理解，并能与之友好相处。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草原的土尔扈特、厄鲁特蒙古诸部，由于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纽带，与在塔城体现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农耕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刻，大都会挺身而出，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上，为保卫祖国而战，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比如，在19世纪中叶后发生遍及新疆的农民起义后，满、汉、锡伯、索伦及蒙古诸部都自觉站到了维护国家稳定的立场上。塔城的许多蒙古人还参加了爱国喇嘛棍噶扎拉参保卫塔城的战斗，为塔城的规复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



棍噶扎拉参

从人口发展考察，通过长期的迁徙辗转，哈萨克逐渐成为塔尔巴哈台的主体民族。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草原民族，在宗教信仰上虽然与同为草原民族的土尔扈特、厄鲁特包括察哈尔人有所不同，但相似的经历，相近的草原生活规律和习俗，又使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不是相斥，而是相吸，使他们在清朝统治新疆的15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互相影响，互相关注，互相支持，共同为塔城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各自的民族精髓。

在塔城的文化群团中，以城市为依托的商业文化载体是以俄罗斯及中亚等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但也有不少中国内地的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加入其间。虽

然在商业利益竞争中，这部分人群时常受到排挤和打压，但他们仍属于塔城商业群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俄国商人因各种因素受到挫折时，他们都会乘机发展，迅速填补留下的空缺。从人口结构看，商业群团不属于最大，但他们的影响却是发散性的，无处不在的，他们通过来自各地的商品，通过建筑格局、通过生活方式，对所在城市和周边人群发挥着影响，同时也从所在地和周边人群积极吸纳着对他们自身有益的养分，在影响别人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融入了塔城。

认真发掘观察塔城历史就会发现，其实这种相互间的影响和改变是随时随地的，无处不在的，它发生在各个阶层、各个族群和不同的文化群团之间，并产生着润物细无声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相互间的学习、吸纳和影响，使塔城社会不同的群团之间虽有信仰却不极端，更不干涉别人，彼此之间都以包容心态相互接纳，形成一种消解异端、吸收正能量的富于地域色彩的地域文化——塔城文化，这种文化既有中华民族共性，也不淹没各自的个性。从而使塔城不同的人群都能彼此包容，和睦相处，共享平安祥和的美好人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到清朝末期，融农耕、游牧和含有俄罗斯及中亚诸多元素的近代商业文明为一体的塔城本土特点和基调已经形成，并在历史的发展中日益凸现。

七、塔城地域特质孕育的文明之花

塔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的简称，原本是一座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城池模式，



塔城北山

并借鉴西北地区建城模式，用干打垒加土坯方式铸墙建成的一座集官署、居住、防守为一体的规模不大的城池建筑。经过一次次修补和重建，进入20世纪，已与内地州县衙署所在地的城池相去不远，只不过规模和人口较少。但是，由于它与俄国边境相近，尤其是与口岸首尾相连，使得塔城的整体风貌，包括城市的架构、建筑的风格取向、城市人口的着装气质，城市总体透出的文化氛围和风尚追求，都显示出一种大异于内地的独特风情：它的基础格调是中原的，但又处处透出浓郁的草原气息和欧洲小城的异域风光，时间愈久特性也愈明显。这种塔城独有的格调还可从本土的建筑及本土人物的著述中体现出来。

比如，塔城的红楼就是本地独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塔城众多建筑中，有一座建筑与其他迥然有异，颇显得与众不同。塔城一般建筑大都是土坯砌墙的平房，绿色铁皮的起脊屋顶，墙面用泥抹平，然后用石灰刷成白色或淡蓝色。唯有这座建筑是斗篷式黑铁皮起脊屋顶，墙体全部用砖砌成，外墙漆成朱红色。红墙上一排刷了绿漆的排水管，从屋顶直通地面，排水管上端的雕花铁皮盒子，像是为屋顶安了无数个眺望台。因为地下室有一半在地面之上，加上房屋高大、墙壁厚实，整体比一般建筑要高出一倍。这一切使得红楼看上去显得雍容华贵，气势非凡，在这个偏远的塞外小城，颇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就是塔城的标示性建筑——红楼。

红楼分上下两层，共有大小房屋16间，天棚、地板、铁皮房顶、拱形门框、



塔城红楼侧影

窗棂边上，绘有圆形、菱形等几何图案，房檐和墙体饰有浮雕。图案精美大气，是典型的俄式风格。临街的墙全部呈浅红色，故而人们称之为“红楼”。它的主人是俄籍塔塔尔商人热玛赞·坎尼雪夫。

热玛赞·坎尼雪夫是《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于19世纪末随舅舅在新疆开设了吉祥涌洋行。随后家族许多人也随之迁居新疆经商，经营方式和范围是：收购新疆皮毛、棉花、肠衣和各种土产，出口至俄国和欧洲，再从俄国进口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随着经营的拓展，热玛赞·坎尼雪夫在清朝末期来到塔城开拓市场。为了占领塔城市场，他不惜巨资，聘请了俄国建筑师设计和塔城优秀工匠，选用上好材料，历时三载，才在城区西北的一块三角地上建成了这座当时塔城最为高大豪华的建筑物。其后，热玛赞在此落地生根，以经营土特产的进出口贸易为大宗，结果非常成功，他的吉祥涌分号很快就成为当时塔城的贸易中心，显示了吉祥涌洋行在新疆外商洋行中的显赫地位。

红楼只是当时塔城诸多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标志，但红楼的故事却充分说明，俄商在塔城的获利之丰和发展之快，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以及他们生活和经营实践对塔城带来深刻的冲击和影响。

另外，在塔城本土完成的重要史著《东方五史》，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外来文化给塔城留下的浓浓痕迹。

《东方五史》是记述新疆哈萨克、蒙、回等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各民族相互关系及新疆相关地理情况的历史著作。这是一部由塔塔尔文写成的线索纷繁的史书，较为详细、客观地记述了新疆和中亚地区突厥语系诸民族的族源、历史和相互关系，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影响，阐述了有关语言文学、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知识，对研究新疆近代史具有重要史料和参考价值。这部著作是由塔城人库尔班艾里·哈力德编撰完成的，可以说，这是塔城文化极具特点的一个标志。

库尔班艾里·哈力德1846年出生在塔尔巴哈台山之北的阿亚古斯（1864年后归属俄国），系中亚的塔塔尔人。幼年时曾就读于阿亚古斯、谢米巴拉金斯克等地的经文学堂。稍长后随其父经商，历经颠沛流离，最终迁至新疆塔城定居。初到塔城时，他一方面被父亲送到塔城清真寺随寺内的阿訇继续学习经文，同时帮助父亲经商。由于库尔班艾里聪明好学，遇事喜欢溯本探源，很受阿訇青睐，凡寺院中的经文书和相关典籍都可随意阅读浏览，这让库尔班艾里眼界大

开，不仅在经文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在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知识也突飞猛进。成年后，他很快就成了寺中首屈一指的伊玛目。

塔城地处新疆的边境地区，从西辽和蒙古时期就是通往中亚、西亚诸国的交通要道，18世纪后叶又辟为新疆向西的陆路通商口岸。由于来来往往的商旅络绎不绝，很早以来就成为东西文明和多种文化的交流荟萃之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无疑对库尔班艾里产生了影响，耳濡目染，让他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郁的好奇心。于是他有了一种要走出去亲自认识、了解外部精彩世界的强烈冲动。他要通过学习和探索，弄清这个世界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

在家庭和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库尔班艾里抱着一颗求知的心，踏上了一条艰辛却快乐的学习找寻之路。从此，他遍游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一带，学习各种语言，学习各种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考察民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搜集各种历史文化资料。他一边学习，一边对诸多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广泛阅读和实地勘察研究，广泛搜集资料，认真梳理；探访求教于名人学者，搞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疑难问题。同时，分析研究和考证各种传说与有关事实。经过数年辛苦工作，他获得了许多正规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大量的第一手民间口述资料。他把这些史料带回塔城，详加整理，本着“把昔日人民的景况编成故事加以传播，把当代民族的状态陈述于世”的愿望，开始了他浩繁的著述工程，此时他年方30岁。

从此，库尔班艾里一边主持塔城清真寺，一边开始他的著书立说工作。他先列出提纲，随后分门别类把史料进行归类，即着手写作，遇到问题，他就再次外出，寻访历史和文化学者向其求教或商讨，力求探究历史的本真。就这样，他手不释卷，马不停蹄，边考察，边辨析，边写作，先后历时21年，终于在1896年完成了这部历史著作，此时，他自己也由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长者，一个资深的历史学家。

著作完成后，库尔班艾里把他的这部历史大作正式命名为《东方五史》。该书计有50多万字，全书分为12章。主要内容包括：中亚浩罕汗国阿通布旭克汗至胡大亚尔汗末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新疆叶尔羌汗国政权的创建和更迭；喀喇汗王朝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的经过及其大力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汗的传记；浩罕入侵者阿吉柏政权的建立及其覆灭；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巴什基里等民族的族源与概况，诺阿

依人与克普恰克人的历史；成吉思汗及其谱系；蒙古人与西藏人的关系；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人民反清起义的经过；却切克（塔城）的由来；“回回”等词的解释；回族在塔城地区的宗教生活及其与哈萨克族、蒙古族的相互关系；俄国入侵中亚与新疆的事实真相；各地一些城堡和清真寺的兴建；哈萨克斯坦概况及哈萨克人的风俗习惯；中亚和新疆著名山川、河流名称的由来和介绍；朝觐行程记；西亚及欧洲名城的介绍；蒙古族、塔塔尔族补遗；日本概况；中国诸朝与当代清朝；1881年签订的中俄条约等。该书对作者当时的居住地塔城的历史和各民族的发展有较详细的记载。书稿内容纷繁、涉及面广，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信息，成书稍晚的历史著作《伊米德史》（由维吾尔历史学者毛拉·穆萨·赛拉米著）就深受该书影响，并从《东方五史》中吸收引用了大量史料。其后，库尔班艾里继续担任塔城清真寺伊玛目，还一度担任哈孜（宗教法庭职务）一职。1912年，病逝于塔城。

在上述《东方五史》内容中，有关新疆和中亚突厥语系诸民族的族源、历史，伊斯兰教传入天山南北等新疆历史重大事件的详尽、客观的记述尤为重要，其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天文、地理诸学科、多个领域，是比较有意义的史料，对研究当时的新疆及中亚社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为可贵的是，由于作者长期在塔城生活，作品也是在塔城完成，他对问题的把握和观察角度，他对当时各种历史情况的记述，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塔城生活的影响，除对塔城的直接记载外，其他各类记述，也无不折射出塔城19世纪中后期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习俗文化观念氛围的许多信息，这对研究塔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与库尔班艾里同时期，塔城还出现了创作出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的哈萨克作曲家哈伊拉克拜依，将民间英雄传说改编为长诗的哈萨克诗人喀尔拜等文化人物。汉、满、蒙古等族群中也出现了许多融入诸多本土元素且令当地人民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作品。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必然因果关系。从上述作品或文娱形式的酝酿、撰述到完成，我们还可以看出，正是历史上塔尔巴哈台各民族、各群体来来往往留下的丰厚遗产，正是巴克图口岸的畅通交流，为塔城注入了中华大地、中亚草原（包括河中地区的农业区域）以及俄罗斯等多种文化的基因，而群体多种族长期的、相互嵌入式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生活，遂使塔城成为一片沃土，无论何种文明的籽种，一经落地，就会生根发芽并绽放出炫目的花朵。

第四章 民国时期——口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一、民初塔城经济社会状况及欧化倾向

进入晚清之后，沙俄为加强对新吞并的占据区的控制，不断将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向这一带地区延伸。1891年，俄国政府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到20世纪初，其铁路已经修建到额尔齐斯河中游地带的谢米巴拉金斯克市。该市地处我国西北方向，距中国西北边境城市塔城最近，因此，成为俄国及中亚东部地区进入新疆的最便捷的通道。加上塔城巴克图口岸进出境手续简便，通过这一通道进出新疆，往往成为当时许多人员的首选。包括中国一些要人出入新疆，往往也会选择这条路线。据当时史料介绍，从塔城进入新疆的路线是这样的：如果是中



1940年塔城巴克图边防站

国人，为了路途快捷舒适，他们往往会选择从东北出境，乘坐俄国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抵达中亚城市谢米巴拉金斯克，再乘船走水路沿额尔齐斯河抵达斋桑，然后由斋桑乘坐小客轮抵达阿勒泰，再由阿勒泰乘车或骑马抵达塔城；或者从谢米巴拉金斯克由陆路直接乘马车到塔城。塔城也是新疆通往俄国的捷径通道，1906年来塔城刺探情报的日野强曾对当时塔城的交通状况做过考察，他说：塔城是当时新疆通往俄都莫斯科最便捷的通道，由塔城乘坐马车抵达谢米巴拉金斯克，然后再从那里换乘汽船沿额尔齐斯河而下抵鄂木斯克，再转换铁路直达莫斯科。这说明了塔城口岸通道在当时新疆交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口岸作用给塔城带来交通便捷的同时，也对其他方面产生了一种微妙影响，就是它紧靠中俄边界，当本国发生变故时，距离迟滞或滞碍了震荡；相反，当邻国发生变故或社会动荡时，它却会受到波及和直接影响。如，1912年中国鼎革，国家元首从皇帝变成大总统，但塔城一如既往，反响甚微，甚至看不出什么变化。可能正因为社会平稳，波澜不惊，新伊大都督府和省府都督关于新疆和平解决最高权力归属的谈判地点被选在塔城。后来，经过谈判新疆都督一职被杨增新获得，伊犁起义一方也获得了不少重要位置，双方握手言和，从一触即发的交战状态和平过渡到民国，使新疆人民避免了战乱之苦。取得这样的结果，让塔城也沐浴了和平的恩泽。其后，尽管进入了中华民国时期，可塔城的最高长官仍与清时一样称作参赞，直到1916年塔城设道，归属新疆，参赞之名才改为道尹。

而当俄国发生重大事变或政治革命时，塔城受到的牵连或影响则首当其冲。如1916年，沙俄在中亚地区强行征兵，引发了哈萨克人的强烈不满，遂爆发中亚哈萨克人的抗暴起义事件。由于沙俄政府采取了镇压手段，致使大批哈萨克人越境逃入塔城、伊犁等地，造成大量难民，给塔城带来极大困难。后来经过新疆当局通过外交途径几经交涉，才使一部分哈萨克人获得赦免，返回原籍，但还是有不少人留了下来，一度给塔城社会造成了混乱。1917年，俄国爆发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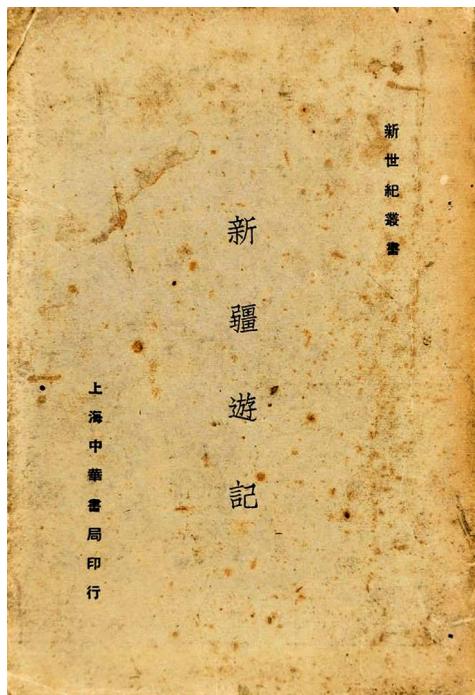


新疆都军杨增新

月革命，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垮台，引起一些国家的武装干涉。国内的一些反动军官也乘机组织了以高尔察克为首的临时政府，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抗。他们无法抵御苏俄红军的打击，于1918年8月后陆续败退至俄国中亚地区。后来在红军的追剿下，被迫缴械退入塔城、伊犁等地，成为直接威胁新疆安全的重大隐患。国内著名的辛亥革命没能让塔城止水般的社会泛起微澜，而俄国的革命却在这里掀起轩然大波，几度给塔城带来无妄之灾。由此我们可以体味塔城步入民国后的种种社会状态。

新疆省督和新伊和谈成功后，塔城仍是一如前清时期：人数众多的哈萨克、蒙古人仍在草原和山间放牧牛羊；汉族、回族、维吾尔族人多在水源丰富、土地肥沃之地结群定居耕耘，形成自然村庄；塔城的城中，城池和官署陈旧破败，做各种营生的人民为生存忙碌奔波；城西北的俄国贸易圈中，洋式建筑林立，洋行店铺鳞次栉比，中外人士熙熙攘攘，依然一片承平景象。塔城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鼎革伊始，民国中央政府百业待兴，事务纷繁，对孤悬塞外的边陲小城无暇顾及，即使偶有谕令，也因万里相隔，鞭长莫及；加上塔城财政一向全赖协饷，民国之后，中央自顾不暇，致使协饷断绝。塔城地方当局万般无奈，只好自行印发钞票（俗称塔帖或军用手票）用以支付军政及公务人员的工资薪酬。种种事故，让中央的威望无形中递减消弭。凡此种种，愈加反衬出邻国的强势。加上俄国铺天盖地的影响：此时塔城居民用的是俄货，使的是卢布，又近在咫尺，口岸相通，不少普通民众及山中牧民，只知道有俄罗斯而不知道中华民国。1917年，中央财政部派员到新疆考察税收情况，于是有了财政部高级专员谢彬游览新疆的故事。谢彬在新疆历时9个月，并在塔城逗留近1个月之久，回京后有《新疆游记》一书问世，书中对塔城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做过详细记述。

谢彬，湖南衡阳人，民国初期的财政部官员。1916年10月，谢彬接受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即以国民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到新疆调查地方财政情况。1917年春，谢彬从北京启程，开始了他坎坷漫长的新疆之行。当时的新疆没有铁路，也没有汽车，行动主要依靠马、骆驼和骡车。谢彬就靠这种原始的交通工具，走遍了新疆天山南北的广袤土地。每到一地，谢彬不仅着眼于财政情况，还特别留心村镇的距离、民俗的状况以及土地的丰瘠和历史文物的分布。在长达9个多月的旅行中，他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先后跋涉奔波8000多千米，除定期向北京民国政府发回调查报告外，还坚持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所到之处，



民国时期出版的《新疆游记》

对新疆的历史与现状描写得非常准确，是了解新疆的必读之书。为此，他特别强调当时专门为新疆培养干部的学校——新疆法政专科学校的学生必须要阅读此书，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总是要送上一套《新疆游记》和他自己的《补过斋日记》，意在鼓励学生通过《新疆游记》了解熟悉新疆的历史和现状，用它的思想理论在新疆有所作为。

谢彬是从哈密进入新疆的，塔城是他新疆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从1917年10月25日离开承化（阿勒泰）进入塔城辖境，开始了对塔城的考察。他途经和布克赛尔、额敏等地，11月4日进入道伊公署所在地塔城，并记下了沿途所见所闻和所感。从进入塔城到离开，共在塔城旅行停留29天。主要考察记述了以下事项：

第一，详细记述了途中站台村店间的里程，途中景色；着重写了塔城在因同治年间中俄不平等划界失去斋桑湖一带地区之后给阿勒泰、塔城两地交通带来的极大不便。他在途中看到昔日日本属中国的大片沃野如今已沦落到俄国人之手，心中无限感慨，他写道：“同治九年，中俄两国共同设立塔城界碑，俄国人偷偷把界碑向中国境内移动了一百多里。不知当年中国派出的勘界的人为何糊涂

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心得，完成了长达40万字的《新疆游记》。

《新疆游记》忠实地记述了新疆在民国初年的闭塞落后，百废待举，空有富饶的资源却贫困交加的状况，同时也传神地描绘了新疆雄浑壮阔苍茫奇异的自然景色。书一出版，立刻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报纸纷纷转载，单行本一版再版，一时之间，竟成了全国上下了解新疆的窗口和百科全书。孙中山读了《新疆游记》之后，非常兴奋，他称赞谢彬是自己所钦佩的有为之士，是做大事的大丈夫，并亲自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使这本书的知名度更高。新疆当时的统治者杨增新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认为它

到如此地步，眼睁睁地看着土地丧失而不去争去辩，不仅割去大片肥沃的土地，更重要的是隔断了阿、塔两地的交通。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孤立两地，应援极其困难。”他希望以后中俄如有改约的机会，就应该根据地势和最早的条约争回此地，以便于塔、阿互相间的联络。

第二，记述了塔城政区的历史沿革、地域方位范围、民族习性风情及物产的丰富，除了遍布山间草原的牛马羊外，还有煤矿和金厂。他在游记中说：“城东四百余里有铁厂煤窑，量大质优，山南为哈图金矿所在地。

塔城东北各山都有金山

之名，而最能显示前景辉煌的，就数哈图山了。”此外还记述了塔城的两种特产，一种是冰鱼，味道非常鲜美；另一种是野马，它长着马身和马头，耳和鬃毛像骡，蹄子和尾巴像驴子，俗称“三不像”。

第三，记述了额敏设县前的情形及县境的考察记录。据《新疆游记》载：“额敏县城设县前称额敏河市，在塔城东一百六十里，市街位于河西，有维吾尔人五百余家，回民三四十家，汉人二三十家。俄商十余家，哈萨克人六七十家。附近还有种地的汉人二十多户。市西存元代旧城遗址，市东有参赞大臣锡纶的参赞公署衙门，东面还有扎拉丰阿修建的领队大臣衙署。”谢彬认为，在这里设县很有必要，过去参赞衙署可改设为县府，领队衙署稍事修葺就可用来驻军，这样，一座县城也就形成了。同时，谢彬还详细考察了即将设县地区的地理环境，将县境的可牧之地、可耕之田、可用来灌溉的水和可安置人的地方一一历数，最后提出恳切的建议，良苦的用心，显现在字里行间。谢彬此说提出不到一年，额敏县即于1918年正式建县。无论此举与谢斌的建议有无直接联系，都可看出他作为有识之士的敏锐和慧眼。

第四，记述了当时塔城财政、税务、商业、金融方面的形势。由于谢彬专为考察财政而来，因此这方面的情况记述得比较详细。据游记记载，当时塔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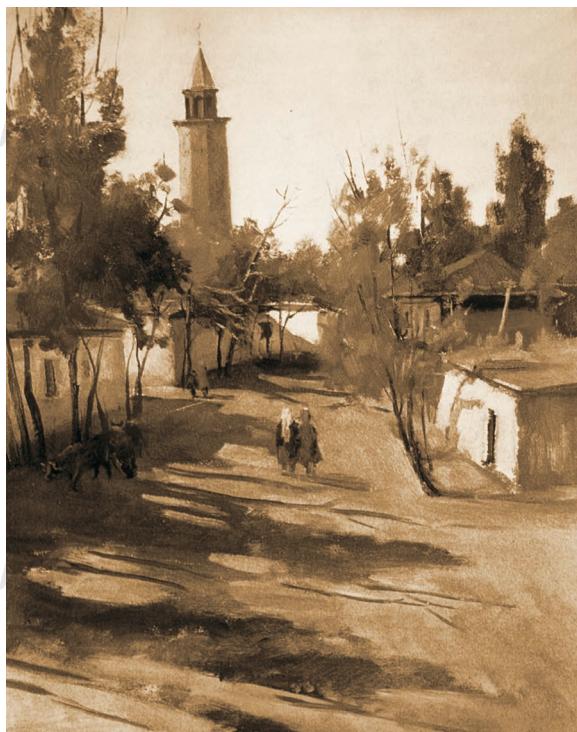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额敏县政府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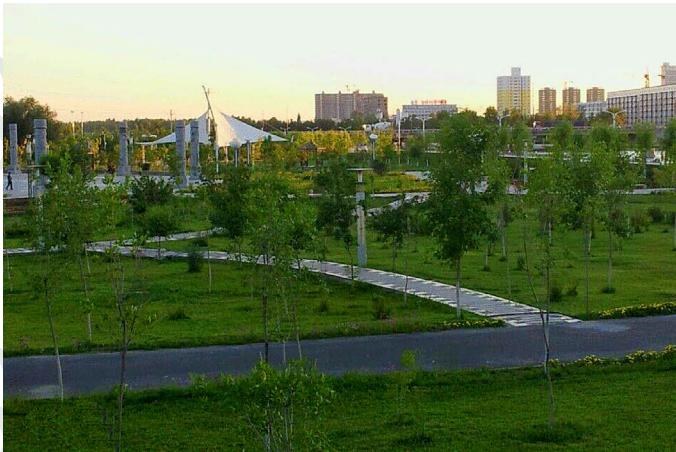
道的财政收入有马租银，牛、羊、驼草场税，皮毛税共三项，合计每年总收入为13988两银票。由于当时塔城流通货币主要是沙俄卢布，因此规定每两银票等同于俄卢布1元，比价为1:1。另外还有两片草场归道尹公署经营，主要用来放牧贡马，一向租给一些固定的牧民放牧牲畜，每年可以收入租场费800两。由于塔城地处偏远，驻兵和官员都比较多，军饷等各项开支远远大于财政收入，这些开支主要靠中央的协饷。民国以来，由于协饷总是迟迟不来，参赞署只好自发纸币（塔帖）以资周转，总发行量27万两，而塔城百姓都说有30多万两。谈到这事，谢彬非常恳切，他说参赞已改道尹，理应将这项军用票性质的纸币如数收回，以保证政府的信用，并使商民免受损失。为了塔城百姓有个好结果，谢彬一再向道尹汪步端呼吁：汪君君子，勉乎哉！据记载，塔城当局后来陆续收回塔帖，这大概也有一份谢彬的情谊在里面。在商业和金融方面，大宗贸易都被俄国人垄断，寥寥可数的几个中国商号，本小利薄，根本无法和俄商竞争，加上华俄道胜银行大肆推行卢布，市场流通全靠卢布，因此整个塔城使用的货币是卢布，用的是俄货，全

部商业和金融，都在俄国人掌握之中。当时，由于俄国爆发内战，商品不能运出，货币一路下跌，塔城不少百姓手里拿着卢布却买不到需要的东西，损失惨重。

据说，塔帖发行之初，人民还能接受，后来发行数量增多，又不能兑换现金，信誉扫地。当时，正值科阿战争，即外蒙古派其科布多的驻军进犯阿勒泰。驻塔城军队奉命前往增援，称援阿军。塔城给援阿官兵的军饷发的也是塔帖。士兵和军政官员们都使用塔帖，商家也



塔城小巷（王金凯 油画）



额敏河畔的额敏县城

不能拒收，但收了之后既不能兑换，又不能进货，成了没用的废纸，搞得商人和平民百姓怨声载道，影响很坏，连上海的民生报都报道了这件事情，说：“塔城援阿军概发军用手票，并未发给分毫实银，以

此作支付之用，大伤军商界之感情。”有位叫韩传富的内地商人，原本想到塔城来发笔财的，干了两三年，没想到 7000 两白银进的货物都变成了一堆不能兑换现金的废纸，老泪横流、痛不欲生。正当大家对塔帖一片骂声时，在塔城的俄国商人乘机低价收购塔帖，然后仗势逼迫 10 天内兑现。塔城地方官惧怕外国势力，不得不向北京政府告急求援。这些记述，真实展现了塔城种种矛盾纠葛，说明了当时经济社会受制于人的脆弱和隐忧。

此外，谢彬还记述了在塔城期间与塔城官员应酬饮宴的情景，虽然着墨不多，但部分官员的神态风貌却跃然纸上。

谢彬通过考察及切身体会，对塔城受俄人影响及控制一事最为忧虑。谢彬离开后，时光流逝，俄国发生了列宁缔造的苏维埃政权取代沙俄政府的重大变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塔城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俄间的不平等的通商条约被取消，俄国人也须同中国商人一样纳税；许多俄国商人失去保护，纷纷加入中国籍，中国商人开始抬头，中国商品明显增多。但是，塔城社会的慵懒、散漫、迟缓却少有变化，城市的俄罗斯影响和欧化倾向也没改变，反而有加深的趋向。如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驻苏俄斋桑领事的广禄途经塔城，对当时城中的境况做过如下描述：“塔城旧称塔尔巴哈台，又名北雅尔，距苏俄边界只有四十华里。塔城在中俄交涉史上为一饱经侵略之边城，许多土地都被俄人一次又一次地侵占，今日（指 1926 年）所有的土地，恐还不及固有的一半。塔城旧日城分满汉两城，满城居东，汉城居西，行政长公署在满城，县政府在汉城。城内

居民自民国后陆续迁出，或至城郊经商，或移乡间务农畜牧，所以城内只有官署、仓库以及公务人员宿舍。以前的住宅都弃而不用，皆成废墟废墟，因之城内颇为萧条。满、汉两城相距一里，汉人和汉回（回族）皆聚集这一空间，此处也称黑塔依巴扎尔（汉人集市）。汉城之西北为商埠地，也称洋巴扎尔，此地洋华杂处，商肆栉比，多半建筑皆已俄化，苏俄领事馆及其贸易公司皆在此地。那时全城居民有3万余人，种族复杂，有汉人、汉回、锡伯、索伦、蒙古、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斯拉夫人等。蒙古和哈萨克两族，仍在山野之间逐水草而居，度其单纯的游牧生活，其他民族，无论是务农或经商为主，俱以畜牧为副业。因为畜牧之利最为优厚，尤其是养羊。”广禄还在回忆录中介绍：苏俄此时在塔城虽设有领事馆和苏新贸易公司，但因其时尚缺乏呢绒布匹等棉毛纺织品，所以只运来一些烟酒、搪瓷器皿及铜壶、铁锅之类的五金杂货，而换取我之羊毛、皮张及马牛羊等畜牧产品。就是这样，中苏商务亦顿现活跃，运载皮毛之类的各种落后运输工具，自迪化至塔城络绎于途。塔城原有俄侨的民族成分有斯拉夫、乌孜别克、塔塔尔及哈萨克人。除哈萨克人外，其余几皆经商，此刻皆已取得中国国籍。



苏联驻塔城领事馆

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广禄在北京读书六年后路过塔城对塔城留下的印象。广禄此后常年在新疆为官，还做过中国驻苏联中亚地区的总领事，对俄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第一次途经塔城，印象深刻，他的回忆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第一，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塔城的人口增加很快，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3万余人。3万人口中应该包括清朝时期专门从事驻守卡伦、巡查边境的新满营八旗的满、察哈尔、锡伯、索伦诸族的官兵们，他们放弃兵勇生活后或经商，或归农，但都以塔城为依托，成了发展经济力量的组成部分。塔城满城空置的兵营，废弃的住宅，或许就是他们留下的。3万人口还包含了进入民国后大量来塔城谋生的内地汉人，他们有的垦荒务农、种菜、经营果园，有的从事手工业及其他服务行业。3万人中还应该包括被缴械安置在塔城的白卫军败兵及其眷眷。

第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新疆省政府为避免波及，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政策，巴克图口岸暂时关闭，但民间贸易未断，人员的往来也未断绝。1920年5月，中国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伊宁临时局部通商协定》，中苏双方互派商务兼交涉员，沟通双方商品交换规则，虽然不是正式通商，实际上中苏贸易已经开始恢复。但由于原先不平等的通商章程业已废止，原居贸易圈内的俄商们失去特权保护，加之被他们视为经济支撑的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也缴本停业，为寻求新的保护，原有俄商大都加入了中国籍。1924年，中苏两国又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苏联在塔城设立了领事馆、商务处、苏新贸易公司等管理商务的部门，巴克图口岸畅通，苏籍商人在政府支持下大量进入塔城，贸易量大增。1931年，苏联土西铁路建成后，从阿亚古斯编组车站，径直到塔城不过200千米，物流、人流更加繁盛。因为新通商协定的签约是在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进行的，此时的口岸、海关才真正发挥作用，商贸往来双方人员都须照章完税，从而为国家，也为塔城地方争得了利益。从此，中国本土商人才有了与俄商平等竞争的条件。

第三，由于苏俄内战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俄国货物进出口还是受到严重影响。即使在正式开关恢复贸易之后，俄国商品的种类花色与以往相比也大为减少。借此机会，中国商人适时地加入进来，迅速填补了俄商留下的空缺。这一机遇造成了两种现实，一是塔城的中国商人数量快速增加，他们不仅在满汉两城之间形成汉人的市场，而且在原来专为俄国人开辟的贸易圈洋巴扎内，也有了汉人、

回人、维吾尔人，“洋华杂处”，形成嵌入式居住格局。二是打破了俄货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商品进入了塔城市场。1920年白卫军串扰塔城事件获得解决之后，塔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汉族商人数量、经营规模逐年增加和扩大。后来，知名的汉商就有64家。他们一般经营日用小商品和生活必需品，货物大都是内地生产，从迪化、陕甘甚至更远的内地转运而来。他们除经营商业外，多数还兼营畜牧皮毛业。大商人养羊上万只，小商人也有数百只。苏联与新疆恢复通商，一些汉族商人开始和苏联进行易货贸易，即用畜产品交换苏联的工业产品。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汉旅行商往来于塔城和裕民之间，用畜产品换取苏联的日用品。在众多汉商中，有8家资金雄厚，规模大的资本金几十万元，小的也有数万元，俗称塔城汉商“八大家”。

但是，这些还是没能改变塔城浓郁的欧化色彩，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联在塔城的影响日渐强大，欧化倾向反而逐渐加重。这也说明，开放的门户一旦打开，它的影响就会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这从一些名人的笔记文丛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亚洲探险家，他先后5次来华。第五次是1926年冬天，他原本是受德国汉莎公司的委托，来开辟欧亚航线，准备作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但在考察筹备期间，就受到了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因为经过“五四”精神的洗礼，中国知识界的现代意识及

民族精神已经开始觉悟。经过谈判，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炳昶教授分任中瑞双方的团长。这是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探险。因为交通上的缘故，斯文·赫定等人曾数次往返于迪化和塔城之间，并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塔城的记载。

斯文·赫定第一次到塔城是1928年的5月初，他是准备经塔城转乘西伯利亚的火车去德国。来到塔城，刚好碰上发洪水，被阻塔城4天。据赫定描述，这次洪水很大，从塔尔巴哈台山上下来的大水冲了塔城县的田园大地，城市的整个西部地区都被水淹没。有不少骆驼遭到水淹，有120多间房屋倒塌，还淹死了两个人。但这次大水却未见别的资料上记载。1928年9月，斯文·赫定返回中国，再次途经塔城。这次他在塔城滞留的时间更长，不是因为洪水，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新疆的督军杨增新被人刺杀了，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没有特殊许可不准进入迪化。

由于时间久，便有了与官员交往的经历。除对塔城外观的初步印象外，当时塔城官员和官场的陋习给斯文·赫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眼里，时任塔城道尹的李钟麟身材矮胖，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圆鼓鼓的红脸上眯缝着一对小眼。赫定的人物素描确实抓住了特征。因李钟麟的外号就叫“李蒙古”。接着赫定对李的性格做了交代，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他诙谐幽默，是一个天生的滑稽角色。他乐观、热忱、善良，甚至不愿去伤害一只苍蝇。他会说俄语，但又说不好，可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滑稽可笑，简单明了。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一位酒场高手。他喝酒招数奇多，花样翻新。赫定是这



塔城市的俄罗斯民居

样介绍第一次饮酒情景的：“我们被请到客厅的一张小桌旁坐下，桌上摆着烟、茶和瓜子，紧接着送来了酸黄瓜和永远也喝不完的伏特加。按照当地的规矩，即使你不喜欢这种饮料，出于礼貌也要‘干杯’，因为主人向你敬酒时已作出了榜样，李道尹充任这一角色确实够格，他不停地向大家敬酒，还极富感染力地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并断言自己是新疆酒龄最长的酒鬼。”

斯文·赫定在塔城滞留了近一个月，虽然他说自己从不与饮酒无度的人一起喝酒，可为了行事方便，他不得不去，他感到，“宴会”一词几乎就是饮酒的代名词，不靠别人帮助将酒一饮而尽，被认为是对主人的礼貌。席间，各种酒令进一步刺激了酒的消费量。例如把一根火柴固定到盒子上点着，在座的人将盒子一人接一人地顺序传递，火柴在谁手里熄灭，谁就被罚喝酒。赫定激愤地认定这很无聊，并且没有义务向李道尹表示特殊的礼貌，因此绝不多喝一杯。从斯文·赫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当时塔城的生活情景：工作散漫，办事拖沓，生活环境沉闷，大家只好在漫无节制的狂饮中虚度时光。从吃酸黄瓜和无节制地豪饮伏特加细节看，这大概是受到俄罗斯人和草原游牧人群生活习惯双重影响而形成的本地特色。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中国著名文学家茅盾慕名前来新疆工作。期间曾携友西游，前往塔城观光览胜。他将旅途见闻、亲身体验写成《西北行》。此书第三章谓《塔城之行》。那是1939年秋，茅盾一行在迪化雇了一辆俄式马车，一路颠簸到塔城。在塔城期间，茅盾先去参观了塔城电报局、邮政局、军政机关及苏联领事馆，他觉得塔城“商业及市场极为发达，具有近代化都市的优点，而且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气象”。据茅盾《西北行》记述，当时塔城还有个俗名叫“白鸥城”，缘由是每年都有从北方来此度夏的大批白鸥，沿塔城的河水飞行。茅盾旅游考察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地理形势和战略位置上来说，塔城是个极重要的地方。”塔城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这座城市建筑和风气，有浓厚的欧化风味。”所谓欧化，就是俄罗斯风情。这就是进入民国之后，塔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的情境与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结盟之后的几年，发展迅速，变化也较之以前显著，以致让茅盾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气象”。而“这座城市建筑和风气，有浓厚的欧化风味”，既是传统，也说明了苏联对塔城影响力的增强。茅盾是第一次来塔城，以他文学家的敏锐和洞察力，他的记述应该是准确和到位的。

二、白俄败兵串扰塔城及苏俄新领事遇刺事件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少数旧俄军人组织反革命武装，其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旧军队反动军官和哥萨克富裕阶层。最先打起白卫军旗号发动叛乱的是前临时政府首脑、俄军最高统帅克伦斯基，他在十月革命爆发次日即下令军队向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进军，但很快被平息。1918年3月起，英、法、美、日、德等国干涉军先后入侵苏俄，并策动各地反革命势力发动叛乱，向苏维埃政权发起全面进攻。在白卫军中，兵力较强、装备较好的是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军队。1918年11月，高尔察克在额尔齐斯河中下游的鄂木斯克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并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至1919年春拥有40万军队。他们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集结力量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由于他们打着代表被推翻的沙皇政权的白旗，以区别于苏维埃的红旗，因此这伙旧俄军人被称为“白俄”、“白卫军”或“白党”。苏俄红军则称其为“白匪”。

苏维埃红军自1919年4月底开始的反攻和其后在东方战线的总攻，粉碎了高尔察克军队。白卫军残部在苏俄红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退向中俄边界。为了挽救失败，他们派人来到塔城，想把驻塔城的中国军队诱骗到苇塘子驻防，为白俄壮声威。同时与塔城道尹汪步端协商，通过签押投诚中国，暗中破坏苏俄革命。起初，因白卫军代表诱以优厚条件，道尹汪步端颇为动心。但省长杨



巴尔鲁克山脚的铁列克提



巴尔鲁克山野巴旦杏林

增新对此却洞若观火，一日数电塔城，条分缕析，严命汪步端严守中立，不越雷池一步，坚决不上当。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白俄又提出借道塔城，从伊犁进攻德扎尔堪特（萨马尔）的红军。其用意十分明显，以借道为借口，乘机占据伊塔地区作为根据地与苏俄抗争。此后又屡次要求新疆当局出兵，夹击苏俄。日本、英国也极力怂恿，都遭到拒绝。后来，白军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一败再败，在俄境内已无立足之地，又被红军追击，纷纷逃到新疆边境。幸亏新疆督军杨增新颇有远见，预案在先，早有布置。1919年12月，派战斗经验丰富的团长张健率兵进驻塔城，加强了塔城的防卫力量。张健是个颇有能力见地的军人，他对杨增新的谋划心领神会，关键时刻还能因地制宜，对塔城沿边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严加防范。但由于边境线太长，处于边境的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沟壑纵横，入口太多，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仍然无法阻止白俄入境。

为了加强防卫力量，张健经过杨增新同意，从当地厄鲁特和土尔扈特蒙古牧民中招募两个营的骑兵，同时又在哈萨克牧民中招募一批。这些蒙、哈青壮年人人自备马匹，只要将他们组织起来，稍事训练，便可成军，并且具有明显优势：“长于驰驱，精骑射，明地势，适气候，且防范俄人即使保卫自家牧场，故皆乐于效力”。有了这批民间武装，塔城边防得到了有效防卫。与此同时，新疆当局还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以便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白俄依照国际公法，解除



裕民县境的吐尔加辽草原

武装后方可入境，以免苏俄军队越境追击，否则不仅自身难保，还会祸及新疆。白俄方面穷途势单，只能同意条件。

1920年3月以巴奇赤为首的白俄败兵在塔城边防部队的监督下解除武装后进入塔城，共计有11000多人，战马9000匹。但他们的武器并没缴完，只是把一些破损或残缺的枪支上缴充数，而将一部分精良武器和弹药偷偷藏在山野里。战马仅上缴4000匹。另外随败兵入境的还有白俄家属及难民5000余人。白俄败兵被安置在额敏南山一带，每人每天配发白面750克。难民则被安置在奇巴拉克什，免费每人发给10天口粮。这些人虽是败兵难民，但都是在情非所愿、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解除武装的。从他们私藏武器、少缴战马等行为可以看出都不是安分等闲之辈。加上这些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又久经战阵，有统一的指挥，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时候，塔城驻军加上两营新增派的援军才有兵力3000人，而且兵弱械腐，缺乏训练。因此，败兵们入境给塔城的社会秩序乃至主权都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在败兵被安置之后就逐渐显现出来。

当时塔城的农业生产水平也就是自给有余，猛然间增加这么多人口，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粮食，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当局只好临时动员居民百姓捐献一部分，缺少的部分就靠从迪化等地赶运。为了安置处理这些不速之客，塔城当局颇费了一番周折，既要派人去外地拉运粮食，又要动员百姓协助修筑简易住房，或挖地窖，搭盖窝棚，帮助难民过冬。那些败兵更是困难，因为没有灶具柴火，还得让当地群众把口粮加工成熟食，再分发下去。而对1500多名军官的安置则

采取将他们分散安排在当地蒙古、哈萨克部落内部，让他们与遴选出来的一些有爱国心、有使命感的牧民家庭同住，每个毡房分配3人，不仅食宿都得到了解决，还使他们受到有强烈责任感的牧民们的管控。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塔城地方官员和群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得到善意对待的白俄败兵，不仅不心存感激，反而借端生事。败兵首领巴奇赤这时仍以大国将军身份自居，准备在塔城的沙俄贸易圈设调查员，实际上是想搞清在塔城可供利用的兵源及财产情况，以圆东山再起的好梦。他们的要求立即被塔城方面严词拒绝。塔城当局义正词严地警告败兵们：你们是战败后逃到中国避难的，我们讲人道，才根据国际公约让你们入境。你们来到中国就应该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怎么能再派人搞什么调查，这和你们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新任塔城道尹的张健不仅批驳了白俄的无理要求，还在贸易圈内设立了警察所，把失去多年的警权收了回来。

塔城当局的严正警告对败兵们并没产生多少影响，有些败兵在边境地区到处流窜，肆无忌惮地抢劫当地群众的财物，有的去串联组织，准备进攻红军。当时社会上正流传着日本准备援助白俄的消息，消息传到塔城，败兵们像打了强心针似的活跃起来，他们偷偷挖出原来秘密埋藏的武器弹药，准备暴乱。幸亏张健事先得到了密报，从南湖把埋藏的枪支弹药提前挖出来，主谋暴动的军官安东诺夫闻风逃往阿山。暴乱阴谋败露后，对塔城败兵震动很大。塔城当局乘机疏导动员，加上苏俄在杨增新的交涉下向境外白俄发布了赦免通告，有4500多名官兵回国，部分难民也陆续离去，但仍有5700多名自卫军和一些难民及家属留下来。

前面的败兵还没送走，新的败兵又到了。1920年10月，由胜系克率领的千余名自卫军也要求按照前例进入塔城。但入境时仅缴出武器90余件，其余全埋藏在山野里，张健按照杨增新的电令，将他们安插在锡伯图。胜系克根本



額敏县境的巴依木扎山口

不把国际法及塔城官军放到眼里，一到锡伯图就派人串联，与奇台的白俄首领阿连阔夫取得了联系，准备于第二年元月暴动。由于藏在山间的武器被张健的密探发现，暴动流产。3月，胜系克又秘密招募兵丁，筹集武器，企图南下攻占迪化，也被张健侦破，收缴了武器，并逮捕了白卫军败兵骨干一百多人，胜系克漏网逃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初，以诺为阔夫为首的2000余名自卫军也败退到中俄边境，企图在塔城北山口入境，张健得讯立即率骑兵三个营及部分蒙哈骑兵沿北山一举布防截堵。5月中旬，巴奇赤派人为诺为阔夫引路，把他们带到塔城南面的巴尔鲁克山区防守薄弱处。诺为阔夫见这里守军极少，就公然违背国际公法，拒缴武器，强行入境，涌入额敏地区与巴奇赤会合，总兵力接近万人。

由于有了诺为阔夫的支持，一度沉寂的巴奇赤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又嚣张起来。他们聚集在塔城，抗拒苏俄政府召其回国的命令，与科布多、库伦等处的白俄遥相呼应，谋图通过暴动夺取北疆，建立一个新的反苏基地。为此，巴奇赤在败兵和难民中广泛散发传单，声称要经伊犁、乌苏、绥来（玛纳斯）东进迪化。他们通过秘密串联组织，积极为暴动作准备。同时他们还不断和塔城当局捣乱，借口败兵无衣无食，要求道尹张健接济银票4000万两。这在当时的新疆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自然不可能得到满足。巴奇赤又怂恿部属抢劫贸易圈中俄商的财物，并危及中国商人和居民，还要求在原领事馆驻扎军队，以便为他们转运军队，积存粮食。当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白俄匪军图穷匕见，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威胁，给塔城乃至全疆造成空前的危机。在这种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塔城当局以白卫军公然违背国际法为由，不再对他们进行庇护，要求杨增新同意红军入境追剿。新疆当局通过与苏俄政府协商，应允了红军入境追捕的要求，一旦白匪被歼灭或出境，红军部队立即退出。

1921年5月24日，苏俄红军1800人的精锐部队从苇塘子经巴克图进入塔城，在塔城守军的引导配合下，直扑额敏河南岸的白卫军。几经激战，数次起伏，终于将祸乱塔城数年、给塔城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白俄匪军赶出塔城。在驱逐白匪的战斗历程中，塔城驻军和蒙哈牧民与红军紧密配合，或守卡巡逻，或监视控制参与堵截，或带路导向，或探听传递消息，协同作战，打败白匪，彻底清除了匪患，为保卫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中亚和西伯利亚边区。新疆近在咫



额敏县境的乌尔喀夏山

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波及，新疆与中亚地区的关系也成为中国与苏俄关系的一部分。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追随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持对立立场，受其影响，塔城与苏俄的官方贸易一度中断。

1918年后，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他们根据自身需要，亟须与新疆地方当局建立联系。当时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是：一是引渡俄旧领事及领署官员；引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犯和敌人；引渡和遣返白俄败兵军官和难民，避免在邻国边境地区形成反苏武装和反苏基地。二是开通贸易往来，弥补和解决因国内革命造成的经济困难；在伊犁塔城等地设立商务机构，派驻商务代表，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往来。

新疆方面关心的问题是：废除中俄间形成的不平等条约，重新建立平等的通商条约，收回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权利，挽回庞大的对外贸易损失。

时任新疆省长兼督军的杨增新是个务实派人物，通过对局势的观察，他断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必定为取胜一方，而白卫军的失败不可避免。但作为地方政府，又不能公然违背中央的指令，面对俄国新旧两个政权的关系，他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既不违背中国中央政府的要求，与旧俄势力保持礼节上的互通信息，同时对其不合理要求也一概婉拒；而对新党苏俄，则以新疆大局为重，务实地与他们进行往来。

俄国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当即颁布明令，剥夺沙俄政府驻华公使及领事职权，并于1918年4月由其外交委员会任命国里贺为苏俄驻塔城第一任领事。不久，国里贺带领随行人员和卫队计25人到塔城巴克图口岸要求入境进驻。新疆地方当局秉承北京政府之命，以“尚未奉有中国政府明令”为由，要求国里贺“暂



传说中的樊梨花点将台

里贺。国里贺没能等到新疆当局的答复，就被刺身亡。苏俄方面闻讯即派代表赶赴巴克图边卡欲与塔城当局交涉，又遭多罗布哲夫纠集的白匪袭击，死伤多人，酿成事端。

如果说杨增新将苏俄委派的新领事拒之门外是秉承中央政府的旨意，而塔城边卡国里贺遇害一案却与时任塔城道尹的汪步端有关。汪步端是塔城最后一任参赞和第一任道尹，万里求官来到新疆，却又自视清高，属旧式文人，好诗词歌赋，塔城任上曾写有《一笔勾》数首，书写其怀才不遇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同时对塔城当地民俗民风多有讥讽贬斥。或许是日久生情，他对从未谋面的新派苏俄殊无好感，而对老派的旧领事多罗布哲夫多了几分宽容。正是在这位道尹的纵容下，多罗布哲夫才来去自如地完成了对苏俄新领事的刺杀和对苏俄交涉代表的袭击。为此杨增新直言训斥汪步端：“是俄人国内战争，与中国无干，万无派兵越境助战之理。”并在呈北京的电文中恼怒地说：“该道尹可做官可不做官，断不可将塔城之事办坏！”为此，他只得把好惹祸的汪道尹调省，改委能干且服从的张健任塔城道尹兼团长。后来，在杨增新授意下，张健遵命调度斡旋，始终用国际公法作交往的尺度，在与中央政府意见相左的情况下较好地处理了与苏俄关问题，为此后和平睦邻关系打下了基础。

1919年7月，苏俄鉴于争取国际空间的外交需要，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声明废除帝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领事裁判权及帝俄时代攫取的一切特权，并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商谈建立友好关系。宣言发表后，引起巨大国际反响，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为表示诚意，中亚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纷纷派代表与新疆地方当局举行会谈。同时，苏俄谢米巴拉金斯克军事当局代

请从缓”。国里贺为完成使命，在塔城境外苇塘子住下来，坚持要求入境，僵持达两个月之久。5月26日，国里贺再次致电新疆当局，恳请允许他到塔城任职复命。此时，盘踞在塔城的沙俄领事多罗布哲夫也不承认失败，仍一如从前颐指气使，对苏俄派出的新领事耿耿于怀，终于按捺不住，竟派人出境刺杀国

表扎罗根军长到塔城巴克图要求与塔城当局会谈。由于苏俄方面的频频示好，中国政府对苏俄态度开始转变，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1920年5月苏俄与中国伊犁方面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据此，1920年7月，伊犁、塔城先后设立税关，对苏俄商民征收进出口税。侨居当地的俄籍商民都表示，情愿向中国政府纳税。1924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换文，同意在对等的条件下，互设领事馆。新疆在谢米巴拉金斯克设总领事馆（1931年改为塔什干），在斋桑、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等处设领事馆。苏联在迪化设总领事馆，在喀什、伊犁、塔城、承化等处设领事馆。不久，中国与苏联又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国同意在原沙俄驻新疆领事馆的旧址上设立苏联领事馆。1925年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开馆，地址即在沙俄领事馆旧址（现塔城宾馆东侧），占地1.77公顷，建筑面积1929平方米，共有办公房舍49间，住房31间。院内绿树成荫，参天蔽日。从此，两国进出口贸易、社会文化交流均走向正常，并取得了与邻国平等的权利。在这一背景下，塔城与苏方的政治文化交流和商务往来日益频繁，对塔城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影响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

三、东北义勇军由巴克图进新疆和归国华侨的安置

1931年，苏联的西土铁路延至中亚小城阿亚古斯。阿亚古斯与塔城的距离为200千米，这在地域广袤、地广人稀的中亚算不上一个很远的路程，但却将塔城与苏联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了。这不仅方便了塔城与苏联方面的联系，中国内地官员、商旅从塔城进出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其中从塔城巴克图入境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东北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与日寇作战

进新疆，历时数月，总数达3万余人。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军队开始发动了吞并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为使国土免遭沦亡，东北三省爱国军民组成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搏杀。高潮时期，抗日义勇军一度达到40万之众。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抗日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给予了沉重打击，让日、伪军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但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由于决策者们过于看重城市的攻坚和固守、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不利、补给援助不能及时到达等诸多原因，加之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到1932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义勇军抗战活动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之下难以为继，各部连续遭到失败。到当年10月，抗日部队骤减至6万人。其后，义勇军剩余的成建制部队，除一部分化整为零，分散开来继续打游击，陆续并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迫先后越界退入苏联境内，总人数包括家属在内，共计4万余人，他们大都分属于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不同番号的各抗日武装人员。

抗日义勇军残部进入苏联后，即通过苏方与国内取得联系，要求原路返回，继续抗日。后经反复磋商，终于传来消息，国民政府决定，让这批历尽战争磨难的东北军人和家属假道西伯利亚，从新疆回国。路线是：伯力—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之所以选择由塔城进入新疆，是因为苏联的铁路已修到阿亚古斯，这里距中国的口岸城市塔城最近，是进入新疆最便捷的途径。

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先乘火车或汽车从远东的伯力穿越整个西伯利亚，来到中亚小城阿亚古斯，再由阿亚古斯进入中国边境城市塔城。在苏停留期间，苏联政府为了表示善意，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或者留下居住。但出于抗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为数不多，一些报名留学留居的人员，听说义勇军被允许回国后，不少人重新加入了回归的大军。

从伯力到塔城，最困难的就是阿亚古斯以东的最后200千米道路了。当时虽然已经进入2月，但在西伯利亚和中亚，正是冰雪覆盖的严寒时节，朔风透骨，呵气成霜。这样的气候环境，对这些长期被劳顿和营养不良折磨得个个面黄肌瘦、羸弱不堪的归国队伍，真是雪上加霜。起初，苏军曾试行动用一定数量的车辆运送，由于道路太滑和四周的积雪太厚，这些车辆根本无法前行。在车陷于深

坑不能前进的时候，官兵们只好下来推车；但由于个个都长期体力透支和营养不良，不少人就此倒在了车下，再也没有起来。

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只好使用原始的畜力。于是就出现了绵延数千米、数十千米马拉爬犁（雪橇）、牛拉爬犁、驴拉爬犁甚至是狗拉爬犁的奇特队伍。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所以他们一路上都是忍饥挨饿挺过来的。

天气变幻莫测，极寒时温度会降到零下四十多度；饥寒交迫，每天还要在齐腰深的积积雪中艰难跋涉，这样每天只能走十三四千米的路程，路上时刻都能听到倒下去的人的呼唤声和活着的人的哭喊声。从各方面史料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显示：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除少部分留在苏联定居，约有近万人死于返国的途中，其中的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到塔城这最后200千米的艰难旅途中倒下的，坚持下来的约有3万多人由塔城的巴克图口岸进入国门。

得到东北抗日义勇军要转道塔城回国抗日的通知后，塔城行政公署立即组成了“接待办事处”，全力筹备组织接待事宜。在政府的动员下，深明大义的塔城各界人民群众，不分民族、不分穷富、不分行业，都积极组织起来，纷纷为义勇军捐钱捐物，准备皮衣、皮帽、皮靴、毡筒、棉衣等物品和食品，短短半个月，仅捐献的物品就装了满满三座仓库，还准备了吃住所需和洗浴设施。2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中国驻中亚总领事广禄和塔城官员率领塔城各界代表赴巴克图边卡等候迎接义勇军。此时的塔城虽然仍是一片冰雪世界，但塔城各族人民的热情，却让这些在异国历尽苦难屈辱的抗日义勇军将士和他们的亲属立刻感受到了祖国怀抱的温暖，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双方见面之后，大家都相拥而泣。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了祖国！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祖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省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号啕大哭；少数官兵趴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在从巴克图赶往塔城市区的路上，场面更加动人：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市区10多千米路的沿途，全程都是欢迎的人群，就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行列之中。途中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



行进中的义勇军将士

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抛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汉族民众大都是作揖握手，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克尔柯孜等少数民族群众则鼓掌欢

呼，妇女儿童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两旁，高呼着“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的口号。

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清洗干净装进衣柜的新衣服，从老人到孩子又全都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将士。他们兴高采烈地牵着被分配到自己家中安置的义勇军战士，拿出最好的被褥，让出最整洁的房间让他们居住；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就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争取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这景象让才踏上祖国土地的义勇军将士们真正感受到边疆人民的淳朴真挚和中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

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地方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从接到新疆省府正式通知算起），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副爬犁可以乘坐5~8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接近1万人，按照最保守的一个家庭3口人推算，等于每家都捐献了一床被褥还

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抗日义勇军除由李杜、王德林所部吉林自卫军 1500 人应伊犁屯垦使张培元请求由霍尔果斯边卡进入伊犁驻守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从塔城入境然后转往迪化等地的。也有一部分就留在塔城及塔城沿途的额敏、乌苏等县。后来还有一些被重新由迪化派来塔城工作或自行来塔城谋生。从 1933 年 2 月底到当年 8 月，在半年的时间里，从巴克图入境由塔城接待的抗日义勇军将士和家属总计达 3 万多人。义勇军进入塔城后稍事休整，当地民众又筹措各种交通工具将他们运往省城迪化。当时塔城全县人口仅有 3 万，在短时间内安置接待、运送如此众多人员，塔城全县人民，每个人都付出了努力，堪称贡献巨大。

抗日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即投入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维护社会安定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动，为消弭愈演愈烈的马仲英骚扰、平息才发生的“4.12”政变所产生的社会动荡，产生新的军政机构、维护新疆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影响。后来，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据当时中央政府的指示，留在了新疆。

1934 年 10 月，留在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 9 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 4 个边卡大队。还有一部分被充实到政府机关的各个机构。从此，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由于抗日义勇军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新疆的经济、文化、社会及各项事业也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统一、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对长期饱受“内忧外患”之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贡献背后，有着塔城人民的付出。

就在东北义勇军的经巴克图入境之后，塔城又迎来了一批被苏联政府遣返回国的华侨及他们的俄罗斯籍家眷、亲属人员。1931 年“9.18 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出兵侵



从苏联携妻小回国在塔城定居的华侨

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还把兵锋指向我国华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不断派遣日伪间谍刺探情报，寻衅滋事并频繁利用日伪军在边境地带进行武装挑衅。苏联政府为防范日本人对远东地区的渗透，在加强远东军事防范力量的同时，对该地华侨及其亲属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开始通过强制手段将他们连同其俄籍亲属迁往中亚地区或遣返中国。

苏联远东地区是华侨较为集中的地方，他们大都来自中国山东、河北及东北等地，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沙俄政府在我国东北地区招募的开发远东的青壮年贫苦农民。他们通过繁重的劳动，为俄国远东边区开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通过辛勤劳作换回了些许积蓄，并在当地娶俄罗斯女子为妻，生儿育女，安家立业。他们大都是本分的劳动者，十月革命期间，许多华侨参加了红军，有的甚至为苏维埃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月革命后，他们拥护革命政府，奉公守法，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然而苏联政府不顾正义，仅仅因为他们与伪满洲国境内多有亲属关系且外貌又与东北的日伪军相似，就歧视怀疑整个华侨群体。从1932年到1933年，有1万多名汉族华侨和他们的亲属被分批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地区。当时苏联已实行集体化，在迁到中亚后经营资本被剥夺，稍有不服就会遭到逮捕和迫害，生存困难，难以为继。当时新疆地广人稀，劳动力十分缺乏，借此机会，他们在中国驻中亚领事馆官员的动员下，不少人辗转来到中苏边境，分别从伊犁霍尔果斯和塔城巴克图入境。根据省政府要求，塔城设立了安置委员会，不少人被就地安置在塔城所属各县，以塔城、额敏为多。

1937年，苏军以“搜查特务”为名，将远东地区大批华侨关进集中营，财产被没收，青壮年则被当作“特嫌”人员押往西伯利亚地区做苦工。同年6月，当地苏维埃政府又根据苏联当局的指示，作出关于凡是汉人，无论其国籍、职业、



随父母回国定居塔城的闫振东一家

地位、党籍如何，一律强制遣返中国的决定。由于当时中国的东北、华北均被日本占领，经过协商，苏联政府遂将1万多名汉族华侨和他们的俄罗斯妻儿亲属分批运送到哈萨克斯坦，再经巴克图和霍尔果斯入境进入新疆。

据当时的塔城官方统计，从1932年至1938年，经巴克图入境回国的华侨计有1万多人。他们先是在塔城所属的城镇、乡村安家落户，以后或投亲靠友，或另投他地，分散到全疆各地；还有的辗转回到了内地老家。但是他们当中的有相当一大部分，连同东北义勇军中的一部分人，就此定居塔城。当时的塔城地广人稀，主要经济生产均为畜牧业。归国华侨们多年在国外求生存，生存适应能力很强，并都学有一定的谋生技艺：经商、制革、制鞋、纺织、缝纫、铁匠、铁皮匠、木匠、理发师、装裱匠、钟表修理、粮食加工、面点制作、面包烤制、糖果制作、烧酒、烧石灰、酿啤酒、制冰激凌、泥瓦匠、建筑师，样样手艺俱全，其中不乏能工巧匠。正是他们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塔城手工业的发展进步，也推动了塔城商业的繁荣。

由于这些归国华侨在国外生活多年，在文化和生活习俗诸多方面都受到俄罗斯影响。他们的到来，也使塔城原有的多元文化特点更加突出，使原有的俄罗斯情调更为显著，开放的心态更加自如。

四、苏联影响下的文化教育与政治氛围

1933年后，新疆的对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此前，尤其是清朝时期，沙俄秉承一贯扩张政策，蚕食中国领土。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又爆发了席卷南部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沙俄乘中国内忧外患之机，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勘分西北界约，侵吞了属于新疆的中国大片领土。此后，仍恃强逞贪，不断攫取中国新疆的领土及经济利益，给新疆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和巨大损



20世纪40年代塔城俄罗斯农家生活场景

失。鉴于他们一贯恃强凌弱的传统，新疆人民对近邻俄国素无好感，包括对取而代之的苏俄政权，也一直存警惕之心。但 1933 年后，新疆对这个邻居态度却发生了一个 180 度的转弯，即由对苏联的怀疑、防范变为亲密和崇敬。

1933 年 4 月 12 日，新疆发生政变。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被逐出迪化，出奔塔城后宣布下野，并由塔城出境转经西伯利亚前往南京。就在新疆政局糜烂，权利出现真空的时候，早有准备的盛世才以进入新疆的东北义勇军为基干力量，伪装进步，取得了苏联信任，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苏联甚至直接派出 2000 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巴克图入境，以阿尔泰“归化军”（白卫军等俄罗斯人加入中国籍留在新疆组成的部队被称为“归化军”）名义袭击围困迪化的马仲英部；以“塔尔巴哈台归化军”的名义直接从伊犁边境入境攻击张培元部，由此击败受国民政府支持的竞争对手马仲英和张培元联盟，于是盛世才登上了新疆督办宝座。由于盛世才是靠苏联起家，因此在此后的行政中，各项工作都以苏联为楷模，处处学习苏联，向苏联看齐。在他的领导推动下，新疆一改以往对俄国、苏联的防范、怀疑、拒斥态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亲苏倾向。

后来，也因为这种因素，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结盟，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制定了反帝、亲苏，实行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并不断推动贯彻实行，从而使苏联在新疆的影响不断强化，苏联的政治观念，苏联的行政方式，苏联的经济、文化、社会运行模式，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堪称深入人心。从盛世才与中共结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 1942 年（1942 年 4 月 12 日盛世才炮制“4.12 阴谋暴动案”，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是新疆民国时期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塔城情况尤其要好），特别是在金融、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及教育等方面近代因素的明显增长，开创了新疆现代化的先河。从经济角度看，这一时期新疆经济的开发，从资金、技术、和途径上与过去 2000 多年以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开发相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政治方面看，在政治方略的制定到施政方针、措施的推行实施，也有了质的发展。

在所有这些方面，塔城都走在了前列。不可否认，所有这些，是与苏联在资金、技术方面的援助，在人才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而塔城能够处处领先，其优势也恰恰与其同苏联的边界相连、口岸相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塔城地处新疆西北边境地区，与苏俄山水相连，又有巴克图口岸近距离相接，历史上就有割不断的联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生活习俗，受俄国影响之深，在新疆各地可谓首屈一指。如今在盛世才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其影响力自然更加深入和透彻。纵观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十余年间，塔城地区接受苏联影响最突出的应该体现在文化、教育和生活习俗方面。

第一，从教育方面看。塔城属于传统游牧地区，教育没有地位。自1764年建制以来，满、汉、索伦、锡伯等官家子弟，只有私塾、义塾，主要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供幼儿启蒙，年龄稍长并具备一定理解能力的学生则用“四书”、“五经”为教材；而哈萨克、维吾尔、塔塔尔、乌孜别克等信奉伊斯兰教民众子弟则去清真寺院开办的经文学校，学习阿拉伯语教授的《古兰经》和宗教诗等。晚清至民国初期，因为塔城定居人数大增，加上清政府推行新政和教育受到重视，官方开始设立学校。1902年，塔城参赞衙署设立第一所正规学校——养正学堂，吸收满、汉、蒙、哈等各族子弟入学。1905年，养正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1910年，时任塔城直隶厅抚民同知



1941年4月塔城县维吾尔族女子学校的教师（前排右2为赛福鼎·艾则孜）

的任兆观在塔城的南街设立了一所官办识字学塾；同年，又在东门外北大街设立官办汉语学堂，用以促进塔城民众的文化学习，以便提升人们的汉语文化水平。此时，教学内容也增加了一些与当代社会相关的新课程。民国初期，由于国事纷乱，协饷断绝，为数不多的官办学校停办。1914年后，新疆杨增新政权逐步巩固，停办学校陆续恢复。

塔城教育真正走出低谷，步入快速发展期，是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之后，社会持续了长期和平与稳定。1922年，塔塔尔女教师古兰丹姆还在塔城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古兰丹姆是位优秀的塔塔尔族女性，1888年出生于俄国喀山，自小热爱教育事业，她希望女孩子也能受到教育。1911年，她从俄国来到塔城，开始了她的教书育人的生涯，当时的塔城地广人稀，加上经济文化落后，多民族聚居，搞教育困难重重，古兰丹姆费了很大的力气，也只收录了少数的几位女学生。她在家里给学生们教文化课、绣花及缝纫等手工艺，限于条件，难以开展规模教学。1914年，应吐鲁番进步人士玛合苏提·穆辉提的邀请，古兰丹姆与丈夫穆哈毕勃拉一起到吐鲁番阿斯塔娜从事教育工作，丈夫接办了汉地海达尔·沙依然创办的学校，古兰丹姆仍在家中办学，给村里的女孩子传授现代知识，



1934年塔城县师范学校师生合影（前排右4为古兰丹姆）



1942年3月8日塔城维吾尔族女教员合影（第二排中为古兰丹姆）

受到群众的信赖和尊重。1921年，古兰丹姆的丈夫穆哈毕勃拉不幸病逝，学校失去穆哈毕勃拉的支撑，在当地宗教势力的挤压下被迫关闭。这时古兰丹姆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因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贫困。她决心重新回到塔城，在那里开办学校。

当时的塔城，由于与苏联交界，加之长期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古兰丹姆归来后，受到群众广泛欢迎。在当地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租赁房屋，筹集经费，购置教具，正式创办了新疆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古兰丹姆学校。办学初期，共招收了学生60多人。古兰丹姆根据学生的年龄层次和不同的文化基础，将她们分成3个班级，分头授课。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等文化课和绣花、缝纫、编织等工艺课。为应付社会宗教势力，每周还开设两节经文课。但内容不是天堂、地狱，而是着重讲文史、道德。学生每年暑期进行学年考试，地点是塔城的人民公园，由校长主持，邀请社会名流和家长参加。考试前先报告学生在校的操行和学习情况，然后进行考试，当场公布考试成绩，最后展出学生作业和绣花、缝纫、编织等学生手工艺品。

由于吉兰丹姆的教育内容新颖，方法独特，易于被社会接受，受到群众普遍好评，因此，教学规模发展很快。到20世纪30年代，学校已由建校初期的几个教员、10个学生发展到20多名教师、300余名学生、分7个年级的规模了。

1924年，从原塔城官府新满营退出归民的有识之士创办了一所旗民学校，招收学生40余人，皆为满、蒙、锡伯、索伦等各族子弟，学校为学生讲授满文和汉文。1929年一批接受过俄罗斯新式教育的维、哈知识分子共同创办了一所托冉学校，有学生120多名，开设的语言课程有哈萨克、维吾尔、俄罗斯语文，还配有汉语教师。因受苏联影响，他们开始的课程中已经有数学、自然、地理、历史、卫生，稍后又增设了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教育的课程。

1933年后，盛世才政府聘任大批苏联各方面专家充任政府顾问，在各个方面都学习苏联模式。同时，一批曾在苏联工作过的联共党员及进步人士，包括东北义勇军中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都先后被吸纳到新疆各级政府。在苏联和这批进步人士的影响和导向下，新疆政府出台了“以民族为形势，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教育政策，大力推行各民族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如前所述，塔城与苏联近距离相接，教育方面原本就有优势和基础，如今又有政府政策推动，自然如虎添翼，推行起来更加迅捷。一些官员的重视也加大了对教育文化发展的推力。如塔城教育局长何语竹，曾帮助盛世才制定政策，是盛世才的同学和老乡，他担任塔城教育局长自然会竭力推行盛世才的教育政策。东北义勇军出身的塔城行政长的赵剑锋，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他亲自劝学，号召富裕阶层捐款捐物出资办学。为推动塔城社会办学，他首先拜访了乌孜别克商人乌龙巴依，向他说明兴学育人的重要意义，动员他捐资办学，培养本地人才，造福乡里。由于赵剑锋平易近人，而且乐于同各族各界人士交往，口碑很好。因此，乌龙巴依非常痛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慷慨地捐出活羊500只。赵剑锋指定专人负责建校，很快工程告竣，被命名为乌孜别克学校。学校开学典礼时，赵剑锋特地将塔城、额敏等地的各族巴依和头面人物请来观礼，乘机表扬宣传乌龙巴依捐资办学的事迹。上行下效，参观人员回去后，纷纷效仿。新疆民众反帝总会塔城分会下属的各族文化促进会也大力宣传动员并积极出资，不久就办起一所塔塔尔学校，一所哈萨克学校，一所汉回学校及两所规模较大的中学。接着，在额敏，裕民也相继兴办了一些学校。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时之间，区县政府、各族文化促进会、民族上层人士及有志于教育的社会贤达，都倾力推进教育事业，

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连偏僻的农村也办起各种形式的识字班、扫盲学校以及家庭学习小组。各校在校学生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利用寒暑假时间，成立“先生队”到各家去劝学，使读书识字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学校多了，需要的教师也多，从而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进入塔城从教。如曾在塔城工作过的赛福鼎·艾则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扎克洛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哈吉耶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一批有苏联留学经历的青年，都在当时塔城的学校当教师。扎克洛夫还曾担任过额敏维文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为培养师资，塔城又办起了教师训练班和简易师范班。赵剑峰离开塔城时，全地区（包括牧区）共兴办学校79所（公办21所，各族文化促进会办58所），在校学生4962人。

由于当时教师队伍大多有俄国或苏联教育背景，其中有的学校，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也都参照苏联，包括曾在塔城任行政长的赵剑峰也是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进入新疆的，因此可以说，彼时彼地，苏联的影响无处不在，影响着教师，影响着学生，同时也通过他们，影响着整个塔城社会。

第二，从文化方面看。自清末到民国以来，塔城受俄国商民的影响熏陶，社会风气一直比较开放，人们对不同种族人群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习俗，包



1944年由苏侨协会修建的莫洛托夫学校，1976年改为塔城四中



抗战期间任塔城行政长官的赵剑锋

括衣食住行，大都持一种宽容态度。在宗教信仰上也是如此，各有各的信仰，各拜各的偶像，但互不干涉，尊重他人。由于塔城与俄国的多年交流，俄罗斯文化在塔城已经有了深厚基础，只是在一定政治社会环境下进入休眠状态。在新的条件下，在苏联新式教育、文化的刺激下，俄罗斯文化又以新的形式复苏，体现在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全新的氛围中，塔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风气。一是报刊书籍的出现。受苏联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后塔城就出现的报刊，进入30年代，塔城印行的报刊达到10余种，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创刊于1925年的《我们的呼声报》、

《新新疆杂志》、《新疆日报·塔城版》等。前两种属于社会个人办刊，如《我们的呼声报》系学校内的教师创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进入盛世才统治时期，受到鼓舞，该报社又创办了《新新疆杂志》，有文艺作品，有对苏联的宣传介绍，还有的涉及对新疆当政者不满的内容。这些报刊主要用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文字出刊，没有汉文版，其影响也主要局限在塔城各民族文化教育界的小圈子，影响力比较弱。真正形成规模且影响力强大的是创办于1936年初的《新疆日报·塔城版》，该报有专门的办报机构新疆日报塔城分社，有专门的采编机构和工作队伍，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出版，辟有国内外新闻、本地消息、时事漫谈、国际要闻、孙文学说、卫生小常识等30多个栏目，其中有大量宣传介绍新疆六大政策、宣传介绍苏联主张和各项新成就的内容，是向塔城人民灌输推介盛世才政府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也是塔城官员和民众了解各方面信息的重要渠道。该报直到1945年三区革命爆发后才告停刊。据当时的《新疆日报》刊文介绍，塔城分社出刊的报纸版式合理，印制也较为精美，每逢有重大事件，总有社论加以点评导向，明显高出其他分社。

以报社为阵地，它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进步知识分子，如报社的社长兼总编杨河林就是一位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当时在报社工作的赛福鼎、扎克洛夫等都受到过他的点拨、重用和庇护。而这批后来成为新疆栋梁之材的年轻人，都为塔城当时的教育文化进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而言，塔城的电影放映也出现较早。电影设备及影片都是苏籍商人、领事人员从苏联带来。内容自然多为介绍苏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纪录片或故事片。起初，电影放映规模很小，1928年苏联商人雇佣塔城本地人开辟了临时放映厅，设有200个座位，主要放映苏联纪录片。1939年，由汉族商人从内地带来5部国产影片，放映的范围逐步扩大。1941年，塔城汉族文化促进会从苏联购进电影放映机，不定期放映电影，从此电影开始走向大众，成为社会民众学习和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

与此相适应，塔城的歌舞、话剧等文艺形式出现也比较早。20世纪30年代中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新疆反帝会总会在迪化成立，各行政区相继成立反帝分会。随后，反帝会辖属的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纷纷成立。1936年，塔城也相继成立了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文化促进会，进行各种文化活动。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有戏剧演出（京剧、河北梆子等）、歌咏比赛、舞蹈表演、社火表演以及话剧、歌剧等。各文化促进会的成立和活动的开展，促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了各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社会各阶层不少有文艺特长的人走到一起，成立了演出队，参加文艺活动。1942年哈萨克、维吾尔教职员剧团即开始排演话剧，塔城汉文会则首次举办了热闹非凡的歌曲、话剧、歌剧会演，演唱的歌曲主要有《八百壮士》、《光明之路》、《中国童子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名曲；演出剧目有《活捉日本鬼》等抗日题材作品，还有当时只在大城市才能排演的《雷雨》、《日出》等名剧。话剧、歌剧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在遥远的边陲小城上演，与苏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他几个文化促进会，如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乌孜别克文化促进会、俄罗斯文化促进会也积极参与竞争。他们长期受俄罗斯文化熏陶，对话剧、歌剧更是熟悉和贴近。于是，他们中的话剧、歌剧爱好者自制道具，自带服装，很快推出了小话剧《九·一八》，内容是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由于剧情好，演员投入，在塔城民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各界人士交口称赞。紧接着维、哈文会又演出了一台大型话剧《血迹》，反映的仍是东北军民英勇抗日的故事，再

次受到欢迎。后来，他们又接连排演了《光荣的胜利》、《未受邀请的客人的礼物》、《阿娜尔古丽》、《尔喜玛拉那》、《半吊子医生》、《克孜吉别克》、《塔伊尔与左赫拉》、《四个调皮鬼》等 20 余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使演出队的水平迅速提高。1942 年，维文会演出队还排演了世界名剧《一仆二主》，各族群众争相观看。苏联领事馆、苏新贸易公司还分别邀请演出队为他们进行专场演出。演出之后，连苏联领事馆这些对话剧艺术形式非常熟悉的人也连连称赞“了不起”。这种文化氛围还培养了一批话剧爱好者，催生了一批业余剧作家。例如，当时一边在报社当编辑、一边教书的赛福鼎利用业余时间写起了剧本，有一些还被搬上舞台，像维文会演出的《九·一八》、《未受邀请的客人的礼物》等就是他的作品。

上述会演、演出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所有上述歌咏、舞蹈、戏剧、电影以及报纸杂志等文化传播方式，既开辟了人们了解外部社会、学习新知识的窗口，又传播了新的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中华民族全民参与的爱国主义社会氛围，对塔城社会所起到的教育影响作用是非常显著和有益的。

教育和文化本来就是互相作用、密不可分的，教育影响文化，文化也反作用于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教育的作用影响下，抗战期间，塔城社会充溢着一股清新纯正的民风，一经动员，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就空前高涨起来。此时地处西北边陲的塔城各族人民，虽然远离抗战前线，没有直接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但他们具有反抗外来侵略、不甘受辱、心向中华的爱国主义传统，始终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积极支援抗战，用特殊的方式为中国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7 年 9 月，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发起了抗日救亡活动。号召新疆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战的胜利贡献力量。为加强对救亡活动的组织领导，还成立了“新疆抗日救国后援会”。塔城人民积极响应号召，立即成立了抗日救国后援会塔城分会，迅速在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场史无先例的运动中，塔城民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进行自上而下的广泛动员，开展社会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前线。从 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9 月的 13 个月中，全疆共收到各地区后援分会的捐款达 24 亿 1705 万两省票，还有大量的金银首饰、银圆、车辆、金表、银表等物，总计折合大洋 60 多万圆，

新疆用这些钱购买了 10 架飞机，送往抗日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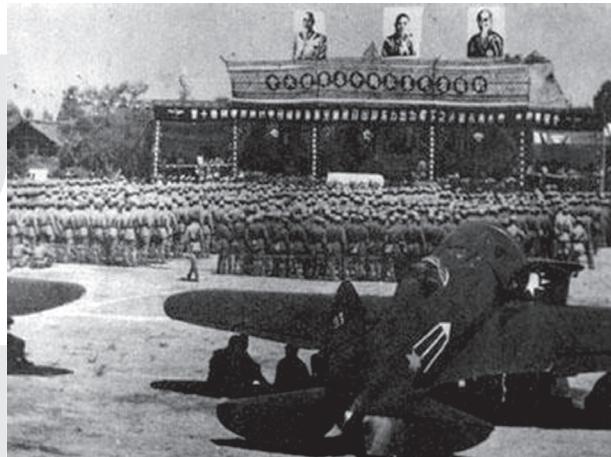
在这批捐款中，塔城捐献的比例很大。1938 年 10 月和 11 月，塔城人民又积极参加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和各族文化促进会等单位发起的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运动和三日献金运动。全区各县都搭起了

献金台，各族各界人士闻

风而动，纷纷走上献金台，慷慨解囊。在募捐献金活动中，各族人民异常踊跃，都心甘情愿地为抗日尽心尽力，仅塔城妇女界就捐献省票 300 多万两。其他行业人士也不甘示弱，额敏县的利顷成、马文德、阿不都阿孜等商户捐款都在省票 100 万两以上，最多的达 200 多万两。由于这项活动合民意，顺民心，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很快就形成一股热潮，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在社会的感召下，塔城监狱的 36 名犯人自动请求减食，要用省下的伙食费为抗战尽一份心。

从 1939 年起，在塔城反帝分会的领导下，抗日捐献成为一项经常性活动。这年，仅塔城额敏蒙古族同胞的捐献就有两大笔，一笔是以额敏县蒙古族同胞名义的捐款，包括大元宝 6 个，280 余两，省票 121.5 万两。另一笔是额敏蒙古族 10 个苏木的捐款，包括黄金 1 两、金戒指 1 枚、大元宝 27 个、省票 915 万两。这些数目只是全区各族各界捐款的一部分，但管中窥豹，从中可以看出塔城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关切。从此之后，塔城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更加高涨，募捐运动开展的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从行政长公署、公安局、县政府、土产公司、林业局、工商会、农牧局、报社、民众俱乐部、中小学、各族文化促进会，以及工人、市民、农牧民，自上而下，全都积极参加了抗日募捐活动。当年底，塔城区还开展了“文化劳军活动”，共收到各类捐款折合大洋 11263.1 圆，这只是月底统计数字，有些县份因为路程较远，捐款数额没有计入。

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1943 年塔城的抗日捐献再次掀起高潮，1 月 12 日，塔城地区召开“文化劳军献金大会”，大会号召各族各界人士以加倍的力量，



“新疆”号飞机

募集更多的款项支援前方抗战将士。募捐开始后，向大会捐献的人络绎不绝，有官员、公职人员、商人、工人、农牧民、学生，他们有的捐现金，有的献金银首饰，有的献马、驼、牛、羊，仅1小时内，就募集现金及牲畜等物折合新省币4万多元。会上还宣读了省政府对依干尔地的嘉奖令。依干尔地是本地商人，他一人独自捐款新省币5000圆，成为献金大会的模范人物，受到参会民众的敬慕。

为保捐献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献金大会之后，塔城反帝分会和妇女协会即着手组织了男女宣传队23个，奔赴全区各县城乡开展文化劳军募捐宣传活动，其中仅第八队就募集钱物折合大洋1228圆。至当年2月底，塔城地区各族人民共捐献文化劳军款项达新省币10万多元。同年6月，沙湾县宣传队在城乡开展“鞋袜劳军”宣传活动，仅两天的时间就收到群众捐献的鞋袜200双，完成了本县分配数额的70%。在“鞋袜劳军”运动中，一位居住在巴尔鲁克山深处的哈萨克老人艾克阿吉特地赶到裕民设治局参加“鞋袜劳军”大会。会上，老人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今年已经六十多了，已不能上前线了，乘这个机会，我想把分给裕民全县的鞋袜一个人承担下来，以尽我一片爱国的心意。”说完，就叫家人立刻飞马回家取款，双手捧到募捐台前。在他的带动下，捐献活动异常热烈。裕民设治局、土产公司办事处、警察局、哈萨克文化促进会、俄罗斯文化促进会，民众俱乐部等机关单位也纷纷踊跃捐款。在玛依勒和扎伊尔山交汇处的庙尔沟，一个哈萨克族地方士绅因病重不能参加大会活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生前最喜欢乘坐的骏马捐献出来，供前方抗战将士使用。

为积极支援抗日前线，1943年9月，新疆开展了“一县一机（飞机）运动”。塔城区积极响应，当即成立了塔城区“一县一机运动”劝募委员会，并着手开展组织动员工作，沙湾县县长亲自带领剧团，深入农村和牧区进行募捐宣传。乌苏县就在财神庙的献金台前搭台演出，为募捐创造气氛。在劝募委员会深入广泛地宣传鼓动下，各族人民群众克服自己的困难，尽自己所能，慷慨捐款，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完成了所分配的购机款额，随后，捐款仍源源不断地汇往塔城劝募委员会。在捐献过程中，有不少人出手大方，一片赤诚，如独山子油矿一位工人一个人就捐献省币5万多元；沙湾商人徐宝贵、张国发两人每人捐献大洋1000圆；和丰的乔加甫亲王等人捐献大马50匹。另外，沙湾县的小学生还为“儿童号”、“学生号”飞机捐献大洋1000圆。由于他们的义举，一县一机运动开展得异常顺利，塔城地区各县捐献的款额都超过了分配数。当时塔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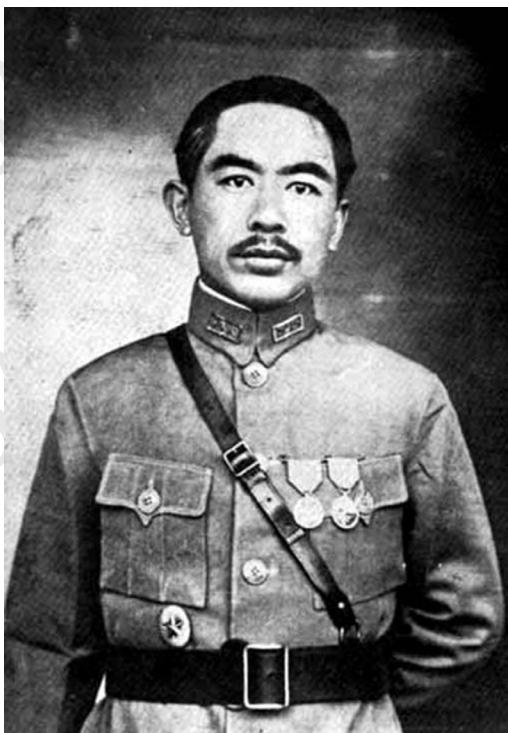
全区共有人口 17 万，分配的购机数额是 6 架，塔城 1 架，额敏 2 架，沙湾、乌苏各 1 架，裕民、和丰各 1 架。实际完成数量：乌苏 4 架，塔城、沙湾各 3 架，额敏 2 架，裕民和丰各 1 架，共 14 架，超过分配数额的 1 倍以上，在全疆名列第三。1944 年 3 月 4 日，《新疆日报》上刊载了题为《塔城一周》的专文，翔实地报道了塔城各族各界人民群众踊跃为抗日捐献的动人场面和感人事迹。1944 年 7 月，额敏县的牧民又献马 320 匹，支援抗日前线。

除捐献钱物之外，塔城各族人民还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铺筑和维护了从迪化经巴克图通往苏联的长达 400 多千米的境内国际通道。当时，苏联及国际上的许多援华物资及军火就是经塔城运往抗日前线的。塔城人民在修筑和养护这条国际通道时，往往是自带工具，不拿一分工钱。沿途的群众还为运货的苏联司机无偿提供食宿、引路、通行护送等方面的服务。抗战期间，远离战场，地处大后方的塔城各族人民就是通过捐献钱物、修筑维护国际交通线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真情，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尽了一份力。

由于塔城地处极边，人们说起塔城，往往会把它与胡天塞草、亘古洪荒以及闭塞落后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但是，看到塔城 20 世纪 30 年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看到当时塔城的城市格局和社会风貌，尤其是抗战时期塔城人民的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度自觉，就会发现，塔城与内地很近，一旦哪里有事，它都随时可以和内地人民携起手来，并肩战斗；塔城也不落后，早在抗战时期，它已经有了遍及城乡的政治社会组织，如民众反帝联合会、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抗战后援会等，社会动员便捷有力，组织功能周密细致，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政治暗昧时代，步入了现代政治文明轨道。应该说，这与当时与苏联的密切接触有关，与当局的推动有关，最根本的是，这与塔城各民族多年来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形成的开放的文化、开放的胸襟有关。

五、民国末期塔城社会的动荡与萧条

盛世才主政新疆后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行进步的六大政策，客观上给当时的新疆带来了一股新风，极大地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盛世才的所作所为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新疆人民的福祉，而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个人在新疆的地位。为此，在统治新疆的十余年中，先后炮制多起



1933 ~ 1944 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

力地支援新疆。更何况，国民党政府经过多年隐忍，已经做好准备，开始经营新疆。国民党势力正步步紧逼，新疆兵力根本无法阻止；而新疆内部，由于盛世才的独裁政治，政治上冤狱遍地，经济上物价飞涨，整个社会怨声载道，阿山（今阿勒泰）更是已经燃起了反抗盛世才武装斗争的烽火。种种现实，迫使他必须作出抉择。

1942 年秋，盛世才经过权衡，公开倒向国民党政府，抛弃了六大政策，由亲苏亲共摇身一变为反苏反共，彻底撕下进步伪装。从 1943 年起，大批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陆续进入新疆与盛世才一起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他们在政治上残酷迫害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滥杀无辜；在思想上大肆进行反动宣传，灌输反共反苏意识；在经济上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把新疆各族人民推向死亡边缘。这时，经文化启蒙和过抗日救亡运动洗礼的新疆各族人民终于看清了盛世才的本来面貌。他们为了求生存、得解放，纷纷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他们有的还建立了地下进步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愤怒的岩浆堆积太多，总有一天会喷发的。早在三区革命爆发之前的 1939 年，

所谓“阴谋暴动案”，用以迫害他的政治对手及潜在的和假想中的形形色色的敌人。由此遭监禁和牢狱之灾者先后达 10 万之众，其中有 5 万人遭到杀害或迫害致死。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应对德国法西斯的凶猛进攻，已不能给盛世才更多支持，一方面要求在新疆扩大开采石油及钼、铍等战略物资，另一方面要求盛世才政府还债，而且必须用牲畜、皮毛等实物偿还，这让盛世才感到屈辱和受损；同时，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也处在空前的困难之中。一贯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苏德战争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不能预料何时结束，即使能获胜，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有

盛世才政府下令强行收缴牧民们用于生产和自卫的枪支，就已激起了广大牧民的普遍的不满。阿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城、迪化、阿克苏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旨在推翻盛世才统治的秘密组织，并爆发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而此时盛世才毫不掩饰的暴行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怒火。一种岩浆喷发式的反抗，已经蓄势待发，一经触碰，即可喷涌而出。盛世才对这种危机应该是心知肚明，因此他不断扩充军队。就在1944年的夏天，省政府又下令，要牧区人民捐献军马10000匹，以扩充骑兵，有马的缴马，没马的缴钱，而所收款价又高出市场马价的一半。这一重负主要落在了伊、塔、阿地区贫苦农牧民身上，这更激起了三区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恨。献马运动成了人民起来进行武装反抗的催化剂，反抗情绪迅速增长。正是这次强征的“军马捐”，成了三区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从而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三区引发了一场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熊熊烈火。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民族宗教因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这种反抗呈现出难以驾驭且易于被利用的不可预知性。

盛世才利令智昏的反苏反共政策对内在新疆引起强烈反弹，对外则遭到

了苏联的更为激烈的反应。由于新苏关系的恶化，驻哈密的苏军红八团被要求限期撤离中国，大批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也纷纷撤离回国，通过软硬兼施的挤压，苏联的军事、经济势力短期内全部撤出了新疆。一度成为新疆重要经济支柱的新苏贸易也被迫中断，曾经人流如织的巴克图口岸顿时冷落起来（实际上塔城边境地区的民间贸易并未完全断绝，只是数量减少），新苏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以笔作枪的杜别克·奴尔塔扎·夏勒恒巴也夫

为对盛世才实施报复，苏联开始周密计划对策。在军事上，莫斯科主要采取策划以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为特征的武装行动，作为组织上、军事上的先期演练；在思想上，苏联的方针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据当时在塔城任副专员的哈吉耶夫回忆，新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一度曾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苏联式社会主义，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由于当地少数民族不接受这种宣传而没成功。后来，苏联改为利用当地的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情绪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民国卷）。苏联在北疆大规模号召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是从1943年开始，那时在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及其他一些鼓动少数民族群众反抗政府的维吾尔、哈萨克文小册子等印刷品已经大量从塔城、伊犁等地的边境口岸和山中的出入口运进新疆，这些报刊和印刷品不断发出鼓动、声援和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斗争的文章。1944年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新疆解放”等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精美的传单在当时的新疆是无法印制的。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印刷宣传品中，传播最广、影响颇大的是一种专门针对伊斯兰教信奉者的传单，它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民族和宗教为口号，鼓动他们反抗中国政府，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民国卷），并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和地下组织。由于盛世才倒行逆施而点燃的民间反抗怒火，加上苏联周密、有针对性地组织推动，新疆的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国民党当局看到了这种局面，为了缓和形势，也为了直接控制新疆以避免盛世才反扑，于1944年9月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命国民党元老吴忠信主政新疆，可惜为时已晚。而且，原先的省军因盛世才的去职而群龙无首，指挥乏人；国民党军甫经入新，立足未稳，人地生疏，这一时机恰好为革命者提供了掀起武装暴动的大好机会（《新疆三区革命史鉴》）。同年11月7日，伊宁的维吾尔、哈萨克民众在伊宁“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并迅速控制了伊宁市区，随即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并组建了“民族军”。这一肇始于伊宁，迅速遍及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称之为“三区革命”。

吴忠信主政新疆后，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释放被盛世才滥押的人士；二是宣抚地方；三是敦睦邦交，即与苏联搞好关系，和睦相处。当时人们把这

三项措施称为“治新三板斧”。1944年10月，吴忠信组织了六路宣抚队，分别由民族上层人士带队，分赴天山南北去安抚牧民百姓，宣传政府治新方针，防止革命运动的蔓延。到塔城宣抚队由蒙古女亲王乔嘉甫带队，同行的有塔城新任专员平戎和原专员赵剑锋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塔城、额敏、和丰等地。所到之处，给牧民发放了茶、糖、布匹、小麦等物，广施恩惠，用以笼络人心，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只是这时伊犁革命已经爆发，其势如烈火，吴忠信的这些措施已于事无补了。

宣抚活动结束后，平戎随宣抚队一同留在塔城，走马上任担任塔城专员。当时的塔城，全区共有人口17万余人，其中哈萨克族10万有余，维吾尔族1万余人，其余为汉、回、锡伯、达斡尔、俄罗斯、满族等。盛世才统治后期，他捕押了大批富商地主、部落头人以及行政官吏和知识分子，造成冤狱林立，埋下了反抗的火种。平戎到任后，塔城的局势日趋紧张，境内的游击队活动频繁，国民党两个团的守军由于分散各地，防不胜防。当时活跃在塔城境内的游击队主要有以下几支：

一是热波夫游击队。1943年9月，塔城县警察局派人到农牧区征税。一些征税人员乘机敲诈勒索，胡作非为，激起了当地村民的不满。征税人员在克孜拜提征税时与村民发生激烈对抗，村民在俄罗斯人热波夫鼓动组织下，杀死了征税人员，并夺取了他们携带的枪支弹药，逃到塔尔巴哈台山上打起了游击。第二年5月，队伍已发展到93人。后来，这支队伍又会合了吉木乃游击队的力量，活跃在塔城、额敏一带，打击国民党军队。1945年秋，游击队转移到果子沟，与列斯肯领导的伊犁游击队会合。当年4月，热波夫游击队被改编为“三区”民族军第三骑兵团二营。

二是艾比湖—玛依勒游击队。1945年2、3月间，巴依坎杰串联了一批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人来到玛依勒山区，组织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活跃在山区的交通沿线，时常袭击和骚扰国民党驻军。国民党军队为消灭这支游击队，几次进行清剿，都被游击队凭借熟悉的地形避开了。国民党为镇压这支队伍，给当地的一部分牧民发了枪支弹药，妄图利用牧民们保护自己的牲畜草场的心理打击游击队，没想到牧民们不仅没向游击队开枪，反而把枪支弹药都送给了游击队。国民党赔了夫人又折兵，游击队却得到扩充和壮大，队伍发展到700余人，参加了进攻庙尔沟、雅马图、托里、额敏的战斗。1945年8月，被改编

为民族军第六骑兵团。

三是裕民游击队。1945年，巴勒哈什和贾和达等人奉塔城“解放组织”的指示，到裕民队牧区宣传革命，很快组织起了200多人的游击队，在裕民一带活动出没，打击国民党军队和警察。

四是买买提尼亚孜·哈里游击队。由买买提尼亚孜·哈里于1945年在塔城发起组织的以职业高中班学生、社会青年为骨干的地下游击队，队员达60多人，每人都配发有枪支弹药。他们的任务是以公开的身份为掩护，暗地里袭击敌人。

五是依敏诺夫游击队。依敏诺夫，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45年5月初，买买提明·依敏诺夫在沙湾北面的小拐一带，利用在水利工地担任技术员的身份，秘密串联群众，组织当地青年，袭击了当地的国民党警察局，缴获步枪30余支，组成了游击队。后来，他们来到乌苏至塔城的公路沿线一带活动，时常以袭击军车、破坏公路等方式袭击和骚扰国民党部队。1945年9月，这支游击队加入了民族军。

凡事都有两面性。巴克图口岸及沿边境的山口在通商及文化交流方面曾给塔城带来便利，然而这时也为反政府人员接受境外支持提供了宽松环境。上述活跃在塔城的各游击队，在人员培训、武器装备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苏联驻塔城领事馆的具体指导。正是在这种有针对性的支持下，他们袭击警察、破坏公路、攻击国民党驻军的分数据点，打得赢就打，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时，就越界去苏联境内休整或补充军需。就这样，他们不仅能够时常袭击和骚扰国民党驻军，以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而且时刻关注着敌人的各种动向，把塔城的情况向三区的军事部门报告。

面对如此局面，专员平戎也想有所作为，但他在对局势的台前幕后的真实情况有了认识之后，自知无力回天，所有工作只能是做做样子。于是平戎便整天和一群官僚混在一起，吃喝度日，有时还要打打牌看看戏，以示从容。对于一日三变的紧张局势，省城迪化没有可派的援兵，他除了向上报告情况，就是聊尽人事地予以应付。

1945年5月，塔城游击队派人向三区民族军总指挥部报告了塔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详细情况。民族军总指挥颇里诺夫等人在得到情报后，经过分析，认为进军塔城的条件已经成熟，便于7月宣布了总指挥部关于解放塔城的命令，并进行了具体的军事部署。1945年7月上旬，三区民族军从赛里木湖东岸出发，

直插塔城，在各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攻势凌厉，势如破竹。7月21日控制了庙尔沟，24日占领托里，28日包围了额敏县城，民族军兵临额敏城下，派人进城劝降，遭到驻防守军的拒绝。29日民族军将县城团团围住，开始攻城，经过4小时激战，城墙被炸开一个缺口。民族军立即发起总攻，29日下午攻入城内，占领了县城。守军率残部突围，县长焦焕成率部分官员投降。

额敏被攻占后，塔城通往外地的交通被切断，孤立无援，一片惊慌。29日，民族军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塔城南郊，随后又派已经投降的焦焕成率科克尔苏（蒙古族）、瓦依斯（哈萨克族）、马文德（回族）、韩建垣（汉族）、阿不都阿克·沙哈尔（塔塔尔族）5位有名望的人士去塔城劝降。条件是：一塔城即刻缴械，不杀人；二各机关官员如回内地，可派汽车运送，士兵可以解散；三愿留当地者听其自由；四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攻城。30日下午，三区民族军分别抵达博孜达克、莫因塔、巴斯拜大桥，从三面包围了塔城。专员平戎虽知抵抗无望，但也没料到民族军的行动如此迅速。传说属下向他报告额敏战况时，竟然找不到他们影子，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和太太在戏院听戏。平戎接到额敏劝降人员报告后才着急起来。他立即将塔城驻军指挥徐克义找来，向焦焕成详细询问额敏被攻克的经过及细节，随后又召开了军政警等机关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平戎介绍了额敏被占领的经过及民族军派人劝降的情况，让大家献计献策。民族军兵临城下，塔城危在旦夕。平时作威作福的政要们，到了危急关头，各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竟无一人发言。最后，海关关长王良说话了：“看来抵抗是没把握的，向迪化撤退去路又被切断，又不能缴械投降，最好是向苏联领事馆交涉，借道苏联退往南疆。”王良说得也没把握，语气中带着询问，似乎只是想打破沉闷，没想到他的一段模棱两可的发言竟成了这次紧急会议的主旋律。平戎当即派专署外交科长王大冈去苏联驻塔城领事馆交涉，其他人员便在会议室坐等交涉结果。经过数小时焦躁不安的等待，终于得到苏联领事馆的答复：可以进入苏联境内，但军人、警察必须向苏军缴械。进入苏联境内的全部中方人员只能作难民对待。军政头目听说后，都默不作声，最后，还是平戎拍板：接受苏联领事馆的条件，去苏联避难。

1945年7月31日凌晨，平戎带着一群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军警党政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余人涌向巴克图，途中又有不少汉族人无奈地加入其中，出逃队伍不断扩大。刚出城不远，国民党驻塔城骑三团的两个民族连（内有一骑兵机枪连）

在连长阿不都哈德和阿不拉汗两人的领导下宣布起义，他们率领 200 多名官兵拨转马头去迎接已经包围了塔城的民族军。平戎等人更加惊慌，也顾不上对付起义的官兵，急急如丧家之犬，慌不择路地向巴克图逃奔。一到巴克图，军警人员便急忙把武器扔在路边，争着向苏联境内拥去。边界附近到处都是武器弹药和花花绿绿的包裹物品，一片狼藉。当天下午，民族军顺利地开进了塔城，胜利的旗帜插满了塔城的大街小巷。

8 月 22 日，国民党盘踞的坚固据点和丰被攻陷，守军团长率残部百余人突围。至此，塔城全区除乌苏、沙湾外全部被三区民族军占据。

民族军占领塔城之后，塔城专署及各县革命政权相继建立。1945 年 8 月 6 日，三区临时政府召开会议，任命裕民大巴依巴斯拜·雀拉克·巴平为塔城专区专员，哈斯木阿洪·司马义也夫和苏联顾问满素尔·肉孜也夫为副专员，阿不力米提·哈吉也夫为秘书长，在新疆学院受过共产党人影响的哈萨克进步青年杜别克被委任为专署社会科主任。从 8 月初开始，塔城专区所属各县县长也先后到任，计有塔城县长吾买尔阿洪、额敏县县长纳扎尔别克·吐尔斯、裕民县县长哈勒德拜·哈那皮亚、和丰县县长宫青喇嘛、乌苏县县长那斯尔丁、沙湾县县长沙比提·布瓦哈吉。为了巩固政权，塔城专署及各县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勤奋工作，他们动员青年参军，鼓励群众捐献款项财产，为军队提供粮食、马匹、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向农牧民推销债券，做了大量工作。仅就经济工作讲，自革命政权建立以来，塔城全区共认购自由公债、胜利公债等各类债券 4 次，计 16.37 亿元（三区期票）（这些公债均不计利息，从发行后的第三年开始还本）；专区地方财政支援军需，现金 2.5 亿元（三区期票），大畜 5000 头，小畜 5.5 万只，粮食 350 万吨，其他物质价值 2 亿元（三区期票）；专区银行发行地方货币 9764 万元；此外还有各族群众无偿捐献的金银、首饰及各类物资价值 14.27 亿元（新省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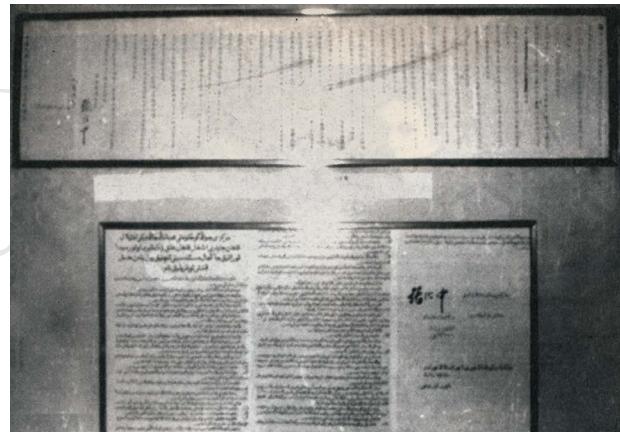
1946 年初，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三区代表和谈成功，组成省联合政府。根据省联合政府的指示，塔城专署和专区保安司令部联合组成接收塔城解放时逃往苏联的军政官员及民众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接收他们分批回国。安全工作由民族军驻塔城步三团和专区保安司令部负责。从 8 月 15 日起，逃往苏联的原国民党塔城专署官员、军警官兵、工作人员及汉族民众分 5 批回国，由塔城步三团和专区保安司令部派人送往绥来（今玛纳斯）。原计划 8 月 23 日即可结束，但

实际上却拖延到9月初，因为返国人员由巴克图进入塔城时，在沿途遭到凌辱和殴打。9月2日，是最后一批出逃人员返回家园的日子，当包括平戎在内的400多名大小官员途经塔城西郊即巴克图口岸至市区一段路程时，却遭到更重的残害和殴打。原专区警察局长孙绍康、副局长克富齐、原驻塔骑三团团长李振声、原塔城保安司令部参谋主任沙开慈等32名（一说35名）军政官员被当场打死。这个事件被当时的新闻媒体称作“塔城惨案”、“有计划的屠杀”。后来，平戎等人被送往省城迪化安置。

据说，吴忠信来疆将平戎和安惠文分派塔城、伊犁两个敏感地区任专员，是这两人姓氏“平安”二字的寓意甚好，希望“平安”两人到任后，这两个地方平平安安，没想到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平戎的表现无疑让老上司枉费了一片心思。

20世纪20年代俄国人在塔城经商的绝对优势被打破后，汉族商人有了与之进行平等竞争的平台。他们抓住俄商受挫这个机会，纷纷来塔城填补空缺，大力发展自己。他们一般经营日用小商品和生活必需品，货物大都是内地生产，从迪化、奇台等地转运而来。他们除经营商业外，多数还兼营畜牧皮毛业。大商人养羊上万只，小商人也有数百只。苏联与新疆恢复通商，一些汉族商人开始和苏联进行易货贸易，即用畜产品交换苏联的工业产品。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汉族行商往来于塔城和裕民之间，用苏联的日用工业产品换取那里的畜产品。到30年代末，塔城国内商业发展迅速，其中仅知名的汉商就有64家，堪称鼎盛。在众多汉商中，有八家资金雄厚声誉良好，规模大的资本金几十万元，小的也有数万元，俗称塔城汉商“八大家”。

甘商“恒丰泰”，商号老板宋紫珩，兰州人，曾担任过专区税务局局长、海关关长和塔城县县长等职。离职后专门经商，经营日用百货和畜牧业，同时收



三区革命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签订“十一项和平条款”正文（复印件）

购羊毛、皮张往苏联交换生活用品，收购羊肠衣发往天津华美公司。在裕民县置有土地上千亩，牲畜三四千头。他的店铺在和平街和平商店处。1945年商号倒闭，财产被没收，宋死去。

津商“文义勇”，由天津杨柳青人许阴卿、李少卿于1935年合资开办，主要经营百货、布匹，也收购畜产品和土特产品与苏贸易。许阴卿当过塔城商会会长，人缘好，生意也兴隆，雇有店员多人，其店面在今塔城市委大门西侧。1945年三区革命时倒闭。

津商“同庆元”，老板是天津杨柳青人温桐轩。他在金树仁时期当过塔城商会会长，经营日用百货，兼营农牧业。现在塔城市博孜达克农场的大部分土地当时都是他的，每年都雇人种地。1945年三区革命时，同庆元商号倒闭。

津商“盟盛和”，店主是杨柳青人孔自成，主要经营茶叶和日用百货。这是在塔城开业较早的一家汉族商号，原址在今塔城市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于1945年倒闭。

鲁商孙贯臣，是从苏联回来的归国华侨。从苏联回来时带回大量资金，后定居在塔城经商，主要是收购畜产品对苏贸易。三区革命时他的店铺被封，孙本人被关押，最后死在狱中。

津商“华丰泰”，店老板是天津杨柳青人李子华。1938年开业。李子华曾任塔城工商会会长。他的商号主要经营日用杂货及布匹、糖、烟、茶等，货色齐全，铺面较大，生意兴隆，因此店员也多。三区革命时商号倒闭，但在三区革命前店主已去西安经商。

津商“明德号”，店主是天津杨柳青人单鉴堂。他的总店设在天津，1935年在塔城设立分店，主要经营布类和日用商品，收购畜产品与苏联进行易货贸易，并兼营畜牧业。其商号原址在今塔城市五金公司第一门市部附近。1945年商号被封，财产遭没收，店主单鉴堂被捕入狱。

鲁商“东吉号”，由山东人王润典、李德明合伙开办。他们两人都是归国华侨，从苏联来塔城经商的。主要收购活畜、皮张、肠衣、羊毛、棉花等农牧土特产品，与苏联进行易货交易。商号原址在今塔城市消防队一带。三区革命时商号被查封。

此外比较有名的汉商还有赵景全、蒋跃光等，其商铺也于1945年后倒闭。塔城的汉商在民国时期兴盛了二十多年。三区革命爆发后，汉族商号多数被查封，财产被没收，商号纷纷倒闭，只剩下少数几家小本商户勉强维持。

在新苏关系“蜜月期”，塔城与苏联的进出口贸易非常活跃，为塔城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盛世才倒戈让苏新关系急剧恶化，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商业贸易首当其冲，到1944年，对苏的贸易往来几乎完全中断，只有民间的地下往来在艰难的环境中苦撑。三区民族军攻占塔城并建立政权后，由于初期实行的泛突厥主义宣传和反汉排汉政策，不少汉、回等族民众纷纷逃离，剩余的也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打压，相关店铺及作坊纷纷倒闭。因此这个群体对塔城经济社会已经无能为力，无法发挥作用。

此时，由于省政府对三区财政供给的中断，加上军事开支浩繁，新成立的各级政府公务人员薪酬也是一笔巨大开支。据《新疆三区革命史鉴》记载，三区军政组织系统庞大，仅地方就设有805个组织、77300多人，约占三区总人口的10%。这个庞大的系统虽然对开展工作有利，但也是个不小的财政负担。另外，乌斯曼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发动叛乱，也在经济上给三区造成巨大损失，除掠走人口，抢走数以万计的牛、马、羊等牲畜外，为平叛增加的费用达130多亿元（新省币）。如此巨额资金，对汉族富裕阶层和各大商号实行没收，成了一种必要的补充，但这也导致这个阶层人员为社会创造财富能力削弱。这个时候，口岸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是向苏联出口换取军需和生活必需品。

武装斗争停止及联合政府成立后，社会趋于平稳，三区与苏联的贸易得到恢复，塔城等地甚至出现了公务人员也参与贸易的情况，但仍没能走出经济低迷的低谷。联合政府破裂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三区一切经费的拨付，三区只能走自给自足的道路。此后，三区与苏联的贸易额度大增，从1946年到1949年，4年中向苏联输送牛13.93万头，羊139.86万只，数量非常可观，贸易权基本为三区政府所控制，塔城的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由专区辖属的“发展公司”。1949年7月，塔城海关成立并开展工作，这一年仅上半年就对苏联出口小麦1.2万吨。包括其他物品，总值达11230万卢布，每人平均约40卢布（《新疆三区革命史鉴》），用这些农牧产品换回一批工业产品。为了筹集资金以应对军政开支，三区还广泛动员市民和广大农牧民购买各种债券，其中，仅塔城全区民众就认购自由公债、胜利公债等各类债券4次计16.37亿元（三区期票）；此外还号召民众捐款捐物，如牛、马、羊等牲畜及金银珠宝共计折价142735万元（新省币）。这些负担分摊在仅靠农牧业为生的塔城地区民众肩上，压力可谓不小，从而也抑制了一般民众的物质需求，使整个社会都处于冷清和萧索之中。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巴克图口岸

一、塔城党政机构的建立完善 与口岸的运行及辐射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塔城地区行政事务仍由三区革命时期组建的塔城专署负责运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塔城地区各族各界隆重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并向毛泽东主席发去贺电，表示了塔城各族人民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施政纲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的真诚和决心。从此塔城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3月至7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先后派出干部赴塔城、乌苏、额敏等地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7月17日，在塔城工作的部分党



1956年建成的巴克图边防检查站

员按照分局指示在分局东大楼召开中共塔城地方组织筹建会议，会议确定了六项任务：建立党团组织、发展统一战线、开展社会调查、筹备各族各界代表大会、秋收征粮和培训干部。8月11日，新疆分局电示：塔城地委由张中涛、胡政（五军十四师政委）、乌拉音拜、阿不力米提·哈吉耶夫（副专员）、谢玉田组成，张中涛为地委副书记，塔城地委宣告成立。10月，新疆省人民政府任命巴什拜·雀拉克为塔城专署专员，张中涛为副专员。至此塔城各项工作逐步走向了正轨。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塔城一直控制在隶属于三区革命政府的塔城专员公署手中。由于三区与苏联方面的密切关系，巴克图一直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担负着塔城与苏联方面的商贸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的重大使命。新疆和平解放后，塔城专员公署的行政职责没有变更，巴克图口岸也一如既往地开放通关。当时，因三区与苏方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国对苏联实行的“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塔城口岸各项工作均沿袭原有运作方式，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定的关税税则。与此相关，苏联驻塔城领事馆也如约保存，并继续履行职能。由于中共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困难重重、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粮食、物资、资金各个方面都很匮乏。为了摆脱困难，获得收入，调整了对苏贸易，除塔城巴克图口岸如常运行外，不久又另将裕民县境内的额敏河出境河口地段及和丰县境中苏边界的察罕鄂博两地辟为临时口岸，出口牲畜、毛皮等畜产品，进口我方所需的各类物资。

三区革命时期，由于三区政府对苏联的依附关系，巴克图口岸的进出货物的查验管理、人员通行的往来登记稽查等各项制度措施和程序，都不够规范和完善，尤其人员往来，通道众多，往往陷于无序。为彰显国家尊严和主权，对口岸进行规范管理，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塔城分关正式设立，对巴克图口岸及各临时口岸的进出口货物和过往人员按照章程进行监管。同时在原发展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新疆贸易公司塔城分公司，负责塔城对苏的商务贸易往来。为加强管理，规范程序，1951年4月，关闭了额敏河出口地段与和丰县的察汗鄂博两个临时口岸，从此，巴克图称为塔城地区唯一的对苏口岸通道，口岸体现国家主权的标志更为郑重规范。

1952年7月，巴克图设立边防派出所，次年4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检查站；1954年4月，设立隶属于国家对外贸易部的塔城进出口商品检验处。同年，中国外交部向各驻外领事馆和各地外事部门发文，通告新疆的出入境口

岸总计为 6 处，巴克图为其中之一，其余均为交货点。当时，新疆处在塞外穷边、交通不便的时期，资金匮乏、物流困难、商品短缺是那时新疆的整体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克图被确立为新疆 6 个口岸之一，并且巴克图距塔城很近，面对着的还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带头大哥”，这对塔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推动促进，对塔城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必然是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当时新疆省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确定的《施政方针》，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巩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取得苏联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帮助。那么，通过口岸取得这种帮助，塔城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据《塔城地区志》数据统计，从 1950 年到 1955 年，塔城每年的出口额都在 500 万元以上，1950 年为 666 万元，1951 年为 710 万元，1955 年则达到 921 万元。1956 年是巴克图口岸通商的高峰期，年进口总吨位达 1973 吨。《中共新疆地方史》记述说：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重新开放了霍尔果斯、吐尔尕特、巴克图和吉木乃等边境口岸，为新疆对苏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出口产品最初以畜产品为主，后来增加了矿石等品种，出口额连年增加，1950 年为 2549 万卢布，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1952 年增加到 6257 万卢布，这其中就有着塔城口岸作出的贡献。1955 年成立塔城专区外贸局，管理全区的对外贸易。

与新疆其他地区大体相似，塔城出口的商品也是以农牧产品为主，除一般活畜及毛皮外，更有山羊绒、狐皮、旱獭皮、贝母等名优产品。1951 年，塔城仅山羊绒出口就达 7 吨。与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塔城进口的商品大都是日用工业产品及农牧业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正因为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在那个年代，塔城市场商品相对丰富，人们的穿戴相对“洋化”，生活态度相对开放，整个地区农牧业的机械化程度也相对较高。

因为历史积淀和惯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塔城不仅在对外贸易上能感受到苏联近在眼前的存在，在工作、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能感觉到苏联的影响。如人们对货物的称量单位用“普特”，作息制度与苏联一致，尤其是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学生们使用的教材全是苏联印制的，内容也与苏联完全一致，致使孩子们从一入学就开始这样的课文朗诵：“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我们的首都是莫斯科……”尤为甚者，大约是出于习惯，苏联驻塔城领事馆的官员们亦一如既往地参与塔城的政务决策工作，并仍如三

区革命时期指导工作一样强势、颐指气使。有一次，地委开会决策工作，在大多数委员都赞同通过的情况下，苏联领事别列耶夫（苏联驻塔城第七任领事）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时任地委委员的十四师政委胡政对这种现象已经表示了反对，见他这次依然如故，便忍无可忍地说：“你一个外国人，怎么能干预我们一级党委的工作？”此后，随着我们党的地方组织自主执政意识的加强，这种意识也逐步反馈到苏联领事方面，才逐步杜绝了这种情况。随着国家各项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文化、教育方面的不正常现象也得到纠正。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处处充满积极向上的朝气，人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工作、奋斗，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像苏联一样的工农业生产发达、社会进步、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们的心目中，苏联是楷模，是样板，人们对它的向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里，塔城地委会议上的插曲并没影响领事馆与塔城地方党政领导层的关系，包括后两任领事，一直与塔城地方党政官员保持着友好关系。

鉴于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均由国家设立的外贸公司包揽，外贸局监管，以个人身份从事外贸交易的人数大为减少，加上从内地进入的各色工业产品日益增多，进入塔城经商的苏籍人士也逐步减少，因此，经两国协商，1955 年 12 月



1961 年莫洛托夫中学俄罗斯族七年级师生合影

6日，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关闭，有关业务移交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及1953年成立的塔城苏侨协会，领事馆的不动产无偿交由塔城专署使用。1955年12月，苏联驻塔城最后一任领事落曼楚克·彼得基里洛维奇离塔返苏，结束了俄苏在塔城设领事的历史。

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在塔城驻领事的数年中，塔城保留苏籍的居民不少，与苏方有亲属关系的更多，双方通过巴克图探亲访友的往来很多，过境手续简单方便。在官方，塔城地委、专署与苏联方面的友好交往也很频繁。每逢两国有重大节日或民间传统节日，塔城行署和苏联领事馆都会互相邀请、拜访，共同祝贺节日。据记载，5年中双方共举办报告会、展览会、招待宴会、歌舞晚会、电影晚会及各类游戏比赛等活动37次，参加人数达204000多人次，互访20余次，464人。塔城军分区与苏方边防军也时有互邀互访的友好活动。国家关系的密切和官方的友好合作往来，折射到民间社会，说俄语，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阅读苏联（包括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包括着苏联式服饰（列宁装、布拉吉、夹克衫），结交苏联朋友，一时成为社会时尚，尤为青年人追捧。

新中国成立初期，塔城地区俄罗斯人和苏联侨民较多。俄罗斯人或苏联人比较集中地进入塔城有这样几次：一是沙俄时期在此经商的俄商，长期居住塔城，并加入中国籍；还有一些人遇到俄国内局势动荡，因逃难定居塔城而加入中国籍；二是十月革命时进入塔城的白卫军及家属；三是苏联30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苏德战争时、新疆三区革命时，都有少量苏联人逃到或奉命到塔城谋生和工作。塔城边界线长，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一些人擅自越界，这样的人，在塔城沿边界地带为数较多。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苏侨队伍或说是与苏联有关系的群体。

二战结束后，苏联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巨大人口损失，194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发布了“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1946年2月起，苏联领事馆开始在新疆宣传这项命令。从此，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开始大规模在新疆发展苏侨，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塔塔尔人加入苏籍，并以发放实物和津贴予以鼓励，致使新疆特别是北疆苏侨数量猛增，塔城苏侨数量也从这时大幅增长。1955年，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遣侨请求，希望中国协助遣送部分苏侨回国，参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解决劳动力严重匮乏问题。

中国政府此前已发觉了苏联非法发展苏侨问题，并与苏联外交部有过协商。但鉴于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十分理解苏联政府劳动力缺乏的现状，完全答应了苏方请求。塔城遵照中央指示，当即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办公室”，本着“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遣送”的方针，积极组织实施遣送，经巴克图口岸去苏。从1955年2月开始，分批遣送。第一批多达11600多人。在办理去苏手续时，苏联驻塔城领事馆乘机转告苏联政府通知：可以接受过去从苏联来塔城的非苏籍人员要求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由此申请登记去苏的人陡然增多，其中有很多既非苏籍，也不是从苏联迁来者。到1962年，塔城先后遣送5批，总计5000多户、28049人，其中塔城县1021户、5387人。此后，仍有人陆续离开。被遣送去苏的人员中，有俄罗斯人，还有很多塔塔尔人、乌孜别克人、哈萨克人和少数维吾尔人。由于迁居者人数众多，占到当时总人口的近11%。从此，俄罗斯、塔塔尔、乌孜别克诸族在塔城总人口的比重大幅下降。

二、伊塔事件的发生与处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两国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赫鲁晓夫当政初期，还能对中国采取平等态度，但当他的地位得到巩固之后，就动辄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波匈事件尤其暴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一直以来追求国与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为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此后，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中苏又发生了激烈争论。加上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性格等因素，终于使两国关系不可调和。1960年，苏联片面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同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又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后，苏联越走越远，除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利用他们在塔城、伊犁地区已经形成的历史影响和复杂的民族关系、社会关系，通过其领事馆和苏侨协会，试图重新染指新疆；同时利用中国大跃进造成的普遍经济困难之机，对中国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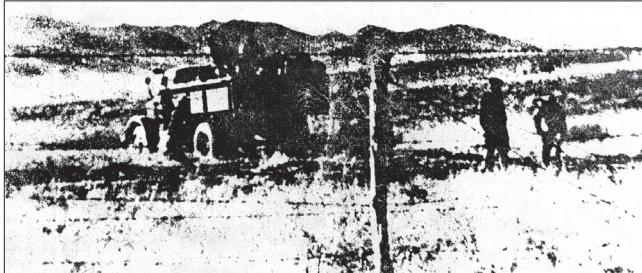


裕民县苏侨协会俱乐部

政策、社会现实进行污蔑攻击，并借助报刊、广播、信函、邮件往来等方式进行渗透，通过散发造假的苏侨证，非法发展苏侨，大量邮寄出生证明、召唤书、探亲邀请信，鼓动塔城居民去苏。

这时候，塔城的领事馆已经撤销，但伊犁的领事却频频光顾。到1962年春，仅苏联驻伊宁副领事迪道夫已经是第七次来塔城了。第一次来塔城是1961年的6月，他们奉苏联内务部指示在这一带地区发展苏侨，顺道去了一趟裕民，与那里的苏侨见了面，还和一些并非苏侨的哈萨克民众谈了话，重点会见了在当地较有影响的6个人，谈话要点就是鼓励大家去苏。前几次迪道夫带来大量由伊宁领事签发的苏侨证，要各地的苏侨协会向市民和农牧民散发，愿意成为苏联公民的，在证件上填上名字就行了。据苏侨协会的人报告，这项工作开展很顺利，苏侨人数已大大增加。这次来塔城，迪道夫担负着更重要的使命，他要在这里搞一场“政治地震”。

迪道夫在接见苏侨协会负责人和骨干，交代布置任务之后，又在主人专门为他们安排的舞会现场发表演说，不加掩饰地利用中国暂时的经济困难煽动群众不满，引诱他们去苏联定居。他说：“我了解到，现在你们的生活失去了欢乐，



越境者上车后苏军在消除痕迹



1962年4月在塔城加曼奇一带边民非法越境

建设。苏联的大门是为你们敞开的。”

迪道夫离开塔城，又马不停蹄地去各县活动，不停地找人谈话，不厌其烦地重复他在舞会上的那番演讲。5天之中迪道夫先后会见了1400人。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百姓并不清楚，但敞开肚皮吃饭吃肉，在这个特别的时期真是太有吸引力了，在添油加醋的传播中，一时之间苏联成了人间天堂，似乎一到那里幸福就会扑面而来，让人们充满了憧憬之情，恨不得立刻就飞过去。迪道夫等人刚走，塔城专署就接到了有500多人签名的联名申请，要求迁往苏联。还有一批自称是苏侨的人到政府去请愿，要求去苏联。专署派人验检他们的证件，发现大部分是非法的。验证人员指出了他们的证件有假，动员他们离去。这些人非但不听，还无理取闹，扬言政府不批准，他们就自己走。其中也有些人大概知道自己的证件来路不正，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悻悻离去，但他们的活动并没停止。一些骨干人员四处煽动，鼓励人们集体越境逃苏。一时之间，从城市到农村牧区，互相串门的人骤然多了起来，从他们紧张又兴奋的神情可以看出，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密谋中。

塔城地区辖境面积达10.45万平方千米，边界线东起和布克赛尔县境内的木斯岛山75号界桩，南到与博尔塔拉交界处的库夏奇沟口266号界桩，公立界桩193处，全长近580千米。在这漫长的边境区域内，高山、丘陵、盆地等各种地

甚至连肚子也吃不饱。可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生活却非常好，牛奶、面包和茶叶敞开供应，需要多少就有多少。你们这个地区的群众，很多都是特殊时期从苏联迁徙过来的，苏联政府还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公民。现在中国的经济一团糟，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我们欢迎你们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形错落交织在一起，地形复杂，沿线共有内外交通的山口 45 处，其中较为易于通行的重要通道 7 处。这些山口或通道大都地形险要、人迹罕至，给防守巡查带来许多不便，非法越境事件屡见不鲜。据邓力群回忆，1949 年月，他从莫斯科到伊犁，只要苏联驻伊宁领事陪同便畅通无阻，因为在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联设有边卡，中国方面没有任何驻军和边检人员，三区方面对苏联根本不设防。邓力群说的是三区革命时伊犁边防情景，那时伊塔一体，塔城边防自然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是兄弟党，两国又结成友好同盟，边境地区虽有驻军，但数量极少，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

1962 年 4 月 9 日，塔城县靠近边境地带出现了零星边民擅自越境现象。苏方发现这些人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遣返，而是用车把他们接走，还在界内的铁丝网上打开了三四个口子，鼓励和引诱边民越境。稍后，裕民、额敏两县靠近边界地区的居民也开始零星出现非法越境人员，有的越境者竟然再次返回，按照对方的宣传口径利诱鼓动更多的人越境去苏。

4 月 15 日后，情况发生剧变，去苏人员已由零星越境发展到成批越境；由夜间秘密越境发展到公开的成群结队地大规模越境。越境者拖儿带女，携带着自己的财产，赶着自留畜，浩浩荡荡地从巴克图、加曼奇、塔斯提等边卡越过国界涌向苏联国境。在越境过程中，有些人顺手牵羊，把邻居或集体的牲畜财产也一同裹胁而去；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分子公开抢劫集体、国有农牧场的牲畜或其他财产后逃之夭夭。而在苏联国境一方，为了便于中国边民越境，他们在巴克图以北沿塔尔巴哈台山打开了 10 处口子、巴克图以南向裕民一线打开了 4 个口子以示迎接，并非常卖力地接待安置越境边民。他们白天全力接运过境人员去事先选好的安置地点，晚上则打开探照灯为越境人员照明，广播车还不停地为越境人员打气，吹嘘苏联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先过去的越境者受到鼓舞，兴奋地跑过来，把“喜讯”传给那些有顾虑的亲朋好友：苏联那边早就盖好了房子，又高又亮，想住多大就住多大，房子里奶酪、馕、方糖和苹果都摆满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少人听了，感到苏联就是仙境，更加心驰神往，不顾一切地携带家眷和牲畜，熙熙攘攘地向边境涌去。事态还在扩散并波及托里、和布克赛尔、乌苏、沙湾等县。

塔城地区地广人稀，边境线漫长。本来就疏于设防，加上事件突然发生，猝不及防。部队和公安干警顾此失彼，当地政府派出干部前往边境协助劝阻，



云中的边防哨所

也无济于事。短短数日内，塔城全地区越境者达 40000 多人，其中塔城县多达 25000 人，有的村中几乎走空，仅剩十人或数十人不等；裕民县有 10400 多人越境，额敏县也有部分边民越境，因距离边境线较远，待抵达时对方已将入口关闭，只能中途返回。事件发生后，中共塔城地委先后发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边民外逃国外的意见》、《关于在塔城、裕民两县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紧急通知》等文件，并抽调大批干部，一边劝阻说服群众不要离境，一边安排受到影响的居民生活，恢复社会秩序，恢复春耕生产。

塔城地区边民非法越境潮刚刚稳住，伊犁地区的霍城等县也出现了大规模群众性边民越境。从 4 月 14 日起，少数维吾尔、哈萨克族群众开始擅自越境外逃，很快波及全县。15 日以后，越境势头四处辐射，很快波及伊宁、绥定、察布查尔、尼勒克、昭苏诸县市，更大规模的越境行动正在酝酿之中，最终酿成了伊宁“5.29”暴乱事件。

事后，经周密调查，有大量证据证明，苏驻伊领事馆与这次暴乱有直接关系。暴乱过程中，该馆领事曾接见暴乱分子的代表夏拉夫（苏侨），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对聚在领事馆前的暴徒发表讲话，收下了暴徒抢来的枪支，后来又接见了在暴乱中被击伤的暴徒。此外，还有 45 名苏侨直接参加了这次暴乱。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向苏联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指斥他们直接策划了大规模边民越境事件，并在“5.29”暴乱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苏方虽然拒绝了中国的



因一首歌闻名的小白杨哨所

直接经济损失 2469 万元，使塔城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及社会安全遭受极大损害。由于劳动力大量减少，塔城、裕民、额敏等边境地区的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机构大都瘫痪，土地无人种，庄稼和牲畜无人管。

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迅速加强了北疆伊塔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卫，从 1962 年 4 月到 10 月，增设边防站 58 个，以加强边防。同时，为迅速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命令，迅速组织农垦部队进驻上述各县的沿边地区，对无人管理的公社实行“代耕、代牧、代管”。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签署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塔城专区成立了宣传命令领导小组，组织 1000 余名宣传员，广泛宣传，同时收缴伪造的苏侨证 2230 多份，边民越境事件得到控制。据统计，“三代”工作队共代管粮食作物 52 万公顷，代耕秋作物 28 万公顷，收拢失散代牧牲畜 32.7 万头。同年 8 月，将代耕、代牧、代管的土地、牲畜、财物全部转交当地政府和群众。

指控，但做贼心虚，迫于舆论的压力，于 5 月 31 日关闭了边界。

5 月 28 日后，额敏县又有 14000 多人先后离开了家乡，涌向苏联边界准备越境。待他们到达边境出口时，苏方边界已经关闭，万余人滞留边境地带的山区。经地县派出的干部的说服教育，大多数又重新回到了故乡。伊犁地区的滞留在边界的人也被陆续劝回。至此，伊塔边民越境事件得到控制。在整个伊塔事件中，波及地区有塔城、伊犁、博尔塔拉，出走人员共 61500 多人。涉及塔城地区共计 58000 多人，其中越境成功者 48000 多人，共劫走集体、个人牛马羊等大小牲畜 23 万余头，弃荒耕地 4 万多公顷，

后来这些工作队逐步变成了劳武结合的兵团边境农场，进一步增强了边境地区的防卫能力和控制力量。1963年初，自治区党委指示北疆各沿边地区党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区和管理区。至此，伊塔外逃事件得到了有效管控。

事后，在事件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苏驻伊领事馆被关闭，并取缔了参与策划煽动越境的苏侨协会，还协助苏联遣返了那些要求回国的苏侨。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4月，伊塔等地再次遣返苏侨45597人，其中包括苏侨家属及一些持非法护照的人员。

由于伊塔事件的发生，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国之间的对峙和斗争更加激烈。与此相关，巴克图口岸贸易额大幅降低，1962年，全年进口总吨位降至72吨，是新中国以来的最低谷。1962年10月1日，根据上级指示，巴克图口岸停止了进出口业务，同时停止双方人员由巴克图出入境的项目，只交接国际邮件。由于边民过境探亲被中断，那些真正的苏侨算是回归故里，但不少在诱惑中越境的人，从此离开了自己的家园难以回还，而那些年龄大的直至客死他乡也无缘再看故乡一眼。

三、冰冻时期的巴克图

1962年中期，因新疆伊塔地区发生严重边民外逃事件，导致中苏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与此相关，巴克图口岸的贸易进出口数额也急剧下降，从最高点的近2000吨降到72吨。并从当年10月起，终止贸易进出口及人员往来等全部业务。昔日川流不息的货物进出和熙熙攘攘的往来人流霎时中断，巴克图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巴克图口岸之门从一开始就是在极不情愿的境遇中被迫一点点打开的，因此，它从不知道装扮自己，总是灰头土脸一副凄苦模样儿，让人怜爱也让人痛楚。通商初期，巴克图仅仅是通道，是个常设卡伦，仅有士兵例行驻守而已，主要任务是解决偷盗及牧民间的纠纷而已。后来随着距离边境的距离越来越近，也加强了守卫，似乎都与商业利益无关。因此口岸设施、有关商业的机构一应俱无，国家损失了巨额海关税费收入。直到进入晚清国家意识增强，政府才

出资修建了一些简单的口岸设施。民国后，新疆当局一再争取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在新疆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下，取消了外国人的通商免税特权。1924年，中苏签订《新苏初定通商章程十四条》，巴克图口岸正式对苏通商，并开始向俄国商民征税。为适应征税需要，1929年塔城在巴克图成立贸易税局，设立关卡，堵截私运，稽征关税，巴克图开始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征收贸易商税，给新疆当地财政增加收入。此后陆续设立贸易公司、边防检查等机构。金树仁上台后，巴克图贸易往来如常。

塔城商人一般比较分散，个人难有作为，为与苏方竞争，百余华商联名建议政府：在巴克图附近空旷处由华商集股建房安户，建设一大集镇，并自办巴克图至苇塘子（巴克特镇）及巴克图至迪化的货运，在巴克图建立中方商务机构，收回权利。时任塔城县长王汝冀认为这是“重国土纾商困固边局”的壮举，极力支持，金树仁也批示准予照办。无奈天不假时，不久军阀们就因争权夺利陷入混战，金树仁倒台，致使这一美好愿望未经践行就胎死腹中。

1933年盛世才登上新疆边防督办宝座，中苏贸易大幅增加，尤其是对苏出口增幅更大。以塔城为例，为适应需要，除巴克图口岸外，又增加叶尔盖提、察汗托海（今裕民县境）、阿克桥卡等地为临时商贸市场，以增强向苏联境内的货物输送。贸易往来虽然频繁，苏新关系也异常亲密，但口岸建设却始终未提上议事日程，关税局被裁撤，出入境货物税均由财政局或税务局代征。直到1944年7月，迪化海关塔城分关成立，至此，塔城口岸通商一百余年，才第一次有了海关。1945年后因发生三区革命，塔城海关遂被裁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万象更新，巴克图也在悄悄变化着：在1950年5月，塔城在新疆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下恢复了塔城海关，任命了临时关长。6月14日，中国海关塔城分关正式成立。1951年，为规范管理，把不久前开放的艾买力（额敏河出界口）、察罕鄂博（和丰境内）两个临时性的贸易市场予以关闭，将贸易集中到巴克图口岸统一进行。此后，与巴克图口岸相关的机构陆续建立并逐步完善。1950年2月设国际邮件交换站，1952年7月，成立了巴克图边卡派出所，维护边境口岸的经营秩序，此后逐步衍生出边境会晤站。1953年4月成立巴克图边防检查站；次年又成立对外贸易商品检验处（后称商检局）。1955年成立专区畜产品公司，专营对苏贸易的活畜和畜产品。

由于进出口贸易的顺利发展，巴克图口岸的基本建设也逐渐被提上工作日



兵团农垦战士在边境巡逻

程。1961年自治区批准了巴克图口岸基本建设计划，要对口岸进行基础设施改造更新，资金拨付到位，建筑材料也陆续到达巴克图指定点，有些项目已经进入施工阶段。1962年4月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伊塔边民外逃事件，许多受蛊惑的民众就是通过巴克图非法越境的。结果，正在实施中的基本建设被中途叫停，计划撤销，所备建材作价处理，剩余资金上缴，巴克图又一次与发展机会失之交臂。

1962年后，巴克图历经数年设置的机构又逐步被取消，如派出所、进出口商检局、检疫专营对苏贸易的畜产品公司等，只保留了边防检查站、会晤站、边防连、国际邮件交换站。海关虽然未被撤销，但由于业务量逐年减少，遂于1963年划归外贸局领导，成为外贸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64年5月起与边防检查站联合对外办公。

与往昔相比，巴克图边境地区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口岸各业务部门业务量骤减；二是边防部队增多，三是塔城的边防部队开始在防区全线巡逻。与此同时，会晤站却繁忙起来，因为自口岸关闭之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过去一件只需简单会谈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则需要反复会晤交涉，并须通过国家外交途径才能处理。



进入边境管理区的旅客接受检查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中国“左倾”思潮的泛化，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裂痕加深，两国的敌意也更深。苏联为加强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在我从东北到西北的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并不断制造事端，由此带来的边境对抗和斗争也愈演愈烈、愈加频繁。其中，仅在塔城辖属边境地区引发的震惊全国的边境冲突和边境入侵事件就有以下数起：一是绑架我兵团工作人员事件。1969年5月20日，我方加曼奇边防站政治干事岳喜坤和班长张银生与兵团农九师164团干部职工共5人在阿克乔河上的加曼奇龙口筑坝引水，忽遭苏方乘坐3辆装甲车的45名武装军人骚扰，他们越过实际控制线，将正在进行正常生产的岳喜坤等5人强行绑架到苏境。后经9次交涉，苏方才将绑架的人员和劳动工具交还。二是塔斯提事件。1969年6月10日，苏军出动数名乘马的武装军人粗暴干涉我方在塔斯提、布尔干河交界的三角地牧工放牧，并将农九师161团的牧工绑架到苏联。塔斯提边防站排长李永强带队巡逻恰好经过此地，就与苏军展开说理斗争，双方发生冲突。在不远处放牧的女牧工孙龙珍闻讯赶来支援，遭苏军开枪射杀。11日，中国外交部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联政府停止一切武装挑衅，交回被绑架的牧民。三是铁列克提事件。就在东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发生不久的同年8月13日，苏联方面出动武装军人三百余名，直升机两架、装甲车数十辆

悍然侵入我裕民县境的铁列克提地区，对我在正常执巡逻任务的巡逻分队发动突然袭击。我巡逻队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因苏军有备而来，巡逻分队寡不敌众，数十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同日，我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发出照会，提出强烈抗议。

鉴于苏联的种种侵略、颠覆行径，毛泽东提出了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著名论断。从此新疆进入了一个以反修防修为最高目标的时代，其他各项工作无不以此为前提。塔城地区有漫长的边境线，名副其实地成了“反修前哨”，并自然地承当起了“反修前哨”的重任，而塔城市区与巴克图口岸之间距离只有9千米，自然成了前哨中的前哨。这时，对伊塔事件发生后划分的边境地区、边境管理区和边境禁区的管理方式，在“左倾”思潮影响之下被发挥到极致。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到塔城巴克图，前后共设置三道检查站，层层设防，查验来塔城地区的过往行人。第一道关卡设在托里县的庙尔沟，凡乘班车前来塔城地区所属塔城、裕民、额敏、托里诸县的各色行人，无论公差还是私事抑或探亲访友，必须持有中国一级政府的公函或介绍信，并在乌鲁木齐长途客运站专设的进入边境地区管理部门签署意见，方能通行，否则就会被扣留在庙尔沟强行管制劳动，直至有塔城方面的亲属前去认领或被扣人员所属地区政府、单位发来公函，证明此人清白方可放人。第二道关卡设在塔城县所属工农兵农场，俗称“三十二公里”。当时塔城县属居民都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中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外出时随身携带以备查验；凡前往塔城县探亲、办事或公干的行人，必须持有所在地公安部门开具的带有本人照片并加盖钢印的通行证才能通过检查，否则也会被扣留强制劳动，其审查程序更为复杂。第三道关卡设在塔城通往巴克图口岸的途中，是为边境管理的禁区，一般都无法通过，只有那里的兵团所属居民通过特别证件才能通过。这种管理方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被逐步放弃。只是到了后来，严厉的查证成了例行公事的程序。

笔者自小在额敏长大，塔城虽近在咫尺却从无缘光顾，第一次去塔城是因为要到地区教育局查看高考录取情况。因为办通行证需要照片，而照一张相需要一个月才能冲洗出来，为此，只能骑自行车前往，往返100多千米的路程足足跑了一天。那时，时有前来塔城地区谋生的内地务工人员（俗称盲流），因无从开具公函证明，而被检查站扣留。为了逃避检查，有人采取多种方式，甚至通过徒步方式或骑自行车方式通过庙尔沟，因为当时的检查重点往往只针对乘

坐班车或其他机动车辆的人。塔城地区种羊场的一位杨姓包工头就是这样来的。他家里成分不好，为求生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花 15 元买了一辆人家准备丢弃的自行车，拿着一张破地图就上了路。路况不好，自行车也快散架了，他一路上风餐露宿，整整走了半个月，可谓历尽艰辛。他讲起这段经历，当时大家都引为笑谈，其实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人在关键的时刻，为了生存，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苦也愿意吃的。

俄罗斯族人多一向是塔城人口结构的一个特色，俄罗斯混血人尤其多。因此塔城曾流行过一个“塔城三大宝”的段子，其中一句是“俄罗斯二转子满街跑”。这本来是塔城特殊的地域造成的自然现象，正因为有了这些，塔城才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流行，这些塔城原以为傲的一些与苏联有关的民俗风情统统成了封资修的东西遭到排斥甚至批判。因为“苏修”成了新疆头号敌人，有关苏联的种种谈论都成了敏感话题，苏式服饰不再时髦，为许多读书人所钟爱的俄苏文学作品成了危险品，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并喜欢着的苏联歌曲也成了“黄色歌曲”，遭到主流文化的贬斥，一些与苏联有关的饮食制作方法和生活习惯也因被斥为修正主义生活方式而遭冷淡。而那些与苏联有亲属关系的或有苏联背景的人更是容易受到泛政治化的关注，稍有不慎，往往会被当作“苏修特务”“里通外国”嫌疑而受到怀疑、审查，严重的甚至遭到批斗和关押。就连颇具塔城特色的学校俄语教学也受到冲击，不少老师被迫改行教授英语或别的课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渐渐淡忘了巴克图。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千米，但许多塔城土生土长的孩子却不知道巴克图其名，既不了解口岸的概念，也不知道巴克图为何物。即使在巴克图工作，除了部队对该地的巡逻值守，海关、国际邮件交换站几乎无事可做。因为从 1969 年到 1971 年，数年间巴克图口岸竟然没有交换过一封信件、一个邮包。从文化大革命前夕，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近 20 年中整个巴克图就像被冰冻起来，人迹罕至，声息杳然，像是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

第六章 改革开放后的巴克图口岸

一、改革开放初期——冰雪初融

1976年10月，以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被拘捕为标志，中国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为中国走出极左政治阴霾创造了条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中国此后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包括对外关系的开放打下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但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比如，就在中央提出今后工作不再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而是按照各项工作的自身规律正常推动，并提出结束当时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却在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越南北部几个重要城市，1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了越南。这场边境战争本是由越南方面不断在我国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



塔城山中草场



夕阳下的塔城

制造摩擦一手造成的，但却受到了中国当时的死敌苏联的袒护，他们向靠近中国边境包括新疆西北部的边疆地区派出重兵，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中国西北边疆，并动用几个师的兵力，以中方为作战对象，进行军事演习。由于苏联有意制造战争气氛，越南在苏联扶持下又一味死缠烂打，给新疆的边境地区造成极大不安。一时之间，战云密布，战争似乎已成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出加强战备的指示。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集中精力加强战备工作。在1979年1月底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三干会议上，新疆军区司令员刘震专就战备问题进行了部署和要求。三干会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配合新疆军区落实战备要求，包括战备物资的充实准备、战备物资的储备储藏、老弱病残的疏散安置等。但在战备方针执行过程中，个别地方反应过度，加上当时一些地方不适当的宣传和导向，急于向内地疏散人员。尤其是伊犁、塔城等沿边地区，不少人开始将老人和孩子向内地转移，还有的人自身也产生动摇，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向乌鲁木齐集中。刹那间火车站人满为患，造成拥堵甚至踩踏事件。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也给刚刚开始的工作重心转移造成很大被动，口岸的解冻和开通自然也无从谈起。好在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保持“内紧外松”态势，尽力淡化战备氛围对各族干部群众的影响，睿智地调整了方向，使新疆与全国一道不失时机地将各项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农

牧业生产上来。

1980年，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展开。在整体政治经济大势影响下，口岸形势终于现出暖意。最早出现松动的是驻口岸单位管理关系的变化：1980年初，国务院决定将海关收归中央统辖。同年2月18日，塔城支关更名为塔城海关，配备了干部编制，确定了单位级别，由乌鲁木齐海关直管。与此同时，海关也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逐步纠正监管工作中左的偏向，为口岸的开放创造条件。最明显的变化是通过巴克图进出的信函、包裹等邮件一天天多了起来。

尽管如此，由于中苏积怨太深，阴霾太厚，受习惯性思维束缚，巴克图的开放之路依旧踟蹰徘徊，步履蹒跚。1981年到1984年，东南沿海的开放事业如火如荼，深圳已由一个渔村变成了一个现代化都市，而巴克图口岸依然是收收包裹，分拣一下邮件，如此而已。渐渐学会横向比较的塔城人开始议论，沿海的口岸能带动一方迅速致富，我们面对如此便捷的开放条件不用，是为什么？面对人们的议论，塔城地区的领导们也坐不住了，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传递塔城各族人民盼望改革开放的诉求，最终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和支持。

此时，随着苏联领导人的更替，中苏两国关系已经缓和。据此，1984年11月2日，由地委、行署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成立了塔城地区对苏交往活动领导小组。11月8日，塔城地委、行署作出《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对苏交往活动准备工作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开展对苏地方贸易往来；加速边境道路、口岸、货场建设；筹备旅游事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苏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同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办公室成立，巴克图口岸第一次有了自己正式的管理机构。1985年4月4日，国家公安部宣布了71个准予中外籍人员出入境的口岸，塔城巴克图口岸名列其中。同年7月21日至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自治区领导王恩茂、铁木尔·达瓦买提和贾那布尔的陪同下到塔城考察。胡耀邦一行来到巴克图口岸，看望了驻守巴克图的官兵，听取了关于巴克图口岸历史和现状的介绍汇报，对巴克图的未来寄予深切期望，并留下了韵味深长的“中苏两国人民永远友好”的题词。

胡耀邦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曾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和全面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1984年8月，胡耀邦在视察黑龙江时，沿着中苏边境线考察了黑河、伊春、同江、虎山、密

林、绥芬河等地，就黑河、绥芬河的口岸开放做过具体指示。他赞同当地同志提出的“开放就活，封闭就死”的观点，主张“把政治和生意分开”。他指出，边境上成千上万的专业户都可以搞对苏贸易。他要求绥芬河市的贸易公司主动行动，恢复和对方的边境贸易。

并说这件事你们自己定就行了，不要老是向上请示，和海关、边检打个招呼，请他们支持。胡耀邦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这两个口岸的建设发展和开放。而胡耀邦同志的这次塔城之行，对巴克图口岸开放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既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首次视察塔城，同时表达了对塔城及巴克图口岸改革开放的支持。1988年7月，塔城地委、行署向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呈报《关于恢复巴克图口岸，开放对苏贸易的报告》。198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巴克图口岸开通临时过货。这是自1962年巴克图口岸关闭以来的首次过人过货。中苏国境线两边的人民，经过20多年的漫长等待，终于又可以在触手可及的巴克图再续前缘，经商贸易，可以通过巴克图探亲访友了。

1988年9月17日，应苏联哈萨克斯坦谢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友好邀请，塔城行署专员阿尔斯坦别克率中苏友好协会新疆分会塔城代表团一行5人赴哈萨克斯坦马坎赤区参加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68周年国庆活动；同年10月27日苏联哈萨克斯坦谢米巴拉金斯克州执委会第一副主席努尔哈孜率经贸代表团一行9人来塔城市访问，双方对两国对应口岸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签署了《边境贸易会谈纪要》。这是巴克图口岸自1962年关闭之后26年以来，中苏双方第一次通过巴克图这条古老的通道实行友好互访。结束了数十年来的敌对，一双双期待的手，终于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意义堪称重大。

通过接触和沟通，双方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双方都期望交流和互通有无。



宁静美丽的塔城

在这样的愿景下，大家都谨慎地、试探性地向前迈进着。1989年1月18日，塔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向外国人开放的城市。同年5月，苏联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外经处官员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办口岸处官员进行了互访会谈，就巴克图口岸临时过货一事达成协议，1990年10月获得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批准。就在这个月底，塔城地区外贸局与苏联公司开始通过巴克图口岸实行以货易货贸易。至年底双方贸易总额为6.99万美元。数额虽然不多，但这条在被迫或主动中反复纠结了一个半世纪的古老商道，终于再次被利用起来。然而我们知道，要让它真正担负起双方赋予它的真正的使命，我们还有很远的路。

此时的中国，此时的塔城，就像乍暖还寒的初春，大片的冰雪已经融化，但在许多荒芜和人迹罕至处，冻土犹存，残冰未消，晴朗的空中时而会吹来一阵凉风，潺潺流水的小河，河床上偶尔还有冰丝闪烁……但是，透过澄清的空气远眺，你分明已经看见了正在生长着的、遮不住的绿意！

二、20世纪90年代巴克图口岸的边贸——如火如荼

1992年1月18日至22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这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的核心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就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特别告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顺应了历史潮流，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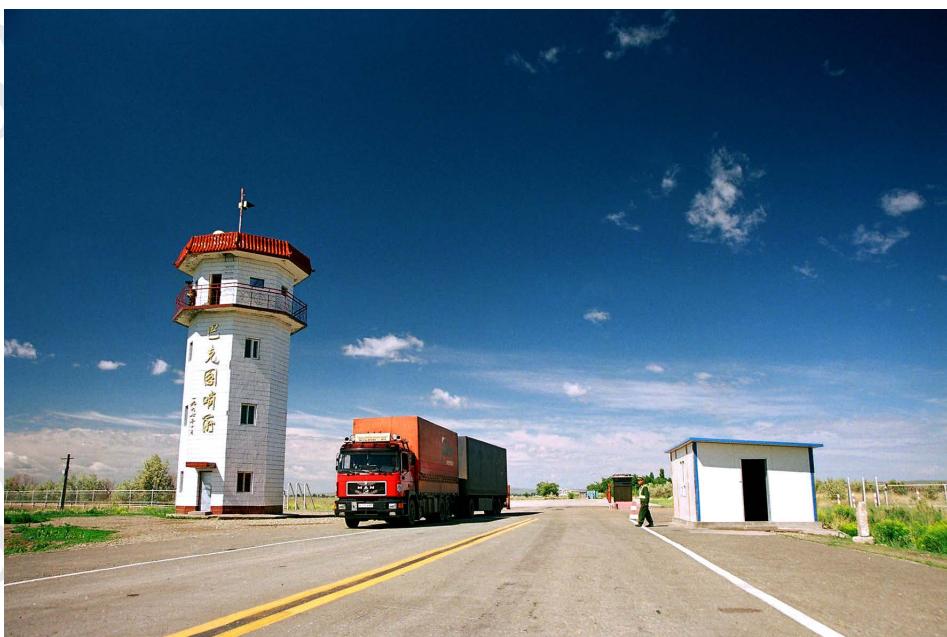
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新疆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都



载满货物的车辆正在通过口岸货检厅

得到了强有力的深化。1992年6月9日，国务院批准塔城市为沿边进一步开放城市，同年10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图·苏莱曼诺夫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哈两国关于开放边境口岸的协定》，《协定》第三条规定：“巴克图（中）、巴克特（哈）口岸具有国际联运地位，自1992年11月开始，对第三国人员、运输工具及货物开放”。至此，巴克图的口岸地位已经大大提高，超出了巴克图历史上各个阶段作用，为塔城的全面开放并以巴克图全面开放为龙头全面拉动塔城地区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塔城地委、行署把握机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口岸为依托，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突破口，采取多种措施，克服种种障碍，积极推进巴克图口岸的开放，同时加大巴克图建设力度，改善开放条件，发掘开放潜力。塔城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的真诚努力，获得了上级党委政府直至中央的理解和支持。1994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巴克图口岸为国家一类口岸，允许向第三国开放。1995年5月，国务院口岸办副主任胡祖宏为团长的口岸验收团一行20人来塔城对巴克图口岸检查验收，验收团一致认为，巴克图口岸已经具备正式开放条件。7月1日，巴克图口岸正式对第三国开放，成为新疆第三个向第三



通过边境口岸的货车

国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至此，巴克图不仅找回了历史，而且超越了历史，可以说，巴克图口岸已迎来了有史以来开放通商的最好时期。

从人员、货物的流量和过境形式看，1992年口岸开放初期，过境人员大都是以探亲旅游方式随身携带一些日用品，如小五金、厨房用品、学生学习用品、电子表、电子计算器、简易电子游戏器以及冰鞋冰刀、钓鱼器具等小商品；在中方专门组织设置的地点出售，回去时购买一些中国的轻纺产品及衣帽鞋袜之类。一月数次或每周一次。由于规模小，接触人数有限，影响也非常有限。但当苏联各地客人看到塔城丰富的商品、便宜的价格及宽松的社会氛围并获得不俗的收获后，随即来了更多的客商来塔城一试运气。此时正当苏联解体、社会生活陷于无序之际，于是一些人看准机会，纷纷从俄、哈等地批量组购货物（毛皮服饰、首饰、小五金百货等），通过巴克图输往塔城市销售，获利极厚。根据预测，1992年输入塔城市场的货物达840吨，1993年达2872吨。

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开放程度的加大，旅游兼营式和以货易货式贸易渐渐被专营式贸易所代替，边境贸易从非正式逐渐向正式过渡，终于被政策所认可，并且做得风生水起，以致“边贸”成了当时人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新式名词，凡参与经营者均有斩获，由此招致了更多的人加入边贸经营队伍。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演练，其实也是一个人们的心理、能力的适应、学习、准备的过程，到1994年塔城被宣布为国家一类口岸并向第三国开放时，塔城的巴克图口岸已经声名在外。同时，塔城地委、行署也在为创造巴克图口岸良好的通商环境积极创造条件：1994年1月25日，塔城地区行署办公室印发了《取消对外籍车辆从巴克图口岸至外贸货场途中设站检查和收取养路费办法会议纪要》，同年4月9日，行署办公室又转发了自治区《关于清理各类不合理口岸收费项目的通知》对各类不合理收费予以停止，共停止收费项目23项。1994年10月2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塔城汽车客运站为自治区二类口岸对外开放，开展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间的客货运输业务，营运对象主要是国际客运班车及出入境旅游购物团人员、车辆和所携带的货物，这给中哈双方从巴克图口岸出入境的人员旅游购物、携带货物往来提供了更大方便。

由于塔城及巴克图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加上自1992年以来的巴克图的宣传和实际绩效，当巴克图被宣布为向第三国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时，来自国



货车从巴克图口岸入境

内外的客商纷纷前来，以塔城为基地，巴克图为依托，红红火火做起了边境贸易生意。这一年，从巴克图出入境的客商总计达 52493 人次，其中入境 26184 人次，出境 26309 人次。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纯属探亲访友和旅游观光者，

但更多的还是从事商贸的人。这时，不仅经营边贸的队伍迅速扩大，经营的商品也在改变：进口商品主要包括钢材、木材、水泥和化肥等；出口产品主要是砂糖、服装、白酒、饮料和轻工日用品。易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3.2 亿元，接待旅游购物团 864 个，2.2 万人次，购物总值 3 亿元，银行结汇 2000 万美元。1995 年，塔城地区对外贸易和旅游购物持续快速增长，巴克图口岸全年进出口货物总计 11.84 万吨，总金额 5.54 亿元人民币；接待旅游购物团 21396 人次，旅游购物总值 5.54 亿元人民币，边贸结汇 3792 万美元。

此后，在边贸丰厚利润的吸引下，加上塔城在软硬环境建设方面的努力，来塔城经商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1996 年国内有 15 个省区的 88 家公司在塔城设立商务办事机构，300 多家公司挂靠塔城地、市外贸及边贸公司开展边贸业务，业务范围从哈萨克斯坦拓展到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等国。

不仅如此，由于舆论和导向的影响，塔城本地人士加入边贸行列的人也越来越多，既有社会个体经营者，也有许多企事业单位，同时还有众多党政机关，都纷纷组织团队，办起公司，挤进边贸大军，期望从巴克图的边贸中获得利益，分一杯羹。一时之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士涌进塔城的巴克图口岸，形形色色、名称各异的公司就像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地在这个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地带施展身手，一拼高下。而在这个颇为庞大的群体中，与苏联各国有亲属、同学、朋友、相识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人更是受到羡慕，因为他们可以凭借这种关系捷足先登，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或俄罗斯等国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公司签下进货合同。彼时彼地，只要能出境，并在那里签上几份进货合同，无论是什么货，也无论数量多少，只要一进入巴克图中国境内，就会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购货客商团团围住，争抢合同。因为只要有了合同进了货，就能卖出，就能赚钱。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俄罗斯或苏联中亚诸国背景的人，都有一个心结，即不愿让人知道这种背景，因为那是一个污点，一个被人歧视的标志；那时的“半家户”（1962年伊塔事件中一家人因各种原因，一部分成员越境逃苏，一半成员留了下来，这样的家庭被称作“半家户”）是不被社会信任的，所以往往被人瞧不起。而今时过境迁，这些人通过巴克图通道一趟趟出境，多则三五日，少则一两天，走时两手空空，回来时就凭着一纸合同，赚得腰包鼓鼓，旧貌新颜，让人侧目。有些人就通过这种方式，短短几年发家致富，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塔城巴克图口岸通商及边贸的几个阶段，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这个阶段是最为火爆，其发展速度也最为惊人。究其原因，一是塔城地委、行署为口岸的开放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动员，让开放利国利民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加大投入进行硬件建设，建造了与开放规模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从而创造了合适的软环境和硬条件。二是开放的潮流契合了人民的期望。多年来，塔城的人民在贫困中挣扎度日，但他们渴望创造，渴望美好的生活，这种意愿积淀愈久愈强烈，当开放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像深埋地下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由于疏导适当，这种岩浆就变成了热力，成为塔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手。三是这种增速极快的外贸发展还与苏联的国家解体有关。1992年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大都忙于各自的政党、政权建设，而疏于对社会及行业的规范管理，致使各种物资无序外流，这就是1992年后中亚等国家和俄罗斯大批初级物资大量进入塔城的重要原因。这从进入塔城市场的货品种及进入的规律也可以看出。比如，1992年最先进入塔城市场的商品无非是家用小五金、学生用品、钓竿、冰刀，还有一些食品如扒皮鱼、鸡爪等；接着是钢铁、木材；随后是羊皮、牛皮、羊毛等畜产品；再后来是废旧金属、废旧电机和少量未经加工的锭状金属，如铝锭、铜锭等。到1995年进入边贸高潮期后，连一些违禁物资也流入塔城市场，显然是管理混乱所致。据此，塔城海关也陆续加强了监管。

随着口岸开放时间的延展，巴克图通商的环境日渐规范和顺畅，与其连接的

地域也日趋固定。大体情况是巴克图口岸可辐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5个州和10个工业城市，均是俄哈等国重点发展的新兴城市，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恰与中国相应地带形成经济互补，有很强的市场潜力。在多年的边贸经营中，塔城地区也涌现出如三宝民贸事业进出口公司等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同时，边境贸易也正在由以贸易货向现钞交易转变，由双边向多边转变，由零散、随意向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转变。

塔城的边贸外贸实践显示，巴克图口岸新时期通商、交流和边境贸易，起点高、发展快、规模大，成效非常显著，堪称是巴克图口岸通商史上的里程碑阶段。这个阶段的通商实践为塔城练就了一支心态开放、技能娴熟的边贸、外贸队伍，为塔城外贸、边贸长期、规范发展树立了标杆；同时也为塔城在新世纪、新时期的新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强劲的推力。

三、巴克图口岸建设的演进



苏方修建的口岸门柱

巴克图口岸是隶属塔城地区的唯一陆路通商口岸，地处塔城市西南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交界处，有国家二级公路直达。巴克图口岸距塔城市区12千米，是距城市距离最近的口岸之一；距乌鲁木齐621千米，也是新疆口岸中距乌鲁木齐最近的口岸。

巴克图口岸历史悠久，但由于当时种种的条件和原因，从未进行过口岸规划和规模性建设，即使有一些零星建筑，也是在当时既有条件下，进行一些必不可少的更新和修补。如新中国后就进行的会晤站房舍建设，边检站营区建设等都属此类。20世纪80年代塔城开放初期，一开始有人慕名到巴克图观光，那时，空旷的边境线上，孤零零地竖立着两个方尖碑似的门柱，碑的顶端有已经褪色的红五星，柱上的水泥已经残破脱落。那就是巴克图较为突出的标志，据说，



边防哨所

这是苏联在 20 世纪 60 年代修建的国门，而在我方边境线内，却没有相应建筑，显得空旷苍凉。在距边境线数百米的空地上有一座七八米高的观察哨卡，稍后的地方还有砖木建筑的会晤站，这就是巴克图口岸当时的标志性建筑。

巴克图口岸正式开展规划和建设是 1984 年 11 月塔城地委、行署作出关于开放巴克图口岸、开展对苏交往活动的决定之后。从此，巴克图口岸建设开始进入了有远景设想、有蓝图规划、有政策措施、有实际运作的全方位建设时期。从建设形态划分，可分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口岸机构建设两大部分。

第一，关于口岸基础设施建设。1984 年 9 月，地区行署分管领导带领地区外办、地区建设处等部门的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赴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学习考察。考察组返回塔城后，就结合巴克图口岸地理位置、地形环境等具体条件，确定了口岸近期建设方案，随即按照方案实地勘测绘制了口岸地形图和规划图。口岸建设具体工作由相关部门组建的口岸规划建设办公室组织实施。在口岸规划办公室的组织下，1985 年至 1987 年，先后改造了塔城市至巴克图的公路，架通了高压输电线路。1985 年起兴建了与口岸配套的友谊宾馆（后改称旅游宾馆）。鉴于塔城至巴克图公路通车状况不好的现实，地区争取自治区交通厅公路局的



边检站机关楼

支持，投资近3000万元对原公路进行全面改造，加高拓宽路基，提高公路等级。该工程于1992年9月动工，1993年10月完成，修筑了这条塔城境内最早的二级公路，为口岸畅通铺平了道路。

为加快巴克图口岸的建设步伐，1994

年4月14日，地区行署邀请自治区计委、财政厅、外办口岸处、乌鲁木齐海关、自治区边防局、伊犁动植物检疫局、乌鲁木齐卫生检疫局、自治区商检局等部门的领导和专业工作者召开口岸建设座谈会，塔城地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巴克图口岸建设情况汇报，现场考察了在建的口岸联检厅、塔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地区和塔城市的边贸货场及民航塔城机场建设，讨论了现在口岸进出境的人员及货物流量问题与加快口岸建设的迫切性等问题，形成了《巴克图口岸建设座谈会纪要》。随后，根据这个纪要起草了总体规划报告。8月1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1994)129号文件，对巴克图口岸总体规划作了批复：原则同意巴克图总体规划及自治区建设厅关于巴克图口岸总体规划的审查意见。

获得批复的规划审查意见确定，巴克图口岸的性质是：巴克图口岸是经国家批准向第三国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是融经贸、旅游、进出口于一体，发展与独联体及欧洲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口岸总体布局分为西区、东区两个部分。西区位于巴克图公路西端，面积为12.2平方千米；东区位于塔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内，面积为1.7平方千米。规划区总面积13.9平方千米。

该规划对巴克图口岸的近远期各项建设，包括“一关四检”等办公业务设施建设、金穗园宾馆建设、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集装箱公司货场建设、仓储区设施建设等项目用地，都进行了规划；同时还对口岸道路、电力电信、给排

水、集中供热，包括环境绿化都进行了统筹安排。根据规划，1994年9月，口岸货检通道开工建设，年底前就完成了主体工程；同年，还完成了投资100多万元的塔城市至口岸通信光缆的铺设，并铺设了口岸区电话专线。1995年，投资467万元的口岸供电设施建设竣工，同期竣工的还有投资2000万元、储存能力达400万吨的边贸货场；此外，通过改造的供电设施、机井供水设施也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全面解决了工作、日常生活、消防、接待、绿化各个方面的用电用水。

2003年以前，巴克图口岸供水主要靠打机井取水。但因为巴克图地下水位高，盐碱化程度重，所打机井基本上都属地表水，水质很差，给口岸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一是严重的盐碱造成大面积的供暖管线和地下水管的锈蚀，常修常挖，既造成浪费，也影响工作生活；二是水质差且水量少，既不宜饮用，也不能供给生活、卫生、绿化用水。为彻底解决问题，2003年8月，巴克图投入资金进行排碱渠工程修建，以改变巴克图土地盐碱化问题。同时加大力度实施日渐扩大的供暖改造工程。到2009年，彻底改造了口岸区的给排水系统和盐碱化问题，改变了过去一直没有上下水的问题，并再次扩充和改造了供暖面积和供暖状况。2010年，又修建了面积为14400平方米的两个出入境停车场，解决了多年来车辆滞留口岸通道、堵塞交通、影响通关速度的问题。巴克图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改观。

口岸的公用房建设从1992年起，也是突飞猛进，一路高歌。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1992年9月破土动工的巴克图口岸联合检查检验大厅工程。该联检厅建筑面积为3048平方米，是巴克图口岸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总投资达1200万元，于1995年6月竣工投入使用。随后，海关办公大楼、边检办公大楼、商检办公楼、动植物检疫办公楼、卫检办公楼等办公设施建筑陆续完工并交付使用。稍后，塔城



塔城国际边贸城二类口岸

地区再次筹措资金，在口岸西区建成了3400平方米的旅检厅和1200平方米5个车道的货检厅，一次次刷新巴克图的建筑数量纪录。1997年，商检局、卫生检疫局、动植物检疫局的职工住宅楼、车库等建筑也相继在巴克图口岸落成，为口岸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2005年在边境线我方境内，陆续修建了仿长城式国门、仿古游廊和瞭望岗楼等建筑；2007年又依次修建了供游客拍照留念的模拟158号界碑及石雕、路障石等建筑。2010年，巴克图口岸建起了一座面积为2500平方米的口岸综合业务大楼；11月15日，自治区拨款350万元用于巴克图口岸报关报检大厅的建设。随着这些形式各异、布局错落有致的建筑的拔地而起，加上近年来一系列亭台楼阁装饰性建筑的点缀和在美化、绿化方面的投入及刻意营造，现在的巴克图一改以往的荒芜与冷清，变得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俨然成了一座袖珍城市，向来来往往的人们秀着她动人的姿容。

第二，巴克图口岸的机构建设。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巴克图虽为通商口岸，除有部队驻守外，并没有与口岸相匹配的相应机构。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巴克图机构设置刚刚进入程序，又因中苏两国的关系恶化而停滞。

巴克图口岸机构的正式设置和步入正轨也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着重进行的。1984年6月，巴克图口岸机构——巴克图口岸管理办公室。这是巴



五星红旗在口岸上空飘扬

克图口岸开通近200年来，第一次有了综合管理机构。1985年，口岸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巴克图口岸管理委员会，1998年再更名为塔城地区口岸管理委员会。口岸管理委员会为塔

城行署在口岸区的派出机构，行使县一级人民政府权力，其职责是贯彻执行上级部门管以口岸的管理意图，规划和监督口岸建设，协调各驻口岸部门的关系，并为其提供和谐的环境、优质的服务，把口岸管理纳入分工合作、科学有序的轨道，共同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为强化巴克图口岸建设和管理，确保口岸安全、文明和高效畅通，2000年6月，塔城地区行署又发文成立了由塔城地区、塔城军分区、兵团农九师等单位及其辖属各相关部门组成的塔城地区口岸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口岸重大改革措施的协调落实，地委、行署及上级党委政府有关口岸工作的重大决议、决策的协调落实；负责协调、监督口岸中长期规划的制定落实等。口岸委及相关领导机构的成立，为口岸的迅速发展和安全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口岸委成立之前，巴克图口岸已有一些与通商相关的机构设置，如海关。1950年塔城即设立了海关机构，当时称塔城支关。1980年2月塔城支关更名塔城海关，人事、业务、财务统一由乌鲁木齐海关统一管理，至此，塔城海关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工作开始走向正轨。

民国时期塔城巴克图口岸设立边防关卡。1952年7月巴克图边卡正式成立公安派出所，主要职责是对在巴克图出入境的人员进行检查登记，并与苏方交涉送接越界人员和牲畜。因与苏关系友好，边境没有边防部队驻守。1953年10月，巴克图边检站成立，隶属军分区领导，共有干部、战士20余人。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依照中央部署，决定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塔城边检站武警官兵在检查过往车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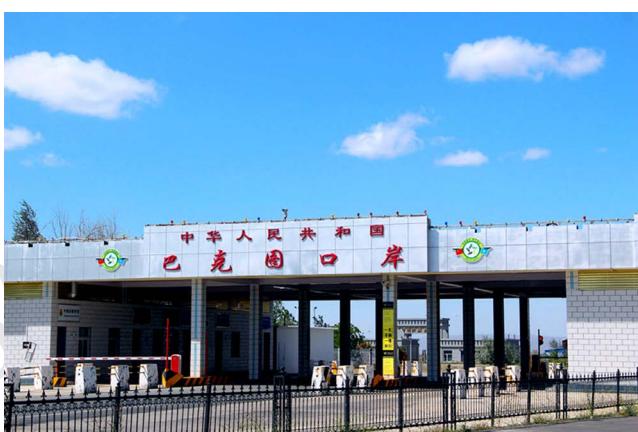
七师、工一师、工二师抽调 3000 多名干部职工进驻塔城、裕民、额敏等县执行代耕、代牧、代管（简称“三代”）任务，恢复三县边境地区因边民越境遗弃的农牧业生产，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秩序。同年 8 月，根据中央指示和自治区党委的具体部署，塔城、裕民、额敏、和布克赛尔等县沿边境地区的公社、牧场内迁，由上述“三代”人员与兵团农七师三管处新抽调人员沿中苏边界塔城地区段组成边境农场带，实行屯垦戍边，保卫边防。边境农场带设在塔城县沿边地区的计有 3 个团场，就是现在的兵团第九师 162、163、164 三个团场，其中 163 团农牧业生产区域就在巴克图口岸区。

为加强国防力量和边防管理，1962 年 8 月，武警新疆公安总队塔城边境工作总站成立，巴克图边检站归其领导；1963 年 1 月，边检站又划归军分区，1975 年隶属于新疆军区边防五团。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为便于通商，塔城巴克图边检站移交武警，隶属新疆武警总队。此后，口岸边检工作开始迈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塔城商检局也是较早的驻巴克图口岸机构之一，当时称塔城商检处，1953 年筹建，1954 年 7 月正式成立。其职能主要是对通过巴克图口岸及其下属临时过货边卡进出的货物依法实行检验。1955 年 11 月与海关合署办公，1960 年与海关一起划归地区外贸局管辖。1962 年巴克图口岸关闭后，商检局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2 年塔城商检处被撤销。1990 年 10 月，中苏两国达成协议，开始从巴克图口岸临时过货，为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商检，自治区商检局临时从各业务处室抽调检验员，轮流到巴克图完成商检工作。随着业务量的增加，1993

年 5 月，塔城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正式成立，编制为 40 人，行政机构核定为县（处）级。

以上均为与巴克图口岸通商直接关联的驻口岸机构。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巴克图口岸人流、物流数量的快速增加以及新的



巴克图口岸通关检验设施



中哈双方会晤
组”，1994年月正式成立巴克图动植物检疫局。

1999年11月，根据新形势、新变化的需求，上级部门决定对驻巴克图口岸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三个机构进行“三检合一”式整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塔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构为正处级，由新疆进出境检验检疫局垂直领导。为维护口岸安全，堵截走私漏洞，2002年月，塔城又组建了塔城海关缉私分局，隶属乌鲁木齐海关缉私局统一领导。

除上述与巴克图口岸通商有直接关系的驻口岸机构外，巴克图口岸还驻有以下机构，即巴克图国际邮件交换站、巴克图边境会谈会晤站、巴克图口岸国际道路运输管理局、巴克图口岸边防派出所，以及边贸货场、物流公司等。其中，巴克图国际邮件交换站是成立较早，坚持工作最持久的单位，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巴克图会谈会晤站也是成立较早的驻巴克图机构，它的前身是巴克图边防检查站，组建于1953年10月。1957年8月隶属塔城军分区建制。1983年4月，巴克图边防检查站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军区巴克图边境会谈会晤站；同时，从边检站分出部分人员，组建新的巴克图边防检查站（隶属武警）。1987年，根据兰州军区的命令，乌鲁木齐军区会谈会晤站改称新疆军区巴克图会谈会晤站。

多年来驻巴克图口岸各机构认真履行职责，珍惜荣誉，坚守岗位，与各驻口岸部门互帮互助，携手共进，为边防的安全与巩固，为巴克图口岸的通畅与稳定、协调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通商规范的需要，从1990年起，又陆续增加了一批新的驻口岸机构。1993年月，国家卫生检疫总所发文，决定筹建塔城卫生检疫局，1994年5月正式成立。1991年伊犁动植物检疫局在巴克图设立“伊犁动植物检疫局塔城工作组”。

四、依托巴克图口岸的旅游业



口岸风光

旅游业又称为旅游产业，是一种依靠旅游资源与设施，专门从事招徕、接待游客的行业，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而是一个综合的产业群，主要为游客提供交通、游览、住宿、商品销售、娱乐、邮电通信等服务。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具有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长、对相关行业带动性强等特点，拥有“朝阳产业”的美称。旅游资源、旅游设施与旅游服务是旅游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三大要素，而旅游资源则是其中最基本的要素。

塔城地处新疆西北边陲，与哈萨克斯坦有着500多千米的边境线，有着开放200年的古老又年轻的通商口岸，尤其还有着许多风景奇特且未经开发的自然的、人文的旅游资源。加上塔城自身又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因为历史与地理上的原因，造成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共存的奇特民俗风情；同时，因为与祖国内地、沿海地区交流较少，这也给塔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有这些都是宝贵的旅游资源，使得塔城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了较坚实的基础与深厚的潜力。

塔城旅游业起步较晚，但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而且为塔城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重要，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自治区把发展旅游业确定为继“一黑一白”经济发展战略之后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业又是第三产业的重点，称为“无烟工业”，是一项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附加值高，辐射性强的综合性经济产业。因此，在未来如何发展旅游业，

必将对一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

此前塔城旅游业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多方面经验，作为紧靠巴克图口岸的塔城市旅游业，应以边境口岸为依托，充分利用塔城本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同时开拓过境旅游资源。塔城地区将以塔城市边民互市“三日免签”为契机，以“西出兴边”为突破口，依托阿拉湖优美的自然风光，早日开通塔城至阿拉湖的旅游业务。

塔城的跨境旅游业，发端于巴克图口岸开放初期的旅游购物，那时，因为特殊的背景和条件，人们往往把旅游的重点放在购物上，是以旅游为形式，实现购物的目的，通过进出境赚取商品不同地域的差价。因此，那时进出境人员虽多，但旅游单项收入并不多。加上旅游宣传和服务意识欠缺，旅游产品和环境等条件跟不上，这种旅游购物时间虽长，但可持续性差。当双方商品价格趋平且人们对对方商品失去新鲜感时，这种以倒卖商品的旅游购物组团活动便难以为继，中哈两国的物流便被以货易货的边境贸易方式所取代。分析 1991 年至 2010 年中哈（苏）两国通过巴克图口岸进出境人数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巴克图口岸开放初期的 1991 年，通过巴克图进出的人员为 1643 人；1992 年开始出现旅游购物团时，过往人员陡然增加到 17541 人；1993 年则猛增到 64822 人；1994 年和 1995 年，过往人数仍保持在 5 万多人和 6 万多人的高位。1996 年骤降到 4.7 万人，降幅几达三分之一；1997 年降至 4.2 万人；1998 年跌至 2.2 万人；1999 年底至最低点，仅为 6575 人，这其中还包括进出境的公务人员。旅游购物从肇始到高潮，再到谷底，只在短短数年之间。此后，出入境人数便在 1 万以上、2 万以下徘徊。如果除去其中的因公出差和探亲等人员，旅游购物这已经寥寥无几。可见，以购物为目的组团旅游是没有



边境口岸观光旅游



巴尔鲁克山

远大前景的。

为扩大旅游购物人数的规模，1998年塔城方面投资2000多万元在巴克图口岸东区修建了占地8.2公顷的边境贸易互市区，每天可容纳5000~10000人进入互市区进行贸易活动。但因1998年哈萨克斯坦单方面关闭哈方口岸巴克特，加上一些其他原因，边民互市贸易长期搁浅。直到2009年2月，经中国外交部批准，允许哈萨克斯坦公民一日免签证进入巴克图边民互市贸易区，互市贸易区才有了启动的条件。2009年6月8日，巴克图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试营业，同年2月2日正式开业，至年底接待入境旅游购物团26个、547人次，营业额270万元。2010年，中国外交部为满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批准对哈萨克斯坦公民进入巴克图口岸互市贸易区正式实施“三日免签”管理制度，



额敏县境内的海航草原

是年全年入境团组92个、1073人次，营业额701万元。在践行过程中，由于种种限制，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做好依托巴克图的塔城旅游，还需要转换思路，另辟蹊径。

为加强依托口岸的塔城旅游

业，1994年塔城客运站被批准为自治区二类口岸对外开放，并开通了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阿亚吉斯和谢米巴拉金斯克的班车和行包联运，2004年又开通了塔城至哈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客货运输路线，同年12月，再开通塔城至哈国卡帮巴依的旅游路线；2007年，塔城市的班车又延伸到哈国旧都阿拉木图。但无论是旅游购物还是通过国际班车营运，来塔人数规模均无明显变化。2009年，通过国际班车出入境的人数为890人次；2010年，通过旅游购物从巴克图入境的人数仅为219人。

为宣传推介塔城旅游业，营造氛围，打造品牌，塔城开始在中亚国家短缺物品上下功夫。2010年8月，塔城市首届“蔬菜旅游文化节”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的东哈州、巴甫洛达尔州和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巴尔瑙尔市举办，为塔城的旅游文化、旅游环境宣传造势。就在同一时期，塔城还在塔城海关举办了“天津—新疆区域经贸企业合作通关洽谈会”，为天津、新疆企业携手西进中亚开辟途径。同年9月20日，首届塔城蔬菜旅游文化节暨中亚—新疆塔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巴克图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举行。交易会共举行5天，接待中外游客4万余人，旅游收入1200万元。

关于开通巴克图绿色蔬菜通道，通过这一古老商道向哈萨克斯坦出口蔬菜的设想，有一个形成过程。2004年，塔城首次通过巴克图向哈萨克斯坦出口蔬菜，颇受欢迎。哈萨克是具有悠久的游牧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以往传统的观念中，他们对蔬菜的需求量非常有限。但通过认真考察，塔城人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日趋提高的现代哈萨克人，其饮食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依照现代科学理念，
他们对蔬菜的需求
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颇具
规模。

据相关专家调查
统计，巴克图口岸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消费
市场，主要有哈萨克
斯坦的东哈州、巴普
洛达尔州、卡拉干达



沙湾县鹿角湾景区



库鲁斯台草原

州和阿克莫拉州，覆盖的城市群是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谢米巴拉金斯克、巴甫洛达尔、济良诺夫斯克、列宁诺戈尔斯克、阿亚古斯、卡拉干达、阿斯塔纳、埃基巴图兹和俄罗斯的巴尔瑙尔等。

如果蔬菜保鲜做得好，这个范围还可以向前延伸。在过去的几年内，反季节大棚蔬菜出口和时令蔬菜出口已逐步成为塔城地区地产品出口的重要商品。2006年从巴克图出口的蔬菜为455吨，2007年增加为8807吨，还不包括旅游购物人员随身携带的蔬菜。根据哈萨克斯坦有关农副产品时程分析资料，2010年新鲜时令蔬菜缺口为33万吨，预测2015年哈国蔬菜市场缺口将达40万吨，其中城市需求量为31万吨。因此，通过广泛宣传营造氛围，通过精心培育产品、保证市场质量，一方面可以增加哈、俄等国蔬菜市场占比份额，并以巴克图口岸为通道，增加该口岸转口贸易。另一方面扩大和强化塔城旅游业的影响力，推动塔城旅游业快速发展。这两者的加强，都将加大巴克图口岸的人员、货物进出境流量。

为进一步拓展巴克图口岸影响下的塔城旅游业，2010年后，塔城又提出了实施“七大战略性工程”“建设幸福塔城”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中，通过扩大巴克图口岸出入境旅游，着眼于把塔城建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大通道上的重要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推进有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塔城已开始着手对本地特有文化进行研究整理，通过对故有文化的梳理研究，发掘故有文化的核心价值，提升文化内聚力，从而打造出融多元文化为一体的塔城城市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关注塔城、认识塔城、向往塔城，让塔城成为向西开放大通道上的别具一格的经济文化长廊。

塔城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争相占据的优良牧地，曾经是中央政府戍守和保卫西北边疆的西陲重镇，曾经是中亚、俄罗斯等地八方商人聚首的商城。同时还是西方探险家们纷纷前来探秘的面纱半掩的神秘地。经过长期碰撞融合，已经

积淀成了多种文化交融的“三元荟萃”（即草原文化元素、代表中国历代中央政府意志的汉文化元素、由中亚及俄国商人带来的俄罗斯文化元素）文化，这就是塔城独有的特色文化。认真发掘这种文化内涵，使之融入现代文化，必将大大提升塔城的魅力和韵味。塔城地处边陲，没有高附加值的核心工业和密集型加工业，但是这里有没被工业污染的山川河流，如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有清新的空气，十多万平方千米土地处处是天然大氧吧；这里有许多自然和人文奇特景观，如塔尔巴哈台山中的玫瑰谷、巴尔鲁克山中的岩画、塔尔巴哈塔山与巴尔鲁克山交会形成的风景如画的巴依木扎草原以及草原上随处可见的土墩墓和草原石人。更有一点，那就是塔城还有通往中亚的大通道巴克图，通过这条路，我们可以了解和欣赏到举世闻名的钦察草原，可以看到风光如画的阿拉湖。如果对历史有兴趣，那会更有趣，你沿着这条路，可以见识到西辽建国初期的帝都，感受当年耶律大石建国的艰辛；可以沿着当年成吉思汗铁骑的足迹，体味当年蒙古铁骑西征的气势……

2013年，塔城地区全境共接待中外游客280万人，但通过巴克图出入境者为数不多，远远没有发挥其效能，还大有潜力可挖。如果认真挖掘塔城的历史文化，并将其与现代各类旅游项目相结合，提供多层次服务，对内可以引来内地旅游爱好者感受塔城文化魅力，享受难得的山川寂静与草原空旷，体验中亚民俗风情，发思古幽情；对外则让中亚人、俄罗斯人近距离了解中国，感受中国；同时大力发展战略形势下的新的旅游购物模式。到那时，塔城势必会成为集休闲度假、探险访古、西域采风、出境观光、旅游购物等各类需求为一体的旅游集散地，塔城必将以另一种形象刻在世人的记忆深处，而且巴克图的通道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巴依木扎的草原石人

五、新时期巴克图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巴克图口岸

巴克图口岸虽然在1990年10月获准对苏开放交接货物，但真正的开放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此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新疆、对塔城的开放搞活工作也愈加关切，在政

策上一直给予优惠扶持，致使塔城及巴克图口岸在短期内获得了对外开放城市和向第三国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的政策待遇。此后，又多次发文对巴克图口岸的开放予以支持。涉及推动巴克图口岸发展的各级文件先后有《中哈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开放边境口岸的协定》、《国务院关于统一开放新疆巴克图等5个边境口岸的批复》，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巴克图口岸总体规划的批复》、《关于同意塔城客运站作为二类口岸的批复》、《关于同意在巴克图口岸设立边民互市贸易点的批复》，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国函〔2008〕92号）》，外交部《关于在新疆对哈萨克斯坦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实行“三日免签”管理制度的复函》等。与此同时，国家和自治区领导也多次前往巴克图考察调研，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为巴克图口岸的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

正是在党的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巴克图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才有了长足进步和快速发展。巴克图开放初期的1990年，由于没有经验，对贸易程序也很陌生，大多是采用的是以货易货形式，数额小，不成规模，全年进出口总额仅为7.63万美元。1991年上升到56.36万美元，其中进口44.15万美元，出口12.21万美元。

1992年，国家作出开放搞活的重大决策，塔城被批准为沿边开放城市，经过巴克图的贸易量猛增，进出口货物量达4.83万吨，贸易总额为1100.8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了近 20 倍。此后，随着口岸优惠政策增加和开放强度加大，进出口贸易额总体成正比增长态势。如 1993 年，贸易进出口总值 3505.7 万美元，是上年度的 3 倍多。1999 年，因哈萨克斯坦官方人为阻止进出口贸易，当年进出口总值为 2656.8 万美元。后经过努力，哈方恢复开放口岸，2000 年巴克图进出口货物总吨位从 2.86 万吨跃升到 6.99 万吨，贸易总值达 1.095 亿美元，对上年度贸易额走低产生反弹，反映了民间和具体部门对进出口贸易的强烈愿望。

2000 年后，由于中国开放政策的一贯性和地方政府的有力推动，除 2002 年因哈方原因贸易总额大幅下降外，总体趋势是巴克图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额度逐年攀升，尤其是 2005 年之后，上升幅度加大，有些年份是成倍增长。如 2005 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1.91 亿美元，2006 年跨越到 4.42 亿美元；2009 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6.13 亿美元，2010 年则跨越为 12.75 亿美元。2011 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巴克图口岸进出口势头较上年有所减弱，进出口总额 6.72 亿美元，其中进口 981.46 万美元，出口 6.62 亿美元，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是，考察口岸 2012 年和 2013 年进出口情况，总体趋势是稳步增长，预示了巴克图口岸贸易进出的可观前景。

分析历年数据还会发现，2000 年前巴克图口岸的进出口贸易一般是进口大于出口，2000 年后则相反，往往是出口大于进口。2001 年后尤其如此，如 2001 年巴克图口岸进口货值 6771.85 万美元，出口 1459.06 万美元；2002 年进口 407.28 万美元，出口 2283.11 万美元；2003 年进口 255.60 万美元，出口 6500.46 万美元。其后，进口额一直在 1000 万美元以下徘徊，而出口额到 2005 年突破 1 亿美元，达到 1.9 亿美元。其后，出口货物总值继续高速增长，2010 年突破 10 亿美元，达到 12.75 亿美元，而进口总额为 2154.56 万美元，虽较上年有数倍增长，但仍不及出口货物总值的六分之一。此后数年的进出口情况也大体如此。

由此可以看出：一、党和政府对边境口岸的政策优惠扶持保证了巴克图口岸的畅通；二、塔城地方党政领导顺势而为，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在各个方面保护和支持巴克图口岸的发展，有力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增加；三、巴克图口岸优良的软环境和硬件设施对各地商家企业产生了巨大引力，让大家对巴克图有了充分的信任和信心。所有这些因素形成的合力，就有了巴克图口岸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

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征收了大量税金。1994 年，塔城

海关全年征收海关税 1738.9 万元；2010 年，海关税突破 3000 万元。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为一批本地民众提供了致富的机会，扩大了社会就业面，增长了社会财富，并为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近年来塔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成效的取得，有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贸易作出的贡献。

新时期巴克图口岸边境贸易进出口货物统计表

年份	进出口货物（万吨）			进出口货值（万美元）		
	合计	进口	出口	合计	进口	出口
1990	0.0088	0.0084	0.0004	7.63	3.76	3.87
1991	0.37	0.26	0.11	56.36	44.15	2.21
1992	4.83	2.54	2.29	1100.8	550.22	550.58
1993	11.24	7.27	3.97	3505.72	1995.83	1509.89
1994	10.2	7	3.2	2854.49	1578.09	1276.4
1995	11.84	9.81	2.03	6665	5460.6	1204.4
1996	9.78	5.97	3.81	8538.03	5376.14	3161.89
1997	10.41	4.84	5.57	9542.96	4789.96	4753
1998	8.59	4.3	4.29	8496.8	3863.7	4633.1
1999	2.86	1.76	1.08	2656.85	1557.96	1098.89
2000	6.99	4.26	2.73	10946.96	2900.2	8046.68

新时期巴克图口岸边境贸易进出口货物统计表

年份	进出口货物（万吨）			进出口货值（万美元）		
	合计	进口	出口	合计	进口	出口
2001	18.03	16.7	1.33	8230.91	6771.85	1459.06
2002	4.24	1.84	2.4	2690.39	407.28	2283.11
2003	7.68	1.89	5.79	6756.06	55.6	6599.46
2004	5.97	2.05	3.92	5632.29	275.27	5357.02
2005	10.18	3.97	6.21	19824.18	723.63	19100.55
2006	10.56	1.6	8.96	44689.54	457.71	44231.83
2007	27.97	0.57	27.4	34090.01	394.15	33695.86
2008	14.06	0.62	13.44	55448.47	751.62	54696.85
2009	11.14	0.64	10.5	61779.5	494.47	61285.03
2010	19.18	2.46	16.72	129652.04	2154.56	127497.48
2011	9.51	0.81	8.70	67242.37	981.46	66260.91
2012	7.26	0.28	6.98	77901.38	415.92	77485.46
2013	11.46	0.25	11.21	95515.63	612.09	94903.52

六、新时期巴克图口岸的地位和影响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做好口岸开放可以扩大城市影响，塑造城市对外形象、提高知名度，作为口岸城市的塔城尤其如此。口岸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做好口岸开放工作，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塔城的国际知名度和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口岸作为国家和一个地方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和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对国家和地区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不仅国际经贸、国际交往、国际旅游都需要通过口岸开放来实现，它甚至可以通过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人们的习俗、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形成一种地域文化。塔城现有特色文化的形成，就得益于口岸开放交流长期的润泽。

民国时期的巴克图从建设规模到从业人员，都无法与现在相比。但由于那时交通闭塞，社会封闭，信息源短缺，社会成员缺少必要的参照体系，彼时彼地，从口岸传递的信息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会远远大于当今社会。因此，当时从人们的服饰到商品的种类样式，还有语言文字类信息，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会给人们带来震撼和难以忽视的影响，对于多数人认可的，人们就会亦步亦趋，



西北距口岸最近的城市——塔城

学习模仿。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苏联通过巴克图对塔城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仍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而今，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口岸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现代口岸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包括运输部门和各类外贸进出口公司、保税区、仓储、报检报关、涉外金融和保险、信息通信、治安、环保等机构以及口岸管理协调部门。口岸的重要基础设施，如机场、货场、集装箱中转站和装卸点、边民互市贸易区等，建设周期长，投资数额大，检查检验等配套设施要求高，口岸开放后必须功能完善、便捷高效、服务优良，才能充分发挥整体优势。为此，国家和塔城地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巴克图口岸的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甚至硬件条件堪与一些重要陆路口岸比肩。

虽然巴克图口岸的设施、人员都已经今非昔比，但无可改变的事实是，时过境迁它已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影响塔城，对现代塔城社会和塔城人造成心灵和视觉的冲击。因为今天有了发达的媒体，有了众多的参照系统，致使塔城社会整体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已与当今的整个时代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尽管如此，口岸对塔城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巴克图口岸对塔城社会的影响已从表面走向深层，从具象走向抽象，从感官上的刺激走向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进一步还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为使塔城经济社会及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环境文明诸文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把巴克图口岸的建设和开放工作当作塔城各项工作的重要一环，扎实做好。因为口岸开放与塔城许多工作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千丝万缕，环环紧扣。

首先，做好口岸开放工作，是塔城发展战略的需要。地处西陲的塔城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还拥有区位优势、自然环境优势、人文环境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绿色农副产品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一个便捷、开放的巴克图口岸将有利于塔城“向西开放”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大通道”的建设。由于塔城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等因素，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来塔投资创业是不现实的，而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钢铁等产业的发展既污染环境，又需要高额的运输费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力资本密集型绿色无污染的农副产品产业发展战略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当然，这个思路还有拓宽的空间。

其次，做好口岸开放工作，是改善塔城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的需要。口



塔城市文化广场

岸的开放有利于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对招商引资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可以起到筑巢引凤的效果。口岸工作效率问题虽然只涉及进出口通关环节，但却备受跨国公司和现代化生产企业的关注，成为外商十分看重的投资环境。塔城要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扩大招商引资，就必须依赖于口岸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口岸开放既可以境外把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引进来，又能有效地开发利用国内的资源、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会直接影响到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的流动速度和流动规模。

第三，做好口岸开放工作，是开发“三元荟萃”特色文化，发展塔城旅游产业带的需要。塔城作为口岸城市，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别具一格的特色文化和民俗风情，与其他县市连为一气，不仅延长了旅游路线，还极大地扩大了旅游景点的类型。塔城有草原，如著名的乌拉斯台大草原；有山野，如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萨乌尔嘎夏山、玛依勒山、赛尔山、依连哈比尔尕山；有河流，如额敏河、玛纳斯河、和布克河；有著名的荒漠植被，如甘家湖梭梭柴自然保护区等。在这些风景各异的草原、荒漠和山川河流所在之地，有着种类繁多，或鲜为人知或名扬天下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每年都要接待大量的国内外游客。2013年，全地区共接待游客280多万人。这些游客从巴克图进出的很少，

整体了解巴克图口岸的也不多。因此，加快口岸开放建设，发展从巴克图口岸的进出境旅游，并把旅游线路延伸到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这对增加塔城的吸引力，提高塔城知名度，发掘塔城旅游潜力，发展塔城的旅游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做好口岸开放工作，有利于促进塔城培育依托口岸的产业群。口岸的开放与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且会带动塔城依托巴克图口岸产业群的发展，为塔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口岸经济区的最终形成。并且，通过口岸通道传递大量的国际经贸信息，为塔城地区企业及时捕捉商机，适时调整企业生产结构，实现塔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信息发达、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口岸对城市人群和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近在咫尺的城市人群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全面、无处不在的，它可能不再附着于衣食住行的细枝末节，却渗透到人的内心。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口岸开放的稳健脚步，我们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从2011年开始，塔城地委、行署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铁路建设的迫切需要，决定依托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以重大优势资源转换项目为基础，以运输燃料用煤为主体，按“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市场运作、实现双赢”思路，向自治区党委正式提出以合资铁路建设模式修建克（克拉玛依）—塔（塔城）铁路的请求，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支持，张春贤书记明确表示支持该铁路建设，并形文确定自治区党委一名分管领导具体协调推进该铁路前期工作。2011年10



与巴克图近在咫尺的塔城机场

月，塔城地区全面启动克塔合资铁路前期工作，委托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建设方案研究和预可行性研究工作，积极联络克拉玛依市和兵团九师，加强与铁路沿线有运量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徐矿集团等企业集团沟通对接，同年11月完成建设方案研究报告，2012年6月20日通过乌鲁木齐铁路局审查。

2012年5月31日，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和兵团九师作为项目建设发起人，共同签订了《建设克拉玛依至塔城合资铁路合作协议》，按照三家共同出资、共同建设、共同受益的原则参股铁路建设，并对铁路建设提供全方位支持。同年10月11日，塔城地区与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徐矿集团新疆分公司达成协议，截止12月底，三家企业首期筹措前期经费各500万元全部到位。目前，新疆克塔合资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已由塔城地区先行垫资注册正式成立，担当项目前期工作推进主体。2013年3月13日正式委托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开展可研阶段前期工作。

为加快推进克塔铁路项目前期工作，地区决定按照“分段审批，压茬开工，完善公司，多方筹资”的原则，采取整线推进、分段审批、逐段实施的工作策略，不等不靠，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力争2013年7月底完成克拉玛依至铁厂沟东铁路可研，2014年年初取得项目核准，2014年6~7月份实现控制性工程开工建设，2016年年底完成主体工程，2017年6月底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克塔合资铁路是国家铁路网新疆北疆铁路网奎北线的一条支线铁路，是铁路三北大通道、国家向西开放国际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连国家一类口岸巴克图口岸，距哈萨克斯坦国阿亚古斯市的土西铁路200多千米，辐射俄罗斯、中亚并通过第三国进入欧洲市场，口岸地缘优势突出。口岸对方哈萨克斯坦矿产资源丰富，铁矿、铬铁矿、钾盐、硫铁矿、铝矿、铜矿是新疆乃至全国的短缺矿种，可通过联合开采或直接进口以弥补经济建设不足。随着国家间资源战略合作的深入以及巴克图口岸出入境旅游的加快推进，必将促进克塔合资铁路与哈萨克斯坦国铁路连接工程的建设，形成向西开放的国际大通道，有效解决北疆西部地区农副产品、机电、化工等产品的外销和哈国小麦、油气、矿产资源的进口问题，推动克塔合资铁路国际物流、国际贸易、国际旅游和国际物流服务化发展，促进投资企业国际化。铁路建成后，预测近期运量可以达到1042万吨，远期运量达到1545万吨。因此，加快克塔合资铁路建设是建设西部国际大通道，

促进企业向西发展的迫切需要。除此之外，克塔合资铁路对建立新疆安全屏障，确保国防安全、边境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克塔合资铁路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一旦建成投入运营，必将极大地改善塔城的交通运输条件，给塔城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旅游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根据克塔铁路的方案设计，该铁路东经克拉玛依—准东—哈密通往内地，西经塔城巴克图口岸出境通往中亚、欧洲。国家发改委将其列为新亚欧大陆桥北线方案（又称“第三条亚欧大陆桥”）的国内最西段。新亚欧大陆桥北线起始于渤海湾的天津港，经北京、呼和浩特、哈密、克拉玛依、塔城，从塔城巴克图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坦的阿亚古斯、阿斯塔纳，俄罗斯的乌法、莫斯科，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乌克兰的华沙，德国的柏林，终点是荷兰的鹿特丹港。

随着这一方案的实施，克塔铁路将成为国际铁路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城巴克图口岸也将成为国际铁路口岸枢纽站、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美丽廊桥。届时，巴克图口岸的作用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带来外向型经贸发展、文化交流和因为距离遥远，旅游事业新的辉煌，为塔城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纵观巴克图，它就像是生长在无边旷野上的一朵小花，我们无从感知它的容姿。但当她进入你的视野，当你目睹她生长、展开，一点点绽放，当灿烂的阳光再次把她映入人们的眼帘，我们才会发现，它是那么独特、美丽，美得动人心魄。

尾 声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大门 ——巴克图展望



塔城市街景

塔城曾经是引领新疆风潮的地方，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口岸文化、戍边文化、包容文化、生态文化。在这些文化中，口岸文化更是对塔城特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塔城地委书记张博曾反复阐释这四种文化的内涵与核心，他强调：口岸文化的核心是开放。这是对塔城历史深入理解后的卓见。有了巴克图开放的历史，才积淀了塔城人开放的胸怀和心态，从而孕育出真挚的爱国情怀、豁达的包容自信，最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开放、包容、和谐、稳定的塔城。

纵观历史，新时期巴克图口岸的开放，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开放均有不同，如果说以前的开放有被迫的因素，或者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那么，新时期巴克图口岸的开放则是塔城人民在久经封闭后的一次主动选择。就像在一个沉闷的暗室居住得太久的人，渴望室外的空气和阳光一样，塔城人民以迫切的期待的心情迎接这次新的开放。从人们心态的角度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

正因为有了这种积极心态，在推动口岸开放过程中，当地党委、政府在国家支持下，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得到了民间社会的一致赞同。自上而下，大家真诚地欢迎口岸开放，热情地维护开放。口岸开放伊始，许多人以积极的心态加入到边境贸易的队伍当中，通过旅游购物、以货易货等方式把自己和巴克图口岸联系在一起。同时，在开放初期，鱼龙混杂，霎时都一涌而来，而贸易的方式、品种、额度，一切程序规则都在探讨和制定之中，这种状况确实给一些冒险者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淘金机会。不少有胆识的人就是利用这个时机，挖得第一桶金，顺势而为，更上层楼，赚得罐满盆盈，从此走上了专门从事边境贸易的道路。当然，当地政府也通过扩大客源、提供服务、拉动就业、增加税收等方式分得了口岸开放的红利，间接反馈了塔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塔城市区一角



平坦宽阔的巴克图口岸道路

口岸的开放涉及中哈双方，亦非一帆风顺。当口岸开放遇到困难时，当地党政领导积极协调，努力争取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使口岸开放步入正常营运，他们付出的艰辛总能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赞扬。每逢此时，都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外贸或与巴克图开放有关的产业行列。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巴克图口岸开放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20年中虽有纠结、有坎坷，但总的来说，快速发展的口岸贸易还是为塔城人民带来了财富，为塔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巴克图口岸获准国家一类口岸和对第三国开放之后，易货贸易逐渐转变为结汇贸易，巴克图口岸过货量猛增，巴克图口岸对塔城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大。2010年，以蔬菜为主的农副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开通后，这种贡献就更为显著，并成了支撑塔城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中国可以与欧亚各国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人民自然是欢呼雀跃。作为丝绸之路西线上的重要路段，塔城获得了天赐良机。

塔城地委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认真研究塔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位置和作用，根据自治区关于新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定位，确定了塔城地区及巴克图口岸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自治区对新疆的定位是：努力将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建设成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切实当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总结起来，就是“五中心三基地，大通道核心区，主力军排头兵”。根据自治区这一定位，塔城地委经过认真讨论，提出了塔城地区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要作“五个通”的前沿，作“两个合”的载体；以“五个通”、“两个合”为重点，为丝绸之路建设作出贡献。

塔城地委书记张博在传达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会议上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今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的，核心就是“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要充分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意义，必须很好地学习。9月17日中央领导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两个合”：第一个“合”是加强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第二个“合”是合力打击“三股势力”，进一步明确了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要发挥的作用。新疆在祖国西北部，塔城在新疆西北部，所以我们要率先深刻地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意义，这是中央的部署。

2014年1月在地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张博再次指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塔城作“五个通”的前沿，要做好以下工作，即通过政策沟通，大大改观口岸通行状况；通过道路联通，修建克塔合资铁路，与哈萨克斯坦的阿亚古斯相接，建起第三座欧亚大陆桥；通过贸易畅通，开通农产品“绿色通道”，扩大对哈贸易；通过货币流通，力争坚戈在塔城市、人民币在东哈州跨境使用，利用境外人民币资金服务于塔城经济发展；通过民心相通，发挥地理相近、侨民聚居、人文相亲和语言优势，推进文化交流、旅游往来、人员流动以及民间活动，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两个合”的载体，塔城一要以巴克图辽塔新区为载体加强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二要以各县市的强项为载体加强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三要以中哈文化交流为载体加

强人文领域的合作。自治区提出把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文化科技中心”，塔城就应该成为“文化科技中心”的示范园。以此为基础，张博因地制宜地对地区各县市提出了具体要求：沙湾县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使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长足发展，建成绿色农产品进出口交易和物流配送中心。依托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培育外向型职业农民队伍，到东哈州从事农业合作开发，建成新疆重要的面向中亚细亚、欧洲棉花系列加工出口基地。乌苏市除了要打造塔南国际商贸物流园外，还要尽快形成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新型建材、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为主的出口商品加工基地以及以矿产、能源、粮食等为主的进口商品加工基地，开拓国际市场，带动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逐步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品质。托里县要在托里工业园金港区、金塔区打造塔城盆地重要煤电能源基地和有色金属加工基地，建成一批高载能、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工业园金准区打造塔城盆地重要的建材加工集散基地，依托高速公路和铁路大通道，进一步扩大托里花岗岩等建材产品在疆内市场的占有份额，并拓展销售到中亚市场。把工业园金港区打造成白杨河矿区重要的机械制造及维护基地、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交通运输中转基地和生活用品供应基地。和布克赛尔县除了要打造塔北国际商贸物流园外，还要建成国家级准北能源基地、煤炭深加工基地。自治区提出把新疆建设成“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塔城就应该成为“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的“非常规油气罐”。常规油气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我们恰恰可以在非常规油气资源上做文章。要以创建国家级和丰工业园区为平台，以庆华能源、苏新能源为排头兵，建设油砂、油页岩、煤制油、煤制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加工储备园区。额敏县要建设优质绿色有机农产品出口基地、食品深加工基地。打造农作物制种大县，力争农作物优良品种出口。加快智能电网控能储能基地建设，打造新能源出口基地。把哈萨克妇女手工刺绣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大做强。裕民县要搞好绿色生态旅游，提高特色服务业的档次，在与阿拉湖最近的（19.5千米）边境争取开通旅游口岸，与巴克图口岸“三日游”相衔接，打造出入境旅游新通道。用巴什拜爱国人士的人文资源架起文化沟通的桥梁。做好巴尔鲁克山创建国家4A级景区工作，力争早日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塔城市除了要打造塔西国际商贸物流园外，一定要力争早日实现异地办证出境旅游。努力为哈方入境游客营造

优质旅游购物环境。以哈方人员入境“三日游”为机遇，建立国际医疗合作机构，积极开展会诊治疗等交流服务。自治区提出把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医疗服务中心”，塔城就应该成为“医疗服务中心”的“康复区”。以中医、哈萨克医、蒙古医、维吾尔医为特色，联合疆内外、国内外高水平医疗机构，“提供硬件，吸引人才，形成特色，服务周边”。塔城市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和巴克图辽塔新区、小白杨市、裕民县、额敏县联手打造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祥和安逸的养生之都。地委扩大会议制后，下属各县都在按照地委和张博提出的要求，制订方案，绘制蓝图，进行贯彻落实。

在2014年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以讲述历史的方式，重提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愿与沿途各国互利共赢，再次引起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共鸣。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理念是开放包容、共商共建、互利互赢，这恰与塔城地域文化的内涵相契合。塔城是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巴克图口岸与中亚哈萨克斯坦相通，这都为塔城搭乘“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趟便车提供了机会。为尽快将这张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塔城地市党政班子热切探讨，认真思考，更具体地提出了把塔城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大通道”的思路，并向塔城市提出了“西出兴边靠塔城”的工作要求。其中心就是依托巴克图口岸，加快向西开放，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往中找准定位，获得自身发展的新支点。为使构想变成现实，塔城各界正采取多种措施，上下一心，齐头并进，为构想的实现而努力。当前，克塔铁路已经开工建设，进展顺利，其他各项计划也都在按照计划有序推进。不久的将来，随着建设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全面实施，巴克图口岸的魅力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展现，塔城的对外开放事业也将因此而大放异彩。

塔城人有梦想、得地利、应天时，又有口岸外文化的浸润参照，只要团结奋斗，我们有理由相信，塔城人民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在实现美好愿望的进程中，巴克图口岸必定会放射出更耀目的光芒。

参考书目

- [1] 塔城地区志. 塔城地区史志办.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9.
- [2] 塔城市志. 塔城市史志办.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6.
- [3] 巴克图口岸志. 塔城地区口岸志编委会, 2010. 12.
- [4] 塔城地区外事侨务志. 塔城地区外事侨务编纂委员会, 2003. 12.
- [5] 新疆历史论文选编. (隋唐、清代、民国) 新疆通史编委会. 乌鲁木齐: 疆人民出版社, 2008. 12.
- [6] 新疆外事志. 沈炳年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5.
- [7]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巴尔托德.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07. 6.
- [8] 多桑蒙古史. 多桑著, 冯承钧译.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13. 9.
- [9] 普兰·迦儿宾行记鲁布鲁克东方行记.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9. 10.
- [10]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 西辽史. 魏良弢.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9.
- [11] 最后一个游牧帝国. 宫胁纯子.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4.
- [12] 准噶尔史略.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9.
- [13] 世界征服者史. 志费尼.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1.
- [14] 伊犁纪行. 日野强.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9.
- [15] 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 白振声, 鲤渊信一.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12.
- [16] 新疆三区革命史. 徐玉圻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9.
- [17]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徐玉圻, 张克迅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9.
- [18] 塔城地区金融志. 马凤仪, 刘向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9.
- [19] 新疆游记. 谢彬.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0. 7.
- [20]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1927-1935. 斯文·赫定, 1992. 9.
- [21] 中亚探险. 橘瑞超.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12.
- [22] 荒漠寻宝. 奥勃鲁切夫.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 4.

- [23] 中亚通史（古代卷）. 王治来.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2.
- [24] 新疆三区革命史鉴. 杜坤荣, 纪大椿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9.
- [25] 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 沈志华编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4. 1.
- [26] 西域钩玄. 罗绍文.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7.
- [27] 新疆 1912. 崔保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
- [28] 中亚历史. 巴尔托德.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4.
- [29] 元朝史. 韩儒林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4.
- [30] 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 耿世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8.
- [31] 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和治新实践研究. 金代新.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9.
- [32] 广禄回忆录
- [33] 新疆外事志. 新疆通志·外事志编纂委员会.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5.
- [34] 新疆与中亚跨界民族研究. 艾来提·托洪巴依.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9.
- [35] 塔城史话. 刘向晖, 贺萍.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4. 12.
- [36] 在塔城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4 年 1 月 14 日. 张博.
- [37] 在传达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会议上的讲话. 张博.
- [38] 在参加地区口岸委党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张博.
- [39] 在第二届巴克图论坛上的发言. 张博.

YSYXZRGS

YSYXZRGS

YSYXZRGS

YSYXZRG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新疆塔城 : 口岸文化 / 刘向晖著 . -- 乌鲁木齐 :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4.12

ISBN 978-7-5466-2844-8

I . ①中… II . ①刘… III . ①地方文化—研究—塔城市 IV . ① G127.4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7586 号

新疆塔城口岸文化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255 号

邮政编码 830049

电 话 (0991)2870049 2888243 2866319 (Fax)

E - mail xjkjcbhbs@yahoo.com.cn

责任编辑 顾雅莉

经 销 新疆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友邻》杂志社

印 刷 新疆塔城中信天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16

印 张 14

字 数 240千字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